#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 ——回忆艾思奇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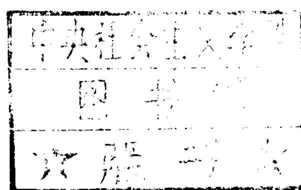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云南人民出版社

58663

#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陆定一题



责任编辑：肖若勤
封面设计：孟庆谷

#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 ——回忆艾思奇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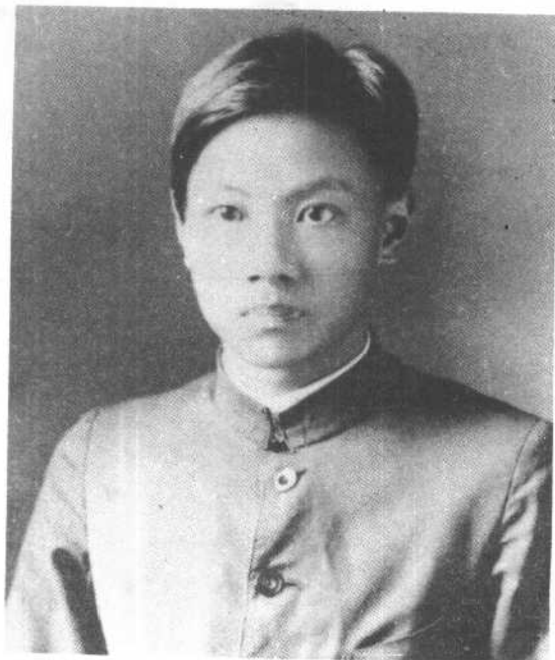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3,000
1981年3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二版第三次印刷
印数：9,481—15,780

统一书号：3116·399　定价：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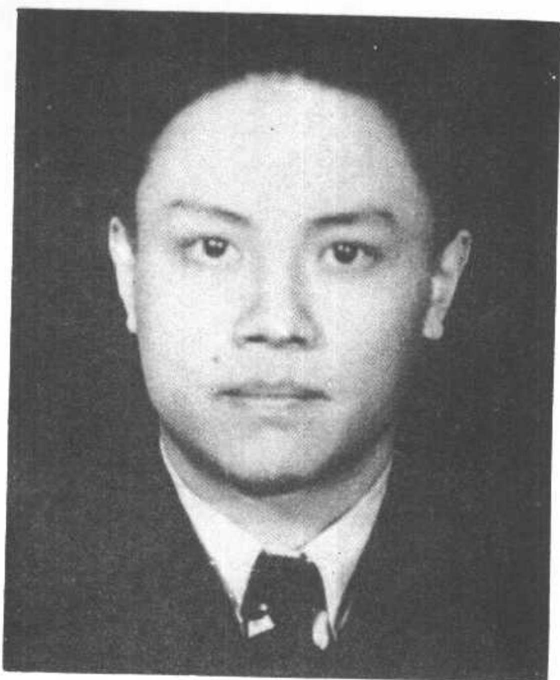
艾思奇同志



一九二八年，艾思奇同志在日本。



一九二九年，艾思奇同志从日本首次返回昆明。



一九三五年，艾思奇同志在上海。



写《大众哲学》时期的艾思奇同志。



一九四〇年，艾思奇同志在延安。



一九三九年春，以林伯渠同志为首的延安各界代表团赴中牟县奠祭黄帝陵。右五为林老，后左三为艾思奇。



一九五〇年，艾思奇同志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社会发展史》。



一九五一年，艾思奇同志在安徽宿县。



艾思奇同志在天津

艾思奇同志在中央马列学院滑冰场上。





一九六四年，艾思奇同志在写作。




艾思奇同志部分著作



艾思奇同志辅导过的农村盲人青年

东北旺农民悼念艾思奇同志



# 序

刘白羽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多年了。这本回忆录中的文章，对于这位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深切怀念，是反映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毛泽东同志的引导下，从哲学家书斋里解放出来，成为人民大众直接掌握的思想武器。艾思奇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就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正因为如此，艾思奇同志为哲学，同时也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认识艾思奇同志的。记得是夏征农同志介绍，我到他在霞飞路的寓所里拜访了他。当时，他已是一位出名的哲学家，但他质朴热情，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日战争的烈火，照红了中国的天空和大地。我在狂轰滥炸、风雨饥寒中历尽艰辛，于一九三八年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我立刻就去找到艾思奇同志，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啊，你来了，欢迎你！"使我这从漂泊中来的人，有归家温暖之感。他把我安置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地址在延安城中心一座小教堂旁边的院落里。艾思奇同志是文协的主任。从此，他不

但是我思想上的启蒙者，而且是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领路人。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当时我有一种思想，觉得搞搞文字工作与实际无补，一心想到战场上去作一个战斗者，艾思奇同志同情并支持我的愿望。五月，毛泽东同志派我陪同美国朋友卡尔逊先生访问华北各游击根据地，在硝烟战火中通过几道封锁线，在河北大平原上冲着狂风暴雨，飞马奔腾。我热爱战斗的人民，热爱战斗的党，回到延安，我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艾思奇、柯仲平是我入党的介绍人。

一九三九年我到太行山去了一年，再回延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这时，艾思奇同志是中央文委秘书长兼“文抗”主任。从到延安以后，艾思奇同志就是我的领导人，但在相处中我们是朋友，我们都管他叫“老艾”。艾思奇同志沉默寡言，但他的诚挚的目光和亲切的微笑，说明他是一个心地坦白、胸怀坦荡，你完全可以和他赤诚相见的人。我和默涵、柳青在“文抗”做支部工作，我常常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总是变成无边无际的漫谈。在延安，生活是艰苦的，艾思奇同志每得了稿费，常约上几个人会餐一顿；公家给他一匹白色瘦马，常常拉给别人骑了，他自己却迈着阔步走。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尤其热爱文学。你以为他只是一个深思善虑的严肃的哲学家，那就错了，他还是一位意绪蹁跹的诗人。他翻译的海涅的诗歌是很出色的，他写的文学论文也十分精辟。我从没有看到艾思奇同志发怒过，可是他对于文艺界一些不正之风，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迎着思想逆流，他那正气凛然的神情，至今令我心驰神往。记忆中，一盆鲜红的炭火，一窗昏黄的灯影，都萦回着我对艾思奇同志在延安的怀念。

由于战争与工作关系，几十年间，我和艾思奇同志常常远隔天涯，但见了面总是那样亲热。我一九四四年调去重庆工

作，一九四六年作《新华日报》记者访问东北后，曾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窑洞里住了二十几天，奋笔疾书，写了《环行东北》。这中间，很受到艾思奇同志鼓舞。记得每当晚饭后，映着斜阳，立在清凉山上，跟艾思奇同志谈起东北见闻，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还拿了我的两篇稿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艾思奇同志是热爱生活的，也很富有生活情趣。解放后，有一次，我和默涵到党校去看他，见他书桌旁小几上放着一架留声机。他全心全意，勤奋著述，在休息时，他就陶醉在音乐中。艾思奇同志对文学艺术有卓越见解。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叹于文艺理论贫乏，我曾说过，“要是艾思奇同志那样有哲学素养的人，出来写写，会大大提高文学理论水平。”为此，我曾专程到他那里去，劝他写写文学论文。他热忱地答应要写，但他又说：自己把全部时间花在教学方面，没有参加文学方面的活动，要写还得调查研究。他绝不做那种自以为是，无所不通，而又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空头“理论家”。这正说明艾思奇同志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

读了吴黎平、林默涵和其他同志的回忆文章，我深受感动。艾思奇同志的诚挚的微笑，又那样亲切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真理是无穷无尽的，追求真理的人需要艰辛跋涉。艾思奇同志一生心甘情愿作思想战线上的一名战士，总是埋头地、默默地工作着，他从没有借“学术”为阶梯谋取什么“权威”“地位”。艾思奇同志真正有学问，因此他真正谦虚，总是不倦不怠，孜孜以求。他确确实实做到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艾思奇同志诲人不倦，待人以真，而又不把感情流露在表面。他使人感到温暖，觉得真诚。这是艾思奇同志可敬可爱的高贵品质。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觉得这本回忆录，不是描写什么叱咤风云、光彩耀目的英雄，而是介绍一位以毕生的心

血默默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实人。做一个真正的老实人是不大容易的。延安的一个夜晚，我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当我们谈到艾思奇同志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这里说的好人，就是老老实实的人。毛泽东同志给予艾思奇同志以高度的评价。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光明，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一个开辟人生道路的勇士。在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学习艾思奇同志，我认为对我们有深刻的意义。

PG25/14

# 目　录

序……………………………………………………刘白羽（1）

忆二哥青少年时代……………………李贤贞　李生葱（1）
学生、战友、同志………………………………楚图南（11）
勤奋的学者　坚韧的战士………………张天放　遗作（14）
艾思奇同志在昆明一中…………………………张克诚（18）
回忆艾思奇同志在《云南民众日报》片断……陆万美　遗作（24）
忆思奇同志二、三事……………………………姚蓬心（30）
家乡人民的怀念…………………………………尹文和（35）

老艾在上海………………………………………许涤新（42）
热心科普创作的哲学家…………………………高士其（46）
怀念艾思奇同志…………………………………李凡夫（49）
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郑易里（53）
难忘的记忆………………………………………何定华（57）
思想战线上的卓越战士…………………黄洛峰　遗作（61）
怀念艾思奇同志…………………………………金　丁（70）
艾思奇同志在申报流通图书馆…………………王笠夫（75）
忆思奇同志………………………………………刘惠之（80）
艾思奇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哲学活动
……………………………………叶佐英　卢国英（86）

# 忆二哥青少年时代

李贤贞　李生莼

我们和生萱二哥（艾思奇是笔名）相处的时间较短，生活在一起主要是青少年时期，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父亲李日垓，是一位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清光绪间入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毕业后被委任为全滇沿边土民学堂总办。他曾加入“同盟会”，该会派他回滇组织秘密反清活动。回滇后，他在腾龙永顺思普沿边创设民族学校128所，并以学堂总办的职务作掩护，在滇南一带进行革命工作。护国讨袁，他任秘书长，所以他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云南领导人之一。他常对生庄大哥和二哥讲述反帝反封建是兴邦救国之根本的道理。在父亲的言行的影响下，二哥自幼即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3年至1925年，父亲因受军阀唐继尧的迫害，全家被迫迁居香港，二哥考入岭南分校高小肄业。这所学校是教会办的，校长司徒晃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校内课程设置是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课，司徒校长兼任圣经课主讲。二哥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独圣经课他没有兴趣，上这门课时，他总是偷看闲书。有一天，司徒校长讲到圣经中的：“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这一段“福音”时，二哥愤忿地站起来说：“我反对这样做！我们不是奴隶，挨了打，就应该勇

于还击，我们不能忍受屈辱。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他这么一说，课堂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司徒校长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这完全是对上帝和耶稣的冒渎，不听主的旨意，上帝将降罪于你，我们也将处罚这样的学生。”说完就宣布下课。在教会学校，违背“圣谕”的处分是重的，可以记大过，也可以开除学籍。但当时我父亲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驻港代表，在香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学校对此，也只好通知家长教育了事。二哥素性喜深思，沉默寡言，但在是非问题上，他却滔滔辩论，坚持真理。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念书，读四书五经。老先生很严厉，书读不好，就要打手心。二哥攻读用心，从未受过体罚。父亲对子女的学业管教极严，督促检查，严肃认真。二哥读古文有一定基础以后，父亲常教他读先秦诸子学说，讲解各家各流派的思想。我家藏书很丰富，父亲也常指导他如何选读和读书的方法，慢慢地二哥已有自行选择阅读的能力。由于二哥自幼受父亲的培养，这对他以后研究哲学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哥对弟妹的学业也是非常关心的，记得四弟生髫幼年，尚未入学，二哥每天总要用一两个小时，抱着他，把着手教他练毛笔字，教他认单字，读粗浅的课文。我们年岁大些，能读一些书了，大哥二哥就常在晚上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和鲁迅的作品，对书的内容和辞句都作详细讲解，对增进我们的阅读能力，帮助很大。我母亲笃信佛教，但她是文盲，不能诵经文，她叫二哥教她认字，二哥说这是为母亲扫盲，一有空就教她认字，渐渐地母亲也识字不少。

我母亲的座上客，常有一些尼姑和“斋奶”，这些人很迷信。有一天，她们说狗和姑娘不能上屋顶，否则就会引起火

灾。二哥听了就抬了梯子，搭在屋上，抱了只狗登上屋顶，还叫妹妹也跟着上去，大声叫道："房子着火了没有？"急得母亲和尼姑们连呼"阿弥陀佛"。又有一次，母亲摆满了一桌糕点供献菩萨，二哥偷偷地拿了几块藏起来，母亲发现后，追问我们弟兄是谁干的，二哥说："是弥勒佛偷吃了。"母亲说："胡说！弥勒佛是瓷器制的，怎么会偷了吃。"二哥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母亲连声说："你这娃娃家，懂什么。"二哥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

父亲整天要我们用功读书，但很难关住我们，一有机会，我们总要溜到郊外玩一阵。有一次，二哥约了表兄寸时能和几个小朋友，到昆明东门外八大河游泳。这条河有个大湾子，水流湍急，有漩涡，常有人因水性不熟游到那里发生意外的，因此人们叫那个地方叫鬼门关，说那里有鬼。二哥他们就不相信，硬要去试个究竟。去的时候，还把同住的六岁多的小三妹张煜（一九三七年到延安，现在沈阳工作）也带了去。到了河边，几个人脱了衣服，让小三妹在岸上守着，一个个跳下河，往"鬼门关"游去。那里有几块大岩石，他们游到那里，故意潜到水底，躲到岩石后面，逗小三妹玩，小三妹不见他们的踪影，以为淹死了，急得边哭边喊往家里跑，告诉了父母亲，全家都慌了，立刻派人去看，见他们都光着身子在岸上。原来他们是逗小三妹玩的，后来游到岸上，不见了小三妹和衣服，只好在岸上等，直到派去的人找到他们。一回到家，父亲喝令跪下，难免挨了一顿痛打。这种惩罚并不全有效，过了一段时间，只要父亲不在家，我们还是往郊外跑。

一九二五年，二哥考入省一中插班二年级。这个学校是云南学运的策源地之一，早在一九一九年该校即成立了"学生自治

会”，由校内师生创办了《滇潮》这份刊物，作为宣传喉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滇潮》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推翻旧制度，解放妇女，反对婚姻包办，提倡白话文，同情劳动阶级，提倡科学和民治主义。”《滇潮》的这一倾向，对当时社会改革起了促进作用。省一中图书馆主任李国柱，是个共产党员，他以图书馆的工作为掩护，发起组织了“青年读书努力会”，把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二哥很快就同李国柱结识为亲密的朋友，他受到李国柱的启发和熏陶至深。当时，楚图南、罗稷南也在省一中任教。在李国柱和他们的指导下，学生会和《滇潮》有了正确的方向，二哥和一些进步学生，如张克诚、毕昌杰、饶继昌等，也参加了学生会的活动和《滇潮》的编辑工作。那时，该刊仍以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为编辑方针，也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当时，在校内由同学汤开国负责成立了一个共青团领导的外围组织——“娱乐会”。二哥担任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每晚在全校熄灯后，点燃小油灯，埋头写宣传稿。学监方介福查夜时发现了，有一次，方学监告诫说：“李生萱，你每晚总是不按时熄灯，再不听话，就要处罚你了。”二哥只好把灯吹灭，待学监走了，他又点灯继续写作。学校里有个盥洗室，同学们都把洗脸用具放在里面。二哥常在深夜把传单、宣传品分放在每个脸盆里。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便可拿到一份。

“娱乐会”开会是在东校理化教室，这是个阶梯式的课堂，面积大，能容纳二百人。每次开会，都是在晚上九点熄灯以后。事先互相暗中口头通知，到时各自悄悄带上蜡烛或煤油灯去开会。“娱乐会”的内容由汤开国和二哥商量组织，一般都是有关文化学习、时事报告、各种学术讨论等，而党的宣传、组织、训练等工作也就渗透在其中了。二哥经常在会上演

讲和发言。

“娱乐会”也有一些不定期的话剧演出。在昆明登台演剧，在封建社会是受鄙视的，认为是当“戏子”。二哥在宣传鼓动方面，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最麻烦的是女角，一个男子中学，哪来的女角？在那样的社会里，女孩子又怎敢上台唱小旦？为了解决女角的困难，几次演出都是由二哥承担了下来。为了宣传新文化，倡导和普及新文艺，他什么都乐意去做。

由于团组织的校际活动加强，二哥和各中学的一些进步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聂耳的关系很亲密。聂耳在省立师范学校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乐器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每遇省一中开话剧晚会，就请他们在台下演奏一些节目，以增强对剧情的烘托和活跃会场空气。后来聂耳的乐队进行了许多专场演出，艺术效果很好，对传播新文化起了很大影响。

当时，二哥在校内与党组织已有联系，他常弄到一些内部发行的刊物和书籍，为了避免受到反动政府的查抄，他都把封面加以伪装，写上什么“红楼梦”、“七侠五义”、“菜谱”之类的名称，翻开一看，却是“共产主义ＡＢＣ”、“共产党宣言”等。这些书，二哥都拿给进步同学传看。

二哥的活动，渐渐的已超出了学校范围。他和同学张克诚、甘艺在学校附近的天君殿巷内办了一个夜校，专收附近工厂和贫苦人家的子弟读书，免收学费，还供应纸笔课本，经费主要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二哥他们自己也筹措了一部分。

此外，二哥还邀约了讲武堂的那维新、成德中学的张淑良与杜逵，在校外成立了一个“青年读书会”。他拟出了章程，印好分发征求社会青年参加，征求的对象是“思想进步，爱好读书的人”。宗旨是：“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做些工作。”组织起来后，选二哥为负责人，地址在昆明先生坡一号。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的书籍集中在那里，

建立了一个图书阅览室，这些书里有不少是改换书壳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家借阅书籍后，都要写出心得，每逢星期天举行一次报告会，由那些学习较好的会员宣读或演讲。这个组织研究的是新思潮，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会不断有进步青年参加，发展到四十多人。他们也常参加社会上的革命活动，因而为人们所注意，也引起了反动政府的监视。

二哥经常撰写反帝反封建文章在《滇潮》发表，有的时候，也把矛头直指军阀唐继尧。除此以外，他还参加党团领导下的游行示威，声援讨伐，宣传鼓动，奔走呼号，冒险犯难，他都是站在最前列。那时的口号主要是：打倒军阀唐继尧，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倡导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提倡天足等。其他如抵制日货、捣毁日本洋行以及声援外省的民主运动，二哥总是以最大的热忱积极参加。正因为如此，二哥引起了反动军阀政府的注意。唐继尧与我父亲是政敌，得知二哥参加革命活动反对他，气得对他的部下叫道：“跑掉了老子，跑不掉儿子，把他抓起来！”

一九二六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在昆明兴华街青林巷二号的家里，突然有几个便衣和军警闯了进来，追问母亲说：“李生萱在哪里，叫他出来，我们要找他去谈话。”说着就各屋搜查。恰巧二哥不在家，一无所获。母亲和我父亲的学生李沛阶（他家租住我家的房子）见势头不对，急忙用眼睛示意妹妹，她领会了意思，趁特务不防时，偷偷溜到街口等着。不久，二哥回来了，她急忙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二哥立刻转头到一家同乡家去躲避。第二天，为了安全，李沛阶就把二哥转移到他正在兴建的新屋藏起来。二哥在暗阁楼上躲了两个多月，经李沛阶多方设法，请一位英国牧师帮忙，把二哥乔装成这位牧师的家庭教师，趁他回国之机，弄了一张护照，随同牧师离滇，经越南到了香港，和牧师分手后，二哥即赴苏州到了父亲住处。

那年，大哥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父亲叫二哥也到那里去继续学习。当时，北伐军已逼近江浙，军阀孙传芳惊恐万状，疯狂抓人。大哥是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孙传芳下令逮捕他，恰巧他外出，只有二哥和一个同乡熊怡琴在他的宿舍，军警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俩抓走。大哥闻讯，赶赴苏州告诉父亲，经宗伯李根源出面营救，二哥等才免于难，被释出狱。二哥到了苏州，跟父亲住宗伯李家。因为外面风声很紧，父亲不让他外出，并教他读《老子》、《庄子》、《墨子》等书，边读边讲解，使二哥进一步懂得那些深奥的哲理。这时二哥十六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他抓紧时间，复习了数理化课程。

大哥学的是西洋哲学。他见二哥对哲学有兴趣，也常常介绍一些外国的哲学思想，指导他看有关材料。二哥在青年时代在哲学上能打下初步的基础，也有大哥的一份心血。

二哥在苏州住了一段时期，父亲不愿让他学业荒废，要他继续上学。在国内就读，政局不定，兵荒马乱，而且两次出事，总不放心，决定让他去日本留学。一九二七年，二哥十七岁，东渡日本，到那里以后因学习过于刻苦，生活上又不注意，得了严重的胃病，不得不于一九二八年暂时回昆明养病。母亲为他的病非常焦急，他却忍着病痛，泰然自若，反而劝慰母亲。回昆时，他带来了许多马列著作，如《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有英、日、德文各种版本。这些书在当时是禁书，一旦被海关、路卡发现，就被没收，人还得坐牢。二哥为此想了许多办法，有的换去封面，有的混在科技书里，有的藏在夹底箱里，巧妙地运到昆明。为了防备查抄，就在低矮的厅堂前屋簷下的顶楼里，敲开一块活动板，把书秘密地收藏起来。二哥最珍惜的是时间，养病期间仍然手不释卷，孜孜自学，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他看比较艰深难懂的理论书籍，

肯花时间和精力，知难而进，决不半途而废。有一次，他读一本黑格尔的著作，从日本读到昆明，竟花了半年时间，书被翻得残破不堪，字行间划了很多红蓝色重点号，空白处和夹缝间也写满了批注。他常说："我不喜欢一本书只看半截或不全理解就丢开，怎么也要把它啃完，全弄懂。"

二哥自幼就学英语，从未间断，所以基础较好。到了日本刻苦学习日文，进度很快，看书和翻译，基本上问题不大。要读马克思原著和德国古典哲学，就要懂德文，在日本他兼学德文。回滇以后，他就努力攻读德文。他用道林纸裁成小条装订成小本，每一页上写一德文单词和文法，下面就注上日文和英文的同义词和语法。这样，在一张小纸条上，就可以学到三种文字。小本放在口袋里，随时取出背诵，经过刻苦自学，他终于把德文学到手，借助字典可直接阅读德文理论原著，甚至连文学作品也能浏览了。

二哥在日本学会了《国际歌》、《伏尔加船夫曲》、《马赛曲》等，他译成中文，教朋友们唱。

当时，昆明办了一份《云南民众日报》，报社里工作的，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该报副刊占一版，上半版"象牙塔里"（它的刊头是二哥设计的），主要发表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下半版"杂货店"着重刊载杂文、散论，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和新哲学的理论介绍。它的杂文，针对现实，毫不客气，敢说敢骂，文字少用成语，通俗易懂。主编是我大哥。"杂货店"的文章以大哥和二哥写的最多，大哥用的笔名是"老幺"、"小伙计"，二哥用的笔名是"小幺"、"店小二"。他俩写的杂文说理较深，笔锋尖锐，颇似鲁迅风格。二哥不仅写杂文，还翻译了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以及海涅的诗篇，登在"象牙塔里"。此外，二哥还用通俗的笔调，写了一些关于哲学问题的介绍文章。有时由于大

哥二哥对哲学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解释，如“费尔巴哈论”及“白马非马”问题的辩论，也引起了其他人写文章参加讨论，活跃了昆明的论坛，同时对读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哥在昆明养病的时间不长，经母亲精心为他调理，很快恢复健康，他又离昆返回日本。

由于受父亲的“工业救国论”的思想影响，他接受了父亲的意见，考上了日本福冈工业学校学习冶金，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学习哲学。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激于义愤，他弃学回国到了昆明。

图书馆简直成了二哥的第二个家，从中学时起，他就爱去图书馆，就是后来在上海，只要有空，他便跑到东方图书馆去，直到黄昏才回住处。内山书店和四马路的一些书店，也是他的经常去处，他没有富裕的钱买书，只好到书店去看，并重点作些笔记。

二哥没有“金字招牌”的学历，他上过小学，入过中学，也进过大学，但都没有毕过业，得过一张文凭。他后来在哲学上有一些成就，也没有什么奥妙的秘诀，归纳起来，只这么两点：勇于攻关的毅力，勤奋自学的恒心。

一九三二年的初春，二哥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云南，离开双亲和年少的弟妹，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我们全家日夜思念着他，盼望早日与他重逢，母亲更是望眼欲穿。在母亲多病的那些岁月，她常念叨：“在我活着的年岁，是怕再看不到生萱了，可是我常常梦见他回来。”母亲为思念二哥流干了眼泪，临终还在呼唤着二哥的名字。

二哥回到昆明的谣言，我们是不止一次听到的。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放出风声说“艾思奇回云南来搞总暴动”。扬言抓不着二哥就要抓大哥，并派人到家盘问我母亲。母亲和大哥在威逼下，不得不躲到亲戚家去。一九四六年李公朴先生

惨遭国民党杀害，昆明街头竟出现了“艾思奇是暗杀李公朴的凶手”的标语，母亲和家人又是一阵担惊受怕，家里被特务搅得不安宁，母亲只好又藏起来。母亲常叹息说：“他要真能回来让我见见面，我死也瞑目了”。但二哥为了革命工作，一别不归，未能再与二老见面，也没有和他所敬重的大哥重逢。正如他寄自延安的一封家信所说：“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将尽全力拿点别方面的成绩来赎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吧！……”二哥一生确实是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的诺言的。

二哥永远离开我们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思念手足深情，心潮起伏，悲痛难已！片断回忆，无非是留形迹于楮墨之间而已。

一九八三年

# 学生、战友、同志

楚图南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我从北京回到云南昆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和陈小航同志(即罗稷南)在云南省立一中教书。我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其他朋友一起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等团体，半公开地进行大革命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宣传，团结了一批学习勤奋、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另外几位思想进步、和李生萱极为熟识的青年有共产党员李国柱等几位同志，当时他们在学校工作。李国柱同志后来曾赴苏联留学，不久回国，在云南从事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光荣地牺牲在云南地方军阀的屠刀之下。因为受到波及，生萱逃到上海，从事理论工作，并开始以"艾思奇"为笔名，写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文章，在《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他的名作《大众哲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从此，艾思奇开始成为一个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家，而他的真名——李生萱，倒很少有人知道了。

一九三五年，我从东北出狱后，到了上海。当时作共产国际工作的陈小航同志也从天津来上海相会。这期间，我们和艾思奇同志经常相会。十年前，我们曾是师生关系，十年来，为着共同的理想，我们都进行了斗争，初步的经受了一些考验，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成为战友，成为同志。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常

在一起讨论国内外的形势和当时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艾思奇作为一个敏锐的哲学战士，我们自然希望他能为在国内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做出贡献，更希望他能在哲学和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发挥作用。经过努力，他多年怀在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三五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他被批准和周起应(即周扬)同志、何干之同志等一起经由上海秘密到延安去。临行前，我和小航同志在董竹君在上海开设的锦江饭店为他饯行。我们再次对国内外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希望，大家以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到实际斗争中去多做工作，经受锻炼，彼此互勉。

分别后，我和陈小航同志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第三国际解散后，陈小航同志的工作有了转换，他开始用“罗稷南”的笔名，从事文学的翻译工作，重要译著有梅林的《马克思传》等。在此期间，我们不断听到艾思奇的名字和消息，并为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造诣上的不断提高，在为普及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上作出显著成果感到鼓舞和欣慰。

全国解放后，我们又重新在北京相会了。一别十二年，神州换了人间。我们为胜利后的重逢而高兴，并为新中国光辉的前景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后来，我被派往西南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曾提名建议艾思奇和罗稷南为西南大行政区的文教委员会委员。我仍怀有我们能再在一起工作的愿望，但是，由于各人的工作和写作的关系，他们都没有能来西南共事。

一九五三年，大行政区撤销后，我调回到北京，从事对外文化友好方面的工作，因此，我们又能经常见面了。艾思奇同志有时也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他有很深的哲学修养，思想清晰明快，沉着冷静，有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他的这些难得的优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作紧张，思虑过度，一九六六年初，他终于患病住院。——那时还潜藏在我

们党内的野心家康生和理论骗子陈伯达，长期以来也对艾思奇同志有着种种刁难和挑剔。——即使这样，他仍在病床上继续考虑问题，不间断地写作。积劳成疾，终于不幸病重逝世。噩耗传来，我和黄洛峰同志等人赶到医院，我们站在他遗体旁边，为他正当有为之年而早逝，感到由衷的哀痛和惋惜。我感到失掉的不仅是一位笃学有为的故乡青年、知友、同志，而且感到我们党失掉了一位在哲学思想战线上忠贞的优秀战士！

我提笔写到这里的时候，艾思奇和我数十年的交往依然历历在目。这里有我们早年在昆明时的热情和对真理的向往，有我们在上海时期的互相切磋和探索，有北京胜利后重逢的喜悦和相互勉励，……。

今天，我们纪念艾思奇同志的时候，我深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和康生、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大肆放毒，散布各种谬论和伪说，导致了对历史知识和哲学理论的思想混乱，其流毒和影响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肃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时候，艾思奇同志如果健在，他该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啊！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光荣、伟大的事业，也是空前艰巨、曲折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一批先烈牺牲了生命，无数的同志为之奋斗了一生。在纪念他们的时候，既有力地鞭策了我们的前进，也更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他们能成为有理想、有朝气、有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一代，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将来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〇年

# 勤奋的学者　坚韧的战士

张天放 遗作

岁月消逝，人世沧桑。转眼间，经历了半个世纪革命风暴的许多云南革命志士，已经相继去世了。罗炳辉、周保中、艾思奇、王德三等等，这些老友们的音容笑貌，并没有因时光激流的冲洗而削弱，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们活在千百万人民的心中，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在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学习和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为建设好祖国、建设好家乡云南，有着重要的意义。

艾思奇是这一代革命老人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他和我都是云南腾冲人。我比他年长十七岁，在家乡并没有见过面。他的哥哥李生庄，是我在省一中的学生，倒是很熟识的。我同艾思奇是在日本共同生活中认识的。一九二七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第二次到日本读书，同时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经理员，负责管理云南官费、自费学生的事宜。我到东京时，艾思奇已在那里。我便约同寸树声、艾思奇等几个同乡，共同租赁一间房子同住。家务劳动，各有分工。同住之后，大家的性格习惯，彼此都更深地了解了。

我同思奇初次共处，对他的习性，一直是惊异的。他留给我的印象，很独特，因而也相当深刻。他处处不同于一般的青年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沉默寡言，勤苦朴实，坚韧顽强。他时时在思索，时时在学习，没有任何轻佻和虚浮。他沿着真

理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追求，终于接受和领悟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真谛。他这个独特的个性，不是一般的性格，而是他勤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当年的东京，是世界各种思潮汇集的中心之一。在留日的学生中，追求进步、颓废没落与迎趋反动的学生的分野是十分明显的。艾思奇是向往真理、追求进步的。他生活朴素，饮食起居，一切都那么随便，与一些象他一样出身官宦的青年人，沉溺于东京的繁华，整日逗游于餐馆、妓院、舞场，绝无共同之处。他始终是俭朴、诚厚，毫不虚浮、奸伪。他始终是爱读书，爱思考，很少出去玩，更不把时间花在无聊的胡扯乱谈或嬉戏之中。他平时话很少，言语简练，对任何事物，不轻易乱发议论，不轻易表示态度。但他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却是很关心注意的。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人，常常不言则已，言必有中。当时在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社会主义形态的争论，他不时发表一些看法，虽然很简单，但总是有道理、有见地。他当时积极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热心学习，表明他很早就信仰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东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有所叫福冈工业专门学校，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有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经过勤奋苦读，他果然考上了。在学校里，他不仅对大学的功课认真学习，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有特别的兴趣。别人去游玩、休息的时候，他都在埋头攻读，俗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勤奋二字，正是艾思奇之所以成为了一个理论家的要诀。思奇读书、作事，不仅勤奋刻苦，而且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不久，

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和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艾思奇为了直接阅读马恩的著作，他下决心一面学日语，一面学德语。他拿来德文原版，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为深入研究马、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还有一件事，当时在东京的云南学生，如黄洛峰、寸树声、徐茂先等，到了夏日，常爱邀我和他们一同到房州海滩游泳。艾思奇会游，但技巧并不精，他决心学，吃了许多苦头，他不怕别人哂笑，刮风下雨坚持不懈，终于游得很好，在水中动作自如。艾思奇坚韧顽强，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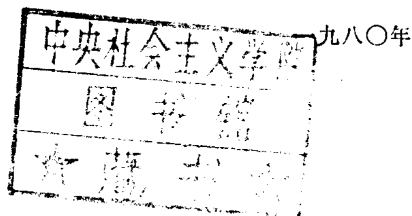
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要注意和群众结合，和实践结合，艾思奇进行哲学研究，始终注意坚持这条原则，从而使他能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学有成效。他在东京，一方面刻苦学习，一方面重视实践，学习理论总是把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他爱读书，但并不是死读书；他爱思考问题，总是踏踏实实地把问题想通，化为自己的血肉，而且还能为群众所接受。对一些事，他总是身体力行地去做，去实践，从不虚夸粉饰。当时，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国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然已搬到大冈山居住，离青年会很远，但他从不计较路途远近，严以律己，实践党的号召，不曾有一次缺席，每次到了，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感受到的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的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回国投身革命，写出《大众哲学》那样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随着思奇同志作为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影响增大，他成了反动统治者的眼中钉。反动派时刻严密监视他在家乡云南的革命活动。早在一九二六年，军阀唐继尧就企图捕杀

他，结果由于他偶然离家而未得，最后在李沛阶等人的掩护下脱身离滇。此后，蒋介石特务面对云南的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心惊胆战，慌乱失措，竟然不断制造了许多荒谬绝伦的谣言，企图把这一切同艾思奇联系在一起，结果闹出了今古奇闻的笑话。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的特务残暴地暗杀了李公朴，反而散播谣言，大街小巷贴着标语，说杀李公朴的凶手，是共产党，是艾思奇，妄图蛊惑人心，嫁祸于人，并离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又如，一九四五年，我正在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沿线推广木棉，蒋介石特务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暴动"案件，到处散布说，艾思奇从延安潜回云南，于某月某日与云南的张天放、郑易里等人，在昆明潘家湾秘密开会，订有长篇计划，准备暴动，云云。在蒙自，马伯周告诉我："县政府接到了通缉令，要搜捕艾思奇和你。"由于形势紧急，我赶回昆明，询问了卢汉的文书李德，是否有捉拿我和艾思奇的公文，李德随手把公文取出来给我看，好大一本，不过全是捏造的。一些特务还真的在昆明忙了一阵子，搜捕了几天，并在艾思奇的妹夫龙泽汇家周围跟踪盯梢，结果没有任何线索。后来知道艾思奇根本没有离开延安，这场莫须有的通缉闹剧，才不了了之。由此两个小例，也足见这些愚蠢的蒋介石特务是如何仇恨他、惧怕他啊！

思奇同志离开人间已经十四年了。这篇短文，难以表达出他的斗争事迹，只能借几点朴素无华的回忆，寄托我的哀思，并表示我对云南革命志士的深切怀念。

一九八〇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艾思奇同志在昆明一中

张 克 诚

艾思奇同志尚在孩提时，就随父亲迁到昆明，中间曾因变乱，全家被迫徙居香港，约在十四五岁时，才又回昆明居住。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昆明度过的。二十年代中期，我们一起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我在二十一班，他在二十二班。那时的艾思奇已不是一个稚气的少年，而是个胸怀抱负喜欢思考政治学术等大问题的青年了。大家正当青春年少，天真、热情、向上，在学习和社会交往中，共同的志向和情趣，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的一中，地下党的工作开展比较早，进步思想异常活跃。云南早期有名的共产党员李国柱烈士就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在他的秘密领导和筹划下，一中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全市性的学生联合会建立后，一中的学生自治会也相继成立，负责人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毕昌杰。下面设立了几个分部。我负责宣传部，搞出版，编报纸；艾思奇同志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

省立一中学生会有一份刊物，名叫《滇潮》，以三十二开本铅印出版。待到我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管工作时，撰稿任务主要落到我和老艾身上。他在《滇潮》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内容大多是反帝反封建，抨击云南军阀唐继尧，反对所谓"联省自治"主张，公开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些民主主义思想

（这在当时是要遭到禁止的）。这一套刊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都珍藏着，想不到十年动乱中被抄家搞丢了，实在可惜。

在学艺部，艾思奇同志工作得很出色，显示出他年轻时就有很高的组织才能。我记得起来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文艺活动。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生，女角找不到女演员。在这种情况下，艾思奇同志总是自告奋勇，担当演女角的任务。在《回家以后》一戏中，他演女主角自芳的情景，演得是那么形象，那么逼真，使我至今难忘。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同志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男扮女装演的，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艾思奇同志和人民音乐家聂耳同志在昆明的密切交往。五卅惨案后，昆明学运高涨，学生们一致行动，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这两位未来的音乐大师和哲学家在战斗中走到一起来了。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同志每当演戏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同志曾建议搞点能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艾思奇同志于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提供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聂耳同志一生写过许多不朽作品，艾思奇同志经常哼着聂耳的曲子。聂耳同志不幸在异邦遇难，噩耗传来，艾思奇同志极为悲痛。他特意在聂耳的骨灰盒旁边

拍了照片，以致悼念。不过，这些都已不是发生在昆明的事了。

二是艾思奇同志在省一中上学时，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开办义务夜校。这是一所职工子弟义务学校，校址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是附近云南兵工厂、造币厂以及街道上穷苦人的子弟，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四个班，共接受了约三百名学生，他们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文化课，每星期也搞点演讲会，宣传进步思想或时事讲评。艾思奇同志专管教务，也兼任教员。白天，我们是一中的学生，晚上则成了义务学校的先生。学生们是很拥护这所夜校的，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并且还爱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我们解答。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离开，热心地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了，对年纪小的或女同学，我们就要护送他们回家。个别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我常常看见艾思奇同志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夜间，我们几个教员就一起住在夜校里。这里，虽然一切都很简陋，时常工作到深夜，很辛苦，但我们却感到十分愉快而有意义。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夜校里整整工作了两年，直到初中毕业。我常常想，艾思奇同志出身名门望族，但他从不嫌弃穷苦人，和他们融洽相处，并热情为他们服务，这种思想感情在那个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

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如反对唐继尧蔑视教育、拍卖省立师范校址（在今胜利堂），五卅惨案后成立“后援会”，到五华山反动政府请愿等等。

在一中上学期间，李国柱同志经常给我们推荐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刊物，《共产主义ＡＢＣ》、《向导》、《新青年》，我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昆明文庙街有一家小书摊，经常出售一些进步读物，如鲁迅的作品、洪深的译著等，艾思

奇同志经常从那里购得不少书籍。特别是省一中有一批我们十分崇敬的师长，象楚图南同志、罗稷南（即陈小航）同志，都是很有才华的进步教员。陈小航同志有个弟弟叫陈少航，那时正在黄埔军校学习，经常从广州给他哥哥邮寄革命文件，陈小航同志又把这些文件悄悄地传给我们阅读。这些，对引导我们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艾思奇同志的家庭是书香门第，加上父辈的严厉要求，使他自幼就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为他往后成为著名哲学家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础，但他本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攀登的道路上，从中学时代起，就具有了勤奋好学、锲而不舍、搏浪而进的精神。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举止庄重，这大概就是人们说他性格内向、深沉的理由吧？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异常炽热，求知欲望尤为强烈。他和书本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不是他手里捧着书，就是口袋里装着书。他轻易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漫无边际或毫无价值的谈天说地之中。只要有功夫，他就坐下来读书。他有惊人的排除干扰的能力，哪怕周围怎样的乱哄哄，他都静得下来看他的书，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那时，他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叫李珩，和他一样的脾气，也是一个书迷，所以同学们都称他们俩是一对“书呆子”。正因为艾思奇同志有过人的记忆力和探索精神，知识面广，各科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自不必说，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国文教员陈小航同志喜爱高材生，高兴之下，当着大家的面夸艾思奇同志很有发展前途。平常，我也喜欢写点文章，并经常得到艾思奇同志的指点修正，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初中毕业后，艾思奇同志远离昆明到南京等地。一九二七年春，他东渡日本求学。他几次来信劝我也去日本，但因种种原因，我终未能成行。大约是一九二八年，艾思奇同志因病从

日本回昆明老家休养，其时，我正在编辑《市政日刊》的副刊《小宇宙》，张子斋、李亚群等同志是这个副刊的台柱子，艾思奇同志利用暂居昆明时间，也为副刊写了大量文章，直至他病愈重返日本前，还给我留下许多备用稿子。

在昆明，他住在兴华街青林巷，我住在小东门竹云园巷，两家相距很近。艾思奇同志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但他从小就非常朴素，不讲究衣着，不事铺张，也很少上馆子。他平时有照相的爱好，也喜欢诗，对音乐更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教我唱《国际歌》、《伏尔加船夫曲》和日本渔民出海打鱼的歌谣。在养病期间，他常常约我出小东门，到八达河游泳，他有很好的游泳技术，会许多种姿式，还会潜水，在那里还常遇到陆万美同志。我想，他的病会好得那么快，大概和他的爱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艾思奇和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愤怒之下，弃学回国。他再度回昆明小住。他对当时云南的白色恐怖非常气愤。大革命失败后，云南最早的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如李国柱、赵琴仙（女）、吴澄（女）等同志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艾思奇同志得知他们的坟墓就在市西北郊的虹山后，有一天，他买了一包点心，邀我一起悄悄去到虹山，费了好大功夫，却找不到李国柱、吴澄的墓冢，只在一个土堆上，插着一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赵琴仙”三个字。我们俩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把点心摆在墓前，为烈士默哀祭奠。想到他们为我们指引革命道路，想到他们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我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艾思奇同志对革命先烈无限怀念和敬慕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永远铭刻在心。

此后不久，年轻的艾思奇同志告别春城昆明，告别他的亲人和朋友，走向沸腾的生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阔步踏上

了全新的征途。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艾思奇同志在上海、在延安、在北京，都多有所建树，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丰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他自从一九三二年离开昆明，就再也没有回云南看望养育他的可爱的家乡。这并非出于他的疏忽，他曾多次打算携眷回滇探亲，但终因公务繁忙，腾不出一个囫囵时间，一拖再拖而竟至永远不能实现。不过，艾思奇同志以他一生的业绩表明，他不愧为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艾思奇同志去世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他的思想品德，以及我们之间诚挚友谊和革命感情，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一九八三年

# 回忆艾思奇同志
# 在《云南民众日报》片断

陆 万 美 遗作

早在一九二六年，我就看到艾思奇在舞台上演戏。那时他才十六岁，正在昆明第一中学读书。他在描写中国妇女悲惨生活的两出戏《回家以后》、《可怜闺里月》里扮演女主角，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不过是台下的一个观众。我直接见到艾思奇同志则是三年以后，在《云南民众日报》社共同参加该报副刊的编辑和写稿工作。大约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翻译了好些篇文艺作品，写了不少战斗性较强的杂文，还写了十几篇介绍新哲学理论的短文。

《云南民众日报》是龙云政权的省财厅厅长卢汉所办。为了表现出一点进步，扩大个人影响，他找来办报的班子却都是进步力量，主笔和许多编辑竟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报纸一出刊，比起云南几家陈腐的旧报，显得有些革命的新鲜气息。它采用的电讯稿，虽然得用中央社的，但不时却敢在报端发一些透露红军和苏区胜利发展的消息。它的社会新闻也可以看到一些揭露旧官僚贪污腐化和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罪行。特别是它的副刊更具特色，每天都登载一些较优秀的文艺创作、杂文、散论等，很受一般知识分子、大中学生的欢迎。这样的报纸，当然会逐渐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仇恨。

副刊最初取名“象牙塔里”和“杂货店”两栏，占四开一

整版，每天刊出。其中“象牙塔里”的刊头是艾思奇同志设计的，这一栏主要刊登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杂货店”着重刊载杂文、散论、社会科学和新哲学理论介绍文章。副刊的内容严肃，但文风也不失辛辣、尖刻、俏皮，战斗性较强，它敢于干预生活的黑暗面，对许多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最先为“杂货店”写文章的就只有李生庄、李生萱（即艾思奇）兄弟和王有源。他们每天都要分工写足五千字的短文，后来才逐渐扩大写作力量，并在投稿中选用。

艾思奇同志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写文章，但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却是在一九二八年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参加《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编辑时开始的。在此期间，副刊先后发表过他翻译的英国天才的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接着，他陆续译出德国诗人海涅的十几首短诗（他原打算把海涅的短诗选全部译出，但未完成）。在这个时期，他用的笔名有小幺、店小二、生萱、S.G等。他的大哥李生庄写得更多一些，用的笔名是老幺、小伙计、罗曜等。

可惜，当年的旧报和资料，因年长日久，手头均很缺乏。我到昆明的几家图书馆和一些老朋友家里查询，所得甚微。费了许多周折，在艾思奇同志胞弟李生葂的协助下，在云大找到十几张《云南民众日报》，是一九二九年七月份的。虽是残张片页，但对启发我的回忆却是极有价值的。

“杂货店”的文章，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疾恶如仇，严厉批驳文艺滥人、流氓地痞的匿名攻击和诽谤。在副刊上，也经常发表一些理论文章和问题争论，如介绍“新哲学”的简明生动的短论，解释《费尔巴哈论》的材料，甚至对战国时期公孙龙子提出的所谓“白马非马”的名辩哲学，也曾一度展开讨论。“杂货店”共刊出二百

四十来期，载文七百余篇。老幺的文章说理较深，笔锋尖锐，时人称他“颇有鲁迅风味”。艾思奇写得较多的是介绍“新哲学”，实际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计有十几篇。他曾打算有计划地对马列主义哲学做一些通俗的介绍，但因不久即离开昆明，终未能如愿。就是那几篇在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对当时昆明的青年读者也是有影响的，有的至今讲起来，还留有较深的印象，认为“自己接触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些文章开始的”。记得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解释和“白马非马”问题的讨论中，李氏兄弟之间出现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并公开进行了讨论，以后则有其他人参加进来，形成了社会性的辩论。联系到艾思奇同志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写出象《大众哲学》这样大众化通俗化的名篇，应该说并不是偶然的了。

副刊“象牙塔里”也编了二百四十多期。一九二九年，云南的白色恐怖愈趋严重，反动派对这两个副刊已不能容忍，破坏也越来越凶了。于是不得不易名“银光”，取其柔和之意，只登载纯文艺作品，连出任编辑的，也是温和的学者刘尧民。但即便这样，也仍然存在不下去，“银光”只办了约五十多期，连同整张报纸即宣告停刊。此年初冬的一个夜晚，主编徐嘉瑞同志，在翠湖老图书馆的水榭里，邀请报社全体同人，举行民众日报停刊散伙夜宴。菜肴还算丰盛，天气却有些阴冷，气氛低沉。主编既不说停刊理由，也不涉及办报的成绩，也没有人提什么别离的话。大家只是喝点闷酒，吃点饭菜，人们似乎对眼前的境遇怀有怨愤之情，天下之大，何以至于容纳不下小小的一张报纸！

艾思奇同志在这家报馆写作虽只有一年多，但这一年多的副刊编辑和写作生活，对他以后几十年从事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无疑是起着有益的作用的。在和艾

思奇同志共事中，我认为，他对生活极为严肃认真，而且热情追求真理和正义，给人的印象很好。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很少考虑个人得失。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生活优裕的家庭，本可以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但他积极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不怕吃苦，逐渐走到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他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参加游行示威总是走在前头，在日本洋行前呼口号是那么高昂激烈，组织读书会、讲演会、为校刊写稿更不后人，连演女主角这样的事他也勇敢承担。我常常想，是什么力量促使年轻的艾思奇这么做呢？

记得在一个暗黑的夜晚，我们漫步在翠湖的林荫道上，坐坐走走，整整和我谈了三个来钟头。平常不爱多说话的他，这晚上却侃侃而谈，他很有兴致地谈到了欧洲哲学中的培根、斯宾诺沙、康德、黑格尔。他说："我总想从这里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的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显然，这时的艾思奇同志在追求探索真理的途程中，已经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次长谈，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不仅热情地去认识客观世界，而且也在逐步解决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表现出艾思奇同志向全新的生活道路进发的决心。

朋友们谈起对艾思奇同志的印象，都觉得他确实具有刻苦好学、冷静深思的特点。他有很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我们经常见他口袋里带着书，有空就拿出来读。那时，我们一些熟悉的朋友，喜欢一起到一个朋友家里聚会，玩得高兴了，往往是又放唱片又谈天，有的在演奏风琴，有的在唱悦耳动听的歌曲，满屋子热闹嘈杂，但艾思奇同志常常坐在屋角里独自看书，有人笑他"装佯"，有人说他象书呆子。有一次，一位朋

友突然抢过他的书，问他刚才看的什么内容、他却不慌不忙，把书中的道理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他家里的藏书很多，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不一定都看懂，但他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父亲、大哥的引导。他对外语学得更是刻苦。当时，他的英、日语基础虽不算深，但他能做到边学习边翻译。他又开始自修德文，用的是日本人编的“独逸语讲座”，他说“日本人编得好，完全可以坚持自学”。不久又找来原本《茵梦湖》，对照郭沫若的译本攻读。他在翻译海涅的短诗时，碰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苦于没有德文词书，一天他提到此事，我忽然想起我已去世的大哥留有一本，他听说后立刻高兴得跳起来，迫不及待地和我一起回家去找，果然找到了，那是一本用日语注释的《独和辞典》，他看了兴奋得连声说：“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个！”走在路上便看了起来。

从报馆分手后，我们就再也很难得见面了。大概是一九三一年他第二次从日本回昆明，晤谈匆匆，他很快就去了上海，而我又到北平。尔后，虽在报刊杂志上经常读到艾思奇同志的作品，感到亲切慰藉，但无缘见面，不过我还是经常打听到他的行踪的。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我从滨海随军绕到胶东。听说艾思奇同志跟随党中央到了河北平山，我通过内部交通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不到一个多月后，我竟意外的收到了他的回信。工整的蝇头小楷，盖满了一张粗糙的土纸，字里行间洋溢着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我高兴极了，一直把这封信珍藏在身边，放在马达子里及渡江的包裹里，又从上海带到云南。十年浩劫三次抄家，这封信竟然幸存下来，可算是宝贵的纪念品了。建国以后，一九五三年春天，我去北京开会，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又见到了他一面，我们只是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相约以后畅谈。后来虽多次进京，也曾计划去看望他，但会议日程很紧，总想他日再说吧。想不到

一九六六年春末，我去北京全国作协开会，不幸获悉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震惊！万万想不到他正当有为之年就被夺去了生命。当黄洛峰同志告诉我老艾临终时的情况，我的心情极为悲痛，以至连话也说不出来。他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可以更多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的时候，却过早离开人世，殊为痛惜！数十年来，有许多人因为读过他的书和听过他的讲座，得到教育，提高了认识，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或更坚定地为党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他的去世，确实是我国理论战线的重大损失。

最近，我再次翻阅了艾思奇同志的几本专著，仍然感觉到有许多新的启发。也特别想到，面对今天青年思想领域纷纭复杂的景况，多么需要下大功夫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艾思奇同志去世多年了，他为世人留下的数百万字的著作，展示了一个哲学家探索真理的艰辛历程！我劝告青年们不妨去读一读艾思奇同志的一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文章，这样，对于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许会有所裨益的！

# 忆思奇同志二、三事

姚蓬心

提起思奇同志，大家总是很自然地回忆起他在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那哲学家的气质和性格。所有这些，也是我所熟悉并深为钦佩的。然而，使我感到最为真切而不能忘怀的，还是他青年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对同志、对朋友的炽热而深厚的感情。

思奇同志和我认识是在初中时代。他在昆明双塔寺新制中学读书，我在昆明联合中学，我们都是各自学校学生会的代表，经常见面。他是一个纯朴敦厚的小伙子，不太爱讲话，但对社会活动却很热心。

我爱人王慧媛和思奇是幼稚园的同学。据她过去回忆，思奇从小就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经常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吸引住一大堆小朋友。有一次，他拿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瓶，里面放了一块腾冲特有的火山石，他指着石头上的窟窿说："这洞里住着个小老头，每天都要到水里来找东西吃……"许多小朋友就好奇地围着那个小瓶子看。

一九二九年，我们又都去日本念书。他到东京后不久就病了，住在当时日本颇负盛名的北里研究所附属医院，他患肺结核，那时对结核病没有什么特效药，重点在于卫生疗法，即空气、营养、休息和一些对症处理。我和我爱人王慧媛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躺在病床上，说话很少，神情十分安静。出来时护

士告诉我们，这位病人很听医生的话，接受治疗能与医生合作，所以健康恢复得比较快。这也如同他研究学问时表现出的性格一样，认真而富于科学性。

当时思奇除了刻苦钻研日译本的马列著作外，还在努力自学德文。有时我们高声谈笑，热闹异常，他却独自静悄悄地躲在一旁盯着一本书出神。有人拿过书来一看，才知是本《德语语法》。我想，在那样吵闹的环境里，读书会受到很大的干扰，尤其是语法这样枯燥的书，怎么能念得进去？我便问他读了些什么，他竟能完整无误地说出书里的内容，甚至有些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楚，朋友们对他这样坚强的意志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无不感到钦佩。后来我还了解到，他这坚强的毅力，还来自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他急于尽快掌握德语这个武器，以便能够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

和他一同考入福冈工业学校的同学高衮文（现在云南贵金属研究所）回忆当年艾思奇和他同学时，不仅求知欲强，学习也确实刻苦，上课时教师在讲台上教英语，因他的英语程度较高，所以他在台下读德语，教师用英语向他问话，他却用德语回答。有一晚，同宿舍的日本同学见他半夜外出久久不归，起来找他时，却见他呆立球场，仰头看天，次日日本同学问高衮文："李生萱是不是有神经病？"高说没有。"那为什么他半夜三更独自个在球场上仰头看天，呆立不动？"高就去问艾思奇，艾思奇笑道："我是在看天文，认星座，看它们运动的规律、它们之间的联系啊！学天文不看天怎么行呢？"有一次他们全校师生外出旅行游山，回校后校长友田镇三要同学们题字留念。高衮文拿起笔题不出来，望着艾思奇，艾思奇教他说：你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外，我印象中的思奇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活泼而富于幽默感的人。

一九三〇年暑假，我们在东京的十四个云南同乡，约着一齐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那时一伙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五个女的和一个小孩同住一间“女生宿舍”，九个男的又合住一间，每天排班由两个人轮流做饭，晚上看书聊天，上下午都去海滨游泳，晒太阳，假期生活过得愉快而有生气。

我还记得一件有趣的小插曲。有一天，思奇对我说：“昨天晚上熄灯睡觉后，我听见有人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他要我晚上先别睡熟，看看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等大家入睡后，果然有个人影摸黑起来打开箱子拿东西吃。我们悄悄地察看着，发现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于是我们商量好，决定要求由我们俩值班做饭，以便乘大家出去游泳时，可以在家把这事弄个究竟。排班的同志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等大伙一下海游泳，我们就打开那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找到一包家乡土产——干鸡棕。我们不约而同地怀念起家乡来，并且想到应该让大家都吃顿家乡菜该有多好！我们便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还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个菜请大家尝尝。”说罢便郑重其事地端出一大盘鸡棕炒肉。由于味道鲜美，又是家乡土产，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老乡又摸黑起来打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次日下午，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气恼，愤愤地说：“我们宿舍里还有人偷东西！”我问他：“你丢了什么？”他只说：“东西并不值钱。”但再问他，就不肯回答了。晚饭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渡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思奇和很多留

日学生毅然弃学回国。那时我早已离开日本，由上海辗转到东北，又在颠沛流离中到了广州念书，慧媛则返回昆明老家。思奇到昆明时，多次到家里看望慧媛。慧媛曾写信给我描述过他最后一次到我家的情景："思奇来了，默默地坐着，不时用爱抚的眼光凝视着我们刚满周岁的女儿，不时又关切地询问你的近况。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却又谈得很少，时时陷于沉思……"后来我们才知道，思奇由于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些活动，当时处境险恶，不能在昆明久留。原来他是怀着惜别之情去看望慧媛和孩子的。此后，思奇同志就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工作，以后又奔赴延安，我们的联系就这样中断了近二十年。

云南解放后，思奇到处打听我们的消息，并且很快寄来了一封信，对我们别来的情况十分关怀。信虽不长，但写得极为亲切生动，犹如年轻时在一起谈心一样。

不久，我的女儿曼华到北京去念书，暂住在郑易里同志家。思奇得知后，专门同他夫人王丹一同志到易里家去看她，以后在百忙中还经常约她到他家里玩，记得女儿曾来信说："我见到艾伯伯很想和他谈谈哲学，可是艾伯伯总是问昆明的变化，问你爸爸怎么样？你妈妈怎么样？再不就是问我的学习和生活。……艾伯伯还说很高兴有这么大的一个侄女儿。"我给曼华去信说："这正是艾伯伯对你的关心，也说明他很珍惜青年时代的友谊，你要问哲学问题，去看他的书好了。"

思奇如此念旧，又如此关心我们的一切，使我深为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

一九五九年底，我去北京，听说思奇那一阵工作很忙，原有些不愿去打扰他，但对他的强烈思念驱使着我带着儿子钟华去看望他。那正巧是一九六〇年元旦，当时他正在午睡，一听说是昆明来的姓姚的，便马上起床到大门口接我们。阔别了三

十多年的老友重逢，真有说不出的愉快。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感谢我对他老母亲和大哥李生庄同志患病时的诊治和照料，我说："这是我当医生应尽的职责。"接着我们谈了离别后这些年来的很多事情，他一一问了昆明老朋友的情况，还问了云南生产和建设的情况。家乡的巨变使他非常激动，他说一定要找机会回来看看。我在他书架上看见有两部列宁全集，一部是俄文的，一部是德文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些年来，他通过自学又掌握了俄文。他告诉我列宁有些著作是用德文写的，俄文本翻译上常有错误，必须要看德文原著。他治学的严谨，读书的认真和刻苦令人敬佩，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九六四年冬，我去天津开会，途经北京再去看望他，不巧因公外出而未遇。此后我一直盼望着能在故乡见到他，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希望终未实现，而一九六〇年元旦的聚首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诀别……。

# 家乡人民的怀念

尹 文 和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回到乡下老家度假，漫步在龙塘边，徘徊于李家老屋与大楼之间，不时想到文章道德两兼优的艾思奇同志，总有“怕过蕉溪垂钓处，大楼怅望总神伤”之感。

我从小敬仰艾思奇同志，我对艾思奇同志出生地的水水山山草草木木都感到亲切、爱恋。他的老家，在和顺蕉溪——又名水碓。村前有水，环村皆山，村头村尾，清水交流。村前有一潭水，一楼阁，一窝树，一月台，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解放后，外地同志到腾冲，必来游访蕉溪，因为这里是艾思奇同志的故乡，可是，在旧社会，艾思奇同志家是门虽设而常关，临门无门入，反动政府对他家是恨之入骨的。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小小山村的如画风景也遭到践踏。

艾思奇同志家在龙潭边依山而筑，老屋和新楼比邻。艾思奇同志一九一〇年出生于老屋。他小时候很喜欢玩 蟋蟀、青蛙、小鱼等，会细心地观察这些小动物的动态、习性，冷静地思考什么。他很大胆，长辈说他：“胆子吃得雷”。有次他要跳下龙潭玩水，大人怕他跃水，阻止他，他说：“我不怕。”就钻进去了。思奇同志幼年就不拘传统礼节。有一年，到了除夕，他母亲特别叮嘱他：“大年三十晚辰，大家要献三牲，你莫去人家玩。”他回答说：“三十不三十还不一样，怕什么。”第二天他母亲又说：“大年初一人家要供斋，你别去玩。”他

还是说："怕什么！"大清早就一溜烟地跑出去了。他小时候白白胖胖的，很灵活，很好玩，有时一个人看小书。

当艾思奇同志两岁左右时，他的父亲就把他领到昆明去了。一直到一九一八年，他九岁时，他的祖父在籍病逝，父亲又带他和弟妹们回家，在家住了大略三、四个月。

我最早听到艾思奇同志的名字，是在家乡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候。我第一次走进我们乡里的图书馆，见好几幅人像高挂在厅堂，其中就有署名"毛泽东"、"朱德"的两张。听大人们说，这是共产党领袖的照片，是艾思奇同志从延安寄来的。从此，我懂得了天下有共产党，毛泽东、朱德是好人，我们和顺有个艾思奇就是共产党。在我们闭塞的小小乡村，我们这些小娃娃能比较早地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照片，实在应该感谢艾思奇同志。从那时起，对艾思奇同志就有一种仰慕向往之心。到了小学五六年级，我开始学着读一点课外书，在家里看到一本《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有两件东西在我幼稚的心里印象特别深：张天放先生的"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的题词；艾思奇同志为和顺图书馆纪念刊写的《一封家信》。这封家信和寸树声先生的《沦陷的前夕》，国文教员后来选作我们的教材，至今还能背得。艾思奇同志在信中说："我离乡时太小，中间虽一度回乡，但也只在十岁前后。家乡的轮廓，在我脑中是非常模糊，若站在宗法的立场上说话，我要算最不肖的游子。家乡白有了我，我实在对不起家乡。……图书馆事业在发展文化的工作上是最重要的，家乡人能热心如此，我非常的高兴。我在这里能贡献的刍荛是：第一、要大众化。书只供几个特等人看读，那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书是要大家都来看读，要多多去找适合于大众阅读的书……第二、要普通化。要设法使馆中的书什么人都能阅读，衙门式的图书馆，只图表面的堂皇美观，那是没有用的。第三、要多购备社会科学

的新出版物。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在现社会的需要上是一切学术的骨干……弟 奇 延安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读着这封家信，使我感觉到艾思奇同志的的确确是在延安了，他关心着家乡文化科学的发展和年轻人的成长。再看看他的父亲李曰垓写在我家客堂的"清言多通"四个隶碑大字和原由我家收藏的《双杉行》行书，我更加感到亲切，想见其人。

非常幸运的，解放后不久，我到了首都北京。在中侨委的关怀下，安排我到燕京大学华侨先修班读书，住在未名湖畔的七斋。学校有一次举行学术报告会，大礼堂边的黑板上贴出了海报，嘛，艾思奇同志来作报告，我喜欢极了，兴奋极了。那时，我才十九岁，真是牛犊不怕权威名流。报告一完，我就追随艾思奇同志走出大礼堂，上前几步自告奋勇地说："艾思奇同志，我是从云南腾冲来的，我早就想见您啦！""呵，腾冲哪里？是和顺乡吧？叫什么名字？"艾思奇同志抚着我的肩亲切地问。当我回答后，他又说："那好，见着家乡人，很高兴，你来马列学院找我玩。"我满心欢喜，频频点头。在北京那段时间，我去看过他两次。我天真地说："艾思奇同志，我好象看见过您。"他笑了笑，问："怎么见过？"我说："我见过您父亲的像片，见过您大哥，他们很随您。"艾思奇同志更有说有笑了："小尹，你说话真有趣。应该说我的外貌象他们呀。"我问艾思奇同志还记得家乡不，他说："只有个印象，我家大门前有一池水，其他什么也记不起了。"我说："就叫龙塘。和顺人讲，水碓山高水深，要出龙呢。元龙阁大门头柱子上还钉着一条木龙，老人们说最初扎钉子下去的时候，木龙会出血哩！"艾思奇同志若有所思地说："唉，这些家乡故事听听倒也好笑，但都是些迷信，不要信它。"我又告诉艾思奇同志："日本投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艾思奇要回家一次。一般人也倒真想见到您，但是反动派却派了一个旧

军人上门到您们本家，据说是来监视您和寸树声校长。”艾思奇同志听了后说：“我听说过。这些家伙卑鄙得很。在延安，工作很多，要全力做好党的工作，我自然不会回乡。就是为了革命需要回去，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怕他们。”我又问他说：“艾思奇同志，为了革命，你吃了很多苦吧？”他谦和地说：“不，我没有吃多少苦。许多老同志比我苦得多，我家堂弟生兰（后改名张灵，于一九七〇年病故）吃的苦也比我多，他在前线打过仗，在后方做过地方工作，能文能武，积劳成疾……”我说：“我在家乡没有听说生兰同志也到了陕北，刚才听到他的事迹，我要好好向革命前辈学习。”艾思奇同志循循善诱地说：“是啊。现在你们的读书条件太好了，能够自由平安地从边地到首都，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生兰从腾冲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延安找我，经历了许多危险，有几次是生命也难保。”在和艾思奇同志相见之后，作为年轻人主观想象的哪一套，哲学家有哲学家的风度啦，权威名流有权威名流的气派啦，这一切观念都不复存在了。艾思奇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温文敦厚，方圆并济，重革命感情，爱护青年。可惜的是，我在燕京先修班学习半年即止，接着考到了天津南开中学，没有机会再直接受到艾思奇同志的教诲。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在国庆节前从上海赶到北京会见回国观光的哥哥尹文琴（缅甸瓦城华侨中学、仰光《人民报》负责人之一）。国庆节后，同缅甸回国观光团成员去中央党校拜访艾思奇同志（此事是我哥哥提议，由我带路）。我们的车刚停下来，艾思奇同志就走向前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即说：“今天我借个地方接待大家，请到那边坐。”接着就把我们引到一间宽敞的室内。我当时想，您是一校之长（当时是哲学教研室主任——编者注），用个会客室，何必言“借”。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就是艾思奇同志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明证

吗？这天，艾思奇同志穿一套灰布中山装，着青布鞋，看他走路真是脚踏实地，稳重而刚健，有几位华侨说他象个乡下农民。他自己亲自倒茶给每一位客人，唯一的招待物也就是烟和茶水。大家都觉得，共产党的干部真真实实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那天艾思奇同志曾问及中缅边界情况、民族情况、家乡建设情况，几位从云南去京开全国第一次侨代会的长者都一一作了回答。有位和顺乡华侨问起他的夫人和孩子，他说爱人身体不好，三个孩子还小。

我那时因为对腾冲沦陷期间的资料比较留心，摘录了延安《解放日报》逐日发的有关滇西战局的消息，这次又见到艾思奇同志，我特意对他说："大概那时您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吧，那样关注腾冲沦陷区。当时《解放日报》以最大的字体在第一版报道'滇西战局转紧，北路敌窜入腾冲'。"他说："我是在参加编报，但报道腾冲消息不是由于我，而是因为共产党是真正在抗日，是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关心沦陷区人民。"他还劝勉我说："你能留意家乡的史地很好，但不要搞得太杂，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精通一门就了不起，希望你在本专业上多下功夫。"那天下午，艾思奇同志有重要事料理，观光团成员也要赶回西苑大旅社开会，相谈只个把钟头。上车前，大家在党校的一条柏油路上，以人行道树荫为背影，和艾思奇同志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大家邀他坐在前排中座，他谦让地说："这不好，还是站着照自然，按高矮或年龄大小站。"结果他把他称为"五公"的一位老人请在中间。上车后，一位老华侨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僚就是不同！看生萱在上海写哲学书就出了大名，又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解放后当了党校的领导，毫无尊贵想法，一点官架子没有，平等待人，生活这样俭朴，真是人民的公仆，难得啰。"艾思奇同志的思想和品格，感人至深，直到今天，人们

都在深情地谈论着他，怀念着他。

艾思奇同志九岁即离乡，又沉默寡言，他的家世不大为人所知，现作一概略介绍。祖父李德润，幼年值滇西回民起义，随父至缅甸，为侨商烧火做饭，后从商，清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年）年老归里，家居读书，不入公门，乡人称誉他“能律己”“待人伉直无饰。”父日垓，字子畅，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经济特科第一名，一九〇三年毕业后返腾冲，在仰光由黄兴及其族叔李德贤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在昆明参加辛亥重九起义，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护国起义时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起草讨袁檄文，有“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名句。最后出任第一殖边督办。有美政，为世人推崇。大力推行科学技术，改革教育，创办云南省立第二中学、腾冲五属联合中学，倡修魁甸水渠，腾冲梁河公路，组建叠水河水电公司。每出使中英（缅）边界会审，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敢倨礼，敬而畏之。工诗文书法，尤擅行书篆书，著有《天地一庵诗文集》。大哥生庄，学识渊博，为“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传播者之一，曾与张耀参等在上海创办《曙滇》杂志（张天放等撰稿），与周禾书等在腾冲办《晨暾》（徐家瑞等撰稿），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地问题》等，为《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生庄先生还长期坚持写日记，记有不少有关政治运动和文化教育的资料。笔者在亲友处见过他的部分日记，对红军经过云南，对腾越简师的情况，记述颇详。三弟生萱，在滇西话剧运动中，以男扮女角演曹禺《雷雨》中的四凤轰动一时，使封建保守势力大为震怒。解放后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长于版本目录学。四弟生倩，长期旅居缅甸。解放初艾思奇同志曾写信嘱其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因病死于缅甸瓦城。妹妹贤贞，在昆明从事妇女工作。

拙文道及“大楼怅望总神伤”事，这大楼说的便是艾思奇同志的故居，位于腾冲城南数里的和顺蕉溪。楼阁宽敞别致，布局得体，建筑精良，价值甚资。一九八一年底，艾思奇同志的夫人王丹一同志和三弟李生葂同志，遵照艾思奇同志生前嘱咐，已将房舍慷慨捐献给国家。他们在给县委的信中谦逊地说，这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故乡建设，略尽绵薄之力。云南省人民政府、中共腾冲县委对艾思奇同志及其亲人爱家乡、爱祖国的高风亮节，十分称誉。

# 老艾在上海

许涤新

我认识艾思奇同志是由杜国庠同志（当时化名林伯修，是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介绍的。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初，杜老在一次同我谈论当时左翼的青年理论家的时候，就提到老艾，并称赞老艾的哲学水平。那时，老艾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盟员，因为“上反”经常忙于写标语，散传单，搞飞行集会，这种情况对于老艾的做好理论研究，是有影响的，因此，杜老通知我，要把老艾的关系从“上反”转到“社联”来。因为接关系，我才同艾思奇同志见了面。

那时，老艾住在法租界吕班路的“万宜坊”。我按杜老所开的地址和暗号，去找老艾。见面之后，谈了一些情况，才知道他是云南人，曾在日本的高等工业学校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的泉漳中学（福建泉漳同乡会办的）教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学者。

艾思奇同志在泉漳中学教书的时候，已经从事写作了。他以思奇或“李东明”的笔名，经常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文章。一九三三年夏间，“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简称）出版了一个综合性的月刊——《正路》。这个刊物由张耀华（“社联”盟员）出任主编，由蔡馥生（当时的笔名是蔡洛岗，现在广州暨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任副主编，参加写作

的，除了杜老、耀华和馥生之外，还有老艾、马纯古和我，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老艾在这两期《正路》中，都刊有文章，第一期是《抽象作用与辩证法》，第二期是《进化论与真凭实据》，记得内容是批评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他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一九三四年春，李公朴说服了《申报》老板史量才，在南京路开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并在《申报》开辟一个副刊——"读书问答"，宣传进步思想，当时实际负责"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的"读书问答"的工作的是"社联"盟员柳湜，因为《申报》的这个副刊很重要，而柳是秘密党员，因此，柳的关系由我自己出面联系。由于"读书问答"的影响日益扩大，读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老柳向我提出要求，要求"社联"派出一位有理论修养的盟员去支持这个副刊。"社联"党团组织考虑结果，决定派老艾去参加这一工作。柳、艾二人，彼此并不认识，于是约定时间，由我把老艾带到南京路"冠生园"楼上见面。这样，老艾就从"泉漳中学"的教师，变为《读书生活》的编辑了。

当时，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四省，而蒋介石反动派却坚持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则围剿不遗余力。在那种形势之下，当时的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广大读者的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促使《读书生活》从《申报》副刊，发展成为独立的半月刊了。老艾的风行一时的《大众哲学》，就是他在这个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编集而成的。在救亡运动中，《大众哲学》对于广大青年的影响，作用是相当大的。

一九三四年冬，我已调离"社联"到"文总"和党的"文委"工作，但"社联"党团分工由我领导。有一天，杜老同我

谈起“社联”理论干部的问题，他认为“社联”既然以社会科学作为号召，那就必须在这方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善于分析、善于战斗的理论家来。他认为“社联”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认为把党外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朋友吸收入党的工作，做得更不够。他问我：“艾思奇已经入了党么？”我说：“还没有。”他要我催促“社联”党团快一点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上海地下党遭到了大破坏。党的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以及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杜国庠、阳翰笙、田汉和我，都被捕了。关于老艾入党的事，也搁了下来，直到这年十月，才由周扬同志予以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我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从苏州伪陆军监狱被释放出来的。我同几位难友，乘苏州慈善机关的装着棺材的木船到上海，到上海之后，很快就找到党的地下组织。吃住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从监狱穿出来的那套衣服，在“只见衣冠不见人”的大上海，实在尴尬。这几位难友都叫我想办法，我便去找夏衍、思奇和其他几位较熟的同志。他们都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赠送衣服。老夏、老艾和王达夫各送西装一套，还有送大褂的。这样，同我到上海的几位难友，就都解决了穿的问题。

通过地下党的联系，周扬同志约我到上海静安寺对面的外国公墓（解放后改为火葬场）见面，他把我们被捕后上海文化运动，特别是一九三六年解散左翼各个文化组织和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说到老艾已由他介绍入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早应解决的问题。几天之后，老周同老艾等好几个人，就都离开上海，到延安去了。

抗战期间，我在武汉和重庆的党报《新华日报》工作，而老艾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教哲学。在党中

央、毛主席的直接教育之下，老艾的理论水平更加提得高了。他在《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加有力地吸住了读者。那期间，我们是没有机会见面的，直到解放之后，在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才在中央党校同老艾见了面。

对我来说，老艾离开人世的消息，是突然的。它象闪电般袭击着我！按照他的年龄，他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多做若干年的工作，但是，无情的病魔，竟把他吞噬了！对党、对人民来说，这个损失，是没法补偿的。

# 热心科普创作的哲学家

高 士 其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十四年了，我以无限怀念的心情写这篇短文，来纪念这位优秀的革命家、哲学家和老战友！

在林彪、“四人帮”的控制下，我们这样来纪念他是不可能的，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这篇纪念文章才能公开发表。

我和他最早一次见面，还是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在读书生活书店里。我们很谈得来，好象一见如故的朋友，每一次见面他都鼓励我多创作科学小品。

我的第一本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的出版，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合编而成的。

后来，我从李公朴先生家里移居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楼上，我住在后楼，他住在前楼，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他为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思想敏锐，行动坚决。我非常钦佩他的编辑才能和写作能力。

我很欣赏他的《哲学讲话》，这本书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了通俗的解释和阐述，在当时影响是不小的。我有一篇科学小品叫做《肚子疼的哲学》，就是按照他的辩证法原理写成的。那时候，我每期都为《读书生活》半月刊写一篇科学小

品。

一九三七年，我同他一起参加了上海著作人协会，并且还与他同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他还陪同我去通俗文化出版社，安排出版我的第四本科学小品集《细菌的大菜馆》。

抗战爆发以后，我们都先后去到延安。

这是我们一生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如果说，在没有到延安以前，艾思奇同志所宣传和学习的还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那么，到了延安以后，他才注意到必须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也就是必须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有时候我到他的窑洞里作客，有时候他到我的窑洞里看我。在聚餐会上，在边区文协的座谈会上，在各种群众大会上，我们都在一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陪同李公朴夫妇来看望我，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鸡，当时我们的接触是频繁的。

艾思奇同志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主席的窑洞很近，毛主席经常找他去谈话。他在抗大任教，时常给大家作报告。我住的窑洞离他较远，每次他来，总给我带来不少前方的胜利消息和新闻。

解放后，我回到北京，曾到中央高级党校看望他，他也常来干面胡同看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还冒着大雪带领全家来参加我的婚礼，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他逝世时，我不在北京，未能参加他的追悼会，这是我一生很大的憾事。

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工农兵的哲学著作比他写的《哲学讲话》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艾思奇同志热情地赞扬、扶植工农兵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运

动，他批评那些轻视工农兵学哲学的人，他非常注意阅读报纸上发表的工农兵写的哲学文章，并搜集这些哲学文章，准备亲自把它们汇集出版。

艾思奇同志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言必有物，喜深思，洞察力强，勇于解剖自己。他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是始终不断前进的，始终没有掉队。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因为他能够自觉地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他为了改造自己，还经常深入农村，到农村的革命实践中去学习。就是这样，艾思奇同志在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深入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第一线的过程中，逐步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说，艾思奇同志可算得上一个既有党性又有真才实学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了。

艾思奇同志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宣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是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不屈不挠的英勇战士。他的一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部分都是在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批判与斗争中度过的。他刻苦勤奋，实事求是，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艾思奇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一九八〇年

# 怀念艾思奇同志

李凡夫

艾思奇同志逝世已有十四周年了。我怀念艾思奇同志，这不仅因为我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与艾思奇同志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我们之间建立了战斗的友谊，更主要的是因为艾思奇同志生前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特别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

艾思奇同志在理论工作上的贡献比较突出的，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问题，特别是对哲学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二是哲学怎样做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哪怕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那是认识的局限性问题。

艾思奇同志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呢？哲学并不神秘，更不是少数专门家的私有品，哲学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它是从社会实践中概括起来的一门科学。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都不能离开社会实践。艾思奇同志就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三三年参加了上海的左翼文化组织——“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一九三五年入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初步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去说明社会现象，并

注意到在斗争中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各种反动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当时我与他在工作中经常有联系，在那个过程中，深感他那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和勤勤恳恳的踏实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很值得我们学习。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批判各种主观唯心主义，如初步批判了胡适的实验主义，张君劢等鼓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同时还批判了叶青等人夸大外力、抹煞民族自主的内在力量的谬论。同时，他面向工农大众，写了不少比较好的文章。他勇于创新，在引导工农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如在三十年代，正当许多人怀疑哲学能不能做到通俗化的时候，艾思奇同志排除了这些疑难，大胆地写出了通俗化的哲学著作——《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广大工农读者的欢迎。当然，这是艾思奇同志早期的著作，免不了还存在着缺点，但主流是应该肯定的。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艾思奇同志到了延安，特别在他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直接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更进一步认识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分不开的。他说："这个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才开始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有的放矢"及其它》前言）整风运动确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具体地反对了主观唯心主义，既反对僵死的教条主义，也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在那个运动中，艾思奇同志针对当时有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阐明了"必须从事实中求出它的

所'是'。不是单纯做调查工作，而必须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在指摘某一现象时，必须明了它在现象全体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离开全体来孤立看待。""同时，在揭发事实，理解事实的时候，要有伴随着一套解决事实问题的方法，才叫做真正的'实事求是'"。对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艾思奇同志说："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一九二九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议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一些同志起了积极的辅导作用。

经过整风学习，艾思奇同志更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比如在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中，正当蒋介石反共集团为了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企图以此欺骗人民的时候，艾思奇同志又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予以驳斥，指出这本书是"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艾思奇同志同时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艾思奇同志在该文中剖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颠倒，……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多了，中国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总

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这样来揭破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

在全国解放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又开展了反唯心论的斗争，艾思奇同志又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比如他写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等论文，更进一步比较系统地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反动的反科学的本质，指出了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大杂烩。他阐明了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同时也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残余。艾思奇同志这些论断，不但具有历史意义，在今天，对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理论战线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适当的方法，也就达不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目的。艾思奇同志之所以能够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出了贡献，除了他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还由于他大胆创新，找到了为大多数人（工农劳苦大众）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即写作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形式。他善于把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表达出来，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向科学化进军。他热情地支持工农大众学哲学、用哲学，使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大众的哲学。艾思奇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还很多，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不少的贡献，我仅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我以上所说的只是他在理论工作的两个方面的贡献，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了。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刊用时略加删节）

# 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

郑易里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现在又重印他早期的有名著作《大众哲学》，使我们心情激动，对他无限怀念。

艾思奇同志在中学时代就很爱好哲学。一九二六年冬，他中学毕业后来到南京，和他哥哥同住。他哥哥是个共产党员，有一天反动军警忽来搜捕，其兄不在，将他抓去。后在亲朋营救下，他恢复了自由，就到了日本东京，和我同住一屋。学完日语初级课程后，他买了一本日文本黑格尔哲学，作为进修日语的主要读物。我当时对哲学一无所知，认为在备考时期不该如此浪费时间。他说他爱哲学，借此容易搞通日语，一举两得。不久，他患胃扩张病，病情颇重，他却毫不在意，仍努力自修。他读了不少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为了能够阅读原著，他还自修了英文和德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同学同仇敌忾，纷纷弃学回国，我们也回到了昆明。

一九三二年，艾思奇同志在昆明的活动受到反动政府的注意，处境危险。于是他怀着革命的热忱，到了上海，在南市泉漳中学担任化学教员，该校是福建华侨集资兴办的一所中学，师生进步，富有爱国革命热情，一九三四年秋，反动军警突然查封学校，捕去教员多人，艾思奇同志住在校外，得以幸免。当时，不得不靠写文章维持生活。这时正是中国革命继李立三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遭受到空前挫折的时候，广大青年彷徨歧途，迷雾重重，但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正在发展，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正如鲁迅所引喻的那样，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在艰难的条件下不停地战斗着。

一九三四年，艾思奇同志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图书馆，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的撰稿工作，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艾思奇”就是他这时候开始用的一个笔名。艾思奇同志在《申报》“读书问答”栏中撰稿后，读者日益增多，该栏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李公朴先生等奔走下，从《申报》独立出来，改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同志是编辑之一，主持内部编辑业务。这时他和广大青年读者已结成了千丝万缕的革命关系。他深深知道，这一时期弥漫在广大知识青年心中的时代苦闷，是由于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所以他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冲破哲学迷宫，用“深入浅出”手法、通俗的语言、浅近的事例叙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冲破了千百年来的这一神秘禁地，使哲学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广大群众面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天天可以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就这样，他开始为每期《读书生活》写一篇哲学讲话，后来集结成书，就用《哲学讲话》为书名。这是一次尝试，正如作者所说：“是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没有人屑于尝试的。”由于当时白色恐怖，写文章需要巧妙、隐晦，又要用容易懂的话来阐明深刻的道理，是不容易的。

《哲学讲话》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国民党反动派则怕得要死，不久便以什么“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以后稍加修改，改名《大众哲学》再版。到一九三八年，在短短两年期间，《大众哲学》已出到第十版，到一九四八年已出到第三十二版，可见《大众

哲学》在广大群众中影响极大。不少青年也的确因为看了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已不是生硬的书本知识，已能够在广大群众思想认识的湿润土壤中生根发芽了。记得贺敬之同志曾在他的一首诗内这样吟诵说：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编者注）

《大众哲学》已成为人们艰苦奋斗中的有力武器之一了。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同志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

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者侵华日紧，爱国有罪，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李公朴先生等七人被捕入狱。次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上海。艾思奇同志在这时主编的《认识月刊》也在战火纷飞中被迫停刊。随后，他和周扬、周立波等同志相继离开了上海，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艾思奇同志到延安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那时正是毛主席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期，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正是马列主义哲学发展新阶段的典范。在上海时，艾思奇同志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进行宣传，到延安后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更好地领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受到客观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使它不断地丰富发

展。日本投降后，《大众哲学》一直在各地销行很广，这说明它仍然反映着时代的要求，仍然很受欢迎，但他感到原版本内容不能满意，所以下决心在工作之暇进行修改。一九四八年改过一次。一九五〇年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现在重印的便是这个本子。这个修改本，他还不满意。

从一九三七年起，艾思奇同志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党要他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党内教育工作。为了更进一步理解变革客观实践的理论，全国解放以后，他曾四次下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在这期间，他写过不少论文和讲稿，其中主要的有：《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胡适实用主义批判》、《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科学方法》、《以辩证唯物论武装科学》、《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武器》、《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等等。艾思奇同志为普及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众哲学》初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四十多个寒暑，中国已由一个横遭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跃站立起来了，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打倒“四人帮”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在继续新的长征，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前程无限光明远大。然而，我们周围世界的现实仍然很复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论还需要继续批判，仍然需要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象《大众哲学》这样的作品。

一九八〇年

# 难忘的记忆

何定华

一九六六年春天，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们以各自不同的心情，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当时我在武汉大学。出乎意料的，突然传来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心情极为沉重，彻夜难眠。尔后，便进入了十年动乱，我同李达、朱劭天同志一起被当作武大的“三家村”打进了他们的“另册”。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肆意践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拖入灾难的深渊，理论界更是被搅得混乱不堪。“四人帮”被粉碎了，党和人民胜利了，理论界又重新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被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正在不断地得到澄清，一大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正在茁壮成长。此情此景，不由得更加激起我对为党为人民献出毕生精力的艾思奇同志深深的怀念。

我和艾思奇同志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当时，我正在上海“社联”工作。马纯古同志调离“社联”时，亲自把艾思奇和柳湜同志的关系转交给我。此后，我和老艾同志便成莫逆之交。

此时，年轻的艾思奇同志在知识界有点名气，他的著述已拥有许多读者。他思想敏锐，敢于面对现实，抨击时弊，而且有较深的理论修养，文笔犀利。他了解自己的读者在想什么，在希望什么，这使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特别是，艾

思奇同志领会到哲学的命运应该掌握在劳苦大众的手中，因此，他致力于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党组织正是根据艾思奇同志的优点和特长，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一些抛头露面，诸如飞行集会等易于暴露的活动，照例不让他参加。原因是要保护他，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去从事理论战线的工作。组织给他的任务，主要就是为申报读书指导部撰写文章，以笔为武器，参加社会斗争。

当时在上海知识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一些资产阶级评论者认为，中国应当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党则坚定地认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象这样带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启蒙性质的宣传活动，艾思奇同志总是认真地按照党的方针、路线，积极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外，艾思奇同志还经常写一些分析形势、认识时局的文章，主要是讲抗日救亡运动。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

三十年代的前半期，上海的特务活动异常猖獗，革命者随时都可能遭到反动势力的暗算。因此，我们每次约会，都要提防和摆脱特务的盯梢。艾思奇同志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不怕带“尾巴”，每次秘密接头，总是准时地在预约地点等着我。一见面，他往往是急于领任务，先谈工作，问有什么新的精神？以后还有什么新的任务？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他很谦虚谨慎，常常把写好的稿子给我们看，征求修改意见。

大家都知道，艾思奇同志言谈不多，为人敦厚，但是他有一颗爱憎分明的炽热的心，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史量才先生，艾思奇同志愤恨至极。在谈到申报读书指导部如何表态时，他说态度要强硬、要抗议。我把党组织的意图转告他，可以表态，但又不能暴露自己。艾思奇同志愤然命笔，揭露反动派践踏民主、扼杀爱国力量的暴行。随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分量很重，气氛很好，影响也很大。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白色恐怖愈益严重，“社联”的活动愈来愈困难。艾思奇同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继续为党为人民默默地战斗着，表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党忠诚老实的高贵品质。救国会成立后，他的工作就更忙了，除读书指导部外，他又是《读书生活》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他虽不擅长于四面奔走，不善于辞令，但他很会分析问题。当时，我经常给他提供一些从外地来的秘密的过路报刊，不能停放，大都要匆匆看完及时取走，他却能从中领会文件精神，在宣传上把好思想关。《读书生活》是一家救亡运动的进步刊物，由于他和柳湜同志等密切配合，使这本杂志越办越好，博得了众多读者的欢迎。在这期间，艾思奇同志的创作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他的“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就是最先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的。结集出版后，更是象火炬一般在进步青年中传递着，使许多人因这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艾思奇同志的工作十分认真，写作异常勤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出名的，能拿稿费的事，总是先让别人去做，写评论、写抗议、支援兄弟单位、写消息报道、写答读者信等杂事、琐事，他总是争着完成。他没有因环境恶劣退缩过，他总是怀着对党无限赤诚的心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时代哺育艾思奇同志成为优秀的理论家，党的阳光照亮了艾思奇前进的方向。一九三五年艾思奇同志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面前展现了一条通往更高境界的康庄大道。象他这样有抱负、有才华的年轻的哲学家，正是党十分需要的人才。

艾思奇同志的日子过得很俭朴。他早年出走，与家庭断绝经济往来，生活全靠有限的稿费维持。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可是他对同志却满腔热情，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相助。有一次，一位同志从狱中出来，艾思奇同志送给他五元钱和一

套西服。他也很体贴同志，当时郭大力同志正在从事翻译马克思的宏篇巨作《资本论》，脑力劳动艰巨，生活又不安定，为了使译者生活有保障，艾思奇同志设法给郭大力同志预支些稿费，使《资本论》第一次有系统的和中国读者见面。

一九三五年底，我因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调往华北做军事情报工作。临行前，我和艾思奇、柳湜同志分别见了面，互勉后会有期。记得马纯古同志曾经多次和我讲起，艾思奇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并要我给组织上反映，继续保护老艾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

想不到三年之后，我和老艾又在延安见了面。他仍然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此时，他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哲学家了。可是，他还是那样谦逊，治学态度却更为严谨了。他说，通过整风运动和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深感到自己写的东西不行。他敢于否定自己的劳动成果，后来果真把一些文稿重新写过，陆续发表在延安报刊上，思想深度和写作水平均更见提高。

艾思奇同志离开人世已十余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年逾古稀，人老了，更感到做学问真不容易。有位同志告诉我，毛主席曾说过，李达同志最先为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写了解说，作了哲学的通俗宣传，而艾思奇同志则能够按实践论、矛盾论的本义解释许多哲学上的问题和政治理论上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对两位哲学家的公正评价。李达同志一九六六年八月受迫害含冤逝世，艾思奇同志也是过早的谢世，这确实是我党理论战线的重大损失。他们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党的理论建设和培训干部的光荣事业，而且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哲学财富。听说，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他们的文集，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哲学家，走过十分曲折的成长道路，有一部回忆艾思奇文集问世，这对于我们特别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将是很有益处的。

# 思想战线上的卓越战士

## ——回忆艾思奇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战斗生活

黄洛峰 遗作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思奇同志因心脏病及其他几种并发症，突然去世了。在垂危的前几天，医院已不允许探视，我只得每晚通过电话从他的秘书那里了解病情。待到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茫然若失，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第二天一早，我约同老友郑易里同志急忙奔赴阜外医院，在太平间里，看见思奇同志安详地躺在那里，嘴角上依稀挂着一丝微笑。我抑制不住悲痛，眼眶湿润了，默默地告别了他的遗体。我们接着赶到中央党校看望王丹一同志，这时，除了几句简单的慰问话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思奇同志长眠十四年了。然而，他在我的心里，却是永远活着的。我的心头一直闪动着他那圆鼓鼓而又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天真活泼而又冷隽的微笑，沉默寡言而又坚定有为的毅力……。在中央党校参加过他的追悼会之后不久，我拼凑出一副挽联。现在，略加改易，不计工拙，把它抄在这里：

宣扬马列，坚持战斗，著作等身，早岁即已蜚声哲学界；

带病蹲点，调查研究，中年英发，何期遽尔长眠八宝山！

他死时五十六岁，按照近年来划分老、中、青的标准，说算中年也不为过的。

我曾几度想写点回忆文章，所以迟迟未写，不仅是拙于用笔，也许更重要的倒是由于十年浩劫，自己也被投进了“牛棚”，成天所要写的总是什么“检查”，以及各种各样的“证明材料”之类，每天都弄得筋疲力竭，实在没有办法再拖着疲乏的身心，去写对亡友的怀念了。一九七九年冬天，云南人民出版社邀约同志们写点回忆艾思奇同志的文章，打算结集出版，终因身体不好，迟迟没有动笔，直至最近，才算草草交卷。

思奇同志短短的五十六年的生涯，充满着战斗的经历。他的各个时期，都有老战友分别写出回忆，我这篇东西，由于所知也不多，主要是写他三十年代在上海战斗生活的一些片断。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愤然罢学回国，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思奇和我先后从日本回到上海，从事反日运动。不久他回昆明住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二年春，他又从昆明来到上海，同吴瑛同志两人寄居在他叔父家里，准备寻找个合适的工作，继续战斗。不料为时不久，由于与其婶母相处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俩愤然搬出来自谋生计。经朋友介绍，他进入上海泉漳中学教书。该校是一所进步学校，不久就被查封，于是他失业了。在米珠薪桂的上海，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经郑易里同志介绍，常常为吴清友主编的一个什么副刊写稿，同时也从日文翻译一点文章，以维持简单的生活。

一九三三年秋的一个短时期，我们朝夕相处。鉴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读物寥若晨星，我们曾打算约集友好，从日文、英文以及其它文种的科技书刊，寻找些于中国有用的东西，编译出版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由他负责主编，我任助编。其时，

有一家中外出版公司（也许叫中外图书公司），在法租界吕班路北口开着一个三开间的门面，声称要出版各种书刊。这家公司的老板明耀五，思奇与他相识，又是小同乡，即由他前往接洽。我们要求不高，每月只要五十元编辑费；刊物的稿费，则照该公司的稿酬办法支付。但是，思奇奔忙了几回，并不能打动那位老板的心，还是不肯给以支持。我们这种朴素的愿望，终于象由一根麦秸吹出来的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们想通过同乡关系去打开一条小小渠道为中国大众介绍科技知识的希望其所以不能实现，自然说明了不同的阶级立场，也说明了我们当时还天真幼稚。接着，我也就离开上海了。

一九三四年春，思奇经朋友介绍，到李公朴先生任馆长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改名为量才图书馆）工作。图书馆设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对外开放。到那儿借阅书刊的，绝大多数是十里洋场上的店员、小职员、失业青年等等。这家图书馆也许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吧，它还设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用书面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思奇与柳湜等同志在这个指导部一同工作，引导青年走上进步的光明大道。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图书馆深得读者的爱戴，真是口碑载道，渐渐地读者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许多问题是近似的，带有普遍性的，个别回答读者，显然已不能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经李公朴与申报馆商量，就在该报专门辟了一个《读书问答》专栏（约占一个版面的五分之一左右），为读者解答那些带有共同性的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读书问答》为读者解答疑难，也为读者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凡是有关哲学和科技知识的解答文章，都是出于思奇之手，他的耕耘是十分辛勤的。与此同时，读书指导部的几位编辑也从读者那儿得到启发，进一步分析了读者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而针对读者的一般愿望，归纳分类，有计划、有步骤地

自行出题，自行解答。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对读者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个专栏越办越出色，读者越来越多，但是，小小的版面，毕竟容纳不了更多的篇章，用那时流行的所谓“报屁股”的短短的专栏，渐渐地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有些读者希望能专门出版一种杂志，于是《读书生活》就在这种督促之下，得到上海杂志公司的支持，应运而生了。从读书指导部到编刊《读书问答》，这就成了出版《读书生活》杂志的先河。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读书生活》在上海诞生了。这个半月刊，由李公朴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子美（即夏征农）任编辑。刊物中设有《短论》、《文学讲话》、《哲学讲话》、《科学讲话》、《读书问答》、《名词浅释》等几个专栏。其中思奇负责撰写《哲学讲话》、《科学讲话》两栏的文章，同时他也为《读书问答》、《名词浅释》写稿。由于李公朴忙于各种政治活动，整个刊物的组稿、审阅、定稿主要是由思奇和柳湜负责的。

《哲学讲话》每期一篇，一直连续登了二十四期（关于《哲学讲话》我将在另一篇专文《艾思奇与大众哲学》中作一些介绍）；《科学讲话》不是每期都有，在《读书生活》第一期上刊登的题目是《谈死光》，第二期是《谈毒瓦斯》……，署名是“李崇基”。谈起《科学讲话》，又使我不能不顺便提起在本文前面提到的他和我曾打算编刊一个《科学杂志》的那一个小小的愿望，在那次碰壁以后，终于由他在《读书生活》上把它部分地实现了。回想当年，我从《读书生活》上读到思奇所写的这个专栏时的喜悦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当时，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大众化、通俗化汇成一股洪流，一浪一浪地冲向各地。《读书生活》随着邹韬奋同志主编的《大众生活》等兄弟刊物一道成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的一支突击队。国民

党反动派对书刊的审查制度的那个文网十分严密，从而在《读书生活》上发表的文章，不可能畅所欲言，遣词造句，颇费心思，有时某些文章甚至只能写得吞吞吐吐。思奇他们几位编辑更是苦心孤诣，随时要准备审查老爷的抽扣和查禁，每一期文稿，总得要多准备几篇，以便一旦某篇文章遭到厄运时，立即填补上去。至于在文章中被审查老爷随意删削，胡改乱涂，更是家常便饭。这种编辑重担，往往是思奇负担得更多一些。

《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由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张静庐做发行人。由于上海杂志公司自有一套发行门路，尽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封锁，每期仍能销售一万多份，有时多达两万份。这在今天看来，真是渺乎其少，但在四十五年前，这已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了。《读书生活》出完第一卷（十二期为一卷）即改为独立经营，由李公朴任主编兼发行人，自办发行，但仍由上海杂志公司代售。在出版第二卷时，思奇又用“李崇基”的笔名，写了《如何研究哲学》，分几期发表。到出第三卷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初），杂志社就发展成为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四〇年起，为便于人们记忆改名为读书出版社），不仅继续出版《读书生活》等杂志，同时还出版各种图书。首先把杂志上已经登完的专栏文章，由原作者作一些必要的修订，结集出版单行本。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讲话》就是最先出版的一种。《哲学讲话》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被查禁，接着经过一些修订，改名为《大众哲学》，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继续出版（即第四版）。《哲学讲话》单行本一经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十几年中一直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思奇写的《读书问答》专栏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也结集为《知识的应用》，出版了单行本。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处处屈膝投降，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特别是在一九

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之后，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上海文化界成立了许多救亡组织，其中有个“哲学座谈会”，就是由思奇同志领导的，会员有柳湜、陈楚云等十几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座谈会，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的团体会员之一。哲学座谈会不仅限于学习、研究哲学问题，也旁及其他政治运动等问题。会期每月一、二次，每次都是由思奇主持的。

一九三六年冬，“救国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领导人被捕了，《读书生活》杂志也被查禁。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出版事业更加肆意摧残，各大中城市的一些零售书店，只能偷偷地卖进步书刊，于是催收帐款就难上加难。书发不出去，帐款收不回来，读书生活出版社突然陷于周转不灵，濒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在这个严重关头，思奇同志挺身而出，找郑易里同志商量，设法筹措资金。一九三六年底，易里商得他二哥郑一斋先生同意，由他出资三千元，支撑了这个小小的文化堡垒。稍后又经思奇、易里和我多方设法，零零碎碎地征集到一千多元资金。思奇和易里坚持要我出任经理，思奇任编辑主任，他每天到社办公半天。有了四千多元资金，可以多做点事情了。我们商定出版社长远出书规划，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用若干年的时间，分期逐步出齐马恩全集。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方针，当郭大力、王亚南二同志开始合译《资本论》，几度与大书店接洽出版碰了钉子之后，他们经人介绍找到了艾思奇。他立即与我们研究，我们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了支持郭、王能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由出版社与他们签订约稿合同，每月支付他们每人八十元的预付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还特意提出两千元专款，在银行单立帐户，作为专门支付郭、王预付版税之用。其后，经郭、王两位

辛勤劳作，《资本论》全译本提前在一九三八年问世了。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就在于《资本论》全译本之能在中国出版，这首先是在思奇的倡议之下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初起，在思奇的筹划之下，读书出版社还同时出版着几种别的杂志。《读书生活》遭到查禁之后不久，另用《读书半月刊》名义出版，但只出了两期又被查禁了。不得已，即由柳湜同志约请各方面关系较多的陈子展同志出面编辑《生活学校》。当然这个刊物仍然力求保留一些《读书生活》的特点，每期的大众信箱，是由思奇负责写回答的，他还写了几篇哲学讲话，重要文稿也参与审定。此外，他要审阅各种书稿，对某些投稿提出意见，帮助作者。同时，他还要为一些刊物组稿、审稿，比如，一九三六年他就为《通俗文化》半月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时，不少进步刊物都约他写稿，他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共同的战斗任务，为左翼文化战线不知疲倦地战斗着。

也是在一九三七年，为了扩大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思奇还提议出版一个大型的理论杂志，并由他负责主编。不久，《认识月刊》出版了。这个刊物在思奇的精心安排之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当时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作了尖锐的批判。它作为一支小小的投枪，在抗战前夕的思想战线上是起过一定作用的。不久抗战爆发，由于当时的困难局面，思奇不久即离开上海，《认识月刊》只好停刊，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考虑恢复出版了。虽然它仅仅出了两期，但思奇为他倾注的心血，在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是使我感到有必要在此记下一笔的。

在一九三七年，思奇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那几年所写的一些单篇文章，结集成为单行本，题名《哲学与生活》出版（这本书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被查禁）。听说思奇到达延安以后，这

本书还曾受过毛泽东同志的赞赏。

抗战爆发后，党组织决定要思奇到延安去任教，于是他离开上海，到解放区的新天地里继续战斗去了。这时，读书出版社又遇到周转不灵，几经挣扎才度过了重重难关搬到武汉，在上海仅仅留下一个更小的摊子由易里同志坚持着。思奇同志到了延安之后，应我们的要求，对《大众哲学》又进行了一次修订。我必须顺便在此提到的是，他到延安后，在百忙中，仍然不断给出版社来信，要我们注意着重出版哪些书籍；有时他还在延安组就书稿，托人带到武汉、重庆，由我们排印出版。遇到有从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来工作的作家、著译者，凡是我不认识的，他都要介绍给我们，争取为出版社写书。他远在延安支持出版社出书的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因交通中断才停止。他对自己参与开辟蒿莱，灌注很多心血而成长起来的这个小小的读书出版社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直是鼓舞我们继续作好出版工作的动力之一。

思奇同志的性格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有些腼腆，遇见生人，显得有些木讷，但是与熟人相处，则是有说有笑的。在他的冷静的外表之下，其实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就象永不枯竭的源泉一样喷射出它的清泉。他处事认真负责，对人热情诚恳，这些，凡是与他交往稍久的人，是无不深切地感觉到的。

思奇同志不仅勤于思考，善于钻研，他的学习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对世界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非常关切。如在《科学讲话》这个栏目中，他还写过《谈潜水艇》、《火星中的生物》等等。他也爱好文学，读过不少中外古典名著。他还通过自修学会了德文，钻研海涅的著作，翻译出版了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他也是一个头脑极为活泼的人。尽管乍一看去，给人的印

象似乎有些呆板，其实不然。就拿他把卓别林写进《大众哲学》来说，他以卓别林、希特勒的胡子之一样来说明感性认识的缺陷，两个人的胡子虽然一样，但卓别林的胡子是滑稽大王的胡子，希特勒的胡子却是法西斯头目的胡子，以此来说明理性认识之必要。试想如果不是一个头脑活泼的人，能用这样深入浅出的事例来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么？再如，以他的“艾思奇”这个笔名来说吧，他是在看了一部外国的《爱斯基摩人》影片之后，突然灵机一动，借用片名的谐音取下这个笔名的。如果不是一个心地活泼的人，他能用这个谐音来表示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这样寓意的笔名么？只举这两件小事，我们就能认识到他的心地活泼之一斑了。

思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地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之下，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埋头苦干，坚强不屈地同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留下了那么多的著述。他的贡献和成就，在思想战线上是会长期闪耀着卓越的光辉的。

一九八〇年

# 怀念艾思奇同志

金　丁

艾思奇同志去世已经十五年了。他的文集即将出版。缅怀故人，我想谈谈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开始研究哲学，应当是不无意义的。

一九三二年冬，我在第一次参加“上反”（即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会议上，认识了艾思奇。那天他在会上发言很少，但他总是在沉思什么的神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听到会上有同志称他为老李。

第二次和老李在一起参加“上反”的会议，那已是一九三三年“五·一”大示威之后的事了。那时，由宋庆龄、杨杏佛领导的“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①已遭取缔。“上反”又着手组织能够公开的“中国领土保障同盟”②。就在这次“上反”

① “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宋庆龄同志是该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是以“上反”成员为骨干的公开的抗日爱国团体，有公开的会址，既有上层的人士参加，如杨杏佛、吴迈（律师），也有工人、学生、店员参加。一九三三年“五·一”后，为上海租界当局所取缔。

② “中国领土保障同盟”，是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被封后，于一九三三年六月成立的由党领导的公开抗日爱国群众组织，上层人士参加的不如“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那样广泛。巴比塞调查团离上海后，即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的会议上，曾讨论了要提到“中国领土保障同盟”会上通过的宣言。不过，无论是“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或“中国领土保障同盟”的公开活动，都极少看到艾思奇参加。我和他彼此相知并结成莫逆的友谊，主要是因为我们共同在泉漳中学工作。

上海泉漳中学是福建泉漳会馆办的，学生多是闽南人，有些是南洋各地华侨的子女。这是一所地下党领导的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在一九三三年前，这所学校曾几次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无理下令停办。到一九三二年底酝酿复办时，“上反”和“左联”约集了刘芝明、吴际云、何烈克、艾思奇、华蒂（叶以群）、穆木天、李辉英和金丁开过一次会。原有的一些“上反”的成员准备撤出，由“左联”的同志去接替。当时决定继续留在泉漳的“上反”成员，只剩吴际云和艾思奇（艾思奇是一九三二年到泉漳中学教课的）。但开学不久，吴际云和“左联”的华蒂以及李辉英等同志相继离校，教师中能经常共同研究学校问题的，只剩艾思奇和我了。

当时泉漳的高中部是文理分科，艾思奇教的是物理和化学。同学们说，他讲课并不工于言辞，但认真，善于把抽象的原理、定义，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讲得大家都理解，有兴趣，因此很受欢迎。同学们很喜欢和他接近。

我们教课钟点很多，而学校每月却发不出薪金，只能领到一些车马费，也算不无小补吧！当时艾思奇住在吕班路万宜坊，离学校所在地日晖桥很远，但因经济拮据，每天去学校教课只得步行。也曾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事：我去他家里，彼此谈话兴高采烈，可是该吃饭了，他站起身来，踌躇了一下，然后有些歉意地笑笑，说，我们到谁的家里吃饭去。他几乎冬夏都穿着那套咖啡色的旧西装，夏天就把上衣挟在手里。也许只有房租是每月到期不能含糊的一笔大的开销吧！我们都很穷，有时身上只有几角钱，但确实不曾为生活吃穿之类的事多去分

心，想得更多的倒是尚未变成现实的海阔天空的憧憬。

我们当时还很年轻，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上，正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成长，它沛然莫之能御，这便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艾思奇和我当时都不是党员，我们最初也不知道自己所接触的同志当中，哪些确是党员，也不便问，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但我们逐渐感到，是有那么一些同志，他们一般都很刻苦，工作上勇于负责，遇事总是很有办法，而且言行一致，能与人为善，这些人彼此很容易推心置腹。因此，处境尽管恶劣，斗争又比较激烈、复杂，我们在精神上却受到鼓舞和支持。

我是一九三三年初去泉漳中学工作的，在那里待了不过半年。这年四月，上海伪教育局不但不批准泉漳注册，还勒令学校立即停课。因为学校就办在泉漳会馆里，同学一般在学校住宿，校委会支持教师和同学继续上课。到六月，国民党公安局竟出动大批警察，强迫同学离校，逮捕了四十多名学生，并把学校封闭。从四月起，我们面临各种威胁和意外的事，要逮捕某些教员和学生的流言时有所闻。艾思奇每天照常去学校上课，中午也很少回家。就在这期间，除了上课、开会，他几乎手不释卷地读着他后来同郑易里合译的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日译本。

学校封闭了，如何善后？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安置他们转学或回家，有些日子艾思奇早晚到各处奔走，他是教师中唯一把学校善后工作做到善始善终的。

泉漳被封后，我曾在艾思奇家里暂住。“上反”又给我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中国领土保障同盟”成立起来了，它初步的中心工作，是接待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留学生（包括现在的政协委员周颖）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而欢迎巴比塞调查团，则包括很多具体的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上反”的工作，我

抓得很紧，我几乎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了。“左联”这时曾找我谈过一次话。是的，我还不曾从一年多来剧烈激荡的生活与工作里，仔细清理一下个人的感觉和体会，以便再接再厉。作为一个作家，他必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但更重要的是，他应当通过艺术的概括，把自己的生活体验，用作品反映出来。我一时还无法解决自己在“左联”与“上反”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矛盾。怎么办呢？艾思奇有些日子也很沉默，他也遇到和我类似的问题，不过他认为非下决心解决不可。我后来才知道“上反”也有同志找他谈过话。

夏日苦长，住在一起，我们谈心的机会比在学校时多了。艾思奇的知识面是比较广的，对文学和音乐都很有兴趣。他喜爱修曼、李斯特以至施特劳斯谱写的乐曲，他特别欣赏海涅的诗。有时朗诵起来，的确象是忘记了眼前的一切。他一面诵读着，一面解释着（他当时已通晓日、德、英几种语言），莱茵河的水声，寂静的月光，古老的街道，那些如梦的幻境，我现在回忆起来，仍不禁神往。我们也曾谈到当时有些同志议论着的“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第三种人苏汶是断定左翼作家不会产生莎士比亚和弗洛贝尔的。他不愿也不敢正视国民党对左翼的压迫。而我们自己的同志中，把写不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简单地归结为题材问题，这当然也不能说服人。艾思奇几次对我谈起这个问题。他那篇《身边琐事与伟大远景》，就是在我们谈论的基础上写的。

但我们谈得更多的，而且感到必须在思想上明确的，是自己应如何在革命工作中发挥螺丝钉作用的问题。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而我们当时都程度不同地有“身不由己”之感。接受组织上安排的工作，我们一般是无条件的，但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他说起自己如何经过再三的考虑，但还不曾向组织上提出转到“社联”的问题。他极想集中力量搞哲学。他谈到

自己从公孙龙子所说的“白马非马”，联想到有关辩证法与抽象作用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论辩证法与抽象作用》这篇文章，很快就写好了，并且送到“社联”办的《正路》上发表出来。这篇文章受到哲学界同志的重视，我知道林伯修（杜国庠）找过他。他还告诉我，他也同许涤新谈过了，他决定参加“社联”，专心一意地去研究哲学。他当时是二十二岁。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出门时和艾思奇约定了回来吃晚饭，但这天傍晚我被守候在湖风书店[1]的两个特务所逮捕。亲爱的同志啊！你当天深夜是怎样焦急地等着我？你第二天是怎样和我的爱人到我常去的同志家里找过我？

……

生活的道路，回忆起来，显得那么漫长而崎岖，而介于同志间莫逆的友情，将永远引人怀恋。我不能忘记一九六二年夏的一次长谈，我们谈往事，谈将来。一九三七年在南京的话别，一九四九年在北京的重逢，然后又都是到人民大学教课……来日方长。然而谁能料到，在他应该更有作为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失掉了一个诚挚、可以完全信赖的老友和同志。

现在，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欣逢《艾思奇文集》即将出版，我在怀念中仅将他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些生活片断琐记如上。

一九八一年

（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三辑）

---

① 湖风书店，是一家进步书店，开设在上海老靶子路。

# 艾思奇同志在申报流通图书馆

王笠夫

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到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当助理编辑，其时，艾思奇同志是这里的编辑。他待人诚恳、热情，和同事们相处得很融洽。艾思奇同志勤奋好学，理论造诣很深，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叫“百科全书”。谁有不懂的问题，都愿意去找他，而他也从不厌烦，总是详尽地给予解答。他的外文水平也很高，由于当时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很少，他经常阅读日文本和英文本，并刻苦自修俄文，以便为更好地研究哲学创造条件。艾思奇同志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我那时才十九岁，特别喜好文学，他热情鼓励我，并介绍我读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他说：“多读文学作品，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扩大自己的眼界。”还说，他在青少年时期也酷爱文学，特别崇拜高尔基的作品，因而取名李崇基。他用这个笔名在上海和延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翻译过海涅的诗。由于他学识广博而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很敬重他。

读书指导部每天要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是读者在学习中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要求解答；其次是读者要求我们介绍一些较好的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作品。开始，我们助编人员，把图书馆现存的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观点较好的书挑出来，向读者推荐。关于读者在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照例是由编辑们来负责回答。具有普遍性而

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报刊上公开答复，至于非普遍性问题都通过邮信个别回复，这一部分占的数量最大。

艾思奇同志极为重视回答读者来信的工作，他极其严肃认真地写过大量回信。有一位读者来信，申述他热爱文学，其理想是将来当个作家，但又遗憾自己没有读过大学，文化水平不高，因而感到苦恼和没有信心。当时，有个编辑给这位读者写了回信，大意说：当作家不一定非要念大学，高尔基就没有上过大学。只要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基层，熟悉人物的生活、思想、感情，用艺术形式和文学语言再现出来，就能写出好作品。回信特别强调高尔基如何深入下层的问题。艾思奇同志看了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完全，他指出，光强调高尔基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是不够的，高尔基之所以成为世界文豪，是因为在列宁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直接参加了革命实践，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正确地反映了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难和他们对光明的追求，并热情地向读者推荐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后来，艾思奇同志在社联的秘密刊物《火线》上，还为此写过一篇专论，对当时爱好文学并想从事写作的青年读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时读者来信所涉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艾思奇同志写回信，总是联系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形势给读者以启迪，引导青年从大处着眼，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曾有一位青年读者来信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书法家？颜、柳、欧、苏四大名家，究竟先习哪一家好？对于这个问题，怎样回答好呢？有的人建议应根据他本人的爱好，选习其中的一种，学书法最要紧的是“持之以恒”。当时，艾思奇同志觉得，这位读者在当时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带有某种特殊性，但又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此，回答他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否则，就会把青年的兴趣爱好引导到脱离现实、不问国事的错误倾向上去。他指出：“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传统艺

术，历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当前我国东北大好河山沦陷敌手，民族危机深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大多数人连识字的权利都没有，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谈什么“书法”？他建议应向读者指明，生长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当然还要说明，有志攻书法是件好事，但现在不是时候。艾思奇同志的这番见解，密切联系当时现实，不但及时为青年读者指明方向，而且对我们指导部的同事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艾思奇同志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很关心别人的工作。他曾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向读者随意开列书目。向读者推荐的作品，必须首先自己好好学习领会，拟出学习提纲，帮助读者学习时进行思考。这种做法，不但促使我们本身更好地学习，提高水平，而且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

艾思奇同志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当时他并无固定工资收入，生活也不宽裕。他写过许多读者回信，既不得名又不获利，可是，他并没有把这当作是苦差事。他常对我说，读书指导部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每天给读者发出那么多回信，这都是革命的宣传品。

艾思奇同志研究哲学很早，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就在报刊上发表哲学著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收在他的《新哲学论集》一书中。然而，艾思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是因为他在高深莫测的哲学殿堂里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而益加鲜明起来，其特点就是他积极从事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贫苦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做我们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动机下，促使他探索哲学通俗化的道路。史量才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我们一起被赶出了申报流通图

书馆。宣传的阵地没有了，他立即和李公朴等人筹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就在这个刊物上，连载了他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在他的影响下，通俗化的读物有如春风扑面，覆盖了许多出版物的版面，呈现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柳湜的“街头讲话”、廖庶谦的“数学讲话”、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社会科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生活书店印行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所有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读者的热情欢迎。而艾思奇同志在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中，他不但提倡，并且身体力行，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三五年，党组织派我回江西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到江西后，我在九江组织了一些青年工人、店员、学生，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时事研究会”。这个组织发展很快，可是，进步书刊当时在内地是不容易买到的，如《读书生活》、《大众生活》、《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等。群众普遍渴望读到“解剖现状”的进步书刊。为解决群众这一迫切期望和要求，我和一部分骨干商议，计划筹办一家书店。可是，当时参加“时研会”的都是一些穷苦青年，办书店缺乏资金，困难是很多的。这时我想到了艾思奇同志，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希望能和读书生活出版社建立代销关系，并请他从中斡旋一下。我们很快就接到了他热情的回信，表示大力支持。我便写信并委派黄志强同志径直到上海读书生活社找他联系。在他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同时和上海杂志公司、生活书店取得代销关系。一九三六年夏初，一个新生的求知书店便在安徽省安庆市正式开张营业，受到当地爱国群众的广泛欢迎！不幸的是，这家凝结着艾思奇同志一份心血的进步书店，正当它为传播真理越来越发挥作用时，便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查封，前后仅维持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事情虽隔四十多

年，但当时苦心经营，深得艾思奇同志赞助的情景却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我到达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大概是因为在上海曾有共事的机缘，老艾找到成仿吾同志，把我要到文协去工作。有一回，我问到他的《大众哲学》能否在延安出版。他极其诚恳地告诉我：这本通俗读物成书比较仓促，又是断续成篇，写作也嫌粗糙，况且里面还有错误。——讲到这里，他问我发现没有？我说没有。他说，譬如讲到雷峰塔的倒塌时，就有外因论的问题。倘若要再版，有些地方需要重新修订。全国解放后，我们虽都在北京工作，但过从甚少。记得进城不久，在中南海开一个什么会议时，曾见过一面。我问他，现在忙着准备什么工作？他说，他正在着手筹划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可是，及至他一九六六年去世，竟未见他的这部著作问世。我想，如果艾思奇同志能把全部精力或者主要精力都投放到理论研究和著述活动上，那成果当会怎样呢？然而，艾思奇同志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总是根据党的需要去从事工作。

如今，我也已年事渐高，抚今忆昔，满怀情思。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经过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之后，终于昂首挺胸，踏着四个现代化的节拍，大步前进了！无数的革命英烈在天有灵，看神州遍地阳光普照，处处景色宜人，也会无限欣慰吧？艾思奇同志逝世已整整十四年了，我谨乘此机会，写了以上文字，以志怀念！

一九八〇年

# 忆思奇同志

刘惠之

时间要回溯到一九二七年。地点是日本东京近郊大岗山，我们几个云南籍的留日学生，等待着一个新留学生从家乡来。他来了，个子不高，宽额头，有一双大眼睛，手提一只小箱子，和我们一一握手时，操着浓厚的昆明腔："您家可好好的？"身在异国听到家乡的声音，格外亲切。经过自我介绍，我们知道他名叫李生萱，这是我和艾思奇同志初次见面。

日本的樱花和樱花映辉时节的富士山是非常迷人的，不夜的"银座"近在咫尺，但这一切仿佛对只有十七岁的思奇却毫不动心。他黎明即起，深夜始眠，整日坐在"榻榻米"上用功，就连我们住处附近，有一个叫"洗足池"的小公园，饭后散步即可达的地方，在那一段时间，思奇竟然一次也不曾去过。唯有神田区的书店对思奇最有吸引力，从不是疏客。那时的日本，正向军国主义发展，它对外侵略，对内压迫日共和左翼活动。但是，在首都东京还能维持资产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民主。譬如：在书店里可允许出售马列主义著作。思奇就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头发总是老长老长也不理，衣服总要过了很久才换洗，为的就是多挤出一些时间学习。思奇看了不少马克思原著，他购买日译本为的是用来学日文，购买原著就又兼学起德文来了。他的学习钻劲特别足。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屠杀我无辜军民，激起了留日学生的义愤，抗日情绪激昂。在东京的我党特别支部，领导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了“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在东京设立总会，在总会领导下成立了归国宣传的分会，我参加归国的队伍，于五月中旬第一批返回上海，思奇第二批返回祖国。

一九三三年我再到上海时，应思奇之邀一同住在法租界格罗西路。我俩同在“日本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不久，组织上派思奇到李公朴先生主编的读书生活社担任编辑工作。这个时候，正是思奇构思、孕育着创作一本写给工农大众阅读的、用通俗易懂的体裁介绍马克思哲学的书。他曾不止一次谈起此事。这一心愿迅速付诸实现。当时上海《申报》有个董事长叫史量才，被蒋介石杀害后，《申报》为了纪念他，创办了一个以史量才命名的业余学校，学员主要是职工群众。李公朴先生担任校长，思奇受聘当老师，主讲哲学知识。思奇写出的哲学提纲先讲给学员听，根据听众接受能力、理解程度，并吸取学员意见，再加增删，然后成文逐篇发表。思奇写此书构思新颖、思想准备充分；指导思想、对象、观点、目的明确；写作的过程又是通过实践不断修改、不断完善提高；特别是这本书在写作方法上，大胆创新，这在当时采用通俗的笔法阐述哲学原理，在我国可算是划时代之举。李公朴先生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说过：“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本书问世后受到广泛的欢迎，一版再版，确不是偶然的。一九七九年冬，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国家出版的负责同志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

要组织有艾思奇风格的人，写新的《大众哲学》。”足见此书影响之深远。

一九三五年，艾思奇同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更严格了。当时的上海，处在国民党法西斯暴政之下，白色恐怖，黑暗统治，地下党员的战斗环境是艰苦的，为了很好地工作，思奇不分白昼黑夜顽强地战斗着。思奇等编辑的“读书生活”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严令禁止停刊了，思奇和其他同志一块，重新组织战斗，另行出刊“读书”杂志。未几，“读书”杂志又被查禁！思奇他们再创“认识”月刊，思奇任“认识”杂志主编。这个杂志已是一个水平较高的理论刊物。

与此同时，思奇和黄洛峰同志、郑易里同志三人接办读书生活出版社，这棵种子，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到处开辟文化阵地，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曾在武汉、重庆、桂林、贵阳等十二个大城市设立分、文机构。抗战胜利后再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组合成“三联”，全国大城市普遍设有机构，这是后话了。

思奇在这期间，除从事编著、翻译工作外，参加社会活动也频繁起来，他参加“政治经济学会”、“社会科学家联盟”、“文艺界救亡协会”等组织活动。我俩虽然同住一栋小楼，他住在二楼，我住在他房间的楼上，只有一层楼板之隔，但，除了工作中必要的交谈，都是各干各的，我们在家中的相会还不比在组织活动中多。记得，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发生过这样的事：家人为使他有所休息，特借来留声机，将开响着的留声机摆到思奇的写字台上，尽管留声机唱片在旋转着，任凭它放送着美妙的音乐，思奇竟能充耳不闻，继续处理着待发的稿件。我也曾眼见思奇边吃饭边看稿件的事，思奇勤奋刻苦的劲头是惊人的。就这样，思奇著作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着：《哲学

与生活》、《实践与理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等等。直到他五十六岁就与世长辞，已著书二十余部，并作了讲稿、文章数百篇，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可说是当之无愧。

一九三五年秋，我离开和思奇三载相处的小楼，去到杭州暂住。为了翻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一书，该书原著只有杭州图书馆有，该馆又不允许长时间外借，我只得住在杭州。每天去到图书馆边借书边翻译。记得交稿拿到了稿酬，一则手边有了点钱；二则这时恰恰艾志诚同志（已故去，逝世前任化工部药政司长）由武汉到了上海，我们都是同住东京大岗山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志，能在杭州团聚，机会难逢，在我和志诚的双双相邀下，思奇赞成来西湖一日。从国外到国内，虽然相处几度春秋，有此一天同游，这还是唯一无二的一次，甚感珍贵，曾合影留念。一晃四十五年过去，至今，合影中的思奇和志诚均已与世长辞矣！念故友，哀思涌心！看今日，党的革命事业前途似锦，他俩有灵，当可欣慰。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和思奇又聚首。当时，思奇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住在清凉山上。他和王丹一同志结成志同道合的伴侣，作为老友为他们的幸福高兴。回想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和思奇在上海分手时的紧张情景，虽然转眼间又过去了七年，仿佛就象刚发生的事。当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燃烧到了上海滩。组织上决定思奇先离沪赴延安。我和思奇分手时，上海北车站和南车站都已不能通车，隆隆的炮声不绝于耳，我送思奇从沪西梵王渡车站仓促离去。握别时盼能在延安相聚。后因我转派昆明，迟到延安七年之久。思奇非常关怀故乡——昆明的情况。我向他谈起党在云南有力地开展统战工作，充分利用龙云地方势力与蒋帮反动中央政府的矛盾，党的地下工作很活跃；能在《云南日报》上转载延安《解放日报》、重

庆《新华日报》的文章；还能介绍一些我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的特写；还报导过我解放区军民搞大生产的消息；甚至还转载了毛主席“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著作。特别是抗战初期，在党领导下，在昆明相继成立“文艺界抗敌协会”、“青年记者协会”昆明支会，连范长江同志主持搞的“国际新闻社”，昆明都有分社发稿。创办了《战时知识》、《南方》、《云南妇女》等刊物，这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都起了积极作用。思奇远离故乡几十年了，对故乡的变化深为高兴。当时，思奇对我谈延安整风，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和他自己的深切感受，可见思奇的修养更成熟，也更老练了。当时，我俩又曾相约，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同回云南去参加建设大西南的战斗。一九四六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又在延安分手了。思奇未能派往大西南，我却有机会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直到一九五〇年脱下戎装转业回京。刚到北京我便去看望思奇，他和丹一同志这时住在颐和园附近高级党校的宿舍里。有一个男孩子已经不小了。此后，虽然都住在北京，见面却很少。但是，思奇有时被请进城给中央机关干部上大课或做报告，我是从不放过学习的机会，记得在全国政协曾听过他的报告；在长安大戏院，先后四次听他讲“唯物主义提纲”的大课。有时，利用中间休息时间三言两语唠上几句，这都是一九五六年前的事了。

在一九五七年春，有一天晚上，思奇突然来看我。当时我住在司法部街最高检察院机关院内，作息时间是按规定行事的，上下班、起床就寝都统一敲钟为号。思奇原本是利用会余时间，刚进传达室，恰巧遇上敲钟。值班同志告诉他，息灯钟响一般不再会客，尽管思奇心想进城访友并非易事，少睡些时也无妨，但是，机关既有作息规定，严于律己的思奇，一定是遵守的。当我闻信赶来相迎时，思奇早已远去矣！这次未能晤

面，谁能知，竟成了我俩的永别！一九五八年我遭贬出京，去到边疆再难有机会相见了。一九六六年从报上得知思奇已于三月二十二日与世长辞的噩耗，感到格外的沉痛！分外的遗憾！时间无情又逝十四年。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去世十四年之后，忽接丹一同志函，对我的冤案平反表示祝贺和欣慰。此外又得知云南人民出版社编印纪念艾思奇文集事。写此短文，以志悼念并寄托哀思！

一九八〇年

# 艾思奇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哲学活动

叶佐英　卢国英

一九三〇年前后，艾思奇在昆明家里养病两年，痊愈后便再次东渡日本，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到昆明后，他原想活动官费赴德国留学，事不成，家里也无力支持。他无心眷恋故乡，更不愿在家里过温暖舒适的生活，耽误学业。一九三二年，艾思奇来到笼罩着白色恐怖，但又汹涌着革命浪潮的大都市上海。他先找到在这里做事的叔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以便出国深造。不料事不成，便决计独立生活。由同学介绍，他到福建同乡会办的泉漳中学里，当了理化教员。

艾思奇在他的自传中说：“一九三三年以前，我虽早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并已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没有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一九三三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在泉漳中学教书期间，他继续刻苦钻研他爱好的哲学，并写出第一篇哲学论文。经杜国庠、许涤新同志介绍，加入了社会科学家联盟。从此，艾思奇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先是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专门处理和回答读者来信，后又参加编辑和主编《读书生活》、《读书半月

刊》、《生活学校》、《新认识》、《文化战线》、《认识月刊》等杂志。一九三七年，延安陕北公学成立之际，他和周扬、何干之、李初梨、周立波等同志奉党组织之命，离沪赴延安。他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这期间，艾思奇撰写过二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哲学方面的著作。此外，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了《新哲学大纲》。

在艾思奇的历史中，上海时期占有重要的篇章。他是在这里走上理论战线的，并且成为哲学界的一颗引人瞩目的璀灿的新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丰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先驱

一九三三年六月，艾思奇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正路》上，发表了《抽象作用和辩证法》，紧接着又发表了《进化论和真凭实据》。这是他在哲学园地里的处女作。文章立意新颖，文字生动流畅，显示出青年艾思奇具有扎实的哲学基础和论辩才能，因而受到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好评。

不久，他就到申报流通图书馆，和李公朴、夏征农、柳湜一起工作。他年轻、热情，学识渊博，同事们称他为“百科辞典”。他所在的读书指导部，服务宗旨是引导读者正确选择读物，解答读者碰到的疑难问题。为了广泛联系群众，扩大宣传效果，指导部的同志们设立了一个阅览室，专门展出进步报刊、书籍，还出版读书壁报，交流学习心得。每天接纳读者多时达到五百余人。仅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指导部发出的有学术内容的复信竟有一千八百余件，其中有普遍意义的回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就有三十万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由于读书指导部工作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便从申报独

立出来，创办了《读书生活》杂志。主编发行人李公朴，艾思奇、夏征农、柳湜相继任编辑。这个刊物，以通俗活泼、紧密联系实际见称于世。国民党中宣部把它归入"反动刊物"之列，定了三条"罪"：一是鼓吹民众武装抗日，要求停止"剿匪"；二是鼓吹国难教育方案；三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与苏联携手反帝。背景是"左倾分子"。这个注脚恰好说明它是宣传真理、鼓动抗战的纽带。它是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少有的几家进步杂志，曾受到鲁迅的称誉。艾思奇为办好《读书生活》，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艾思奇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兢兢业业操持刊物的编务，同时刻苦深入钻研他崇奉和热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发表了一批很有见地的论文。他曾多次说过，十分希望能在哲学专业的深度上加快步伐。然而，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看到的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肢解，加上天灾人祸，连年内战，经济破产，使得"大众生活的路途一天比一天狭窄。"许多人，特别是失业失学的青年，纷纷给编辑部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发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生活下去等疑问。艾思奇同情他们，总是义不容辞地给一个个读者写回信。他仿佛看见无数双迷惘、悲观失望的眼睛在期待着。这难道不正是知识的饥荒吗？他痛切地感到，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脱的责任。艾思奇的心中强烈地萌发着让广大群众掌握哲学的美好动机。

群众需要哲学，哲学也需要群众。但是，中国自古至今的哲学书，对于大众来说，有哪一本不令人生畏！哲学从来就被禁锢在神圣的书斋里和大学的讲堂上。在一般人看来，它是那末高深玄妙，离大众生活太远。旧哲学自不必说，即使新哲学，对于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也并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的。在科

学大众化、文学大众化的热潮中，艾思奇想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他决心要为大众写哲学。残酷的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他不得不暂缓对理论的更深的钻研和写作，而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都投入到开拓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领域中。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艾思奇经过通盘构思酝酿，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读书生活》上每期写一则，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共得二十四篇，这就是后来集结成书的著名的《大众哲学》。李公朴先生称赞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深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又说："尤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

艾思奇在这本被称为"入门"的书中，开宗明义打破哲学的神秘色彩，说哲学就在你的生活中，并非高不可攀。他用当时老百姓最切身的又最苦恼的失业和生活难作例子，讲述在现实的面前，为什么有人自杀，有人忍耐，有人奋斗求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受了不同的世界观的支配。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这种哲学，它不只是说得动听，而且它的"重要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就这样，艾思奇的每次讲话，使用的都是人们习见的、浅显的事例和口语。象拉家常一样，娓娓写来，引人入胜。比如，"一个招牌上的种种花样"、"卓别林和希特勒的胡子"、"天晓得"、"雷峰塔的倒塌"、"不是变戏法"、"七十二变"、"笑里藏刀"、"猫吃老鼠"等等。他把自己要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别具一格，境界清新，通俗易懂。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写法，确实是开创哲学大众化

的相当成功的尝试。

正因为如此，《大众哲学》一出版，便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成为一本脍炙人口的畅销书。赞扬和感谢的信件稿件，源源送到作者的案头上，当然其中也有善意的意见和恶意的攻讦。许多人读了这本书，受到影响、鼓舞，走上革命的道路。它被诗人比作火炬，在进步的读者群中广为传递，在黑暗中散发着希望之光。另一方面，反动派则非常仇恨它，惧怕它，禁止它的出版发行，组织围攻，歪曲谩骂。一些反动的学者和披着唯物辩证法外衣的所谓新物质论者，大肆诬蔑《大众哲学》是"毒药"、"庸俗"，胡说"艰深的哲学怎么能通俗呢"等等。艾思奇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时代的要求，他不顾一切恐吓、诽谤、讥讽和怀疑，顽强地为大众生产丰盛的精神食粮。

在创作《大众哲学》前后，艾思奇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和民族的存亡、大众的疾苦紧密联结起来。他对待通俗化的工作是不遗余力的。他写过许许多多的哲学通信。在《生活学校》等杂志上，每一期都有他为"大众信箱"写的文章，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解答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他的《知识的应用》、《实践与理论》等书中，大部分都是很通俗、很实际的文章。他计划要写的"历史唯物论"通俗读物，已发表了十多节，终因时局变化而未完成。同时，他还写出《如何研究哲学》一书，这是一本专为"大众叩开哲学神秘之门"的"工具书"。在当时，是一本很好的指导读物。尽管他的努力取得成绩，受到读者热情欢迎，但艾思奇从不自负，总是虚心地接受读者的批评，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李公朴先生说他是一个诚恳的人，遇到涉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往往要详细地和朋友讨论，直到真正了解为止。《大众哲学》这本书，解放前发行的三十多版中，曾作过几次大的修改，解放初又作了修订，但仍不满意。他告诉读者，这本书有许多不足。解放后二十多年，因种种原因，直到一九

七八年才由三联书店重新印行。

艾思奇是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先驱。他的具有时代色彩的探索和实践，在现代哲学史上，占有斑烂的一页。他在当年勇敢地肩负过的重担，似乎现在又以新的形式摆在理论工作者的面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已逐渐普及，已经不是什么启蒙了，但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挑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发展，象这样的一些十分严肃的课题，是极需理论工作者努力宣传的。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就要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需要有新的《大众哲学》献给广大的读者。艾思奇在一九三六年曾这样说过："目前中国哲学上的同道者，也许会有人起来努力做一件更好的工作。《大众哲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种'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就是我所要引为慰藉的了。"他自己就设想过，要用文艺形式写一本哲学通俗读物，使人读起来感到轻松活泼，但艾思奇已经逝世，美好的设想变成遗愿。在新时期的广阔前景中，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当为人民掌握哲学这个精神武器，做出更富创造性的努力。

## 批判反动哲学的英勇战士

艾思奇一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活动的时候，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对当时各种反动的哲学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致力于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同时，"偷空随时写成一些东西"，《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等著作，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尖锐武器，无情地向唯心主义开火的真实记录。

一九三三年七月，艾思奇面对"当时什么都一无所有的科学界"，却有人用什么"真凭实据"，捡起早已破产的"生物

自然发生说”，大骂达尔文的进化论，写了长篇论文《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他揭露所谓“真凭实据”不过是一种臆想和骗术，决非科学。它只是唯心论在生物界的沉滓泛起，是不值得一驳的。但是，象它这样的反科学，却可以在刊物上大肆张扬而不受到指斥。这就“好象在军事上被无理横蛮的帝国主义节节进攻没有一点办法一样，学术界也常常受那些强词夺理没有一点头脑者的欺凌！”艾思奇感叹道：“人类固然希望着真理，科学固然要求着真理，而在社会里，支配阶级却不一定爱真理！”文中喷发着作者对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的深恶痛绝和对混乱不堪的科学界的愤懑。

这年冬天，艾思奇密切注视当时哲学界的动向，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剖析和抨击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扼要地写成《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指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统治哲学的旧时代，已到了结束的时候。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成为锐不可当。他对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和“玄学派”大杂烩中的种种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当时横着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一九三〇年前后开始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新康德主义者和“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这种唯心论迫使“正确的唯物辩证法不能不另用一番心力与之抗争，与之分裂”。“新哲学一面反对观念论，一面和机械主义作战，要在这两条战线的夹攻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血气方刚的艾思奇等人如异军突起，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这派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叶青之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最残酷的年代，全国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中。但是，革命是

扑不灭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然象地火在运行，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敌不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已经有了许多中译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都先后被介绍过来，加上国内的一些新哲学著作，足有几十种。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拥护，而且延伸到大学的讲堂，甚至成为一些学者所公认的研究一切学问的基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叶青的反动哲学。

叶青早年曾钻入我党，“马日事变”后叛变革命，无耻地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他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大量出版托派及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艾思奇用了很大力量和叶青斗争，取得了胜利。

叶青鼓吹宗教——哲学——科学，证明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和死亡的，哲学离开宗教独立，现在科学又离开哲学独立，科学否定哲学，哲学便是消灭了。这就是名噪一时的叶青的所谓“哲学消灭论”。艾思奇说此论是荒谬的，企图用科学代替哲学是错误的。“科学的研究是各部分分门别类地实行的，所以每种科学的认识，也各有一定的范围，至于包含一切范围的普遍的认识，仍是哲学的任务。科学认识各种有限的范围内事物的法则，而哲学则研究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他指出，叶青消灭哲学，其实是为了创立他的“新哲学”。然而，他的所谓“第一思维，第二思维，第三思维”的思维哲学，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在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论战中，张东荪、叶青等人都反对或曲解辩证逻辑。披着辩证法外衣的叶青说：“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两者相生相成，互为规定”。艾思奇说他的这种“理论”，在两千年前古希腊的诡辩论者就

已经说过了，他们就是把运动看做空间中的无数停留点，因此，只有无数的停留点而不存在运动。这种古老的形而上学，不料竟在“二十世纪”的叶青那里还魂，真要令人叹为观止。

面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不断涌入中国的大好形势，叶青、严灵峰等人大讲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他们提出所谓“中国特殊论”，并且宣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劳的所谓“外烁论”。叶青说，“凡合规律的新东西必定从旧的东西中产生出来”，断言“中国的历史是不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哲学、科学、文学堆满了书店或流行于学校的都是外来的，纯属于采用性质。戊戌运动，五四运动，彻底否定自己，于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在这里，显然是外烁的。”艾思奇对这种极为有害的“外烁论”有过很多批评，指出叶青耍的是诡辩手腕，在中国问题上，显然夸大了外力，抹杀和否定辩证法的最高法则，即内因的一般的本质性。诚然，外因是不可忽视的，但却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必然性的是内因。正如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外力有很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又不能说，中国的发展没有内在的规律性。要证明中国历史发展，就得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作基础，研究这些外力怎样通过这些内部矛盾而发生影响，研究中国在这些外力的影响刺激之下，怎样发生自己的矛盾和运动。这才是真正的贯彻唯物辩证法的以内因为基础的内外统一论，否则就要陷入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艾思奇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完全是按照中国自己的规律不断前进的。叶青之流特别夸大外力，抹煞内在的推动力，把一个国家的变化，说成为“全面由外力造成”，把民族解放的前途，说成要“受外力的左右”，这种荒谬的观点，不过是为了替他的中国老师严灵峰的“外烁论”辩护，“不外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嘈声相呼应”。

在“方法论”和黑格尔哲学的讨论中，叶青诬蔑新唯物论的创始者马克思只不过是辩证法的检证者，创立者应该是黑格尔。艾思奇写了《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予以驳斥。他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划时代的新哲学。“马克思不仅仅是取消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观念’等形容词，而且改正了被压歪的公式，将辩证法归纳成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三大定律，把黑格尔认为是低级的质量互变提高为根本法则之一，使矛盾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不能彼此孤立而存在。”说叶青是“表面上装出批判黑格尔，而骨子里却偷割了黑格尔的肉来出卖”的市侩。

一九三六年前后，艾思奇批判了以“玄学鬼”著称的张君劢。这个无耻文人和反动政客，纠集一伙人鼓吹什么“人生观之中心点是我”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艾思奇指出，“主观性的要素是玄学鬼作祟的中心”。同时，他也批判了以“科学的人生观”自我吹嘘的丁文江，指出丁文江表面上似乎与张君劢的观点对立，实质上也不过是从西方主观唯心主义者那里“借来一些观念论的学说，而对于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始终只抱着‘存疑’的态度”。

在艾思奇对胡适、叶青反动哲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简单地一概否定他们。他说象胡适这样的人，虽然“实验主义”是错误的，但作为和封建传统迷信相抗争的一个学派，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只要胡适能贯彻他的实用主义，也比一般专门粉饰太平的空论家更能多看到一些东西，也还能够相当地暴露敌人的侵略和绝对不抵抗的态度。当然这是很不够的，因为他看不见侵略的本质，更看不见民众抵抗的前途，是和唯物辩证法全然不同的。至于叶青，艾思奇也多少肯定他在批判张东荪时起过作用，并且曾给新唯物论作过一些辩护，但

他不顾目前的社会现实，只是把二三十年以前的旧货拿来作书斋式的研究，他固守在反动的立场上，对新唯物论在实践中发展的成果是根本不懂的。

以上是艾思奇在上海时期批判反动哲学的片断，其中主要是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论述。这次论战，从一九三〇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三六年，规模是很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政治、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尽管反动的哲学有政府的支撑，伴随着文化专制主义，有恃无恐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论战的结果，大大地削弱了反动哲学对群众的欺骗性，驳斥了反动哲学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是教导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哲学武器去批判反动的哲学。艾思奇以党和民族利益为重，始终站在哲学战线的最前列，他不愧为一名批判反动哲学的勇敢战士。

## 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家

艾思奇讲过，正确的社会科学是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的利器，要认识当前的现实，才可以知道要建立什么样的哲学。一九三三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又说：负着创造将来之使命的中国的先进阶级已经崛起，它是前进的文化和前进的哲学的担当者。艾思奇从选定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的时候起，就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并且为自己的信仰忠贞不渝，奋斗终生。

艾思奇在上海时期，写了许多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较强的文章或专著。其中《哲学与生活》一书，研究了世界观、认识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对和绝对、内因和外因

以及真理观等哲学问题。他密切联系实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合在文章里。关于这本书的一些精采部分，毛泽东同志曾作了长篇摘录，称赞这是一本“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他的《抽象作用和辨证法》一文，对辩证法的论述也不乏独到的见解。他全面地分析了“白马非马”论，认为公孙龙子不过是在这里弄一点巧辩而已。其实，“抽象作用有两面的效果，即一面是对于某一群的多种多样的个体给以概括的关联的综合作用，一面是将这关联中的个体群和别的世界事物分离开来的分离作用”。他说《资本论》的作者明白地表示说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是专门地利用“抽象力”，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正是这一种与形式伦理不相同的抽象作用。把抽象作用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研究。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哲学史的事实，在理论上阐明了“抽象作用”的意义，批判了唯心主义。现在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它的理论深刻，说理充分，逻辑严密，给人以新的启发。

艾思奇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观点，象“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样的一些基本原理，是他经常探讨的课题。他说，人类在实践中，“能从朴素的感性的直观，而更进一步洞察到这直观的根底里所隐藏着的一般的东西，实践使人类的认识力一层层地掘进事物的深心里，实践的发展，便使知识的精确度增高。”在解释什么是实践时，他说实行有种种的实行，真正去努力改变世界固然可以算作实行，投机取巧、偷名窃利也是一种实行。然而，我们讲的实践，是单指前者，实践就是变革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不能没有立场的。在国难当头之中，他用这个思想去进一步引导读者思考问题，指出唯一重要的“实践”，就是革命，就是抗战，除此没有别的生路。

在讲到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艾思奇运用新哲学观点，论证主观没有绝对的能动性，而意识也不能是绝对自由的。能动性和自由的活动，仍被包摄在一定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中。主观能动性是相对的，客观的历史条件规定着它的活动。在一篇回答读者关于意志自由的专文中，他说：一个人面对着一件事情时，做与不做，自己有选择的能力，也就是有选择的自由，能选择就是一种自由。当然，这种选择的自由，也并非是绝对的，它要受到环境的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如果我们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么就可以在这种限度之中发展起来，甚至于打破了这种限度。“这种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选择道路的自由，就是相对的自由。”只有对社会的深刻的认识，才能够获得这种自由，选择正确的道路。很清楚，艾思奇再三强调认识的自由和意志问题，显然是希望他的读者认清形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选择拯救民族生存的革命道路。

掌握真理是为了应用真理，解决实际问题。艾思奇讲哲学从来就很少空论。在日寇入侵、国势危殆的紧急关头，他总是把哲学和民族解放联系起来，用抗战中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哲学上的一些原理，同样，他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来分析抗战非常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艾思奇说，哲学总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任何哲学都有它的社会作用。比如在抗战中，要认识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内忧外患的局面，她的发展前途又会是怎样的，这就要在哲学的钻研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彻底粉碎破坏抗战的汉奸理论。在他写的《民族解放和哲学》一书中，愤怒地批驳了那种把抗战联合战线诬蔑为某种党派（即中国共产党）少数人的运动，是少数人利用多数人。这种极为有害的论调，抹煞了日本侵略者妄想独吞中国、民族危机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这样的事实，因而不能解释爱国运动高涨、民族意识的强化和普遍化的根本原因，违背了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原则。当然，爱国运动首先是从少数人或某党派发起，但这“少数”并不能左右历史。只是因为他们最敏感，最先意识到民众所要意识的东西。没有全国民众本身的要求做基础，那么，任何英雄豪杰以至神明都没有办法去推动一个大的运动。艾思奇在这里运用哲学原理，精辟地阐明抗战的兴起，决不是个人能够随意左右得了的。

在抗战期间，曾出现过种种反辩证法的倾向。比如对当时出现的危机，就有人以为是“女人”造成的，抛开敌人和汉奸去怪罪被迫得走投无路的弱女人；有的则认为民族衰落在于“衣冠不整”，而不管群众饿着肚子又何以整肃衣冠。这原因，艾思奇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没有抓住事物的核心和本质，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那时，还有一种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公式主义，死抱住阶级斗争、阶级利害之不可调和，否定联合战线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右的例证主义，用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证明中国的不能抵抗。这两种倾向都看不见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和中国的实际力量，撇开事物的核心，不可避免要陷入左的和右的危险。艾思奇结合抗战的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哲学放在民族解放运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进行了十分有益的研究。他说，中国目前的解放运动，为新哲学提供了无限的新的历史材料，使新哲学理论得到更多的内容，使它更丰富更具体。“我们不要以为用新哲学来了解目前的解放运动只是逻辑公式的运用。……新哲学是解放运动实践的指针，同时解放运动也推进了新哲学。……新哲学并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大众的事业，每一个读者，在他的实践中都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都可以对新哲学有所贡献”。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

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艾思奇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在现实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努力中，成绩是卓越的。

此外，艾思奇在上海时期，还和郑易里合作，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新哲学大纲》。他热情地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简要地论述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史，二是明确讲述了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的一致性”。这两点是现阶段的一切新哲学著作里都不曾有过的。而且，这本书的解答都是根据新哲学创始者的文献。该书发行了十多版，在传播马列主义哲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同时，艾思奇努力应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现象，写出许多论抗战文化的著作。他热爱文学，积极参加文学战线上的斗争，他翻译的海涅的长诗是很出色的，写的文学论文也十分精辟。他还创作了一批科学小品，高士其同志说，在中国早期的科普园地中，他的作品别具风格，也算得是一家。艾思奇的兴趣是广泛的，学识是渊博的，以上也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不可忽略的方面。

艾思奇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哲学活动，正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的放矢，而且表现出他对党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和真诚。他的世界观是革命的。许多人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的哲学是讲真话的哲学。他对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努力，影响是深远的，在把哲学理论推向人民中去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他对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的批判是严厉的，表现出一个战士的进击精神。他以极大的热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竭尽全力。当然，一个哲学家也还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的学说和他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一样。今天，我们来研究艾思奇在上海的哲学活动，确实可以发现他的著作深深打下了时代的印记，它把战斗的功绩和难以避免的缺点一起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财富。

# 怀念艾思奇同志

林 默 涵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认识艾思奇同志。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卓有声誉的青年哲学家。当时在《读书生活》上连载的他的《大众哲学》，获得了广大的读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艾思奇同志不过大我几岁，但却是我哲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正是《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同志的其他哲学论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才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有人说《大众哲学》包含了不少缺点，后来艾思奇同志自己也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只有他第一个用那样通俗而饶有兴味的形式去宣传和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吸引了广大青年接近马克思主义以至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个功绩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的工作，本来是很不容易做的，任何一个小学生，在长大成人后也不会笑他的启蒙老师的"缺点"，我对于艾思奇同志是始终怀着尊敬的。

那时艾思奇同志正和柳湜同志合编《读书生活》半月刊。我在上海流浪，迫于生计，便试写一点文章，想弄几文稿费买饭吃。我从日文书刊上找到一些科学材料，改写成科学小品，投到《读书生活》，居然被登了出来。由柳湜同志介绍，我曾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部去看望艾思奇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敦厚而不善辞令的人，宽阔的前额，炯炯的眼神，一看就觉得正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哲学家。

一九三六年，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参加的是一些青年文化工作者，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由艾思奇同志主讲西洋哲学史。座谈会是在旅馆开房间秘密举行的，每次要调换一个地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钱亦石同志率领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日本侵略军在金山卫登陆，东南前线溃败。我们一直撤退到浙西的江山，而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连向群众做一点宣传抗战的工作，也很少可能。不久，我就离开战地服务队，跑到武汉去了，在那里遇见刚从延安出来的陈楚云同志，才知道艾思奇同志已经去了延安。

不久，我也到了延安。我看望的第一个人就是艾思奇同志。他住在延安城内的边区文化协会，那时延安城还没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后来我进马列学院学习，艾思奇同志是我们的哲学老师。他虽然没有象悬河奔泻那样的口才，但他讲的内容是很扎实的，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同学们是欢迎他的讲课的。

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创办了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由艾思奇同志主编。组织上把我调去做他的助手。毛泽东同志的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刊词在第一期上发表的。艾思奇同志和我可以说是最早读到这篇著作的普通读者，但在当时，我并没有真正了解它的重要意义。

回想起来，《中国文化》上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那时的编法，是每期按商定的计划，由我把稿子集拢来，交给艾思奇同志审阅编定。稿子要送到离延安几十里路外的安塞印刷厂去排印。每期付印时，我就借一匹老马，骑了到安塞去看清样，我总觉得自己很有点象那位有名的愁容骑士吉诃德，心里不禁暗暗好笑。不过这匹马虽然又老又瘦，但它还是气喘吁吁

地尽力奔跑，不辞劳苦，这是我至今也不能忘记的。

艾思奇同志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尹达同志写了几篇不同意范文澜同志的观点的文章，艾思奇同志也不完全同意尹达同志的意见，但尹达同志的文章都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了。这种编辑态度，今天也还可作为榜样。

一九四三年，艾思奇同志到延安《解放日报》主持副刊编务。我又被调去做他的帮手，还有温济泽同志等也在一起。《解放日报》副刊有一个特色，就是紧密地同现实斗争相结合，也跟报纸的其他各版同一步调，密切配合，与过去的报纸副刊（所谓“报屁股”）完全不同。过去的许多报纸副刊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它们的报纸立场往往是反动的，或者是迎合反动统治者的，而副刊却可能由比较进步的人士编辑，但又不能明显地宣传进步思想，因此只好采取曲折、隐晦、旁敲侧击的办法透露一点东西，有如从密封的罐头中，刺一个小孔，通一点气，那是万不得已的做法。而《解放日报》是在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出版的，它完全是一张革命的报纸，当然用不着采用那种方式了。

《解放日报》副刊，是一个综合性的副刊。凡是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副刊所关心的问题。它发表议论性和知识性的文章，也发表文艺创作、报告文学等等，还辅导群众写作。当时蒋介石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想把陕甘宁边区吞掉。我们副刊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阴谋的报道和杂文，有如匕首投枪，起了刺穿敌人假面具的作用，其中不少杂文是艾思奇同志写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下，边区经济极端困难，党中央发起生产自救运动，动员全边区干部、群众，开荒生产，纺线织布，边区军民不但没有被困死饿死，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副刊上发表了许多

反映生产运动的报告文学和生动地介绍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小品文章，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一九四四年春节，延安文艺界和机关干部，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开展了蓬蓬勃勃的新秧歌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的副刊发表了许多介绍和评论优秀秧歌的文章，艾思奇同志还为报纸撰写了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对文艺同政治的密切结合、文艺面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给以热情的赞扬和支持。

就在这时候，延安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由于受到那个作恶多端的康生的干扰，产生了逼供信的偏向，《解放日报》也不例外。但是，副刊部的运动却比较稳当，我们对被审查同志的情况，从各方面做了调查，反复进行了研究，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没有怎么搞逼供信，这与艾思奇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样一来，副刊部就没有打出一个"特务"来，而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却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斗争锋芒便转到我们身上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艾思奇同志，已经开过好几次批判会，弄得他瞠目结舌，晕头转向。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有一天，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周副主席要我去谈话。我有点奇怪，因为我只是远远地见过周恩来同志，听过他的细密而有深刻分析的富有魅力的报告，却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怎么他会找我谈话呢？

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不久。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去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前，他看见了我，走到窑洞前把我引了进去。天气很冷，但窑洞里却很暖和。他让我坐下后，给我倒了一杯热开水，头一句话就问报社的运动搞得怎样了。我告诉他还在进行。他似乎很了解报社的情况，没有再问下去。他说：

"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重庆许多同志希望

你到重庆去工作，你愿意去吗？”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心里想：审干运动还未结束，我这时出去合适吗？但我没有说出来，只回答：

“组织上要我去，我就去。”

“那好，你回去告诉你们的组织，赶快准备一下，把工作交代一下，什么时候走，会通知你。”

他送我到窑洞门外，握手告别时，他望着我的眼睛，我觉得他的眸子里有一种锐利的光芒，似乎可以照透每一个人的灵魂。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一路上想：在审干运动结束前，组织上让我到大后方去工作，这表明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心里很高兴。但想到远在米脂工作的我的妻子，她作为教育工作者到延安出席了边区文教工作会议，刚刚回去，在我离开前不能再见她和在她身边的女儿一面，心里又有点怅然。

回到报社，我就把周副主席的谈话告诉了艾思奇同志，他也为我的调动高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即将到来的批斗。临走前夕，我去向他告别，一盏小油灯照着他的有些消瘦的脸，虽然强带笑容，却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拿出一包稿子，是他翻译的海涅的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是他利用工作的余暇，一点一点地翻译出来的。他要我带到重庆交给黄洛峰同志，请他帮助出版。

我们那次从延安到重庆，正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陕甘宁边区，大闹摩擦的时候。同行的有而复同志、韦明同志和汪琦同志。我们的车子经过国统区，每到一个地方吃饭或添油，国民党军警都横着上了白晃晃的刺刀的枪，把我们的车子团团围住，如临大敌。其实我们身上连一枝手枪也没有，是根本造不了反的。我们在宝鸡的一家旅店住宿，发现旅店人员一下子都换成了便衣特务。我最担心的是怕遗失艾思奇同志的译稿，我把它放在挎包里，白天背在身上，晚上枕在头下，一直带到

重庆，交给了黄洛峰同志，才如释重负。不久，这书就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艾思奇同志是哲学家，他对文学也有很高的修养。他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他的哲学论文往往带有文学气味；他还写过不少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有许多独到见解，不是人云亦云。我记得他的一篇论述鲁迅哲学思想的文章，指出鲁迅先生比较早就取得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虽然在历史观方面有过于强调个人和精神作用的唯心论的倾向，但他的反庸众、反愚昧、非物欲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

自从我离开延安后，不久，日本投降，又开始了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关山阻隔，音信难通，而人事匆忙，也顾不上写信。偶然得到《解放日报》，还经常读到艾思奇同志用笔名写的文章，我在国统区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有的也在《解放日报》上转载了，可见艾思奇同志还在关心着我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我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艾思奇同志。五载别离，相见极欢。他留我吃了饭，我们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谈得很多。我向他建议，把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集成一本书出版，并自告奋勇，愿意由我来收集选编，因为我知道他所用的笔名，也熟悉他的文章风格，他欣然允诺。我翻阅了几年的《解放日报》，请人把每篇文章抄录下来，经他最后编定，这就是后来由海燕书店出版的《“有的放矢”及其他》。这个书名也表现了艾思奇同志的治学目的和态度。

艾思奇同志是不大流露情感的，但你对他绝不用提防什么。他不是“当面输心背面笑”那样的人。赵超构先生在《延安一月》中讲到他对艾思奇同志的印象，是“方方的脸，沉默多于开口……”。的确，艾思奇同志是不喜欢多说话，甚至拙于言

辞，只知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一点也不象有些人物，一出了名就自以为无所不晓，到处夸夸其谈，唾沫满天飞，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鲁迅）。而艾思奇同志却默默地一辈子在编讲义，教哲学。他的几百万字著作，虽然并不如经天之日月，但是却有如闪烁的嘒星，在暗夜里能给寻路的旅人投送一点微光，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感谢，我就是在这许多感谢它的照引的寻路人中的一个。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个年头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阜外医院的一间小屋子里，他躺在周围摆着一些白花的灵柩里，他的脸上依然带着一个哲学家的严肃神情。我和白羽一道，向他行了最后的告别礼。时候已近黄昏，可能我们是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最后两个人。我深深感到艾思奇同志死得太早，他是还可以做许多工作的，他的身体看来一向很好。艾思奇同志自始至终抱着严肃态度从事学术研究，这种严肃态度，使他得到丰硕的成果，但可能也正是这种严肃态度，使他过于认真，呕心沥血，因而过早地失去了生命。如果他是一个跟风转向、朝立暮改、二三其德、把一切只当玩笑玩笑的人，也许可以活得较长久的吧，不过，我相信，艾思奇同志是不会羡慕那样的生活的。

丹一同志告诉我，忆念艾思奇同志的文集将要出版，问我愿不愿意写点什么？我说：我是应该写的。但是，事务繁冗，思想芜杂，总不能静下心来把零乱的印象理出个头绪来，因此，迟迟不能动笔。现在，交稿的日期不能再拖延了，只好匆匆记下这些杂乱的回忆，算是了却这一桩心愿，以纪念这位严肃的诚实的思想战士。文章虽然不好，但我对这位诚实的思想战士的怀念之心也是诚实的。

一九八〇年

# 回忆艾思奇同志

温济泽

我和艾思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

那时候，我刚到延安。在抗大工作的一位战友引我去见他。艾思奇同志当时在抗大二大队任主任教员。抗大二大队在延安东门内原来的府衙门里。艾思奇同志住的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靠窗口放着一张小书桌，靠里边墙放着一张木板床，两边书架上放满了书，陈设极为简单。我就是在这间陋室里会见他的。

我的那位战友向他介绍，我是不到半年以前从国民党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我就从在监狱里读过他的《大众哲学》谈起，谈到我把这本书讲给同狱的难友们听，怎样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我们还谈了关于哲学大众化和如何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一些问题。我在没有见到艾思奇同志之前，想象中以为他是一位能言善辩的人，见面之后，才看到他对人诚恳、朴实，并不善于辞令。谈了不太长时间，我就告辞了。

延安的生活是紧张的。我很快进了陕北公学，不久又分配到关中陕公分校去教书。我和艾思奇同志第一次见面之后，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再没见到过。

以后再见面，是在一九三九年，大概是七、八月间。

那时候，陕公分校迁往华北，创建华北联合大学，我被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艾思奇同志已调到中央宣传部文

化工作委员会任秘书长。我们住在一个山头上，他住在上一排窑洞里，我住在下一排窑洞里。我去了几天，就碰上他了。以后，我们有时在一起谈论些哲学问题，也交谈过过去各自经历过的斗争生活。他编《中国文化》，我也写过稿子。这样接触就频繁了。

我们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是在一九四〇年这一年。这一年的春天，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在职干部教育计划成立的。部长张闻天同志任组长，领导全组学习。艾思奇同志任学习指导员，写学习提纲，作学习辅导，在讨论会上作总结性的发言。我当秘书，做学习的组织工作，主持讨论会。

这个小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写的提纲进行学习的。提纲是分章分节写的。艾思奇同志每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写一节。写完一节，就油印出来，发给全组的同志。由于时间紧迫，艾思奇同志往往夜以继日赶写，甚至在微弱的灯光下，直写至黎明。每节之后，有参考书目，讨论参考题。提纲写得相当详细，总共有十几万字，装订起来，厚厚的一本。可惜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现在只能从当年的《中国文化》第一卷第四期（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找到连续发表的八篇。不过这也不是当时的学习提纲，而是依据当时的学习提纲，经讨论后，艾思奇同志加工改写，作为讲座发表的。这八篇中，前三篇有个总题目：《哲学是什么？》，分篇的题目是：《哲学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哲学是党性的科学》、《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这就是提纲的绪论中的三节。后五篇都是讲辩证法的，各篇的题目是：《什么是辩证法？》、《论事物的运动变化》、《论质量的互相转变（上）》、《论质量的互相转变（下）》、《论对立的统一（上）》，发表到这里就中断了。这五篇是提纲的上篇《辩证

唯物论》中第一章的五节，下篇是《历史唯物论》。这个学习组有一百多人，除去中央宣传部的一些干部，中央其他机关也有不少同志参加，其中有些是领导同志，如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莫文骅等同志。

这个小组的学习，到一九四一年春天结束。由于在学习中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比较密切，学习方法比较生动活泼，学习效果比较好，并且能坚持学习制度，这个小组被评为当时延安干部学习的模范小组之一。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以后又改名中央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建立了九个研究室，其中有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教育、中国新闻、中国文艺、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以研究哲学思想为中心。艾思奇同志调到这个研究室担任主任，我调到这个研究室当秘书，我们又一起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的前七、八个月，我们专心致志地着重研究中国当时的哲学思想状况。艾思奇同志多次谈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意义。他深有感受地说，他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虽然也列举中国革命的事例，但是仅仅作为对哲学原理的证明，很少想到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为党的理论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在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就致力研究抗战以来中国各派的哲学思想。当时他还在文委工作，到了中央研究院以后，就以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这篇文章，综述了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情况，批判了蒋介石的力行

哲学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还批判了阎锡山的“中”的哲学。他能在毛泽东同志报告后两个多月短短的时间里，写出这样的文章，这表现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何等尊重和重视！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我们的学风，他又是怀着多么巨大的热情，发挥了多么难能可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研究室一共十七个人。当时大家都很年轻，艾思奇同志也只有三十出头，除去个别同志年龄较大，都是二十多岁。艾思奇同志作为主任，他从来没有以成名的哲学家自居，他对人谦逊、坦率、热情、诚恳，他关心和尊重每一个同志。陈恒力同志是较年长的一个，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些研究，艾思奇同志就发挥他的所长，让他搜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资料，这一年冬天，他写了一篇《王充的哲学思想》，在他写作的过程中，艾思奇同志多次给他鼓励，同他探讨，文章写成后，艾思奇同志又写信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

因为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对研究哲学来说，知识基础和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因此根据当时全院的情况和规定，艾思奇同志提出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第一年以大半时间来学习。他说，哲学是研究事物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需要用哲学来指导各门学科的研究，哲学又需要吸收和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新成果，才能不断发展，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要大家学历史、学文学、学自然科学等等。他还提出，每人至少要学会一种外国语。尽管他当时日语、英语和德语都已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仍然挤出时间跟大家一起学俄语，学得非常认真。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之后，有一天，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艾思奇同志和我都去参加了。座谈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里开的，毛泽东同志说明召开这次会，是要大家来编一本书，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关

于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编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泽东同志还说，现在延安有些人闹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里有思想意识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会议决定，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艾思奇同志从杨家岭回来以后，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艾思奇同志主持总的编辑工作，全室其余十六个同志都分了工，每人分了几本书，紧张地工作起来。艾思奇同志对于从每本书中摘录出来的论述都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看看有哪些摘得不够妥当，有哪些该摘录的没有摘，一一加以校订。对于全书的结构和章节目录，也都做了反复的研究。在毛泽东同志召开座谈会到编成这本书，一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艾思奇同志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花了不少心血。

整风运动，在中央研究院，从三月十八日开始。艾思奇同志被选为院的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常委。整风运动开始不久，我被调到党委工作，仍参加文化思想研究室的整风学习。

在整风运动中，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位领导成员，同时又以一个普遍党员的身份参加研究室的学习。研究室的学习会，他每次都参加，没有请过一次假。他带头学习文件，带头反省检查。他学习文件，写了不少笔记。当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失”及其他》，就是他的笔记中的两篇。他根据自己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对于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怎样做到有的放矢，作过多次深刻的发言。他再三阐述：“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又反复说明：“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

利是不可能的。”他引导研究室的同志深刻地去领会这两方面的原理。他喜欢用毛笔写字，写得苍劲有力。他把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用大字书写出来贴在自己窑洞的墙上。他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也写了贴在墙上。艾思奇同志不是这种人，但他认为这副对子对每个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艾思奇同志对于会上每个同志的发言，都认真地听。他从来不以领导者的姿态提意见、指点或批评，他总是以平等的同志式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带着商讨的口吻提出问题,引导同志们自己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在一次会上，有一个同志检查自己的思想，说他刚到延安的时候，听到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朱德司令万岁！”觉得有点不习惯，革命队伍里不是人人平等吗？为什么对领袖要那么呼万岁呢？大家听了以后，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艾思奇同志指出，这位同志既然检查了自己，就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这种思想不对头了；他又讲了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要大家从理论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象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在文化思想研究室，整风学习进行了半年多，始终充满着这样的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气氛。会上谈得不充分，会外再个别谈心，人人推诚相见，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每个人都系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深刻地学习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从表面上看,艾思奇同志是个很严肃的人,但是同他相处久了,就会感到他的内心充满热情,有时是很活泼的。有一次，他要我到一个地方去。他有一匹马，想再帮我借一匹马，没有借到，他就不骑，跟我一起步行。在回来的路上，走过一块瓜

地，他想买甜瓜，只见有个瓜棚，找不到卖瓜的人，他就拿出一张边币，找了个土块，把边币压在瓜棚里的一个小凳子上，然后摘了两个甜瓜，要我跟他一起就地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瓜擦干净，两手捏了几下，就把瓜分成两半，我们就一起吃起来。吃完瓜，他说再歇歇吧。他先唱起《伏尔加船夫曲》，我跟着哼了几句。他又问我会唱什么歌，我唱了《马赛曲》，他就跟我一起唱起来。他不仅有个唱低音的好嗓子，歌声中还洋溢着充沛的激情。

一九四三年一月，党中央决定加强《解放日报》副刊部，调艾思奇同志任主任，我被调去当副刊部编辑兼秘书。

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各人在自己住的窑洞里研究、学习，副刊部的同志在一个大石窑洞里工作，这样，我们就跟艾思奇同志朝夕相处了。

艾思奇同志有较渊博的知识，有较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他担任主编后，副刊很快就出现了新面貌：思想评论和杂文增多了；农工业生产知识、科技新知识、卫生知识、史地知识、国际知识、读者往来等新栏目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反映敌后根据地军民艰苦战斗和生活的文艺作品也多起来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每天要编出一万多字的副刊，工作是很紧张的，艾思奇同志整天在编辑部。他除去拟订计划、审阅稿件外，自己还经常写些思想评论。在繁忙中，他没有放弃对哲学的研究，还挤出时间读一些历史和文学的书。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艾思奇同志的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就是他离开中央研究院后，继续研究哲学的一个成果。这是击中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一颗炮弹。

艾思奇同志在解放日报社担任编委会委员，同时为全社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那时候，副刊部的整风学习尚未结束。艾

思奇同志作为学委领导副刊部的整风学习，我被选为党的小组长，做学习的具体组织工作，整个学习的过程是和风细雨的。

到了七月，突然来了一场风暴，这场风暴是康生掀起来的。康生是当时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目叫《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夸大敌人的力量，胡说什么延安“特务多如牛毛”，有一大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隐藏在各个机关，要搞一个运动来抢救所谓“失足者”。这阵风也吹到了清凉山。按照学委的布置，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社的大多数部门都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一些所谓“失足者”作了假坦白、假交代。艾思奇同志和我坚决不搞逼供信，坚持实事求是，在副刊部里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一天，艾思奇同志告诉我，他已被撤销学委的职务。我问他为什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他从来是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就没有再问他。接着学委布置在编辑部的全体会议上对我进行围攻，说我阻碍运动。我以为他们会继续围攻下去，还会围攻艾思奇同志，但是出乎意料，只开一次会就停止了。过了几天，学委的一位同志找我谈话，对我说，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来了，他认为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这是抢救运动搞出的偏差。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周副主席的意见，已经决定纠正这个错误，对被搞错了的同志要进行甄别。还说毛主席严厉批评了逼供信的做法。通过这次运动，艾思奇同志在全社赢得了更高的威望。

抗日战争胜利了。一九四五年八月，艾思奇同志调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他在副刊部的职务由我接替。我还是每天把编好的稿子，送给他审阅，请他最后签字发排。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大改组，艾思奇同志担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副总编辑，我调到新华社的口头广播部（即延安

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当主任，编好的稿子，还是常常送给艾思奇同志审阅签发。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胡宗南军队准备进攻延安，延安实行疏散。艾思奇同志作为领导成员之一，他同社长廖承志同志一起，带着大队向晋察冀边区转移。我被留在延安坚持工作，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底才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在晋冀鲁豫边区会合时，没有见到艾思奇同志。因他在行军途中患了副伤寒，未能跟着大队走，以后中央决定重办马列学院，他又被调到马列学院去教哲学。因此，一直到全国解放前，我们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四九年三月，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央迁到北平。不久，马列学院也迁到北平，我去看望了艾思奇同志。我还告诉他，广播电台要办社会科学讲座节目，第一个讲座是“社会发展史”，请他主讲，他高兴地答应了。他每写完一讲，常把稿子念给几个同志听，修改到念得顺口、听得易懂和顺耳才定稿。他每次都是自己到电台播讲，当时电台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录音设备。这个讲座的听众有五十多万人，是中央宣传部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干部收听的。这是一所空中大学，许多听众在收听学习之后，认清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树立和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收到的效果，不亚于《大众哲学》。

在办这个讲座期间，艾思奇同志每星期到电台来录音，我都接待他。讲座结束后，我有时仍去看望他。一九五七年春天，我又去他那里一次。他往在三间一套的房子里，房间很小。他办公的那一间，书架上的书放得满满的，桌旁放了一架留声机，是他听俄语录音唱片用的。他在勤奋工作之余，每天都挤出时间学俄语。他谈到他很留恋在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工作的那些日子。他认为在实际工作中研究哲学，比在学校里研究哲学要好得多，容易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希望我能有时间再

同他一起研究哲学。

没有想到，这是我同艾思奇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九五八年以后，因为我的处境，没有再去看望他，在我得悉艾思奇同志病逝的噩耗时，也未能去向他的遗体告别。不过对于艾思奇同志我是永远难忘的。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来，我同许多熟悉他的同志谈起他的事业，他的成就，他的为人，大家都流露出深厚的怀念之情。不论从他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来说，还是从他的品德、思想和作风来说，艾思奇都实实在在是难得的好同志。艾思奇同志离开人世已经十几年了，到今天，他仍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活着，我相信他是会在人们的心里永远活着的。

一九八三年

# 忠诚正直的革命哲学家

吴 黎 平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艾思奇同志满怀革命豪情，从遥远的上海，来到延安。从此，这位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生涯，展开了全新的一页。

艾思奇同志长期在白区做文化人的工作。他初到延安时，似乎一切都不大习惯，但是，我发现这位不满三十岁的青年理论家，对环境有惊人的适应能力。人们都知道，他是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的作者，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在宣传新哲学观点上，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因此，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中宣部工作，是很恰当的。我之和他相识就从此起。他看起来是那样沉默寡言，而对革命工作却是满腔热情，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当时，在宣传部里，我们这些同志好象都没有什么职称和官衔，人和人之间称名道姓，“老艾”“老吴”，平等相处。中宣部离马列学院很近，我们都要在那里讲课。艾思奇同志教哲学，我讲马列主义，毛主席、张闻天、陈云等领导同志也都在那里讲过课。只有那个陈伯达，满口吱吱唔唔，很少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上不得讲台。

在延安那阵子，条件是很艰苦的。可是，我们工作得很努力，心情也很愉快。那时，出门办事，谈不上坐什么汽车。我们要去各地上课或做什么事，大家都走路，骑马算是最好的了，连毛主席也一样。艾思奇同志讲课很负责，也很热心，有

请必到，从不摆什么架子。同志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等级，就是象穿衣、吃饭这些事，都也那么随便，没有人去计较。记得那时，也分吃什么大灶、小灶，这小灶充其量也不过是加一点馒头，多几块肉片而已，没有人把这些放在心上。我和思奇同志写点文章在报上发表，有一段时间，有为数不多的稿费收入，这在当时，已算是“富翁”了。有一次，王若飞同志见了我就说：“亮平，又该你请客了。”我当然照例高兴地答应了。他又去请毛主席和吴玉章同志。毛主席一听，即高高兴兴赴约，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领袖和一般同志之间是那么融洽，气氛好极了。我和艾思奇同志也互相请，同时总要约一些同志聚在一起，用那一点点钱，改善一下生活。但是，我们是从来不请陈伯达的，也很少同他讲话，陈伯达一毛不拔，他也不请我们，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的缘故吧！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艾思奇同志住在上下排窑洞，相隔不过几步远，在一个单位里，朝夕相处，过从甚密。空闲时，我们就结伴去逛逛新市场（这是因敌机轰炸在延安南郊山沟里新开辟的一个市场）；要不，我们就一起到延河边上去散步。这些富有情趣的延安生活，充满着时代气息，至今还历历在目，令人神往，令人难忘。

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之前，毛主席早就在研究哲学了。在长征途中，不管情况如何艰险，主席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唯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始终带在身边。一九三六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七年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主席得知艾思奇同志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毛主席虚怀若谷，善于博采众议，他的“两论”油印本，就曾亲自签送给艾思奇和我等有关同志，希望阅后提出修改意见。思

奇和我提的一些意见，毛主席大多都采纳了。毛主席当时送我的一份油印本，至今我还珍藏着。毛主席读过许多哲学书籍，其中也有思奇同志的著作。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长篇摘录了艾思奇同志所著《哲学与生活》一书，还给思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信。这件事，体现了领袖怎样重视和关心哲学工作者，同时也体现了伟人的谦逊和不耻下问的崇高风格。艾思奇同志是十分敬仰毛主席的，他非常佩服毛主席的伟大气魄、胆略和渊博的学问。思奇同志说过，毛主席的哲学是从革命斗争中概括出来的，有实际，有理论，深入浅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主席对艾思奇同志也是很尊重的，并且给这位青年哲学家以很高的评价。但是，艾思奇同志直至去世，都没有把毛主席的摘录和给他的信的手稿公诸于世。自诩“理论权威”的康生和陈伯达们知道后，曾经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托人要去手稿题字、写诗和作“跋”。艾思奇同志深知陈氏其人，一眼看穿他们这是欺世盗名，便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虽然如此，艾思奇同志一直珍视这份手稿，并以此激励自己和身边的同志。他千叮咛，万嘱咐，要王丹一同志妥善保管好这份珍品。中间虽经战乱，十年浩劫，但手稿总算幸存，并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同时亦为哲学界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

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艾思奇、何思敬等同志是这个学会的负责人。毛主席还是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回，总结学会的工作时，憨厚诚实的艾思奇同志，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主席也笑了。当艾思奇同志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还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同志善攻哲学，对文学也颇有研究。早在上海时，他就写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科普作品。到延安以后，他曾任《中国文化》的编辑，又是中央文委的秘书长。一九四〇年，思奇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长篇报告，高度评价了边区文运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边区文运的成绩和问题，指出边区文运今后的具体任务。在开展边区文化运动方面，思奇同志是有功之臣，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扬过他。他关心文学，和文艺界人士如周扬、周立波、刘白羽、柯仲平等同志，都多有交往，还曾和周立波同志专门讨论过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

一九三九年，中宣部决定，要在党内外进行一次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为此，需要有一本讲述唯物史观的系统的教材。组织上把编写这个教材的任务交给思奇和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很重要，因为，当时延安的干部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有很高的觉悟；二是从全国各地涌向根据地的青年干部，他们有炽热的革命激情。但是，他们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教育。因此，中宣部这个决定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接受任务后，一起进行了研究。在三十年代，我曾经编写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一书。我们的编写工作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共同商定一个提纲，然后分头修改、补充，最后写成《唯物史观》这本比较通俗的参考书。思奇同志对编写工作十分认真，他的见解，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言必有中。全书编定时，原没有“家族”一章，艾思奇同志建议，是不是应当把家族问题单独作为一章增写进去。我也认为有必要。这一章的补写工作，思奇同志很快就完成了。前后不到半年时间，这个材料的编撰便告结束，并以《唯

物史观》的书名在延安出版（国民党统治区则用《科学历史观教程》印行）。当时，在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内，许多机关都以此书作为干部教育材料。从效果上看，该书在读者中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出版社的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让我将此书修改重版，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它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一定的价值，但从现在的眼光衡量，它的缺点恐怕不少。可惜，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要是他还在世的话，我们又可以象当年那样，互相切磋，共同斟酌。如今，倘若要修订，只能由我来承担了。不过，由于它是历史的产物，我将尊重原作的精神，作一些我认为即使艾思奇同志在世也会同意的增删整理。书仍将以我们两人署名出版，一是借此纪念思奇同志，二是让我们并肩作战的这朵友谊之花永远绽开。

艾思奇同志有许多美德。在延安，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作风朴实、心地善良的哲学家。他为人真挚正直，对同志竭诚以待。他的群众关系很好，许多人都乐意到他的窑洞去串门，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周围的同志。有一回，一个同志病了，思奇去看望他，问寒问暖，慰藉一番之后，悄悄地把十几个煮鸡蛋放在窗台上就走了。当这位同志发现时，他已去远了。思奇对战友的深情，使这位同志很为感动。在学习上也如此，谁有点什么理论问题搞不清，都想到去找他，而他总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给予解答。他虽然从年轻时代起，就有点名气，被称为学者，但他从不自负，从不凌驾在别人之上，不摆架子。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每一次学习讨论，他都细致地进行准备，发言总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记得在中宣部时，我们一起学习《资本论》第一卷，他读得很认真，并从哲学角度分析自已对这本巨著的认识，给大家的启发很大。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思奇同志在和大家相处中，从不恶意整人，从不中伤别人，更不会有意去冤屈好人。延安整风时，他就讲实事求是，言论和行动都不象“理论权威”那样，胡乱诬陷同志。当时，有人说李公朴的坏话，甚至有人因为艾思奇同志在上海曾和李公朴共事，对他加以毫无根据的怀疑。可是，正直的思奇同志胸怀坦然，不顾流言蜚语，勇敢直爽地说：李公朴先生是好人，是真心诚意为民主而斗争的，他反对国民党，拥护热爱共产党，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派，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为抗日民主事业奔走呼号的志士。思奇就是这样一个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勇于卫护真理的革命战士。但是，象这样一位对革命赤胆忠心，对同志真诚相待的好同志，竟受到某些人的怀恨和打击。解放初期，康生和陈伯达等就结伙整艾思奇同志，指摘他的《大众哲学》翻开哪一页都是错误，诬蔑他靠一本书吃饭，诬蔑他“懒”，这真是荒唐透顶的胡说。《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不必说了，思奇同志一生著述，据统计有三、四百万言，怎么是靠一本书吃饭！怎么是懒！而那些惯弄权术、刁钻古怪、没有任何理论著作的所谓“理论权威”康生又当何论！艾思奇同志一贯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己任，解放后仍一如既往，不论场合大小，不计听众对象职位高低，总是有请必到，尽量给予满足，写稿讲演，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这种可贵的精神已有公论，却有人说他这是爱出“风头”。这倒使我想起延安的一件旧事。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是福建人，有一回他到延安访问。不会讲普通话的陈伯达却要抢着去当“翻译”，而他的话又要别人再翻译，风头算是出尽了，却给人们留下笑柄。陈伯达还讥笑艾思奇同志是“九品官”，这倒是一句实话。思奇从不嫌弃“官卑职微”，他想到的是，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只有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向党向人民求取高官

厚禄的权利！他一生当教员，并引以为荣。那些讥笑别人的人，自有一套削尖脑袋、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的本领，但是，到头来却一个个成为世人所不齿的垃圾！相形之下，崇高与卑鄙、正义与邪恶不是判然在目了吗？

我和思奇同志共事多年，熟知他的为人和品格。我们之间平素无所不谈，从无隐私。我崇慕他敦厚朴实，钦佩他治学严谨勤劳。他挨整时，我曾坦率地对他说：你不适合当一个社会活动家，你应当多搞研究，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应当把时光和精力倾注在探求真理的事业中。我还说，有困难，可以去找毛主席，他了解你。可是，这位忠厚的好同志，不肯去找，一切都忍受下来，宁可自己一人受煎熬。他反而对我说，哪儿没有困难？人总还要讲一点党性嘛！可是，艾思奇同志终于因为受到不实之辞的诬陷长期抑郁而早亡。及至今日，还使我深感难过。

艾思奇同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他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生活之树常青。随着时代的发展，势必使理论领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他的过早去世，无疑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每想到这点，就更加激起我对思奇同志深深的怀念。

# 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

吴伯箫

出于亲切、诚挚，大家称呼艾思奇同志为“老艾”。这样称呼的时候，在我更是常常想到艾思奇同志对人诚恳、处事稳健、意志坚贞、革命热忱等种种品德的。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说过：“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

三十年代初期，当《大众哲学》成为知识青年学习哲学的必读书的时候，老艾同志才二十几岁。那本书象在读者心里点了一把火，引起许多青年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炽烈的兴趣。使他们初步认识了什么叫观念论、唯物论，什么叫形而上学、辩证法。那本书引谚语、成语，用通俗的文字，采取谈话、讲故事的体裁，使抽象观念趣味化，生动，形象，浅显易懂，把哲学从神秘玄妙的宫殿里拉向了十字街头、日常生活，纸贵洛阳，影响很大。抗日战争初期印行到第十版，那时进步的知识青年谁不知道《大众哲学》呢？而且提到《大众哲学》就想到艾思奇，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几乎成为同义语。不久，又出版了“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哲学与生活》。无疑，他的著作对广大知识青年是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道的一个鲜明的路标。

一九三五年老艾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认识老艾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初夏，在延安城里。那时他

正给千多名抗大学员上露天大课。学员们坐在地上，各就膝头作笔记，既肃静整齐，又愉快活泼。灰色军装汇成的湖面上，阳光灿烂，微波荡漾。周围还站着一伙一伙衣着斑驳的听众，那多半是象我一样，刚刚到延安，象渴了找水喝，饿了找饭吃，由于慕名而骛集旁听的。当时我曾想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听鲁迅先生一次讲演的情形。

鲁迅先生那次讲演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晚上在北平第一师范学院（即师范大学）风雨操场讲的。那时鲁迅先生在阔别三年之后从南方重返他生活、战斗过十四年的北京，先在燕京大学、北河沿北大三院和第二师范学院讲演，这是第四次。到执笔的今年，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他讲的一些片段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一九二六年夏天所以逃出北京，原是由于遭到"正人君子"的诬害而奔向青天白日之下的。……那是为了找革命。可是到上海的时候，革命还没来，说是在广州；当辗转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却听说革命北上了，那里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后方；现在赶回北平，又听说革命成功了，天下已太平无事。所以，我始终没有遇到革命。不过世界究竟是大变了，"正人君子"和党国英雄"咸与维新"了。到处已由五颜六色的国旗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而且为清一色计，他们正在防止赤化和排除异端，甚至从红皮书到红嘴唇都被禁止了。自然这也是洋大人所希望的。难道不是"懿欤盛哉"的事吗？……一段话，把大革命因蒋介石叛卖而失败做了多么有力的总结啊！字字金石，铿锵有声。象弹丸一样射到每个听众的心里，在听众的心里激起炽热的感情：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对反革命罪行的愤慨。言外更是无声的召唤：要革命胜利，必须在全国点燃燎原大火，掀起漫天风暴。正象《无题》诗里写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次鲁迅先生讲演的场面，真象烈火在燃烧一样，一直是热气腾腾地。不用说风雨

操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就是讲台上、窗台上也站的、坐的都是人，还有因人多挤不进风雨操场，就簇拥在门口窗口外边。

老艾同志讲课的场面，已经是鲁迅先生响亮的召唤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讲的内容是民族民主革命，火热的抗日战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老艾同志讲课非常认真，仿佛时时都在想把自己理解的真理完整地让听众也能同样理解。有讲稿，但不是照着念，声调不高亢，也不讲究仰扬顿挫，但明白流畅，娓娓动听。

散课后，我到他简陋的平房住室去看他，作了自我介绍。我比他大四、五岁，算是老学生。他给我在纪念册上写了这样的话："团结全国为争取抗日最后胜利及建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斗争到底。艾思奇 五·五。"题词表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论持久战》的精神。那天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作为新学员，我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一大队。到今天整四十年，想起来象昨天一样，这在我是值得纪念的。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我们相处了三年，编《文艺突击》，筹备文化代表大会，接待从"大后方"先后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成立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都是在这个时候。

老艾同志身躯不是很高大，但非常敦实壮健，走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坐下来象磐石那样镇定，仿佛摇撼也摇撼不动；说话不急不躁，平易近人；对人表扬或批评，都一样温文和蔼，没见他发过脾气。相处越久，彼此了解越深，"久而敬之"。遇到意外的什么事，他处之泰然，从不惊慌失措。记得在一次俱乐部的晚会上，有人为一件生活小事向大家搞突然袭击，把匕首从皮靴筒里拔出来，猛然往桌子上一插，嘴里唧唧囔囔，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大概有两三秒钟，空气紧张，全场默然。就在第三秒钟的时候，老艾同志在座位上从容

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有意见好好讲嘛！想吓唬谁？别看错了地方和时间。这里驻的是长征的英雄部队，大家在抗日。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一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拿匕首对谁？"说着，用右手食指轻轻地一指，严峻地说："收起来！"三个字，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无可抗拒。就这样，那食指指处昂着的头低了下去。——从那以后，每逢遇到向党、向群众逞强梁、要威风的人，我就常常想到老艾同志处理那次插曲的场面。

我们相处的时候，生产劳动，老艾同志总跟大家在一起，他捻过线，种过菜。不过文化娱乐他却很少自动出节目，仿佛有点古板。可是很久以后听说，他在故乡昆明读中学的时候，很会讲故事，说笑话。为支援"五卅"大罢工，进行反帝宣传，还组织同学唱歌演戏，在男学校找不到女角，他甚至自告奋勇扮演易卜生名剧《傀儡之家》里的娜拉。——一九二五年因"不安分"被云南军阀唐继尧追捕，那时他才十五岁。

老艾同志会游泳，在狄青牢崖下延河那处水深的地方，我们一道跳水、潜水，他的功夫最深，仰泳他能手叠脑后躺在水上，后来读《水调歌头·游泳》，我就常常联想那时的逸致豪情，只是"极目楚天舒"换成"极目秦天舒"罢了。他四十多岁练溜冰，锲而不舍，五十岁可以滑"燕飞"，真正不容易。老艾同志更富于深沉的精神生活，喜欢音乐，一个人用深厚的嗓音唱《伏尔加船夫曲》，唱得很有感情。长年写在座右的是这样一些话："实事求是"；"劳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鸢飞于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而自己都是照着实践的。

老艾同志除了从事哲学著述研究而外，对文学也是爱好的，并且有深湛的造诣。我很喜欢他从德文海涅原著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流利、押韵，保持了海涅诗歌

的隽永幽默、情感炽热的特点。我学习翻译的《波罗的海》就是从老艾同志收藏的一种海涅诗歌英译本翻译的。在延安抗日战争年代里他主动借给我那本书又鼓励我翻译它，那是治学中无私的帮助，令人至今深切地怀念。《波罗的海》译稿清样，我寄请他校订，他立刻复了信：

“谢谢你寄来的译诗集，庆贺解放的中国出版了海涅的第一部译诗！我读了几首，我很喜欢它译得自然！……

很可惜的是，不论德文原文，以及英译本，在延安撤退时都丢弃了！这是很大的损失。但当时的情形，不容许避免这样的损失，所以我不能帮助你完成愿望，这是很难过的！”

“有空盼望常常通信！”

信是从北京马列学院寄到长春东北大学文学院的，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到北京以后，只要有机会我总去拜望老艾同志，无论分手多久，他待人的热情诚恳始终不变，而生活上的艰苦朴素，也永远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最初，他跟王丹一同志在颐和园附近住两间小房子，房子里除了书桌和木板床，地上堆的都是书。一次，他一个人在洗衣服，见面急忙擦手招呼。热天，他招待我吃西瓜，连切两个嫌不好，又要切第三个。依旧象住窑洞的时候一样，木炭火上煮红枣，哪怕只有半搪瓷茶缸，他都拿出来给大家享用。

等到一九六三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老艾同志是副校长。他住的楼房虽然是通明敞亮的，但除了更多的中外图书和半导体收音机，却很少增添新的家具什物。从宿舍到办公室他喜欢骑脚踏车。经常散步到我们学员宿舍。不讲阔气，不摆架子，看不出进城二十年一般人所常有的那种变化。

老艾同志著作很多，成部的书二十余种，文章和讲稿近三百篇。六十年代初期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比较系统地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广大读者中至今仍受到欢迎。只是十多年来遭受“四人帮”的禁锢封存，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重新再版。一九七八年印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书，是他二十多年前写的，对当前肃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流毒，亦有现实意义。老艾同志谦逊敦厚，从不因富有著述而炫耀自满。有的野心家因为他有社会影响而嫉妒他，他却从没以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作为个人捞取什么的资本。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本书刊用时略加删节）

# 难以忘怀的纪念

舒 群

人老了，心底里不免时时泛起忆旧的感情。那过去的事，那故去的旧友，总是凑着伴儿在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我因此常常想起为他们写点什么，以寄托我对他们的怀念。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并非同行，平素交往也并不很多，然而却充满着革命的情谊。这种革命的友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这里我要讲的，就是哲学家艾思奇。

大致是在一九三七年，我在上海初次认识了这位后来在中国哲学界卓有建树的艾思奇同志。七七事变后，“左联”系统有两批同志根据党的指示撤往内地。我当时和艾芜、沙汀、白朗、罗烽等是第一批走的。到南京以后，一些同志去了重庆，我留下等第二批人到来。不久，李初梨、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何干之等相继到达。他们中我大都不认识，一个个文质彬彬，约莫在三十岁左右，是战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这批人的目的地是延安，又都是初到北方，旅途是够艰难的。于是，我们乘上了往西安方向的火车。现在人们一提起火车，总有一个严格的“正点”概念，如果晚点了，许多人就会埋怨、恼火。但是，在本来就很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再加上战乱，火车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停停走走，象蜗牛在钢轨上爬行，天知道我们在火车上呆了多少日子。在车上，没有人管你吃喝，每

到一站，饥饿的旅客们就争先恐后，一窝蜂地奔向小食摊，为的是买一点大饼油条之类的食物。那情景，颇有点“冲锋陷阵”的味道。在这种场合，我发现老艾就有点无能为力。是啊，一位战斗的革命哲学家，并不一定就处处能适应这种你争我夺的环境。我只记得，他每遇到这种情形，就只好温良恭俭让地站立一旁，两只灼烁的大眼睛，安然地直视着这拥挤的人群。这时，我则毫不迟疑地冲向小摊，因为在同行中，我的年纪最轻，身体也好，又是工人出身的北方人，说实在的，我也不忍心看着同伴们挨饿。等我买回食品，大家一块有滋有味地享用时，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从此也给我一个印象：老艾真是老实憨厚！我喜欢他，尊敬他，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林伯渠同志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任云甫同志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在这里，我一直和老艾住在一起，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值初秋，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因为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在特务包围圈中，我们都不好随便远离住地。当时，从延安来了几位大姐，其中有我们景仰的邓大姐，还有贺子珍、陈琮英、简先弗等同志，大家聚在一起，谈延安，谈形势，天南海北，话题很多。可老艾话不多，光听，总是象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沉着，稳重。他虽只比我年长三岁，却要比我老成持重得多。不久，老艾他们都到延安去了，我和周立波被派往八路军总部工作，到了太行山。

一九三八年春，任弼时同志让我到武汉去参加编辑《战地》杂志。行前，我特地到延安办一些事和组稿（艾思奇同志专为《战地》撰写的《文艺创作三要素》就发表在创刊号上）。这是我首次到革命圣地，时间虽然很紧迫，我仍然没有忘记去探望艾思奇同志。那时他正在抗大任教，异地重逢，格外亲热。他一定要留我吃饭，还专门为我叫了一份“小灶”，主食

是馒头，菜呢，是一碗白菜熬猪耳朵，另外不知从哪里弄来点酒。这在延安，就算不错的了。他一边把自己碗里的猪耳朵挟到我的碗里，一边说："很抱歉，没有更好的东西招待你。"吃饭间，他给我讲了好些关于前方战事的消息，还有别的一些什么。这顿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情真意切，深深地感染了我。说也奇怪，我当时住的是交际处，吃的要比他们好得多。解放后，我到中央高级党校拜访他，他也热情地请我吃了饭，大盘小碟，当然要比窑洞里的白菜猪耳朵丰盛得多了。但唯有延安那次，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这叫人怎么解释呢？

一九四〇年，我从桂林奉命调延安，先是在"鲁艺"，后到"文协"工作。艾思奇是"文协"的主任，因还忙于教学，到机关次数并不很多。他每次到机关谈工作，都来看我。他说话不多，但很严谨，好象每一句话，就是那么三五个字，但意味特别深长，他不是那种一说起来就口若悬河、长篇大论的人。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时候，组织上决定让我去主编第四版。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志接触。他老人家很关心报纸，亲自领导和过问文艺版的工作，为此，我常常要徒步到杨家岭，或是骑着牲口到枣园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那时，毛主席的作风是很民主的，就说那"枣园之晏"，请什么客，比如文化人的名单，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每提起一个人，他就谈一点看法。记得谈到艾思奇时，毛主席说："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毛主席对艾思奇的印象是很好的，后来还多次称赞过他。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著名的延安整风开始了。后来发展到所谓"抢救运动"，问题转而复杂化。领导都了解我，康生对

我的情况也清楚，我想大概我不会有什么事。可是，事情并不妙。有一回，康生拉着我去看陈伯达，说了许多在延安抓“特务”的经验，还说这次问题全解决了。我不解其意。这时，艾思奇同志已经到报社副刊部负责工作，我则无故被停了职。记得有一回，到中央党校礼堂去听“坦白大会”的典型报告，只有艾思奇同志陪着我，就两个人。后来我才知道，让老艾陪我，一是让他见见世面，开开脑筋，因为各部门都搞得热火朝天，只有副刊部还没有抓出一个“特务”来。二是表明对我有怀疑。随后，我被当作“双料特嫌”打落水中。从此我同老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中相处着。由于当时还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样复杂的场面，明明要革命，却变成了“特务”。我百思不得其解，真是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我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艾思奇同志作为副刊部的领导，对我是很关心的。他让温济泽同志来“看管”我。老温也是个好心人。“看管”的目的，本是要加温添火，而他们则是怕我出事。他自己也经常来看我，开导我说：“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象金子一样，真金是不怕火炼的。”一席话说得我得到莫大的安慰，我至今仍感其言。我本是一个自信的人，这样就更增强了我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不做官，就去纺线，飞转的纺车伴着我度过那辛酸的但又令人怀念的岁月。我的纺线技术还真不错，甚至可以赛过心灵手巧的女同志。艾思奇同志有时仍然来看我，在吱吱的纺纱声中，我们再不便交谈什么，此时，我总是报以感激的微笑。虽然笑是苦涩的，却出自内心。

在革命队伍中，处处都有关怀、温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博古同志深情地对我说：“换个环境吧！我已和王震同志说了，到那里去住一段时间。他欢迎你去。”参加劳动，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快来到三五九旅的大生产洪流中。干活我是拿手的。这年秋天，艾思奇和王丹一同志到南泥湾参观。他们

特意来看望了我。那时，我的问题虽然还没有结论，心情已平静许多。但是，在远离延安的南泥湾见到他们，交谈是愉快的，是令人难忘的。

不久，我的“特务”冤案得到了甄别，党组织又把我调回延安“鲁艺”。我又能和博古、思奇同志保持联系了。博古同志有一次对我说：“破例告诉你吧。在运动中可真难说，有七份材料揭发你有特务问题，说得有鼻子有眼，怎么办？……可是艾思奇同志竟在那时为你打包票，说好话，他认为证据不足，始终认为你没有问题。他还说副刊部的同志都不可能是特务，他因此被撤消了学委会委员的职务。”在运动中那样整我，我都没有掉泪，听了博古同志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禁不住热泪盈眶。但是艾思奇同志可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些事，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当时已是黑云压城的气氛，他敢于站出来仗义执言，硬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同志身处逆境，甚至已经落水，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留下话柄。不是说艾思奇素来沉默寡言吗？可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拍案而起。这就是沉默与仗义在他身上的统一。这里还使我记起另一件事。就是在作甄别结论时，因为我在东北参加过第三国际的工作，是有党籍的，因此我希望保留前两年的党龄。由于组织和群众的意见都不一致，要不要写在结论里呢？我有一点犹豫。我征求艾思奇同志的意见，他说：“既然如此。你就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写上，要相信组织是会弄清楚的。”要不是他那样明确指出，说不定我会犹豫，以至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解放初期，我到西郊马列学院看望他，闲谈中，感谢他的指点，说到两年党龄因有人证明，已经得到恢复。他为我感到高兴，而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曾进行过帮助却不怎么介意。他这个人，确实是最有真实感情，却又不愿喧赫美德于人的。当时我们一起在校园周围散步，路过清

末太监李莲英的墓地时，谈了许多清廷腐败及其与这个墓主的关系。后来又说到周文同志的死，他不禁唏嘘，十分惋惜的心情溢于言表。

一九五八年我又再次落难，戴着沉重的“反党”帽子到了东北的一家工厂。一九六二年我有幸和两位工厂厂长出差进京。事也凑巧，我和艾思奇同志竟奇迹般在西单长安戏院门口相遇，他还是那样真挚热情，问寒问暖，他的车子就停靠在十字路口南边。他郑重其地事把我领到车子旁，告诉他的夫人王丹一同志下车和我相见。其实，他当时明知我的党籍都丢了，有的人也许会避之不及，那能象他这样上前握手问候呢？可贵啊！他珍重真诚的革命友谊，是永不变色的。我高兴地向两位厂长介绍了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也都以为这是一次幸会。此后，天各一方，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一九六六年春末，当我在报端看到艾思奇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我的心不禁紧缩起来。真没有想到，几年前长安街头邂逅相遇，竟成了我们的诀别，我要知道的话，我该怎样珍惜这难得的时光！至今想来犹感遗憾。不过可以告慰于英灵的是，在他的追悼会上肃穆地放置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送的四个大花圈，这也使我稍感宽慰了。

艾思奇同志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人。他甘愿在背后为同志作出牺牲，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是不可多得的。我因此常常想到他的为人，想到他对同志的友爱和革命道义，想到他的坦荡的胸怀。这难道不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品德吗？现在，正面临着整党学习，我们每个党员都应当严格按照党章要求自己，通过整党，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看艾思奇同志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好党员。他，永远值得我学习！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 我的好老师

宋振庭

一九七九年春，我调到中央党校工作，距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学习已四十一年了。我和老朋友们说这也是“落叶归根”，不过归来的是一片老叶子了。

离延安后几十年，我始终没机会到党校来，也始终未能和四十年前把我引入哲学领域里来的领路人，当时马列学院哲学室指导艾思奇同志深谈一谈。这中间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思想领域思潮波浪兼天汹涌，可我全在外地，对于首都的情况、党校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回想起来，我和老艾同志之相处也只有两年有余，但这两年他确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他的敬慕是始终未变，直到如今。

本来，在我进马列学院前，对于作为哲学家，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一个朴实勤勉、谦虚笃厚的学者艾思奇同志的形象在延安的干部中是已有口碑的。在我们到延安较早的一辈青年同志中对他已有了不少传说，这些传说全给我造成了很想对他切近地观察一下的热望，后来愿望果然实现了，我成为研究员，他是指导，在延安北门外西山坡的一间窑洞里，有八个人，差不多天天是在一起，读书、讨论、听辅导、编写材料，也常常一块吃饭，上山开荒，一起参加晚会。两年的时光不算长，要以现在的时光比，那算是太短暂了（谁晓得！近二十几年竟过得这么快），但那个时光至今还历历在目，许多

事情、人物的面目言行还记得清清楚楚。对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大家全有体会，不用我说。可是，在我说来，因为那几年的生活太新鲜了，太让人难忘了，太不同寻常了。这几个“太”字，在副词字眼儿太通货膨胀了的昨天，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我却深知它真正的含义。

老艾同志和别人在一起，他的话不多，讲意见时挺慢，边思索边说，他两眼很大（我觉得他白眼珠也比旁人更亮），他不善于辞藻，更少用副词，但他很关心他的思想是否表达得清楚。对自己，这个哲学家常常是忘我的，衣服穿得很随便，好象生活中没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和要求似的，但对人却很谦虚和蔼。比如，我们中的两三人，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说话时却很有礼貌，很尊重人。他可能是有一天里连续地思索着一个命题的习惯，在连续思索中，他把别的事、别的话暂时都忽略不管。我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就“唯物主义的本质”这样一个问题发言时，我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句话：“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不作任何附加的理解”，并翻开他译的《新哲学大纲》中这一页，他抓住这句话反复解释它的重要性，几次重复这句引文。等到晚上，月出东山之际，我送他到后山窑洞的路上，他又提起这句话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很吃惊。我才发现他差不多整整一下午脑子里全在想着这句话，难怪别人传说他确是常常为想问题达到废寝忘食！我说的这个小小插曲，其时是一九三八年春。（后来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到现在仍然金碧发光地嵌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迎面正中的墙壁上。）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老艾是多么认真地开动机器。

老艾同志一生忠实地把心血用在思索上，用在党指示要他做的工作上，他对党布置的任务，从无二话，总是努力去做到

与党中央政治思想上的一致。他一生来来去去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地是个书生，我看他也从未想到抓权作官。曾经很有过一段时间，人们拿陈伯达和老艾比，舆论是陈伯达“能中国化”，“善于联系实际”，“老练深沉”，似乎老艾太简单，太老实，太哲学气、书生气。记得建国后有一次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喝水时，我见到老艾，我问他：“您还认得我吗？”他看了看我，笑了笑说：“我认得，还能忘了吗？”我问候他说：“您怎么样？”他笑笑说：“还那样！还是艾教员！”从这次见面后，我一直忘不了这三个字“艾教员”，以后我常常在心里掂掇这三个字的分量。我当时也确实把老艾和“大人物”陈伯达比过，觉得老艾比不了这个号称老练又博学通天的大人物，但我又从心里更加敬慕一个以其一生的心血甘愿做个教员的人。这件事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完全明白了：正直的老艾和老谋深算的大奸巨恶陈伯达之间，人和鬼的界限原来在这里！

记得毛主席说过，他很想辞去许多职务，只作一个专栏作家，我也从心眼往外把这句话无数次地赞颂过，和主席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相印证辉映。但可惜的是历史是不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毛主席也未能实现他的这个愿望。

纪念艾思奇同志，我最敬慕的是他一直为党的事业始终如一，表里如一，言行如一，四十年来花费心血培育干部，他是一个真正的艾教员！真正的好老师！

# 我所知道的艾思奇同志

王　匡

我知道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读书生活》上。那时我正追逐着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读书生活》中的一个专栏，它在我们这一群初学社会科学的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具有非常高的威信；它讲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理，但通俗易懂，寓意深刻。记得其中讲到一个青年人，他可以是个"青年"，同时又可以是个"店员"，借以批驳那些认为青年就是青年，店员就是店员的形而上学观点，讲得清楚、明白，很有道理。

我对哲学感到兴趣，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读完《大众哲学》，进而又读完他和郑易里合译的《新哲学大纲》，然后再进而涉猎世界的和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虽然几十年来在哲学方面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思奇同志对我的启发、引导，和在我那荒芜杂乱的思想园地上所播下的种子，使我永不能忘。

一九三九年底，我被从延安马列学院调到中央文委。文委的负责人是张闻天同志，艾思奇同志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咱两人"一个领导，一个群众"，在蓝家坪的半山上住了两年。为什么要调我去同他在一起呢？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在我学习《大众哲学》的时候，因为有一两个问题，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而写信同他"商榷"。当时用的是我的原名，

未料到在抽查我的历史档案中，给他发现了，他决定把我调到他身边。“记得你曾给我写过信吧？”谈起这件往事时，他笑咪咪地望着我。“你提的意见是对的。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后来出书，我已根据你的意见作了订正。”他那虚怀若谷的态度，使我非常感动！我想，怎么一个整天浸沉于思考与写作的哲学家，对一个无名小卒的一两点零星意见会这么重视呢？

艾思奇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勤奋。他自从调到延安之后，就要在抗大、陕公等校作讲演，在高级院校中教书，为此，他得亲自编写教材，作好备课工作。一九四〇年《中国文化》创刊，他是主编，这刊物由他撰写长篇大论的《哲学提纲》。除此之外，他主持了当时的延安哲学研究会的报告会，和经常给大后方的进步刊物写批判托派的文章。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那张破旧的白布门帘，通宵闪映着摇曳的烛光。记得有一次，天刚亮，他拿了一大叠稿子（大约有一万几千字）对我说：“昨晚到现在，我写了这一大堆，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清写了些什么了，请你帮我看一遍。”我知道他一夜未睡，答应为他当个校对。真的，在校阅过程中，我发现了好些地方由于精力不支而造成的笔误。例如，他把“工人”写成为“工人阶级”。说这个工厂“有三千个工人阶级在做工”。……我看到这里，不觉哈哈大笑。等我把这些告诉他，他也不由得哈哈大笑！

思奇同志为人朴素、踏实，从不居功自傲。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连饭也忘了吃（他是吃“中灶”的。打开他的饭盒子，常常会发现有两三个又冷又硬的馒头），但是他总是感到自己做得很少，好象对不起人似的。看他桌面上堆着的文稿，就算干它一辈子，恐怕也干不完的，可是他还是一件接一件的做去，除非他病倒了。

有一次，他同我谈到那本风行一时的《大众哲学》。他

说，“这本书之所以深受欢迎，不是由于我有什么特殊创造；我只不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比较通俗的形式表达出来罢了。”“这本书在抗战前夕得以畅销，有其客观的原因：一个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二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北上抗日行动的胜利；三是广大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的几个原因，更激发起人们对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左倾”的东西的兴趣。不然的话，新哲学到我国来近二十年了，为什么惟有此时才受人注意？因此，这本小书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应当归功于党的政治路线，归功于伟大的长征战士，因为没有这些光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没有抗日救亡的革命形势，就找不到这样多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青年读者。”

思奇同志懂德文和日文，但他仍感到懂得太少，他很想学会俄文。他常常感喟于许多文章的引文，有些译文错漏，有些语意不明，尤其糟的是，一时“你引我，我引你”的，形成一种很坏的风气。“我们不可以提倡学一两种外国语么？”要使搞马列主义理论的人，都能看懂马恩列斯的原著。那时我也正在学俄语，他对我的学习，一直采取宽容、鼓励的态度，从没有在我学习的时间内，给我派出过公差。

思奇同志待人非常宽厚。所有同他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为人都是没有二话的。他从不发脾气，即使是遇到不了解他的人向他要态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件事给我的印象颇深：有位搞哲学的同志，拿了他自己在延安哲学研究会上的“学术报告”，硬要思奇同志在《中国文化》上予以发表。那个所谓学术报告，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论文章。它要表达的是关于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讲过的一句话——“事物是螺旋形发展的”——他为了讲清楚这一句话，曾在黑板上画了一

个大田螺，他的这种“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别人也不知道”的幼稚行为，早已引得哄堂大笑了。现在还硬要拿来发表，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可是这位同志不但缺乏自知之明，而且疾言厉色，想向艾思奇同志施加压力。思奇同志很耐心地劝慰他，并请他考虑是否另写一些别的文章？……事过几天，我们都为这咆哮如雷与心平气和的两种态度而感到诧异。可是，思奇同志也自有他的看法。他说：“本来嘛，文章不被采用，用不着生气，多写几篇就是了。多写几篇，人家就有选择的余地。一篇文章被否定了就开口骂人，并不说明你的本领高强，相反，说明你没本事，因为你的本事就仅只此一篇了。”“发脾气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因为它不了解事物的必然性。这位同志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文章不好，却反过来怪别人瞧不起他。在我们看来，象他这样的文章，一无实践经验，二无新的观点，只抓住斯大林的一句很平常的话，牵强附会，随意引伸，能够写出什么来呢？这是教条主义者的通病，我们既然了解这种必然，就用不着同他生气。”从此，我理解到他对发脾气的看法，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点意外收获。

思奇同志喜爱文艺，对党的文艺工作起过好的作用。他是个哲学家，又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常用“崇基”的笔名写些短小的文艺评论。文艺批评可以说是他的新哲学在文艺方面的应用，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尝试。在这个思想领域里，他的笔尖有时显得十分锋利。他推崇鲁迅先生，一九四〇年，上海的鲁迅纪念委员会老远地给他寄来一套《鲁迅全集》。他非常高兴，不管怎样忙，他也要挤出时间来阅读。他还把《鲁迅全集》转借给我，嘱我务必要把它读完（创作部分）。他的全部精力虽然都放在哲学上，但他十分注重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他私下曾同我谈到过延安的许多新老作家的作品，如艾青、贺敬之、郭小川、鲁藜等人的作品，他都向我推举过。我还清楚记

得，他对《白毛女》歌剧的估价，他认为这是“划时代的杰作”。一九四六年，我从中原前线回到延安，他叫我暂时住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住地），同他住在一起。那时他同我谈得最多的，恐怕要数文艺方面的问题了。这时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文艺作品。

思奇同志十分喜爱诗歌和音乐，这大概是很少人知道的。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朗诵海涅的诗，歌德的诗，拜伦的诗……。至于对音乐的爱好，他简直要使人大吃一惊！除了我国民间音乐如郿鄠、道情以及他的乡音云南民歌之外，他还非常喜欢外国的古典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在雷鸣闪电之中，他独个人放声高歌舒伯特的歌剧《魔王》！

思奇同志的趣味是多方面的，他的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为了研读哲学书籍，他不得不浏览许多自然科学、医学著作；为了钻研诸子百家的作品，他经常翻阅《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他的哲学著作如《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每一次版本，他都认真作了修改。所谓精益求精，也真足以说明思奇同志的治学精神。

从外表上看，他似是一个一动不如一静的书生，其实他是一个内心生活十分丰富多采的人。他多么期望能到我国名山大川、各处胜地去旅行啊！但是他所到过的地方却是很少很少，我每次到北京去看他，他都以教务羁身，不能前往为憾，他竟连广东也没有去过。我当然知道他是个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不会丢下工作不管，独自去游山玩水的。因此，我总是说：“不要紧的，就等以后的机会吧！”但是，一九六六年春，噩耗忽然传来，思奇同志不幸遽然长逝了！他永远也不会有南来的机会了！

# 想起了艾思奇同志

解　清

这一年我常想起艾思奇同志，因为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艾思奇文集》，我帮助寻找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没有署名的文章。当时发表的报纸社论、短评和“解答问题”等稿件，是不署名的；也有的短文章的署名只用一次。他不署名发表的文章数量较多，又往往是重要的作品，应当寻找。在翻阅艾思奇的文章中，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他，想起我们在《解放日报》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

一年来，我读过几篇没有发表的回忆艾思奇的文章，吴伯箫同志写的《回忆老艾》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谈到艾思奇平易近人，待人热诚宽厚。大家不称他的官职，也不尊称他“艾思奇同志”，而是亲切地喊他“老艾”。最近读了王匡同志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我所知道的艾思奇同志》，他写了不少老艾在《解放日报》的活动，我象看到了老艾沿着清凉山顶的一条平路，迈着大步，走向报社办公窑洞的健壮的身影。不由得提起笔来，写点我对他的怀念和记忆。

老艾是著名的哲学家，一九四二年夏调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副刊部主任。我在副刊部作编辑，他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老师。老艾的哲学《大众哲学》在当年的青年中影响极深，我是成千上万背着他的《大众哲学》去延安学习的青年之一。我们一起在报社的时候，他又教我写作和学习。

在延安时，老艾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阐述毛泽东思想。他在《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中说："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老艾一生的工作、为人、处事是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个光辉的哲理的。

一九四三年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末期的审查干部阶段，怀疑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要把他们从"失足"的泥坑里"抢救"出来，这就是当年著名的"抢救运动"。当时副刊部有十个编辑，被"抢救"的有一位老作家和我两个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开始审查我的历史前，老艾对我说："你的历史简单，谈两、三个下午就可以结束了。"我十八岁入伍，入伍前在河南地下党领导下，在开封办杂志，也参加其他抗日救亡活动，因而被我所在的开封高中"勒令休学"。我的历史就是这样清楚简单。但想不到五月二十五日审查我的最后一天，问题突然来了：有一位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被迫假供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复兴社分子，还假供我是他的领导人。我提出：我没有加入过复兴社，革命前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当时在开封工作的同志可以证明。老艾也认为：对我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从两方面考虑，不要孤立地看待运动中的口供。想不到他的正确哲理分析遭到了领导的批评，甚至说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四四年初，"抢救运动"进入甄别阶段，我是《解放日报》第一个被认为搞错并给予赔礼道歉的人，我从无形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老艾的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崇高品质使我至今不忘，我常以他为楷模策励自己。

老艾对人亲切、热情、宽厚。他先看别人的优点，关怀人，爱护人，对人负责任。用他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对同志要关心。"他对待给报社投稿的作者的态度也是这样。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进行加强党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的改版工作，改版后第四版成为综合性和杂志性的副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文艺的稿件都刊登，但以文艺为主；还有约两周出版一次的《敌情》、《自然科学》等专刊；《学习》专刊不定期，一月约出三次，也由副刊部负责编辑。这样原来《文艺栏》的三个人——舒群、陈企霞同志和我，显然很难完成改版后的副刊编辑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报委员会就把艾思奇同志调来当副刊部主任，仍兼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原《文艺栏》的主编舒群当副主任。老艾又提名调林默涵、温济泽、庄栋和王匡等同志来。王匡因原单位不放，没调来，不久调来了陈学昭同志，这样综合副刊才算办了起来。

综合副刊每天有几十件来稿，编辑要发稿、看拼版、校对清样、检查报纸、算稿费、组稿、接见投稿者等等。而在生产季节和运动期间又只有半天工作时间，所以每个编辑平均每天或每半天都要处理十件、八件，最少也要处理三、五件稿件，而且不用的稿件，都要写信提出意见退还给作者。这些退稿信都是经老艾看过才发出去的，有时他看退稿信还要翻翻来稿；有时他对退稿信作些修改；有时甚至重写才发。这样，稿子虽然被退回去了，但作者从中得到了关怀、指导和帮助。老艾有时也亲自处理稿件，但一般作家的作品，包括负责同志的作品，他大都放手由编辑处理。

老艾对哲学的贡献固然大，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贡献也是不朽的。他为社会主义文艺所作的贡献，表现在他对文艺理论的阐述，还表现在对新作者的重视、培养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老艾特别强调要重视工农作者和年轻作者写的“豆芽菜”(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时，把工农作者和青年作者的作品称为“豆芽菜”）。因为不

仅“豆芽菜”可以成长，就是“豆芽菜”本身也很有价值。

从前方回来的新作家写的反映战斗生活的作品，如胡丹佛的《把眼光放远点》，海默、洛汀的《粮食》等剧本，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孙犁的《荷花淀》、李季的《老阴阳怒打蝗虫爷》、华山的《碉堡线上》等小说、散文，老艾看了大为赞赏。现在这些同志都是著名的作家了。

对延安整风后出现的作品，如王大化等人的《兄妹开荒》、丁毅的《夫妻识字》和军法处秧歌队的《钟财起家》等秧歌剧，老艾也非常重视。他常于百忙中执笔写文章，推荐新作品。在延安演出的第一出改革京剧《逼上梁山》、优秀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他都及时写了剧评。他在延安写的推荐新作家、新作品的文章，和他三十年代在上海写的文艺理论文章、文学评介述著，在文艺理论战线上至今仍熠熠闪光。

对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他都叫编辑写文章介绍，并尽可能转载，扩大作品的影响。但对少数作家写的与抗战无关的题材，或写国民党统治区的一般题材，都叫编辑退稿。老艾说，不怕得罪人，这些作家会理解、原谅我们的，这是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

老艾对社会主义文艺所作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开展文艺评论持民主态度，从而促进了文艺创作的活跃和繁荣。

生活中举凡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哪怕它是最完美的，也会引起不同的反响，毁誉并存，何况刚琢成的新玉，就更不会是无瑕可剔了。一九四四年五月，歌剧《白毛女》公演后，从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到机关的一般勤杂人员都说好，我也很喜欢这个新创作。这是根据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间传说汉奸恶霸欺压群众的故事，综合采用河北和华北民间戏曲调而创作出来的六幕新歌剧。但对这新歌剧，当时延安文艺界引起极大的争论：大部分人说好，也有少数有代表性的专家说不好，甚至

有人认为“完全不是戏”。剧作者贺敬之、丁毅同志既受到鼓舞，又感到疑难。有一段时间，贺敬之每天从他所在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城东八里的桥儿沟，跑到城西、城北去征求意见，一天跑几十里路，常常顾不得吃饭喝水。他把搜集到的对《白毛女》的意见，其中有我和他谈到的观后感，都整理出来，用他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纸张，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出了个墙报专刊。后来，贺敬之根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观众的意见，对《白毛女》作了几次修改。我感到剧作者是认真努力的，这出新歌剧的尝试是成功的，报纸应当支持。我向老艾说了我的意见，老艾同意，他说《白毛女》的创作很不容易，戏是好的，虽然现在不是没有缺点，“你写文章介绍嘛！”我就把多半从贺敬之办的墙报上看到的意见，随便取了作者署名，写了一篇《关于〈白毛女〉》的剧评，在七月十七日《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

文章发表前，老艾认为对《白毛女》既有不同意见，就应当开展讨论，报纸有责任把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发表出来，与大家商量。这样就在副刊上为《白毛女》的评价开辟了《书面座谈》专栏，我的那篇文章是发表在这个专栏的第一篇。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目是《〈白毛女〉的时代性》。文章说“要足够估计《白毛女》的好处”，同时对该剧作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文章发表不几天，一位领导同志就来问：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作者是什么人？他肯定批评《白毛女》的这篇文章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当时老艾向他解释《座谈》专栏的意思，说文艺问题可以开展讨论，发表那篇文章并不是说我们就同意那种意见。领导同志坚持说那篇文章有许多错误，对发展创作不利，应赶快写文章批评。这样我就又写了《谈谈批评的方法》，批评对《白毛女》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我的那篇文章经过老艾修改，题目也是他重新写的。他改得使文章说理

更充分些，更广泛些，不是针对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我临时署了个笔名“解清”，老艾是第一个给我修改稿子的老师，为了感谢和纪念老艾的帮助，以后我就常用这个笔名。

老艾一般是不主张改动作者的文章的，没有政治错误，不是语句不通，不是错别字，他都不主张改，他说应当尊重作者，这叫“文责自负”。

我写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作家、艺术家没有人再写稿参加“讨论”了，《座谈》专栏接着发表了两组短稿，每篇千把字，主要是说《白毛女》好话的。这样，匆匆把“讨论”结束了。以后，《白毛女》又作过少许修改，成为群众喜闻乐见演出最多效果最好的新剧，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终于成为不朽之作。

老艾的职务是管副刊，但整个报纸的思想、理论工作他都管，象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批判稿件，多是由他负责组织和审阅。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艾担任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工作更忙了，但他仍不断写稿。他写作和审阅很多社论，写理论文章，写文艺评论，写短小精悍的杂文。当年他写的杂文《降魔》、《再谈面子》直至今天仍被当作文章的典范而选载入册。

有些“问答”稿件，一般报纸不很重视，而老艾却亲自动手写，简单明了地解答问题，很受读者欢迎。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到报社不久，就答复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陈俊儿同志问某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地球必然要渐渐冷却、死亡，甚至随时都有因其他天体的变动而突然毁灭时，他就会减低或失去革命积极性，而沉浸到无可奈何的忧郁中。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怎样说服他。”老艾写的编者答说：“日本帝国主义正要灭亡中国，我们正处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如果不战胜日本帝

国主义，我们民族在这几十年或百多年中就要灭种，这是顶现实的问题。地球的毁灭那不是几十年、百余年的事情，而是几十万年以后的事情。如果现在丧失革命积极性，我们的民族，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就要绝灭。”老艾还说“进一步说，地球是要毁灭的，但地球的毁灭是不是等于人类的毁灭？我们辩证唯物论者不但能认识自然，而且能改变自然，使它的发展有利于自己。”老艾以哲学观点所阐述的道理，浅显明晰地解答了问题。现在读着，仍感到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人们常常误解哲学家是一个严肃呆板、枯燥乏味的人，其实不然。平常我们看到老艾工作严肃，说话稳重，但他却是个思想活跃、活泼风趣的人。他会唱歌，爱运动。有一次我们从山顶办公室出来，沿着山路回宿舍窑洞。老艾一个人在前面走，边走边哼歌，他喜欢哼秧歌调，也会唱外国歌。我跟在后面，与他距离较远，听着他唱歌，不想打断他的兴致。当快到他的宿舍时，我赶上去说：“艾思奇同志，今天怎么这般高兴？”他笑着说：“高兴吗？有好事呵，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把《海涅诗选》译完了，干完一件事感到很轻松愉快。”犹如金黄的稻穗给辛劳的农夫带来收获的喜悦，我理解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繁忙的工作中，老艾完成译诗的快慰。

在那战斗的年代里，生活、工作本身就是战斗。我们的工作天天干不完，编辑个人写稿都不占用办公时间，只有写社论时在家里，其余时间都在办公室工作。老艾写文章是业余的，《海涅诗选》的翻译更是业余的。老艾是当年少数在国民党区可以拿到稿费的作家，但从没见他把钱寄来使用，他把稿费存在书店里，哪位同志有困难，需钱用，他就把钱送人。他听说肖逸同志的母亲患病，就主动热情的写信给肖逸，请他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属凭信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取稿费使用。老艾自己的生活却简单朴素，一身布衣布鞋，布衣还是缀有补钉的；吃

的是与一般享受小灶供给制待遇的干部一样并无特殊。讲究。

老艾爱运动，交谊舞跳得好，到了舞场，一场接一场不停地跳。他说跳舞的音乐旋律，能使大脑获得休息、营养，舞蹈的动作，又是轻松的、有益的运动。他曾教我跳舞，给我做示范动作，让我跟着学，可惜我天生笨拙，没有学会。

和老艾在一起工作，使人得到教益；跟老艾在一起生活，使人感到亲切。在清凉山时，老艾个人是有“小鬼”打饭的（“小鬼”是对勤务员同志的爱称）：报社的“小鬼”多是从前方回来的小英雄，他们喜欢在前方打仗，不愿在后方工作。他们年纪轻，有的只十二、三岁，常常玩起来就忘记打饭了。遇到这种情况，老艾不着急，也不批评，热情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长期给老艾打饭的小鬼叫林济安，是当年年纪最小，也是最爱玩的一位小同志，听说解放后他在人民大学毕业了。那时打饭一担挑两个瓦罐，一罐装饭，一罐装水。林济安打饭上山时，看到麻雀就迷了，有时放下担子，在山坡上逐着雀儿飞，等把担子挑到老艾那里时，饭早凉了。他不好意思地说：“饭都凉了，怎么办？”老艾笑笑说：“你们在前方不是常吃凉饭么？”林济安说：“前方和后方不一样，应当打热饭给你吃，下次我不捉麻雀了。”要是冬天有木炭烤火时，把馒头切成片在火上烤烤，老艾吃着便很满意，说这样更好吃。想起老艾，我常想为什么延安时代人与人之间真诚友好的感情、关系在今天不能够保持发展呢？

老艾热爱同志，但对某些坏人坏事，他是态度鲜明的。当年他对陈伯达的为人和他的许多文章都看不惯，有人说这两位理论家“不团结”。这是无法团结的，因为这是是与非之争，不是无原则的纠纷，但老艾还是以革命为重，做了很多团结工作。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报纸发个专

刊。老艾写了一篇《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编辑同志组织陈伯达写了一篇《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编辑说陈伯达那篇文章写得不好，老艾也认为很空洞，八股气重，只好勉为其难地发了。老艾还叫发稿编辑把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在专刊头题位置，编辑明白老艾这只是谦虚礼让——陈伯达那种“学霸”作风，他的文章不发头题还行？

老艾是哲学战线和宣传战线的老前辈。解放后，大家想着老艾可以为党作更多的贡献，可想不到他的处境不顺。他为人正派，胸怀坦荡，心中有党，只知道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想不到他作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就去世了。

血液停止循环，躯体付诸火堆，并不就是生命的消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的人活着犹如死去；有的人死去仍然活着。老艾是我们中间永存活脉的前辈，他的思想品格，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典范；他的科学哲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指南；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永难忘怀的记忆。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过去，建设未来，我们又重新踏上老艾走过的道路，去消灭愚昧、贫困、落后，去创造崇高的生活，为建设四化而奋斗，这是可以告慰于老艾的。

（原载一九八一年六月《艺丛》第三期）

# 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

肖　前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年了。岁月的流逝冲不淡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在我们重新组织哲学学习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起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工作的老战士。

早在三十年代，艾思奇同志所写的《大众哲学》，就以独创的风格，揭开了笼罩在哲学上的神秘玄妙的帷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宣传，把新的精神武器送给争取解放的中国青年。这本书一出版，就吸引了广大的读者，不得不多次再版。它教育了一大批青年，把他们引向了革命的道路。我自己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启迪下，才引起对哲学的爱好，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的。艾思奇同志是我终生难忘的启蒙老师。他的《大众哲学》以及他翻译的《新哲学大纲》和编辑的《哲学选辑》等等，都成了我求学时爱不释手的读物。我曾多么渴望能见到这位革命战士、学者。一九四八年初，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我终于见到了他。原来他是那么平凡、朴实和平易近人，使我深深感到，《大众哲学》的作者确是一位大众的哲人；只有真正的大众哲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大众哲学》。从此，我不断地得到艾思奇同志的

教诲，并投身于哲学专业工作。从他对我的日常教育中，也处处可以看到他把哲学贯彻于生活的精神。

有一段时间，在同志们屡次批评我不谦虚以后，我曾下决心不管思想通不通再不坚持己见，倒可以博得一个“谦虚”的美名。艾思奇同志了解后，耐心地给我指出，在马思克主义哲学看来，“谦虚”不仅是一个伦理学的范畴，甚至主要不是一个伦理学的范畴，它首先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善于吸取前人和旁人的一切好的意见，它永不满足，并不断地吸取消化新的革命经验和新的科学成就，甚至还要尽力在错误的东西中发掘出合理的因素，加以批判地吸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富有无限的青春活力。马克思主义的谦虚绝不是一种伦理学的姿态，它有着坚定的原则性，它绝不为所谓谦虚放弃任何真理，容忍任何错误（包括自身所犯的个别错误）。否则谦虚就转化为虚伪。这番话还是在一九四八年讲的，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深刻的。

艾思奇的一生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教育的一生。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他讲：“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我的这一种兴趣上的偏好使我成为一个爱读死书的人”。但是，由于革命的需要，他还是致力于写象《大众哲学》这样的通俗读物，并且不厌其烦地多次认真修改。他以极端严肃负责的精神对待哲学的普及工作，为此，他还翻译编写大量教材。艾思奇同志刻苦钻研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开始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他写了一些哲学论文，“记录了自己当时思想上的变化过程”。在和我们这些后辈谈话时，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缺点和理论上的个别错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启发我们要勇于善于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指出这是学习理论掌握真理的可靠方法。

一九四八年，艾思奇同志来到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本是为了写一部有份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并且已经初步组成了一个助手班子。工作刚要开始，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在即将解放的全中国展开一个哲学普及教育运动，他毅然地中断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全力以赴地赶写《社会发展史》，为迎接全国解放后宣传教育工作做积极的准备。胜利来得之快，使我们来不及组织一支宣传队伍，这又迫使艾思奇同志不得不亲自宣讲，在电台、学校、机关、团体，到处奔波，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安定的生活，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他不仅要宣讲，而且还担任培养新一代哲学工作者的繁重任务。他编写了多本适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经验的教材。一九六一年出版了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一九六二年经过一次修订，至今还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教科书，仍被广泛采用着。由于这一个接一个沉重的任务，使他始终没有时间写出《中国近代思想史》这本专门著作，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同时也使人为他那种忠诚于哲学宣传教育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艾思奇同志一贯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他指出，首先得力求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以此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到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他坚决反对在没有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时，“就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主席对它的发展”，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他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不反对挑选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作例证通俗地说明问题，但他着重指出：“严格地说，这种方法还不能算是真正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对革命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际问

题进行分析，作出结论，提出指导工作和斗争的方针、计划、方法，以此推动工作和斗争取得胜利”。他的这些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艾思奇同志一生的事业和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后一辈哲学工作者的心里，不断地督促、鼓励我们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宣传教育工作，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原载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北京日报》）

# 深深怀念艾思奇同志

刘子正

艾思奇同志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战友。相处十五个春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至今件件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行战略反攻，全国胜利指日可待。这时，党中央为建设新中国和迅速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决定继续办好马列学院。由于多年忙于战争，没有机会系统学习理论，我为此向组织提出了到马列学院学习的要求，并且很快得到上级批准。经过十多天的跋涉，我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山东来到党中央所在地附近的河北省建屏县李家沟口村，成为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

不久，听说艾思奇同志要来任教，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是我们党内著名的哲学家，早在抗战期间，我还在鲁中太南地委工作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各级干部要学习哲学。在当年敌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哲学书籍是很难找到的。后来，我才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传阅得破烂不堪的石印本《大众哲学》，印刷和纸张也都很粗糙，但唯其难得，便在工作和战争的空隙里认真阅读。我背包里原来只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现在又装上了这本《大众哲学》。这两本书伴随着我度过硝烟弥漫的战斗岁月。

从前，我曾经听其他同志讲过一些哲学原理和抽象的名

词，总觉得那是一门艰深的学问。读过《大众哲学》以后，才知道哲学这东西并不是那么玄妙的，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讲的道理也都是从实际中高度概括出来的。障碍扫除了，学习哲学的信心增强了，特别是提高了我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浓厚兴趣。这是促使我向组织提出到马列学院学习的一个主要动因。

在两年多的学习生活里，艾思奇同志和学员相处是很融洽的。他主要给我们讲哲学课，大家都管他叫"艾教员"。这个称呼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我和他在杭州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们感到叫"艾教员"既亲切又顺口，如果叫"主任"、"副校长"倒觉着别扭。

艾思奇同志不愧为一位出色的教员。他的《社会发展史》是讲得很成功的。从"猴子变人"讲到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和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革，深入浅出，使人听得入迷。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着重阐述了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转过来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否则必然导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原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正是按照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前进的，如果有人硬要倒行逆施，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通过《社会发展史》课程的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提高了革命的觉悟，起到了转变世界观的作用。它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不仅仅是推翻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且要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建设好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达到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目的。艾思奇同志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帮助我把朴素的、直观的认识，上升为理论，从而牢固地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

坚强信念。

学习结业后，我被留在马列学院做组织工作。从此，我和艾思奇同志成为“同事”。开会、学习讨论常在一起，接触多了，逐渐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他做学问、办事情、待人接物都实实在在、诚实质朴。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特别是教学工作，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写讲稿，做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动手。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累了，就在凉台、湖边散散步，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又干，往往见他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从外表上看，他沉默寡言，似很严肃，但熟悉以后，就会发现他平易近人，对人热情。他平时很少串门闲聊，但他偶尔散步或路过我的宿舍门口时，也会进来转转，交谈交谈工作和见闻，聊聊身体和生活情况，完全不象那些高高在上、高傲孤僻的人。

刘少奇同志曾经提出对教学干部轮流下放农村、工厂锻炼培养的指示，主张教学干部既要读书、教书，又要到基层参加实践活动，以避免产生教条主义。艾思奇同志衷心拥护，坚决带头贯彻执行。在酝酿教学人员下放时，他主动提出“要到农村”。因他的身体不大好，我劝他不要去。他说：“还是要到农村去，否则容易脱离实际，再则进了大城市还是艰苦些好。”一九五八年九月下旬，他和罗扬实同志带领十多位教学干部下放河南。艾思奇同志还任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登封县委第二书记。象他这样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工作繁忙，仍然争取深入农村、深入实际，对其他同志无疑起了鼓励和促进作用。

一九五九年春节前夕，我随杨献珍同志到湖南看望下放干部，途经河南登封时，见到了艾思奇同志。我请他回校休息休息，他委婉地说，应该和大家同甘苦。他一直坚持到七月，才和同志们一起返回北京。见面时，他高兴地给我介绍了下放干部的表现，还直率地说到他实行“三同”的许多感受，他说：

“‘三同’的好处是易于联系群众、学习群众，可以了解到一些生产知识和群众的纯朴勤劳，从而增强群众观点。”他还说：“这样做，对于提高业务能力，提高教学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水平是有意义的。单靠长年坐书斋关门读书研究，不在一定时期去直接参加社会实践，吸收一些新鲜的感性知识，是不可能真正做好教学工作的。”当谈到写文章时，他坦率地说：“只有心里真正有话要说，文章写起来才顺手，才不会有一种硬凑文字的枯燥的感觉。因此，我肯定，下放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也是有帮助的。”下放河南结束后，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其中提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仍然可取，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使我想起艾思奇同志在下放期间写的一篇短文《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工作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讲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又是有穷有尽的，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他指出：“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指标”是错误的。在当时许多人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却能进行冷静的分析，这就说明艾思奇同志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底是很深的。他的文章对我认识当时的不正之风以新的启示。

艾思奇同志讲课和写文章，喜欢独立钻研、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五十年代，学校曾经请了一批外国专家讲课，有的同志说，他们才是马列主义的正宗，应该采用他们的讲稿讲授。艾思奇同志拒绝这样做，他说：照搬外国的东西是不足取的，并积极撰写自己的讲课稿，尽管当时已发现他有高血压心脏病，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写成的。他还建议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教员来代替外国专家。即使现在看来，他这个主张也是正确的。

六十年代初，中央高级党校第四期新疆民族干部班的工

作，由副校长艾思奇同志直接负责。当时，我也在这个班做具体工作。一切重大事情，我一般都要向他请示汇报。他听取汇报是很耐心的，从不喜欢打断别人讲话，必要时才插话，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多次叮嘱我们一定要把新疆班办好。他亲自给民族干部讲授哲学引言，帮助学员开拓探寻唯物辩证法的道路。他经常深入到学员中间，和学员谈心，交朋友，强调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好，都应当不分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谅互让，团结一致，共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他曾经对我说："如果要讲民族的话，吕振羽同志是苗族，翦伯赞同志是维吾尔族，白寿彝同志是回族，我家的祖先是蒙族，祖辈长期居住在云南边境，那我也算是蒙族。共产党人不能以民族不同划线，或人为地去制造隔阂，而应当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我及时地把艾思奇同志这番话转告给新疆班的学员。他们听了都很感动，对增强民族团结的思想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艾思奇同志对党是十分忠诚的，他的组织观念也很强。党的各种会议，只要没有校外的社会活动，他总是照例参加。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的一点负担，他一次就缴纳党费一万元，还格外嘱咐我不要去对外声张。

一九六四年，我在调往浙江工作之前，去向艾思奇同志辞行，我们谈了很多。临走时，他对我说："一起相处多年，现在你要走了，送你点什么作纪念呢？"我说不必了，过去你曾经送我一幅齐白石老人的真迹《山茶花》，足可作纪念了。这时，我见他墙上挂着自己书写的"实事求是"条幅和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龟虽寿》手迹。我把话题转到这里，他说，"实事求是"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原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论是做教学工作还是实际工作，都必须认真贯彻这个最

根本的原则。后来，我问艾思奇同志，听人说毛主席曾经称赞过《龟虽寿》这首诗，但对其中一些句子我还不完全理解。他细心地给我解释说：曹操这首著名的诗篇，抒发了他自己的抱负，其中有封建主义的糟粕，但又包含着健康、有意义的内容。特别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写得很有气魄，富于哲理。“老骥”指的是一匹好的老马，比喻他自己，老马虽伏在马棚里，但不失远大志向；“烈士”指的是有雄心壮志的人。总的意思是人到晚年也应当雄心勃勃，不能停息。封建社会的曹孟德到了晚年尚且精神振奋，壮志不衰，何况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者。我们说得高兴，最后我要求他把这两件手迹送我作纪念。他欣然应允。我把它们视为珍品保存着。在十年动乱中，造反派们在抄我的家时，说这是宣传封、资、修，把它劫走了。幸好，“四人帮”垮台后，当清理归还物品时，艾思奇同志送的这两件纪念品竟完好无损。睹物思人，我心里稍感宽慰。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九六五年冬天在杭州。那时，看上去他的身体还很健康，精神焕发。不料三个月后，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不幸逝世的消息，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表示我对这位党的忠诚的哲学家、我的老师和战友艾思奇同志的深切怀念，现在仅以这篇浅薄的短文，了却我多年积下的心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杭州西湖畔

# 艾思奇同志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

艾 力 农

一九四八年，党中央为提高党的干部理论水平以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急剧发展需要，决定恢复马列学院，我很荣幸地被组织上送到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艾思奇同志便是我们的专职教员，“艾教员”的名称便从此开始，一直是学员们对他的尊敬的称呼。他当时已是全党驰名的理论家了，记得当时有两篇他的文章是为解放区广大干部所熟读的，即：《反对经验主义》和《〈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我也是认真学习过的，但是没有直接听过他的课。入学以后，有关哲学方面的课都是他讲，有社会发展史、联共党史第四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艾思奇同志讲课是朴实的，不讲求声色，但非常注意联系实际，剖析具体问题细致入理，逻辑性强，每次都能给人一些新意，发人深思。他也注意启发式教学，让学员先解答一些问题，再给讲解，记得一次让每个小组先写一篇解答，给他送去，我分得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危机，东拚西凑答得非常肤浅，送到他住处请教，他很耐心地给谈了半天，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接近，印象是平易近人。

艾思奇同志初次给人的印象是十分严谨的，是一种不苟言笑的哲学家风度，但与他熟悉以后，他还是十分热情而幽默的，同时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力。当时马列学院一班学员很少，有“一百单八将”之称，所以师生之间关系十分融洽。课堂俱乐部

都在一个小四合院内，是块方砖地，对那个不到百户的小村庄来说是个上等房子了，大家听课没有桌子，只坐在木凳上用膝盖垫着记笔记。周末经常开晚会或草鞋舞会，偶尔也跳一下华尔兹。师生都出节目，艾思奇同志也不例外，他说过一个用五线谱音阶来代替语言的方言笑话，引起哄堂大笑。后来进到刚解放的北京，马列学院驻地在香山慈幼院，大家都搭地铺，每班一个大宿舍，艾教员的小宿舍就挨着我们。一个星期天，我听见隔壁传来进行曲的旋律，探头去看，原来是艾教员在唱。我有些意外，这种情况在他是很少见的，或许是情不自禁吧！其实，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对中西方音乐都有很高欣赏力。他喜欢贝多芬交响乐和意大利歌剧中的选曲，他也爱谈京剧，他称赞谭鑫培、杨小楼是真正的好演员，有精堪的艺术造诣，他常用梅兰芳晚年从博返约，只演几个戏，而且每次都能有所发展来说明哲学上的一些问题。他对吴昌硕、齐白石的画也有浓厚的兴趣。艾思奇同志是个知识很渊博的人，然而又是一个很不愿意夸夸其谈的人。

进北京以后，艾思奇同志的理论活动多了起来，讲课、写文章都很忙碌，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直是他所遵循的，并且越来越臻入更高的境界。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工作者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要处理得好并不容易，往往有时在上边办公室或学校里就只是钻理论，而下到工厂农村时却又只顾埋头实际或从事体力劳动，不善于把实际很好融合在理论中，有人管它叫做“两张皮”现象。但是艾思奇同志是解决得比较好的，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提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上去写文章做分析。一九五八年我们随他下放到河南去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刊登于《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四期，这是一篇很好的分析实际问题的理论文

章，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曾经讲过写文章时的思想活动。那时，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浮夸风已经开始了，下放干部也有所觉察，但是正值群众运动高涨的时刻，说的不恰当很容易形成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如果默然不吭，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于心不安的，同样是一种精神负担。艾思奇同志对这样一种矛盾处理得比较好，他站在向前看的立场采取积极态度写了这篇文章，既保护了群众的积极热情，又提出了应该防止片面性，走到形而上学的思想道路上去。问题提得是十分辩证的，因此这篇文章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现在看来，也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文章首先就指出"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之后，又用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例子充分作了论证。作者在文章中，大量笔墨肯定人民群众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这也是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实了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中国人民在掌握政权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地主阶级，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了资产阶级，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艾思奇同志是充满着革命信心来观察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他又明确指出："必须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防止片面性的建议，都是

合理的，因为它合乎辩证法的观点，它是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全面注意的问题。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艾思奇同志的理论联系实际著作之一，当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再要求他能有什么更深更远的看法也是不可能的。

我还记得，在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河南下放便告结束，我们就随艾思奇同志去登西岳华山了。在旅行中，艾思奇同志手头总有几本书在看，他也常说，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脑子里不经常挂着几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去思索，那是不行的。他是当时年纪最大的一位同志，但爬山的劲头也确实令人钦佩。他一直登上了华山西峰顶端，去过华山的同志当然都知道那是很艰巨的，有的同志说出劝阻的话来，也常引起他的不愉快。记得华山上面有一句谚语："过了千尺幢，又是一重天"，说明华山上面气候多变，我重复说了，他听了后，开玩笑地说："你要怕冷不敢去，就裹着棉被上去好了。"看来，他对登山还是十分认真的。不过说他是个严师有时倒也不乏幽默，也会给你轻松一下，记得就在登上"千尺幢"后，稍作休息，他给我拍了一个小照，并且对我说你以后可以配一副上边带黑横边的眼镜框，这样就会使你面庞的下端显得削尖一点，会好看一些，说得我和周围的同志都开心地笑了。

艾思奇同志的强调实事求是学风也表现在他对哲学史的研究上面。他常年讲课，主要精力是花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哲学史的讲稿和文章留下不多，不过他对中国哲学史也很有研究，他读过大量古书，掌握有不少资料，有不少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一九五一年他曾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实践论和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是一篇有影响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史方法论是贯串实事求是精神的，对我们现在研究哲学史也有着很大的参考意义。

艾思奇同志首先强调了哲学史的党派性问题，他说“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党派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集中地表现了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愈益前进的科学认识和愚昧无知的斗争，表现了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行动中愈益提高的自觉性与盲目性的斗争。”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标准，而对离开这一标准的说法都加以驳斥，他说“我认为，不论就哲学一般来说，或单就认识论来说，这个根本的标准，就是恩格斯早已指出过的：如何看待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

艾思奇同志突出强调哲学的党性问题，这是与当时刚解放不久，在哲学界这个领域内还存在着大量的斗争有关，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性观点还是比较重，这也是“有的放矢”的。

但，与此同时他还再三叮咛，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种种哲学学说要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不能一笔抹杀，他说“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学说都仅仅是错误，而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是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与一切过去哲学的根本区别，我们强调唯有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但决不能因此就对于过去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也是针对当时学术界已有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的苗头而提出的。艾思奇同志有见于此，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学风。遗憾的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坏作风随着以后极左思潮的出现，在哲学史界也大大泛滥了起来，以致发展到庸俗化、简单化，乱贴标签，对古代哲学不加具体分析而采取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严重现象，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时代，哲学史成了重灾区。这些坏作风，艾思奇同志是早已反对了的。

艾思奇同志还强调哲学的发展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都

是分不开的。他认为"研究哲学史一定要联系到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与阶级斗争实践。或者说，一定要注意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一九五九年他在党校讲哲学史时曾用大量篇幅介绍唯物论、辩证法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历史，今天看来，这还是哲学史研究中重要的课题。

理论联系实际很重要的一环是理论工作者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其中主要的方法是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与他们相结合。艾思奇同志一直在这方面下着很大的功夫，在对敌斗争中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在与工农结合上他又是谦逊的学生。我们知道，他是以写《大众哲学》而为世人周知的，那时他仅有二十三岁，但已在向广大群众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多次参加农村的群众政治运动，在这些炽热的时刻，他既向工农群众作着马克思主义普及宣传工作，又锻炼着自己。一九五八年他在天津，仍然向广大工人做过不少次演讲，并曾总结过工人学哲学的经验，随后下放河南，他足迹所到之处，无论是开封、郑州或是登封、禹县都向广大基层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直到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他临去世前一、两个月，还在北京郊区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经常在公社、大队讲课。我们管他叫"艾教员"，实际上他真的当了一辈子的马列主义哲学教员，有人说"将军应该死在战场上，教员应该死在讲坛上"，艾思奇同志可以说是为教马列主义的书呕尽了心血。讲课在不少人看来是个平凡的事情，但在他看来是个多么庄严的政治任务，即使在他晚年，虽然担负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但课堂活动迄未放松过，我们应该敬佩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艾思奇同志确实是为公而忘我地工作了一生，我常常在想，他的去世是中道崩阻，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平常不大注意自己的身体，以致他的心脏病发作，是阜外医院大夫从心电图上了解

到危险而从会场上把他劝进医院的，但是已经晚了，如果提前疗养可能会延续寿岁的。

艾思奇同志虽然一生都听取毛主席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已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每个同志都有自己的和客观的条件的限制，这种联系总不会是完美无缺，这在艾思奇同志身上也不例外。可是不公平的是，在陈伯达和康生控制理论界时刻，他们造成了一种舆论，长期污蔑艾思奇同志似乎是个教条主义者。陈伯达讽刺他“一直停留在小册子水平上”，康生骂他是个“书痴”，加以关锋等人帮腔，艾思奇同志长期受到一定的压抑，停版他的《大众哲学》，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常年不约他写稿。这与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完全成了相反的对比。毛主席在延安时就看过他的书，给他写信肯定他的写作。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春中央党校学员在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照像，毛主席在人群之中特意寻找艾思奇同志，当领袖和哲学家握手时，全场热烈鼓掌，激动场面历历在目。两相对比，艾思奇同志为什么人所厌恶，泾渭清浊自然分明了。在今天贯彻中央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时刻，拨乱反正，恢复毛泽东思想原来面目，一切正义将得到伸张，一切邪恶将要被打倒抛弃，艾思奇同志九泉有知，亦当有很大安慰了！

# 艾思奇同志在安徽宿县

孟亦奇

淮海大战的硝烟刚刚在上空飘散，皖北平原到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历来又受着天灾人祸，水、旱、黄（蝗虫）、汤（恩伯）① 的遭害。农民苦不堪言，生活十分贫困，世世代代备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他们需要休养生息，他们日夜渴望和平与土地。解放不久，华东局和安徽省委迅速作出决定，要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到次年春耕之前完成宿县地区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央派出的土改工作团也来到宿县，团长就是艾思奇同志。艾思奇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哲学家，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我们这个工作团，是由中央派出的干部和本地干部组成的，负责宿县栏杆区几个乡的土改工作。因为任务紧迫，工作团的大多数人员已由一位副团长率领，提前进入目的地。当时，艾思奇同志刚刚结束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讲课，第二天便风尘扑扑赶到宿县地委机关。我们希望他在这里住一宿，休息一下再到乡下去，但是，艾思奇同志考虑到工作团是由许多单位的人员临时组成的，而且大多数同志初次到农村，很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或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他马不停蹄竟不顾旅途劳顿，要求我们下午就起程前往栏杆区。他的这种对

①汤恩伯解放前是国民党战区司令官。

工作的热情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当时是地委的成员。组织上商定由我陪同艾思奇同志工作。出发的时候，我们一起乘坐在一辆淮海战役中缴获美国的破旧军用小吉普上。地委机关就这一辆车子，再没有更好的交通工具照顾北京来的客人，只好让他坐在驾驶员旁边，我们几个人挤坐在后排。我们对艾思奇同志早就怀有敬慕之情，一九三八年初，我在一个抗日救亡团体里，有幸得到一本《大众哲学》，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通俗读物的兴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走上革命道路也从中受到启发。面对这位令人钦佩的启蒙者，我的心情是激动的。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形象、举止和言谈。他身材中等，宽宽的前额，透过近视镜片可以看到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那么深邃；身上穿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制服。一路上他总是注视着道路两旁的村庄和原野，有时也偶尔问到淮海战役的一些情况，问到宿县的工作和栏杆区群众的生活，还问到车上几位同志的工作和年龄等情况。他说话是那样随和、亲切，态度又是那么诚恳，一下子缩短了我们和这位哲学家的距离。随之，我们就在车上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们他今年四十一岁了。我说，您二十三岁就写出《大众哲学》了？他没有作声，只是微微一笑。我又说，您那本书影响可大了，使很多青年受到启发，走上革命道路。他谦虚而认真地说，那时自己的哲学水平也有限，何况又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写的，有些观点不可能阐述得很清楚，有些例子也不一定恰当，因此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只是因为处于那个时代，才可能产生一些作用。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由此可以看出艾思奇同志实事求是、谦虚的品格。

从宿县到栏杆区的解集，路程九十里，中间还要翻越一堵小山岗。所经过的道路全是牛车土路，走起来尘土飞扬，颠簸不堪，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在黄昏时候到达解集（云台村）。

下车以后几乎成了泥人，每个人的身上脸上都扑满尘土。当时没有找到脸盆和水，艾思奇同志和大家一样，用双掌抹拉抹拉脸，也就算了，一点也看不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大知识分子的模样。

我们住在一家军属的三间房子里，房子很破旧，还有弹洞。艾思奇同志和几位知识分子、专家住西屋，我住东屋，中间是留作开会用的。解放初期，农村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土改工作团进驻前后，很多群众还不了解党的政策，一些地主、流氓、地痞乘机造谣惑众，一度引起思想混乱。栏杆区接连发生几起自杀事件。经过调查，自杀的人没有一个是地主分子，有的是雇农，有的只是替地主疏散了浮财，有的仅仅为地主收过租或办过事，有的是当过汪精卫的兵或国民党的兵。这种情况引起工作团的高度重视，同志们都有点紧张。艾思奇同志却很冷静，他详细地阅看和分析了调查材料之后，和我商量，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不扭转，势必会搅乱农村的阶级阵线，妨碍土改的顺利进行。于是，及时地召开了土改干部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反复学习“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找到了发生自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敌人的捣乱破坏，更主要的是群众还不懂得党的土改政策。为了迅速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工作团拟定了很有针对性的宣传提纲，报告地委批准以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广泛宣传，及时揭露和打击地主分子的谣言和破坏活动。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地主阶级被孤立起来，为栏杆区的土改铺平了道路。艾思奇同志说，这就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党的方针政策不和群众见面，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宿县地委把栏杆区工作团的宣传提纲和工作经验，电话转告各县，对全区的土改运动

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在几个月的相处中，我发现艾思奇同志是非常好学的。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刚出版不久，他每天都要抽空看上几页。晚上，经常在昏黄的油灯下仔细阅读，有时晚上开会太晚了，第二天早上一定要补读，从不间歇。他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零星时间，外出开会，他也要把"毛选"及土改文件随身带上，利用人未到齐之前的空隙阅读，可谓惜时如金，手不释卷。他的读书方法也很特别，看过几页之后，往往又翻回头再看，象是在凝神思索。我问他为什么老是翻回来重看。他说，读书一定要思考，读到后面就要联系到前面是怎么讲的，这样才能够把问题弄通搞透。他还说，对于毛主席的著作，读一遍不行，反复读才能理解清楚。我在他的启发下受益不小。

艾思奇同志平常话不多，但他对同志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很突出的。当他发现自己的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时候，总是那样轻声慢语，推心置腹地和你恳切交谈，以理服人。他完全不是那种摆起理论家的架子，以势压人或揪住不放的人，因此大家都感到艾思奇同志平易近人，很好相处。有一位林学专家看到解集一带很穷，没有大瓦房，便认为这里不会有地主，还说，只要把所有的荒山秃岭栽上树，就可以都富裕起来。其实，他还不了解农村的状况，更不知道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旧中国根本无权耕种土地的痛苦。艾思奇同志没有责备他的这种认识，而是劝他多多参加诉苦会，听听贫苦农民的呼声。为此，艾思奇同志还特别提出，所有的工作团成员都要自觉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斗争会、诉苦会，然后分组进行讨论。这种办法教育了很多人，从而转变了一些人的糊涂认识，激发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参加土改的积极性。

艾思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细致的，每次组织农民诉苦，

他都参加，常常和同志们到农民家中访贫问苦，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他对工作团的每个成员都很关心，尤其一些老知识分子，不仅年龄大也从未到过农村，记得有位统计学家，在那里生了病，受到艾思奇同志仔细周到的照料，这种真挚的热情使老教授深受感动，待土改结束，他俩竟成莫逆之交。据老教授告诉我，艾思奇离开北京时，小儿子还出生不久，孩子未满月发现有漏管，爱人在月子里就要带小孩进城看病，两个大孩子还没上小学，困难可以想见，但艾思奇从不提个人的困难，更未因家事挂心而影响工作。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他乐于和下边的干部同甘共苦。当时，集市上可以买到各种生的熟的肉类，他从未去买过，始终坚持和同志们吃大灶。在参加土改的几个月时间里，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曾多次劝他到宿县去洗洗澡，改善一下生活，他都没去过一趟。在他的带领下，同志们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出色地完成了栏杆区的土改任务。

短短的几个月，我受到艾思奇同志很多的教育和帮助，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我因此常常思念他。一九五五年夏天，我有幸入中央党校学习，他是我的老师。结业时，我特地到他的寓所拜访辞行。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今后一定抽时间到栏杆区那个地方看看。"我高兴地表示一定再陪他去那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可是，他过早地离开人世，同往栏杆区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每念及此，我就感到万分遗憾。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合肥

# 和艾思奇同志一起参加土改

王仲武① 遗作

早在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就读过艾思奇同志著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书。我感到他是一个脚踏实地、讲究实际的学者。我对哲学本是外行，但读了后很受启发，很有教益。我在二十年代写的《统计学原理及应用》，思奇同志约在一九三三年见到此书，并曾谈论过它，因此，我们也算是有很深的文字之交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我参加土改工作团，和艾思奇同志等一起去安徽省参加土改工作。行前，我们在北京进行了集训。当我第一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本人时，他笑着说："哦！你就是王仲武同志呀！"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缺少对土改运动的实践经验，心情是十分紧张的，因此更加认真地学习当时发下来的有关文件。艾思奇同志说，他在老区曾参加过土改，第一次到农村做实际工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经常鼓励我，说我学习得不错。

我们参加土改的地方，是在安徽的宿县，那里曾是淮海战役的战场，土质贫瘠，连续七年灾荒，再加上久经战乱，解放初期，人民生活还十分穷困。我们每天吃点胡萝卜的须和根烧的汤，没有其他的菜吃。当时，卫生条件也差，汤里常有苍蝇，

①王仲武同志，江苏人，一九八〇年五月逝世，时年八十三岁。解放前，曾任上海交大等校教授、统计学会会长；解放后历任铁道部专员、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教授等，为民革成员。专长统计学，著有《统计学原理及应用》等书。

同志们常常闹病。艾思奇同志身体原来就不大好，经常泻肚，有时便血，但他毫不在意，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生活十分俭朴，土改五个月，从未到集市为自己买过任何一点东西。后来，我还听说，我们离开北京赴安徽时，他爱人刚住院分娩，满月后又因孩子有病住院，家中无人照料，他虽有时牵挂着，但从未听他说过困难，更没有因此影响工作。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工作，真是一片赤诚。

土改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坚持勤奋地学习。除每天研究和处理工作外，他稍有空闲，就拿起书看。我们常常谈论“哲学”，联系土改中的具体问题，提高到哲学观点上来分析来解决，对我的启发很大。他学习的特点，是处处联系实际，而且能够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说出的话总是言之有物。他是一位出色的马列主义宣传员。土改工作到一定阶段就要做小结，在会上，总团领导要大家发言，我们总是推举艾思奇同志。他讲得很好，深入浅出地举出许多实例，他每次讲话，都是从实际开始，最后的结论又联系到实际。除我们工作团之外，当地的农民代表和地方干部也来参加，大家的反映都很好。在谈到学习问题时，他总是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我问他应该怎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他谦虚地说：“我没有王老的聪明才智，我是每学到一点，就联系自己的实际问题，反复地思考，反复地学习，反复地实践，最后‘悟’到一点体会。”

正是由于他联系实际刻苦地学习，在土改中，处处表现出他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政策水平。当地某村有个地主，强奸过不少妇女，有一家三代七个妇女，都被他奸污了，还有血债。思奇和我亲自到农民家里作了详细的调查，事实确凿，民愤极大，经过研究考虑，最后决定开公审大会，在群众要求和当地政法部门主持下，镇压了这个坏蛋，大

快人心，增强了群众的斗志。当时，各团在划分阶级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够准确的现象，思奇就和我们把有关材料反复进行研究，认真核实，每天工作到半夜。他对工作十分负责，有时碰到一些较大的问题，他总是找许多人讨论研究，再将情况反映到当地党委、华中局甚至党中央，提出我们的意见和方案，请上级做出决定，在处理这些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时，他从不意气用事，而是力求按照党的政策办。

思奇同志表面看来是个冷静沉着的人，但他对同志却充满了热情。我是个旧知识分子，和他住在一起，有机会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我们住的房子很破旧，墙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炮弹洞，窗户敞着，门也残缺不全。我们用稻草把窗口和弹洞堵严实，但时值寒冬腊月，淮北的气候多变，天是够冷的，屋外经常刮着北风，飘着大雪。思奇同志让我睡在屋角避风的地方，他自己则睡在进门处。寒风常从门口的破洞里一阵阵地钻了进来，他也满不在乎，真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呀！晚上，他督促我早睡，怕我累倒，而他自己却常常工作到深夜。当时，我们下去的土改团员里，只有思奇同志带了一只洗脸盆，大家都来借着用。个别同志很不自觉，脚上长了癣，还用脸盆洗脚。我实在看不过去，便对思奇同志说："你要把盆子好好洗干净再用，传染上皮肤病怎么办？"他却毫不在意，照样用来洗脸，照样让大家随便使用。……所有这些，都使我这个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深受教育。使我感受更深的，是他对我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我稍做一点好事，他就很高兴的给予肯定，并且不断地鼓励我。我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也很尊重，总是认真地研究，积极支持我的正确意见，使我在紧张的土改运动中，情绪一直很饱满。后来，我得了脊椎炎，病势来得较猛，行动不便，组织上要送我回北京治疗。我感到参加土改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对我的思想改

造十分必要，说什么也不愿意走。思奇同志一方面关心我的健康，劝我回北京治病，但他又比别人更能理解我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心情，十分珍惜我的这番政治热情，因此并不勉强我离开这火热的土改斗争，而是让我自己来选择。当我最后决定不离开时，他又积极想方设法为我找药治病。正是在思奇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关怀下，我才鼓起更大的勇气，坚持搞了两期土改，身体也没有垮下来，完成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思奇同志对同志十分诚恳。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对我提意见说："王老办事的能力很强，我们都很钦佩，但有时下结论过快，碰到问题，最好多思考一下，迟些下结论。"我是多年在大学里当教授的，过去很少听到有人这样直率地当面批评我。而且，他的行动也感动我，他自己就是这样，在许多会上，总是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等大家把话讲完了，最后才简要地说上一两句话，经过全面观察、分析、思考后才下结论。他对我的忠告，使我终身难忘，以后，我遇事也就学着不急于下结论了。有一次，开会研究处理一个坏分子的问题，事前我和他个别交换了看法，但会上我一直未发言。思奇同志问我为什么不表态？我说还是迟一点再下结论吧。思奇同志笑笑鼓励我说："现在是讨论问题，可以把你的想法讲一讲。"

艾思奇同志十分谦虚好学，经常与我研究中国的书法，也向我了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以丰富他对哲学的研究。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本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说法，但他作为一个党的老干部，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却一点架子也没有。在宿县参加土改斗争结束后，我们就成为真正的深交好友了。

在我七十高龄之际，忽传来他去世的噩耗，不禁痛哭失声，老泪纵横，久久难以平静。当全国人民正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我想思奇同志如果有灵，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 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

汪子嵩　黄丹森　张友仁

早在三十年代，差不多每个追求进步的青年人，都熟悉“艾思奇”这个名字。他写的《大众哲学》，从一九三四年以《哲学讲话》为题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以来，一直为人们爱读。许多年轻人都是从这本书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们都没有赶上“一二·九”时期北京的学生运动。但在解放以后，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库的顶层上，却发现了一大堆旧书，这是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北大学生匆忙离开北京时留下的。这些书籍原留在北大的西斋和三院等学生宿舍中，后来集中到图书馆里，上面盖有说明书的来源和时间的戳记，其中就有不少本《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同志的其它著作以及《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这些纸张早已变得灰黄的书籍，居然经历了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散失，不能不说是奇迹。现在还可以看到读书人在书上作的记号和批语，使人想到这些书在当时学生运动中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经历了从中学到大学，从对革命无知到向往，终于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这些在学校里的年轻人，大都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因而想从书本中去寻求真理的。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控制还不严，进步的书籍还能从公开的新知书店买到。《大众哲

学》因为它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写得比较生动，容易为青年人读懂，就成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什么"矛盾统一"、"量变质变"等哲学术语，最初都是从这本书上学来的。后来国民党控制严了，这些书已经不能公开阅读，就在同学间偷偷流传。在秘密的读书小组里，我们讨论哲学问题，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四十年代，我们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在蒋介石统治区的大学中，联大的进步力量比较强，在学生运动中很多次起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运动。学校里经常响应当时党的号召，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贪污腐化，宣传民主自由。学生中公开和秘密的社团不少，最普遍的还是读书会。我们读的艾思奇同志的著作，除了《大众哲学》之外，记得还有他和吴黎平同志合作编写的《科学历史观教程》以及他翻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不但我们学生读这些书，一些进步教授也在读这些书。闻一多教授拍案而起时，曾经认真地阅读《大众哲学》和英文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一九四一年，有一次他的助教何善周同志看到这位古典文学教授居然那么认真地在阅读《大众哲学》，感到奇怪地问道："闻先生，你看这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先生却严肃地回答说："入门书！？在这方面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一身重病，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教授，在解放战争时期向他的孩子借来《大众哲学》认真地阅读。当时有一位同学对他说："朱先生！你可以看看更深一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他却坚定地回答道："我自己过去对这方面了解很不够，要从头学起，要从初步的东西学起。"

北平解放以后，艾思奇同志不仅以他的著作而且以他的谈

话、报告，行动和北京大学直接发生了联系。

当时艾思奇同志是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工作，是有名的“艾教员”。北京解放以后，好象他没有担任什么行政工作，但以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身份和原来北京的文化界人士联系。记得艾思奇、胡绳等同志和北大、清华哲学系的教授汤用彤、金岳霖、郑昕、贺麟、朱光潜、冯友兰、胡世华、任继愈、张岱年等常在一起座谈讨论。这些教授过去大多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政治上虽然表示“服了共产党”，在哲学思想上却还处在将信将疑之际。座谈时大都由艾思奇等同志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一些问题，有时也请这些教授介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逻辑学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提出问题，相互讨论，态度完全是平等的。大家交谈、讨论时感情十分融洽。艾思奇同志没有以改造者自居，而那些旧大学的教授们却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艾思奇同志总是带着他那浓厚的云南乡音，有条有理地发表他自己的见解。有些教授说：“没有想到艾思奇他们对旧哲学也是很有见识的”。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些教授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郑昕教授就将他原来开的“康德哲学”课程停下来，和学生们一起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座谈会对于这些教授的思想转变，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艾思奇同志就来北大指导政治理论学习了。当年暑假以后，各大学开始开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第一学期开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主要是讲社会发展史，第二学期开的是“新民主主义论”，讲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结合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党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同一学年，文法学院还加开了全学年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时的政治课程不是采取后来从苏联

搬来的系统讲授、向学生灌输的办法，而是采用我们解放区一贯行之有效的学习办法，以学生自学和讨论为主，教师则在开始时作点启发报告，在学生自学和讨论后再解答问题。北大建立了以许德珩教授为主任的政治课教学委员会，由文法学院一些教授和我们这些党员助教共同担任各大班的政治课教学工作。但是，无论是教授或是我们这些党员助教，过去都没有系统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怎么解答得了呢？只好从校外请指导了。当时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政治课教师有时集合在一起听辅导报告，艾思奇同志常常是主讲人。北大是当时最大的学校之一，有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容易有机会请艾思奇等同志亲自到学校来作辅导。有时候就由他在北大民主广场作统一的辅导报告。艾思奇同志和北大还有点个人情谊，他的父亲李曰垓在光绪年间是旧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第一届的优等生，在校参加了同盟会的活动，他的大儿子后来也是北大毕业生。当时的政治课教学委员会决定请艾思奇同志来北大兼任教职，可是那时的北大按旧规定请校外人来兼课只能发"兼任讲师"的聘书。请艾思奇同志来兼课，只能当个"讲师"，大家都不同意，后来就决定聘请他当哲学系的专任教授。既然当了专任教授，就要发工资，而艾思奇同志当时是按照解放区的办法，享受供给制的待遇。第一次给艾思奇同志送工资时，他就坚决不拿，可是钱已经由教育部领来了，他后来将这笔钱送给了北大生活比较困难的工友同志，从第二个月以后，按照他的意见，北大就不再向教育部领他的工资了。

由于艾思奇同志等常来学校辅导，我们就有机会向他提出问题，一起讨论。这使其他兄弟院校的同志十分羡慕，也纷纷提出要求。从一九五〇年春天起，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安排艾思奇同志定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作内部广播，讲授重点讲题或

集中解答问题，由各校师生从收音机收听。这可能是解放后最早进行的电化教学，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

艾思奇同志做辅导工作，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和蔼可亲，以理服人，不故作艰深，不乱扣帽子，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又能做到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吸取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记得有这样一个例子：他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总是指定大家阅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在讨论中，地质系研究古生物的教授们提出了意见，他们说：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说人类是从“类人猿”演化来的，这是以当时达尔文等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的，它不能不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条件的限制。实际上，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认为，人类并不是从类人猿演化来的，而是从古猿演化来的。古猿既演化为人，又演化为类人猿。所以，古猿是人和类人猿共同的祖先；类人猿和人并不是直系的血统关系，类人猿是绝对不会演化成为人的。听到这种意见以后，当时有个别同志曾认为这是违反经典著作的错误观点，是某些教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甚至主张加以批判。可是，艾思奇同志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不但不认为这是错误，而且十分虚心地尊重和接受了这些古生物学家们的意见。以后，艾思奇同志在讲到从猿到人的发展时，就不讲从类人猿演化为人，而是讲从古猿演化为人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我们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不变的教条，而是要尊重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也博得许多自然科学方面教授的好评。他们说：“共产党的理论家真是实事求是。”艾思奇同志经常讲，我们讲课、做文章，既要持之有故，又要言之成理，还要行之有效。几句话就深入浅出地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实践性，给人以深刻的经久不忘的印象。

一九五二年秋，全国大专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教育部将全国在解放前设有哲学系的北大、清华、燕京、南大、南开、武大、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哲学系教师都集中到北大哲学系，当时给哲学系的任务，除了招收少量学生外，主要是教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解放前著名的几十位教授集中起来，组织他们的学习，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当时系里只有几个年轻的党员助教，我们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在当时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领导下，我们主要靠中央宣传部胡绳、于光远等同志的关怀，他们给我们出了不少主意，而在业务学习上，他们推荐艾思奇同志主要负责。艾思奇同志自己到哲学系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课程，全系教师和学生一起听课，听讲后又分别进行讨论。艾思奇同志作的解答报告，有时就吸收全校各系教师都去听讲。可以说，北大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课程的系统讲授是由艾思奇同志开创的。

记得当时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大家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艾思奇同志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作解答报告时强调指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总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出现伟大的革命领袖，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位领袖是谁？他的贡献大小，则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艾思奇同志的讲法是和恩格斯的许多著名论点一致的，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而为大家所信服。谁又会想到，不久以后，艾思奇同志竟会因此而遭受批判呢！

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艾思奇同志在北大哲学系讲了一年课，下一年，我们请他再来讲，他却推托工作忙，不愿意再来了。此中原因，现在我们才了解了一点。虽然艾思奇同志当时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在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的对胡适唯心

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以后的其它运动中，艾思奇同志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不象有些同志那样，不作调查研究，扣大帽子，夸夸其谈，艾思奇同志总是认真地查阅许多材料，（他还通过我们向北大图书馆借阅一些必需的书籍）。对于批判，他总是采取有分析、讲道理的态度。因此，他的批判意见，即使在当时一些还坚持唯心论的教授中，也往往是能被接受的；对这些教授的思想转变，能真正起到促进的作用。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他那朴素的、谦虚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我们拉杂地记下这几件小事，以表示对于启蒙过我们的这位导师的悼念。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 怀念尊敬的老师和战友

陈仲平

我获悉艾思奇同志去世的消息时，正落难山西。我过去只知道他身体不错，除有时血压偏高外，并无其他病情。何况他平素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冬滑冰，夏游泳，有多种体育爱好。我总以为他是可以长寿的，万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早逝。因此，噩耗传来，我十分惊异。我悲痛中寻出身边仅存的一张我和他以及教研室同志同外国专家的合影，又将报纸讣告上的遗像剪下来，珍重地贴在相册上。面对他和善的面容和那深邃的闪烁着智慧的眼神，历历往事齐上心头。哀思化作千重浪，涌向京城祭忠魂。

艾思奇同志是我尊敬的老师和战友。他只比我年长二、三岁，年虽相仿，在学术上却是我的前辈，可以说是我理论上的启蒙老师。说起这段机缘，还要回溯到三十年代初期。

一九二九年，我的家乡福建武平县爆发了农民运动。一九三〇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秋天，组织把我派往广东梅县东部地区学习和工作。当时，我以学生的身份进了松源中学，从事一些学生活动。毕业后，我又奉命继续留在那里，以教书为生活手段和职业掩护。这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侨乡梅县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极为不满，这是开展工作的极好机会。同时，梅县地区的文化水平普遍很高，这也为传播革命理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我从组织读书会入手。读书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普及性的，也有比较高的带研究性质的。读书会的成员千方百计订阅、购买进步刊物和书籍。我们较早看到的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底，我们订到了《读书生活》杂志。这本刊物以通俗和切中时弊著称，鲁迅先生曾说："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读书生活》延续出了三年多，使我们得到许多益处。因为，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大都深奥难懂，而翻译著作就更费解。这时，艾思奇出现了。他的《哲学讲话》（《大众哲学》前身）多么新鲜，多么吸引人。我们很想读而又很难读的哲学，在他的笔下变得那么形象生动，那么通俗易懂，那么引人入胜。我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理论还一无所知，只知道共产党好，是为穷人的。通过理论学习，我才逐渐知道一些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道理。我仿佛视野宽广了，心胸也开阔了。多少人受了《大众哲学》的影响，萌发着革命思想，初步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一位潮汕的同志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个青年，因家境贫寒，失学失业，加之国势危殆，陷入终日彷徨苦闷的境地，产生了想以自杀了此一生的念头。后来，他读到了《大众哲学》这本书，打开了眼界，终于使他的悲观绝望情绪一扫而光，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斗争，在理论界也有尖锐的反映。叛徒叶青等办过一家哲学杂志叫《二十世纪》，里面尽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词句，虽神秘莫测，晦涩难懂，我们读书会里也有许多人不厌其烦地去读它，很多人还误认为它是一本进步刊物。后来，我们读到艾思奇同志批判叶青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叶青是一个伪马

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理论骗子。艾思奇同志就是这样，以笔为武器，向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展开无情的批判，把真理的种子播进革命青年的心田里。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在理论战线上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是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拓荒者。劳动人民和青年学生喜爱通俗化的哲学，是因为他们易于从中汲取到有用的东西，把它当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从而增添了走向革命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艾思奇同志说他的这种写法不过是一种尝试。这是一个具有多么重大意义的成功的尝试！即使到了今天，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仍然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去探索，去实践，去写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需要的新的大众哲学。

从那以后，艾思奇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便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哲学家的脉搏和劳动群众、青年学生的脉搏一起跳动。当时，我对他产生了仰慕之心，常常想，如果有一天能见到他，得到他的指导，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时代的车轮在飞快地转动，全国解放了。一九五一年，我在福建龙岩专署工作。是年八月，省委张鼎丞同志决定，派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志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不久，我们就来到北京。在这所党的最高学府里，聚集着许多有名望的理论家。想不到十多年前的愿望，如今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于是，我做了艾思奇等同志的学生，开始了三年的学员生活。

艾教员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这并不单是因为我原先就有的崇慕心情，他给我们讲过许多课。他讲课从不以声情取胜，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但更主要的，是他有敏锐的思想，严密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听他的课，并不使人感到有什么负担，笔记下来，就是一篇工整的文章。还有就是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乐于解答问题，也给学员留下难

以忘怀的记忆。

一九五四年，学员生活结束，我被留在哲学教研室工作，从此成了艾教员的同事和助手。教研室属初建伊始，一切只略具规模，艾教员担负室主任工作。我是一个刚从山上游击队下来的，是地地道道的半路出家者。过去，虽因工作需要，曾经接触过一些理论，到马列学院三年，又读了一点书，受到老前辈的许多教育，但如今要专搞教学，而且还负有领导责任，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困难是很大的。幸亏有艾教员在，他不仅学问渊博，还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们在他的领导下，依靠教研室的集体，使教研室的工作日益前进，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教学任务。我们和艾教员讨论、研究问题，他总是那么细心，那么耐心。他最不主张从头到尾审查教员的讲稿，而要求教员提出讲课中的疑难问题来共同研究。他认为这样不仅有可能而且会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他的这些大胆放手、相信群众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了教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艾教员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他相处，不必有什么顾虑，我们从没有听过他在背后闲论人非，表现了他为人正派、敦厚笃实、与人为善的可贵品质。在学术问题上，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从不强不知以为知，一时解释不清的问题，就提出来要大家思考。他的心中常常装着许多问题，他也要求我们脑子里经常有几个问题在转着，他说，在阅读书报和日常实践的过程中，就会帮助你对那些问题一个个逐步思考成熟，这时你就具备了解决问题或撰写文章的条件了。他兼有多种职务，工作是异常勤奋的。他一生著述数百万言，讲过多少课难以数计。人们只知道他的课讲得好，讲得活，殊不知那是他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啊！暑假中他常常是不出去休息的，大热天躲在屋子里备课、写讲稿，那腕子上的汗水常常把稿纸都润湿了。即使因病去青岛疗养的期间，仍然孜孜不倦地撰写

《辩证唯物主义纲要》一书，即便这样，他还常常感叹时光的易逝，还有什么什么事要赶紧去做。他说过，《大众哲学》虽然在当时起了些作用，但那毕竟是过时了，何况那里边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他打算用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调写一本通俗哲学读物。可惜，这个美好的设想，最终只成为一种遗愿。他还不止一次讲到，毛主席曾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写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他常常为没能快些完成而遗憾。想不到时间对他是那么吝惜，只给了他五十六个春秋，他计划做而未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呀！

艾教员对于党的政策的贯彻也是极其关心的，尤其是当一个同志受到无辜的打击时，他敢于仗义执言，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切的亲身体会的。一九五八年，我被当时主管党校的康生和他的老婆，派上一个“右派”头衔，并把我赶出北京。后来，党校曾决定为我平反。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突然接到哲学教研室党支部的一封公函，说对我的问题要进行甄别平反，并请我从速到中央党校去。我负辱多年，当然希望澄清。我到党校后，受到同志们的热情接待。艾思奇同志还特意在职工食堂准备一桌便饭，表示欢迎。随后，艾教员主持召开了甄别座谈会。艾教员郑重地说：“这次请陈仲平同志回来，就是要把一九五八年的问题说说清楚。那时，剥夺了他的发言权。这次来了，可以畅所欲言，有气可以出气。”组织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把强加给我的长篇铅印“材料”和“结论”一条条据理驳斥。我把这个“材料”和“结论”概括为六个字：捏造、夸大、曲解。我的问题，完全是康生指使他的老婆，通过不正当的手法制造出来的。我说，如果在人民内部，检查我工作中的错误，我可以说上几十几百条，可是要放在敌我范围内，一条也没有。我说完以后，与会的全体同志都表了态，有的同志甚至痛哭流涕。座谈会末了，艾教员总结说：

"今天，陈仲平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大家都谈了，证明教研室的同志和陈仲平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认定这是一宗纯粹的冤案，要彻底平反，他责成写甄别材料的同志快办，迅速把意见书呈送党委审批。会后，他对我表示，一九五八年时，他没有尽到责任（当然，我了解他当时的苦衷），这次他要负责到底。他问我，是在北京休息一下，还是到外地去看看，如果去外地，九月中旬务必回来。他是这样设想的：九月一日开学，开学后处理一下教学方面的事，就可以把我的问题摆上党委议事日程，到中旬也就差不多解决了。当时我想，这里没有我的事，还是回山西去吧。九月下旬，我再度到了中央党校。这时，十中全会将要结束。时令虽刚进初秋，但这里已经寒气逼人。见了艾教员，他说形势有点变了。但他还是安慰我说："你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因为你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提出来就必定要解决。你在这里过国庆，可以到天安门去观礼，过个十天半个月，大致可以有个眉目了，你就等等吧。"我领承他的一片好心。我想在这里已无甚必要，家里还有工作，我说还是回去吧。艾教员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你回去也好，有事再来通知你。"他送了我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一本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用说，我的问题从此石沉大海，艾教员已经爱莫能助了。而意料不到的是，艾教员当时一席话竟成了诀别的赠言。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直到一九六六年春他离开人世。

艾思奇同志九泉有知，大概是不会想到我还会再蒙受不白之冤加重罪过的，然而，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我并没有幸免。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清晨，我所在的山西省党校的大院里，突然铺天盖地贴满了关于我的大字报、大标语，说陈仲平是杨献珍伸向山西的黑手！奇哉怪哉，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到一张传单，才算真相大白。原来是那个已经变为文革大顾问的

“理论权威”，在接见山西群众代表时，捏造出来的。他说：“你们那里的陈仲平，是一个坏人，是杨献珍的黑爪牙”等等。艾教员心地过于善良，他是不会想到世界上竟有如此凶狠的恶棍的。

“三十春秋成往事，半生忧患笑谈中。”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多年来造成的冤案惨事已得到昭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的蟊贼已一个个落入法网，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应得的惩处，艾思奇同志冥府有灵，见神州大地是非曲直泾渭分明，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 怀念老师艾思奇同志

梁 唐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我急切地阅读着凝结了艾思奇同志心血的文章，一幕幕往事，又勾起了我无穷的怀念。

艾思奇同志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梁品青是一九二三年的老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在黄浦军校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从事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和鲁迅先生有交谊，也有书信往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去世，我父亲接到许广平同志的电报后，从山西赶往上海参加追悼会，在悼念鲁迅先生的活动中认识了艾思奇同志，并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最初阅读艾思奇同志的著作约在一九三六年，是父亲让我读的。当时我已经是共青团员，正在太原中学读书。我的父亲常年在外，只是逢年过节回来看看。每次见面，他除了给我讲一些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的事外，同时让我读一些书，其中就有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当时，太原地下党办了一家“引擎书店”，专门发行进步书刊，我常到那里去。艾思奇同志编辑的《读书生活》杂志和他的《大众哲学》就是从这里读到的。

我第一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九三八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周恩来同志来到太原，指示我父亲回延安

工作。这时，正巧接到老家来信，我祖父病重，让父亲回家探望。父亲急于去延安顾不得回家，和我商量："你替我回家去看看爷爷，我得走了。"这时我已十五岁，是牺盟会的宣传员，我很理解父亲的心情，答应立即回家去看望祖父，但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父子的永诀。

父亲去延安后，一直没有消息。一九三八年初我在屯留县做瓦解阎锡山的"公道团"的工作，一天忽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我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飞到延安。

到了延安后，知道父亲原在工会工作。当我得知父亲已经去世时，泣不成声。稍后又到父亲生前的住所，睹物思亲，我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同志们告诉我，周副主席很关心父亲的病，去武汉之前还特别嘱咐徐冰同志照顾好他。

父亲给我留下了一封遗书，讲了他的病情和对我的关切。遗书中还开列了一些名字，其中就有艾思奇同志。遵照父亲的嘱咐，我很快就去拜望了艾思奇同志。他很同情我，沉痛地说："很不幸，你父亲十分挂念你，但等不到你来，就去世了。你父亲和我是同行。他是中山大学学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相处得很好。你有事可以来找我。"艾思奇同志还谈了在上海时期的生活，谈到了父亲一九三六年从山西长途跋涉到上海参加鲁迅先生葬礼时的情形。艾思奇同志当时还只二十六岁，但他和蔼可亲的神情，第一次见面就使我对他十分尊敬。

我第二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九四八年解放石家庄的时候。他在华北大学工作，住在正定县。当我见到他时说："你进步很快嘛，当兵打仗，参加土改，还当了副团长。可我一直在延安，还是翻书本。你接触实际比我多，很好。"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而艾思奇同志的态度是真诚的。

我第三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北京解

放以后，我参加了军管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没有理论不行，如金融斗争、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于是我找到薄一波同志，谈了我想去学习的愿望。他很支持我，我立即到马列学院，找到了艾思奇同志。我把来意说过，他说："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下半年考试，合格了就当学员。"

来到艾思奇同志身边，实际上是做秘书工作，我心里有点不安。他明白我的意思，说："文章我从来都是自己写的，我不要你替我写。"我又谈到他在《读书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很合读者的口味，确实写得好。他诚恳地对我说："那些东西，现在看来，还是粗糙一些。但他真实地反映了我对当年时局的感受。你的实践比我多，那么多感性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对我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你可以帮助我收集一点资料之类，但事情不多，主要是让你读点书。"他的这一席话，除去了我心中的许多顾虑。

下半年考试，我被录取为马列学院三班的正式学员，艾思奇同志是我们三班的班主任，我继续留在艾思奇同志身边，既当学员，又当秘书。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他从不叫我做别的事。我碰到问题去请教他，他不论多忙，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这一点对我来说，确是得天独厚。

艾思奇同志始终和党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他的哲学很少空论。解放初期，党号召开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提倡学习社会发展史，艾思奇同志讲的"猴子变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蒙工作。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讲座"，正象三十年代的《大众哲学》一样，影响是很深刻的。抗美援朝期间，要清除崇美恐美的思想，他深入地批判了杜威和他的中国门徒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他总是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紧密联系实际来论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对宣传毛泽东思

想更是不遗余力。《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写过不少有研究有见解的文章，他把这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军内外机关请他去讲课，他总是有求必应。一九五二年，刘伯承同志让政治部请他到南京军事学院辅导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反映很好。他讲课时，从不哗众取宠，从某种意义上说，还缺少那么一点鼓动性。但是他的理论基础扎实，语言简炼，逻辑性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公认的，对经典著作或其他要引用的内容能加以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显得有连贯性。

艾思奇同志是一位真正谦虚的人。他常说自己的感性知识少，是个缺陷。因此，他平素很注意向实际生活学习，积累经验。进城以后，多次到海淀区的农村参观。他观察认真，并且爱问个究竟。还和四季青公社的李墨林同志交上了朋友。他这个思想是一贯的。一九五八年他下放到河南，当了一个时期的地委和县委的副书记。回来后，我去看他，他说："我只是一个教员。看来我搞不了一个县，当不了县太爷。"我相信这是出于艾思奇同志的真心话。

艾思奇同志对作者是热情的、负责的。他经常接到读者来信，每信必复。虽然其中一些是我替他回的，但他一定要自己看过，并事先告诉我怎么写。有一些来信很有意思，信封里还夹寄邮票。艾思奇同志说，这是怕我不肯回信，所以连回信邮票都替我准备好了，一片急切之心可见。信写好了，他让我一定要把邮票原样退回，然后贴上自己的邮票寄出。

艾思奇同志的生活是很简朴的，要求自己很严格。他进城办事，轻易不要汽车，要了车子，也是尽量少跑一点路程。私人用车，他按制度付款。解放后，他一度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去讲课开会，因为路近从不要小车，而到马路上去搭乘半个小时一趟的"木炭汽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艾思奇同

志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从不和人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势力，更不依附旁人，看风使舵。对于阿谀奉承、阴谋诡计，更是深恶痛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私人纠葛，也没有个人恩怨。待人诚恳、谦恭，即使碰到一些不太讲理的人，对他奚落、争吵，他也能泰然处之，只当耳旁风。在闲谈的时候总不免要扯到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对此总是回避，不喜欢纠缠在无原则的纠纷中。然而，他写文章、处理问题的态度却是极为严肃的，表现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崇高品德。他有许多诚挚的朋友，他的著作博得了众多的读者。

一九五五年，我毕业了。相处五年，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强烈的事业心以及勤勤恳恳、严谨治学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是难忘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于北京

#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宣传者

张　磊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我的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和平易近人的领导者。他对党、对人民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勤勤恳恳为党的理论工作而献身，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 两次去通县

一九四九年七月，北京地区解放不久，伟大的解放战争胜利地发展着，我党正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为新的国家机关及其所属企业培训干部。为此，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干部学校（初称工作人员训练班）成立了。该校的任务是从政治思想上训练企业管理和技术骨干，开学后的第一课是社会发展史，第二课是马列主义哲学。没有教员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向理论部门求援。当时我在这个学校做组织工作，便和一些同志想到《大众哲学》的作者、马列学院的教员艾思奇同志，并提议请艾思奇同志讲这两课。但又觉得我们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训练班，校址又在通县，远离马列学院一百余里，能把艾思奇同志请来吗？大家说："试试看，好好请求一下，能来讲一次也行。"没料到，经联系，艾思奇同志立即答应。艾思奇同志来通县讲课的消息，很快在通县地区传

开了。不只是我校的学工人员，还有通县地委、县委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和中学生，都想听听艾思奇同志的报告。于是便在通县剧院及其周围都安上扩音器，共有二千余人去听艾思奇同志的课。这个情况，艾思奇同志事先不知道，讲课内容只是针对干校的三百学员准备的。我们临时说明增加听课人员的人数，并且大多数不具备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艾思奇同志严肃地表示："我担心这一课讲不好，但我要作最大的努力，尽量照顾到多数听课人员的实际要求。"并和蔼地对学校的负责同志说："请你们以后注意，不要临时变更或扩大听课对象，讲马列主义要有针对性，必须掌握对象的思想情况，这是大家都懂得的。"听课人员的经历、思想水平悬殊太大，再加上扩音设备差，要达到好的讲课效果的确是很难的，但由于艾思奇同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主观上的努力，讲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通俗易懂，并适当地放慢讲课速度，所以讲课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一课从上午九时开始到十二时还没有讲完，下午又讲了两个小时。一天之内，往返二百余里，连续讲课五小时，是会感到很疲劳的，但艾思奇同志却不显倦意。这只有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高度热情的人才能做到。数日后，艾思奇同志又在同样的范围讲了一次哲学课。这次课，是在三小时内概括地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虽然讲课的时间短，内容多，但因事先全面地了解到听课对象的思想情况，针对性强，结合形势和任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中的主要点，所以这次讲课的效果比第一次更好。大家说：艾思奇同志现在还是讲大众哲学，但比他写的《大众哲学》更有味道。

## 在马列学院的课堂上

我于一九五二年秋到马列学院学习，能经常聆听艾思奇等

著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讲课，是机会难得的。按照教学计划，先学逻辑学，再学哲学等课程。艾思奇同志担任《逻辑学》和《矛盾论》等辅导课。艾思奇同志的讲课，由于学识渊博，理论造诣深厚，且能深入浅出，运用自如，逻辑性强，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很有说服力，但尤其感人的，还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热情。他在讲《逻辑学》时强调指出："我们学习逻辑学是为学习马列主义打下一个基础。"在说明"逻辑的基本规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时，艾思奇同志通过举例，阐述了马列主义著作中的一些基本原理。艾思奇同志在讲解《矛盾论》时，不仅按照《矛盾论》的体系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唯物辩证法思想作了详尽的说明，而且阐述了马列的许多哲学原理，例如：马克思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运动着"，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和列宁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等观点。艾思奇同志还强调指出："学《矛盾论》主要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做到"把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艾思奇同志不仅是这样讲，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在教学工作中，经常深入班组，虚心听取学员的意见。现在回忆起艾思奇同志的那些语重心长的教诲及其战斗的工作精神，仍然受到启发和鼓舞，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实现"四化"而斗争。

## 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

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艾思奇同志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后被任命为副校长，仍然兼任该室主任。我于一九五五

年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哲学教研室工作，自此，艾思奇同志便成了我们的直接领导者。在这一段时期，艾思奇同志更加积极、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道路。尽管艾思奇同志在理论宣传中谦虚谨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也受到批判。这个奇怪的现象，是康生及其老婆，蓄意对艾思奇同志进行排斥和打击形成的。当时在艾思奇同志身上找不到什么右的"材料"，便硬加上教条主义的罪名，竟然把在广大读者中有很大影响的《大众哲学》也扣上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这次运动后，艾思奇同志被下放到河南省开封地区。批判、排挤和打击，丝毫没有降低艾思奇同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情。相反，他把下放作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好机会，从而认真作调查研究，使自己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又提高了一步，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艾思奇同志在下放期间，向广大基层干部作了多次哲学报告。返校后，艾思奇同志更为积极地宣传马列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虽然艾思奇同志也象许多同志一样，因受历史的局限，说过一些错话或不够准确的话。但在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分为二的普遍规律、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等问题，则是态度严谨、是非分明的。有一件事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六四年，当我们因讲"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和生产工具都有决定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受到批判时，艾思奇同志明确地说："这种讲法没有错"。这在当时对于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至于以后未能顶住这一错误的批判，则是有主客观原因的。艾思奇同志还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经常利用全室会、其他小型会和个别谈话，结合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讲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担

负着十分繁重的领导工作的艾思奇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讲当时的理论动态、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干群的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出题目要我写文章，特别指出需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特点”等问题。每当想到这些情景时，总是仿佛艾思奇同志的音容笑貌又显现在面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我心潮起伏，怀念之情倍增。艾思奇同志的谆谆教诲，我将永记不忘。

以上片断的回忆，难以表达艾思奇同志热情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的万一。但这些回忆，却能激励着我在实现社会主义“四化”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做好党交给的工作。

# 艾思奇同志在天津

梁寒冰 聂元素 左健 黎干 孙延龄 黄增瑞

艾思奇同志是天津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熟悉的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天津解放初期，艾思奇同志多次应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和设立在天津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邀请来津讲学。当时，知名学者来津讲学次数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此后，他一直与天津理论界、学术界有着较多的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天津的传播和普及，做出了贡献。艾思奇同志逝世已经十四周年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倾注的满腔热情，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艾思奇同志是我市许多干部和群众学哲学的启蒙老师。这不仅是他的《大众哲学》曾在很早以前对一部分同志有过影响，而且还在于他通过讲课和座谈等形式，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解放初期，大批新干部参加了工作，大家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甚熟悉，艾思奇同志从讲述社会发展史着手，由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一直讲到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这些生动、系统的讲授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激发了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陆续发表后，艾思奇同志又多次到津辅导这两本哲学专著的学习，较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

曾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正确的认识和改造世界，没有正确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科学的方法论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他通过阐释认识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理论与实践、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的关系问题，和什么是辩证法和它的规律，如何运用辩证法，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关系等问题，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对它的发展。通过这个阶段的宣传，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起了很大的作用。

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传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积极热情、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次讲课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他的讲课记录稿略加整理，就是一篇系统的文章。对于不同的听课对象，艾思奇同志就采用不同的讲授方法。例如讲《矛盾论》时，他就准备过章目全然不同的两个讲稿。讲课以后，大家在学习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认真地、耐心地给予解答。在学习《实践论》中，大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他都做了研究归纳，一一给予解答，往往解答问题竟要占去讲课的一半时间。艾思奇同志每次来津，除讲课外，还经常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搞调查研究，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他经常以一个普通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参加各种讨论会和座谈会，全神贯注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都表现了他的革命事业心和谦虚朴实的美德。

艾思奇同志讲课言简意赅，朴质无华。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例，通俗易懂地说明深刻的哲理。例如，在论证猴子变人时，语言生动形象，逻辑思维严密，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人类起源的重要理论问题，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艾思奇同志讲课很少照搬经典作家的原话，也不拘泥于原著章节的束缚，却能完整准确、层次分明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辅导《实践论》时，他说："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一

个问题，主客观关系问题。”他由主客观的矛盾讲到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而联系到科学的预见、人的天才以及人们为什么会犯错误，要求人们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这里，艾思奇同志把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把准确的概念表述、严密的论证、通俗的语言结合在一起，言之有物，引人入胜。

艾思奇同志在讲课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刻苦钻研经典著作，造诣很深，又能细心观察生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用自己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做好哲学的普及与宣传工作。他在讲课中大量联系整风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等事例，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当时我们党对待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从哲学的高度较深入地阐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艾思奇同志不但用哲学理论说明社会现象，宣传党的路线，而且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动哲学思想。在一九五三年以后的讲课中，他系统地批判了梁漱溟和胡适的哲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他们的反动立场和思想根源做了深刻的挖掘和透彻的剖析，揭露了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和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的反动本质，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从艾思奇同志来津讲课活动中，我们深深感到实事求是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不固执己见。我们曾多次听到或看到他根据同志们的意见，修改自己的讲稿或变更自己原来想法上的欠妥之处。一九五二年，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是对抗的还是非对抗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艾思奇同志曾连续三、四次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会，细心听取不同意见，并在先后数次发言中修改自己的看法。又如，关于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问题，他也多次参加讨论，吸取同志们的合理意见，变更自己原来的提法，使之在表

述上更加科学，使在场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值得提出的是，艾思奇同志对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不是抱着迷信的态度，他曾直言不讳地提出，对某些问题的观点是需要分析研究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艾思奇同志对天津各大专院校的哲学教学也很关心。他在津期间，曾到过一些大学去讲课和参加座谈，多次和同志们共同探讨一些较深的理论问题，与天津理论界、学术界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过。对天津有关院校编写的哲学、逻辑学教材，他都认真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修改意见，并热情地接待由津来访的同志。

艾思奇同志对天津市高级干部的学习更是关心，帮助也很大。从一九五六年天津市委高干自修班成立以后，艾思奇同志就经常到这里讲课或进行辅导、解答问题等教学活动。

我们尊敬的老师——艾思奇同志，在全国解放的十多年中，除了系统地给全体干部讲哲学外，还给天津市的工人群众讲哲学，尤其是难忘的一九五八年夏天，在我国最大的上海、天津等工业城市，出现了工人阶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新高潮。这是新的创举，虽说一九五八年在工农业生产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差，但是，不可否认，工人阶级那种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那种奋发图强和出自内心的忘我劳动的积极性是十分可贵的，是难以忘怀的！在这一高潮中，在这一思想洪流中，上海求新造船厂、天津仁立、东亚毛织厂及轧钢一厂等单位的数万工人，首先展开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的热潮，接着在全市各个工厂、企业的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要求。在这种形势下，由市委再次邀请艾思奇同志到天津，为全市的工人同志讲授哲学。重点讲授了《实践论》、《矛盾论》。当时正值炎夏，七月三伏，汗流浃背，可是艾思奇同志仍不辞劳苦地深入工厂、车

间，亲自参加工人同志们的座谈会、讨论会。同时，讲大课，解答问题，耐心地反复进行辅导。在艾教员的苦心帮助下，工人同志较普遍地掌握了认识论、矛盾论的初步哲学理论，并能恰当地联系实际，以至解决一些生产中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工人同志通过学习，学会了解决生产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如仁立毛织厂的细纱车间、染整车间老工人李长茂、刘俊英就解决了生产中长期存在的质量问题等等。在炼钢厂、轧钢厂等许多工厂，也逐步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通过学习，普遍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热情和责任心，推动了生产的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工人同志普遍反映：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开了窍，学了知识，掌握了解决困难的“金钥匙”，并普遍地为艾思奇同志的那种带病下厂、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几十年来对艾老师念念不忘。

总之，解放后的十余年中，艾思奇同志成为天津市干部学习的主讲教员和导师，为天津的理论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风里来雨里去，真是风雨无阻。不论他工作多么忙，身体有时多么不好，只要来请他，他总是热情应允，而且没有一点架子，不论是谁来请，只要说明是天津市委来请他去讲课，他总是立刻答应，从无二话。在时间安排上，从不考虑个人的方便而有所延误，他总是按照天津市要求的时间准时到达。十余年中，我们亲眼看到他对工作总是那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待同志和群众总是那么谦虚和尊重。

我们是艾思奇同志的学生。早在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艾思奇同志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的哲学教师。他不仅在理论学习方面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在实际行动方面，在对待党、对待人民群众等方面，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以言教，教了我们马列主义；他以身教，教育我们怎样去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名符其实的共产党

员。

一九三八年冬天，梁寒冰同志也在抗大任教，和艾思奇同志都住在校部（城内延安师范学院内），当时他刻苦读书，生活俭朴，感人至深。他经常在小豆油灯下读书到深夜，有时直至天明。全国解放后，条件变了，但艾思奇同志在生活方面，仍是十分艰苦朴素。战争年代的延安，物质等生活条件很差是不言而喻的。一般刚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生活要求上，表现出来的“能好一点就好一点”的现象并不奇怪，而艾思奇同志全然不是这样。组织上按规定给他一点照顾，他总是谢绝。如一九三八年，他在抗大当教员，每月可领得二十斤大米作夜餐之用，可是艾思奇同志从来不要。身边工作的“红小鬼”有时替他收下，他马上又让小同志送回去。他和抗大学员吃一样的饭菜，毫不特殊，即便夜里备课到三更，他也从不加餐。直到解放初期，还是供给制的时候，理论教员讲课制度规定，给予车马费或讲课费，可是，艾思奇同志从来都不要，有时他的秘书代收下了，他得知后又让秘书如数寄回给我们。

艾思奇同志生活艰苦俭朴，还表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穿着方面。抗战时期，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时候，延安生活当然要苦一些，干部学员差不多都是每两年或三年发一套棉衣。陕北高原秋凉冬寒，甚至夏天，住窑洞的，早晚也离不了棉衣，一套衣服常年在身，自然难免破烂。艾思奇同志虽是较高级的教员，也是身穿一件破棉袄，袖口边缘经常露着棉花，冬天也是穿着一双破单鞋。这在延安当然是普通的事，特别是大生产运动之前。但是，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在一九五〇年冬天，我们在华北大学看见他时，仍然是穿着一件补了袖口的灰色军棉衣。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见到他的生活依旧是很简朴的。

他的一切都和战争年代一样，和普通群众一样，他完全保持着艰苦朴素的、谦虚谨慎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在工作上，他一生兢兢业业；在生活上，他毫不奢侈；在对人上，他热诚相待。他的许多美德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即便陈伯达、康生如何诋毁，都动摇不了我们尊敬艾思奇同志的信念。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

# 和艾教员相处的日子里

吴秉元

我第一次知道艾思奇同志的名字，是在一九四九年。当时苏南刚解放，我还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正在常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争读《大众哲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从《大众哲学》这本书中不仅得到了许多哲学知识，而且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同时我们也从报刊上不断地读到艾思奇同志写的有关论述干部、青年的理论学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方面的文章，感到非常亲切，受到很大的启发。艾思奇同志写的书和文章，对我们知识青年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起了不少指引和鼓舞的作用。从这时起，我已对艾思奇同志产生了崇敬和钦佩的心情。

为了革命发展的需要，我于一九四九年冬天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斗争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大众哲学》中所讲的哲学道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九五四年春，组织上把我从中央公安部门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真是巧得很，哲学教研室的主任就是艾思奇同志。我被分配做资料工作。我为自己能到中央马列学院，又是在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身边工作，感到十分幸运，真是高兴。那时，我们哲学教研室只有十来个同志。有一次艾思奇同志亲自走到我们办公室看望我们几位青年同志，对我这个刚调来的青年人特意表示了欢迎和问候，他对我们的学习和工作

都非常关心，鼓励我们边干边学，注意在工作中间好好学习。在艾思奇同志的领导和鼓舞下，我们这批青年人在学习和工作中进步都比较快。

建国以后，艾思奇同志配合党的任务，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写了大量的文章，在校内外作了很多报告，特别是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在宣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在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大众哲学》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多次再版重印，都不能完全满足广大读者购阅的需要。从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开始，组织上让我帮助艾思奇同志处理一些读者来信。有许多读者强烈要求，继续出版《大众哲学》，以供广大青年学习之用。我请示艾思奇同志，对这种来信应当如何答复。他沉思了好久，才郑重地说："你就替我回答他们，因为《大众哲学》有缺点，不大适用了，不宜再版了，以后有机会再另写一本吧。"我感到很奇怪，但又不便细问，只好照他的嘱咐办理。直至他去世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窃取了马列学院院长职位的陈伯达，对于为党的理论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艾思奇同志怀着满腔的妒嫉和仇恨，他为了打击艾思奇同志，一九五三年在内部对《大众哲学》一书发动了"批判"，竟然胡说什么《大众哲学》一书随便翻到哪一页都有错误，把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大众哲学》诬陷为一本有害的坏书。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可是，艾思奇同志对于自己受到的这种打击和迫害，从来没有对我们谈起过，抑郁之情始终积压在心头，直至去世。这就是《大众哲学》这部名著长期未能再版，与读者隔绝了二十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能够重新出版的原因。

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期间，我们党为了顺利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伟大历史任务，

也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了革命斗争，大力组织了宣传辩证唯物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工作。艾思奇同志把主要精力投入了这一战斗。他写了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批判梁漱溟的反动哲学等许多文章，后来又进一步加工改写，出版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等著作。艾思奇同志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当他发现了自己的文章中有个别错误或不当之处，总是立即改正，有时甚至在报刊上发表短文公开纠正。他的著作、文章全部都是他自己动手写的，从来没有让别人代他执笔写过什么文章，用他的名义发表。每次讲稿也是亲自写出，不愿省力气，把别人现成的讲稿拿来用。

艾思奇同志常常不惜花费宝贵的时间帮助和指导我们青年人学习写作。一九五五年，我们教研室的一些青年同志给报刊写了一批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文章，后来北京大众出版社要汇集出一本小册子，艾思奇同志对此表示很高兴，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请他审阅，他很认真地看了，而且亲笔替我们作了具体的修改和补充，使我们甚为感动。我们曾请他谈谈如何才能写好理论文章，他多次对我和其他青年同志作过亲切的指导。我记得大体谈到这样几点：一、写文章是严肃认真的工作，要靠平时在看材料、读书、阅报和做工作的过程中，用心思考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逐渐积累思想和材料，有什么感想、体会、心得，随时记下来，积累多了，就可以写成文章。二、写文章一定要对问题作具体分析，要仔细解剖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具体分析，才能讲清道理，才有说服力。没有具体分析的文章，不会是好文章。三、写文章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不要光靠引证，要选择适当的事例具体地论证和说明问题，要避免死板和空洞，言之无物。这些经验之谈，对于指导我们青年人学习写作很有帮助。这也恰恰是艾思奇同志自己写文章的一些特点。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从一九五五年起改称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工人员经历了一场整风反右运动，野心家康生指挥了党校的运动，他的老婆还直接坐镇哲学教研室插手运动，把一些革命同志打成了右派。艾思奇同志本来在青岛养病，也被叫回来挨了整，虽然未被打成右派，但却被看做需要下放锻炼、改造思想的人。他有高血压症，心脏也有病，本来应当继续疗养。但他知道了要他下放锻炼，便表示完全服从，态度是积极的，觉得自己应当下去接触实际，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因此他对下放作了认真的准备。这时候，组织上确定了让我给艾思奇同志当秘书，跟他一同下放。

下放前，艾思奇同志曾带领我们一批同志去到天津参观了一个多星期，了解了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他应天津市委领导同志的邀请，给天津市的工人和干部作了几次学习哲学的报告。同去参观的一位叫白大方的老同志作了详细记录，回京后对记录作了整理和加工，形成了一本有四、五万字的小册子，书名为《破除迷信，大家学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艾思奇同志要我帮助仔细看一遍，再作些文字修饰工作。艾思奇同志很尊重白大方同志，为这位老同志有这样高的热情，非常感动。为了尊重白大方同志的辛勤劳动，他要我把白大方同志的名字也写上，这本书就是作为他和白大方同志合著而出版的。白大方同志对艾思奇同志这样来处理这本书的出版，一方面感到不大合适，因为书中的基本思想都是艾思奇同志讲的，他不过是补充了些具体事例；另一方面则越加尊敬艾思奇同志的为人的高尚品德。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们有十多位同志跟随艾思奇同志一起下放河南，具体工作地点主要是到登封县，也有些同志到别的县。临走前，艾思奇同志的爱人王丹一同志嘱咐我，要我多多

照顾他，注意他的身体。我表示一定好好照顾，请她放心。艾思奇同志并没有让我在他身边照顾他，为了让我有独立地到基层接触群众、参加实际工作锻炼的机会，派我到了离县城较远的大冶公社大冶大队去帮助工作。有一次，他深入到大冶公社了解工作情况，亲自到大队看望我。我住在一个贫农家里的一间小屋里，有学习的桌子椅子。我向他汇报了自己学习锻炼的情况，他表示满意，并说贫下中农和队干部对你很照顾，还给你单独住一间屋子，有看书学习的地方。他鼓励我一方面要好好向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同时在学习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也可以给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讲讲哲学。要结合基层工作的实际，通俗地讲些哲学基本原理，对基层干部要有所帮助。能不能讲得好，对他们有帮助，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对自己也是一次很好的考验。我照他的意见做了，的确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体会到了哲学的用处，使自己的确得到很大的收获。

艾思奇同志对三官庙贫农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学习哲学，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他亲自抓了三官庙贫农学哲学这个典型。多次亲临三官庙作指导，看哲学教师写的讲稿、社员写的学哲学的心得体会，先是派了韩树英同志，后来又把我调到三官庙蹲点做具体工作，帮助培养哲学辅导员，把组织贫农学哲学与搞好生产结合起来。他认真总结了三官庙贫农以及其他地方工农学哲学的经验，在河南报刊上发表了《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间，登封县委遵照艾思奇同志的建议，为了推动全县的工作，为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学哲学培养师资，在县委党校开办了几期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大多是大队干部、中、小学教员和红专学校的教师。他亲自讲哲学课。学习内容是，结合学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习《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大家都觉得学习

收获很大，既明确了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政策，又懂得了不少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知识，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推广学哲学创造了条件。

有的同志说，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位大哲学家，下放河南十来个月，对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熟视无睹，并且还为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作辩护。这不符合事实，作这种论断是不公平的。不错，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作为一位下放干部，主要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工作，不可能在作报告和写文章中过多地去讲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但他是看到了大跃进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等错误的。他在一些文章中，虽然一方面讲了要反对右倾保守，但另一方面则强调了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重要性，例如他在一九五九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作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是不应该仅仅凭着空想和热情来指导行动的。""破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也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一九五九年四月，艾思奇同志根据自己在大跃进中观察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高指标"等偏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一文，指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既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又是有穷有尽的，是有限的。"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用旧式农具种地，一个农民只能种几亩，不能希望他一个人耕种百亩千亩。""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见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误认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或缺点，在规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

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善操作，一句话，不会节约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最大潜力。”显然，艾思奇同志是把大跃进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的。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艾思奇同志曾应禹县县委的邀请，向禹县干部作过一次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集中地反对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他指出，在“大跃进”中，有些干部“非常主观地看问题，非常主观地解决问题”，“不实事求是，头脑不冷静，头脑太热”，把干劲“浪费了”。如果我们提出超过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指标，“那就是空想，就是主观主义。”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中所以发生缺点错误，“首先就是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冲天干劲没有跟具体的分析，科学的精神结合起来。”他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口号，指出不能凭胆量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讲条件。正确的思想，“是既看困难条件，又看有利条件，并且利用有利条件，经过努力，来创造一些有利条件，来克服困难。”他说：“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就是要使主观能够反映客观，不要使人的主观脱离客观，这个又叫做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凡是做事情，要把客观的情况摆在第一位，主观服从客观。但是主观的努力也不能放松，主观要服从客观，要注意客观各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客观条件，加上一些主观条件，同时也不能放松主观努力，主观的指导。”当时，有些干部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敢说实话，对此，艾思奇同志非常恳切地说：“做工作的时候，真正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自己经过研究，的的确确应该这样工作，按照唯物论来办事情，别人如何说你右倾保守，那你不要怕，要敢于顶住。我只要真正研究好了，我觉得的确应

该这样作，我就坚持真理，别人说我保守，我也不怕”。

艾思奇同志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要使我们的思想如实反映客观情况，是不容易的，因为客观情况、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他说：“要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很好地反映客观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走群众路线。”他建议干部们，凡事要多和群众商量，决定任何重要问题，都要多和群众商量。主观主义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多半是领导干部不跟群众商量，或者很少跟群众商量。这就需要按照毛主席所提倡的，要“多谋善断”。艾思奇同志强调指出，一个人的脑子想问题，总是想得不完全的，事情往往很复杂，一个领导同志不跟别人商量，有些事情是想不到的。所以要多谋，多跟群众商量，才能正确反映客观情况，善于正确决定问题。他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用极其简朴的语言说：“走群众路线来解决问题，要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再来指导群众，首先听群众的话，然后再让群众听领导的话”。就是“要先让群众当家”，让群众出主意，然后干部再当家，“干部当家要和群众当家结合起来”。艾思奇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唯物论和群众路线分不开，要实行唯物论，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

艾思奇同志又进一步阐明了“我们要坚持唯物论，就一定要坚持辩证法”的道理。在他看来，“大跃进”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不分析客观条件，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夸大了事物的一个方面，造成了极大的片面性，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所以，他认为，坚持唯物论，要使我们的思想恰当地反映客观事实，一定要全面反映。因为事物是多方面的，如工作中一般总有成绩和缺点两方面，研究工作情况就一定既要研究成绩方面，又要研究缺点方面才全面。研究客观条件，就既要研究顺利条件，也要研究困难条件。片面地看问题，就会违背

唯物论，造成主观主义。他着重地讲了如何应用两点论、树立对立面、两条腿走路等工作方法。他指出，辩证法的两点论就是要全面地看问题。树立对立面的方法，并非人为地制造矛盾，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客观存在着的矛盾、进行对比、开展批评或斗争、推动进步的一种方法。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就是要利用矛盾的对立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赖的关系，来推动工作的方法。他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工作与休息相结合等例子，说明了必须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的道理。他批评了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那种只重视工业，不重视农业；只重视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只要工作、苦战，不注意休息、休整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错误。

艾思奇同志在登封县对干部讲课中，和在其他地方跟干部的讲话中，还曾讲了如何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他认为有正确的主观能动性，也有错误的主观能动性。有时候，一个人为了一个错误的目的，也会自觉地努力去干，那就是错误的能动性。有了正确的目的，这个能动性就有了正确的方向。能动性要有正确的认识基础。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基础，就可能引导到错误的方向。犯错误的人有时候也会有错误的干劲的。艾思奇同志是从"大跃进"中看到有些人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蛮干，不讲实事求是，而从理论上作这个说明的。他说："能动性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主动，有了能动性不一定能够有主动性。你如果犯了错误，虽然是有能动性了，积极努力，冲天干劲虽然有了，但是结果还是会被动"。"所谓主动，在战争中就是讲战争的自由权，就是要得到自由，要能支配敌人，而不被敌人支配。"他根据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理，对干部说，要取得主动，取得自由权，就要认识必然，就要按照客观规律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取得主动权，取得自由。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艾思奇同志曾被邀请在郑州、开封等地向干部和学生作过几次报告，除了宣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外，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讲了许多哲学理论问题。他对有些问题的论述，至今对人们仍有启迪。例如，他认为，刮共产风，与人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有关。从理论上来说，确有这样的问题。他在讲演中回答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即中国是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他认为，我国是一九五六年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至于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权性质已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可以说已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他讲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时说，社会主义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形式，而共产主义只有全民所有制这一种所有制。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社会主义还有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差别就消灭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了。如果综合一下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大体上是生产关系三方面的差别：两种所有制与一种所有制的差别，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差别，人与人关系的某些差别。艾思奇同志认为，将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就是三个方面的过渡，主要是所有制和分配制的过渡，加上三大差别的消灭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变化。其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生产力要高度发展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指出，有些人认为办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饭，这就是共产主义，那是不对的。所以会造成增产了反而生活困难，就是因为认为很快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缘故。艾思奇同志这些论述，从理论上挖掘了出现“共产风”的根源。

艾思奇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下放期间，亲自看到“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深切体会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一次讲话中对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专门作了讲解。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去年大跃进以来有个时期有人认为实践就是理论，对读书很不重视，而把读书看成教条主义的特征，因此，理论原则也不大被人注意了。”他针对一些对解放思想的错误观念，指出党号召解放思想，是说的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资产阶级思想障碍下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并不是不要书本知识，把科学规律随便抛弃。在工厂里决不是要把科学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而是要破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他说：所谓迷信就是主观主义的东西。“破迷信就是立科学，破迷信并不是破科学。有一个时候把科学也破了，这是违背党中央的原意的。”艾思奇同志非常中肯地向干部指出，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证明了读书、学理论是必要的。“许多问题的发生就是没有好好读书，就是因为没有尊重理论。理论是什么东西呢？科学的理论就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尊重理论也就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举例说，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如果你多少注意一下，共产风就可以减少很多。他认为，学理论，不仅高级干部要学习，中级和基层干部也很需要学习，学会和应用马列主义理论，可以使干部在工作中少犯许多错误，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保证。

艾思奇同志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河南，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回北京，在河南工作九个月左右的时间。总的来看，他对“大跃进”中“左”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是有一定认识的，所以他总是竭力想正面地从哲学理论上，从世界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引导干部认识和纠正“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的错误。这正是他最为可贵的地方。应该说，他从

哲学上对“大跃进”中主观主义的错误的分析是比较深刻的，直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启迪和教育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过去的文章和讲话中没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他对当时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么清楚，这也是事实。但是我们总不能用经过多年反复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来苛求于他吧。谁又能保证一个人在一生中对每件事、每个问题，看得都那么准确呢！

在下放河南期间以及到一九五九年秋天下放结束回京时，艾思奇同志带领我们十多位同志先后参观了洛阳、开封、三门峡、西安、太原、大同等地，他把参观的重点放在了解当地工农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其次是看了一些历史古迹，登了嵩山和华山。每参观一个地方和单位，艾思奇同志都看得很认真，问得很仔细。对于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大同的云岗石窟等也看得很有兴趣，他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作了考察和分析。在登嵩山和华山时，他尽管身体不大好，但表现了顽强的意志，不畏艰难的精神，不到顶峰不罢休的气慨。在回京一路参观时，艾思奇同志受到各地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见到他便兴奋而又激动地说：“我在青年时，正是因为读了你的《大众哲学》，懂得了革命的真理，鼓舞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过多次。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众哲学》在我国青年中确实起过很重要的启蒙教育作用。这是艾思奇同志受到人们崇敬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六〇年，艾思奇同志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肩负的行政领导和教学工作的担子更繁重了。到中宣部开会也多了。这时候，艾思奇同志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四篇哲学著作，分析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贡

献。后来中央书记处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主编一部哲学教科书，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首先组织我们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写了初稿，然后主持召开了编写哲学教科书的讨论会，有不少省的代表同志来参加，在此基础上又集中了一批同志，编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他为了编好这本书，费尽了心血。他提出的一些原则要求，对于编写其他教科书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例如他说到：哲学教科书讲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知识，要有相对稳定性；要力求准确、简明，在阐明马列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来阐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要把阐明马列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和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发展结合起来；要适应教科书的对象，适当兼顾其他读者；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艾思奇同志还谈到使用教科书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情况出发，分析、说明、解决实际问题，分析、说明和总结实际经验，要批判对立面的东西，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作斗争。他十分用心地对哲学教科书进行逐章逐节的修改，有些章节几乎是他重新写过的。经历了二十来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他主编的这部哲学教科书在哲学基本原理上是扎实可靠的，是站得住脚的，直至如今仍然是一本受欢迎的有价值的哲学读本。

艾思奇同志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责己严，待人宽。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要求特殊照顾。如因私事用车，总向公家交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职权给亲朋及家属特殊安插工作。有时有的亲友找上门来提出要求帮助安插，他总是婉言拒绝。艾思奇同志能真正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是可贵的。

自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以后，我因到本校的理论班进修，秘书工作由卢国英同志接替了，我与艾思奇同志的接触就少了。一九六六年春，当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突然得到

他逝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当时他才五十六岁，正是有为之年，去世实在太早了。回想我十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日子，乃是他作我的老师、我当他的学生的最珍贵的日子，我受他的教益是很多的。艾思奇同志对党的理论工作一贯忠心耿耿，为了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不怕遭受任何打击，不愧为我党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 怀念艾思奇同志

葛　力

万物更迭，人间多变，缅怀往事，思潮起伏。艾思奇同志的逝世使我极为悲痛，他离开我们，已经历时十四个春秋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每念及艾思奇同志，便思绪万千，悒郁满怀。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理论界也出现了活跃的形势，这更加使我怀念艾思奇同志。如果这位哲学家、理论家仍然在世，他可以凭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修养、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展纸挥毫，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作出应有的贡献！可惜，他已不能参与这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了。

当我是青年的时候，就知道艾思奇同志的名字。上大学以后，参加一二·九运动，我和其他同学相互传阅的进步书籍中，除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文版）以外，最使人爱不释手的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这本书对引导我学习唯物主义哲学，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由书及人，从那时期起，我一直怀抱希望，能够见到艾思奇同志，亲受教益。

一九五四年六月，如愿以偿，我见到了艾思奇同志。这第一次会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朴质，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流露于精神状态，特别是一般言谈之中。他不以有名学者自居，平易近人，出乎自然，使人感到亲切。此

后，我遇到什么问题，就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在十多年的交往中，有些事情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艾思奇同志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深刻理解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从政治和业务上关心他们的成长。艾思奇同志熟悉几门外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准确地领会马列主义原著的精神，广泛地阅读资料，深入地探索问题，也希望其他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在他的鼓舞下，我们中间有些同志一度热衷于外国语的学习，发挥了顽强战斗的精神，收到一些效果。可惜，为时不久，由于工作繁忙，加上干扰重重，学习的热忱逐渐淡漠，最后竟然中辍而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有了有利的条件，他曾经领导过的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又重新燃起学习外语的热情，用具体的行动来实现艾思奇同志的遗愿，为提高教研质量而奋斗！

艾思奇同志关心同志，特别从政治上关心同志们的进步。一九五八年我申请下放劳动时，得到他的支持。我在山西太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共一年零一个月，在思想感情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又培育了一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艾思奇同志经常讲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后来我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确实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则，一旦这个原则变成思维活动中的因素，这个因素就会隐含地或明显地体现在哲学史问题的分析，乃至科学方法的论述上，可以提高哲学史研究水平。

艾思奇同志在业务上非常关心同志。每当我提出要研究什么课题时，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汇报，尔后发表意见。有几次我和他论及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外国哲学时，他表明前者迄未为人重视，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唯物主义传统，后者被人忽略，不能达到知己知彼，通过科学的评述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谈论这些问题，一般都在夜阑人静的时刻，

稀疏的灯光照在楼台和湖面上，情景格外幽寂。我只知道他喜欢运动，冬季来临时，我和他以及张如心同志经常一起滑冰，认为他身体健康。谁知，他在校内外兼任多种职务，积极地从事科学研究，日以继夜地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到现在为止，我还很后悔，不应该晚上去找他，占用他的休息时间。可是，艾思奇同志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耐烦的神情，对我总是热情接待。

十四年过去了，艾思奇同志和蔼可亲、诚朴真挚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历历在目。每遇夏秋季节，我漫步庭院，在他所住的楼前，看垂柳袅娜，天际流霞，深感景物依旧，人却远离尘世，怀念哀思之情油然而生，心情极为沉重。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九六五年的隆冬。一九六六年春节回校时，王丹一同志告诉我艾思奇同志因检查身体而住院，不必担心，我也想以不干扰为宜，未前往探视。谁能想到此后竟未能再见面！我至今懊悔不已，现在我只有以自己辛勤的哲学工作来纪念艾思奇同志！

一九八〇年

# 艾思奇同志在河南登封

韩 树 英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党校干部趁学校没有教学任务的机会，分头下放到一些省、市，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九月二十六日艾思奇同志带领十五位同志到了河南，然后又带领我们四位同志下到登封。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在这期间，他任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参加地、县的领导工作。这里，着重讲一讲艾思奇同志关心和组织干部和农民群众学哲学的一些情况。

登封县三官庙，当时是全国农民学哲学的先进典型。三官庙乡党委从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中，找到了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改进基层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正确途径。这里不仅基层干部学哲学，而且普及到群众，被称为“哲学之乡”，各项工作都很有生气。

艾思奇同志作为哲学家，很关心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哲学学习。到登封不久，他就派我到三官庙大队蹲点，要我向群众学习，汲取经验，并对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做一些工作。他不断听取我的汇报，并细心地审阅了三官庙群众教师编写的哲学教材，积极地提供了改进的意见。他自己也几次到三官庙，直接听取群众学哲学的经验，并看了群众写的学习心得、文章。艾思奇同志在研究了三官庙学哲学的经验之后，在河南报纸上发表了《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一文。他十分重视三官庙学习

经验的推广。我们在三官庙举办了短期群众哲学教师训练班。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培养了一些教学骨干。

当年冬天党中央召开了武昌会议，发表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要求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在此前后，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解决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办好人民公社，对全党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指示，做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重要的一环是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当时，广大基层干部工作热情很高，但对什么是务实，什么是务虚，为什么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中仍然要坚持按劳分配制度等，都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有些干部对党的政策甚至有抵触。在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干部中强迫命令的作风也有所滋长。经过一番研究，考虑到三官庙等地的过去的经验，艾思奇同志亲自向县委提议由县委直接举办短期训练班，分批训练全县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队长。他并且提议要把政策的学习和哲学学习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学习过程中，要求先摆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然后再结合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课和讨论。县委讨论并通过了这些提议，在中岳嵩山脚下的嵩阳书院先后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每期半个月左右，一百多人，学习内容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在古代讲授程朱理学的嵩阳书院，讲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讲了认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专题。训练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河南日报》报道说：大家都觉得学习的收获很大，不仅明确了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方向道路和具体政策，而且懂得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知识，为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在全县推动农民学哲学创造了有利

条件。

在第二期训练班，还专门附设了时间长些的哲学师资班，目的是能给县和各公社培养教学骨干，撒下种子，以便在我们走后，能使学哲学的群众运动坚持下去。参加学习的有县里几个中学的校长和各公社的一些民办教师。

在这一期间，我参加了训练班的工作。艾思奇同志仍然很关心三官庙的学习和工作，又派了其他同志接替我到三官庙蹲点，协助基层干部抓哲学学习，直到我们离开登封。

一九五九年六月，在我们离开登封前，县委召开专门会议，和我们互相交换了意见。县委领导对艾思奇同志这段工作评价很好。他们一致说他作风朴素，没有高傲情绪，团结好，民主作风好，和当地干部没有什么隔阂，不管在干部中还是在群众中，印象都是好的，说他担负了文教整条战线的工作和报纸宣传工作，使得县委很放心，把干部学习提高了一步，为尔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说他工作走群众路线，等等。据我看，这些并不是什么客套话，也不能算是溢美之词。

上面说的并不是他这次在基层八个月工作的全貌，我印象深的也不限于这些。这里我再说一件事。经过一段工作，我们一些人都感到基层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浮夸风等问题，都不是仅从基层工作方面能彻底解决的。在下放结束时，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给省的主要领导人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回信承认了他的意见是对的。当时看到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一些人都觉得根据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改正工作中的缺点，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艾思奇同志的信写得可能很婉转，但是这一行动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刚下来的时候，大家头脑都比较热。

艾思奇同志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最后总结下放工作，回顾认识的变化时，他深有感触地讲到：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的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不久，庐山会议反右倾，我们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实际工作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 学者和战士

卢国英

一九五四年初夏，我从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分配来马列学院后，便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工作，一九六一年起，直到一九六六年春他逝世前，又调在他身边工作。他给我的教益很多，帮助很大，影响很深。在整理他的遗稿过程中，常常触景生情，引起我无限怀念。这里回忆的，只是若干片断，谨表怀念之意。

## 普通教员

“艾教员”，我们中央党校大多数同志，都这样称呼艾思奇同志。艾思奇同志担任了副校长，大家仍然这样称呼。很少有人称呼“艾主任”、“艾副校长”。他曾对按职务称呼的同志说：“就叫我艾教员好了”。我们也习惯这样称呼。“艾教员”这个称呼里，包含人们对他的尊重，包含着师生的友谊，包含着党内领导和被领导的平等关系，包含着他不计名位的品德。

艾教员成名于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才二十三、四岁。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街头贴出许多标语：“欢迎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同志”，其时也才二十七岁。一到延安，便为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器重，被组织所重用，曾担任边区文协主任、中央文委秘

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等重要职务。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职务，主要任务是当哲学理论教员。

在有些人看来，这不是降职了么？当教员还不是有职无权的“教书匠”？但艾教员不计较这些，安心当他的教员。他常对我们说：“当好一个教员，就是为人师表，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好马列主义教员，更难，不仅要熟谙马列主义各门学科，还要懂得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艾教员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当了一辈子教员，是一个普通教员，又是一个不那么普通的好教员。

## 有血有肉

许多人都爱听艾教员讲课，我也是其中一个。这并不是迷信权威，崇拜名人，而是他讲课有血有肉，有观点有材料，内容丰富。

艾教员讲课，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也没有富于表情的姿势，总是平静地侃侃而谈，用清晰而坚定的云南音调，富有哲理的语言，有条有理的逻辑，来阐明他要讲的内容。他讲课很少带书，也很少引经据典大段引证，却用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丰富的材料，按照自己表达方式说出来，力求使听众明白易懂。因此，听完他的课，总感到是一次丰收。这是许多同志的反映。我多次听他的课，也有这样的感受。

艾教员讲了大量的课。我们不说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的讲课，就以解放后来说，在五十年代初，党号召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他不但在校内担任主课，而且还到校外去讲，还应广播电台邀请，开了广播讲座。《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一书，就是讲课的成果。一九五五年以后，党号召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就在校内外到处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原是那时讲课的一个提纲。一九六〇年前后，党号召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他又讲了许多次课，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稿。此外，他还讲过中外哲学史、形式逻辑、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甚至还讲过古汉语等。

艾教员是我国知名的哲学家，党政军机关和高等学校，都请他讲课，他还应邀到天津、西安等地讲学。艾教员对要求他讲课的单位，从不摆架子，有求必应，即使工作很忙，也想法挤出时间，满足邀请人的愿望。有人以为这是不务正业，"出风头"，而我却多次听他讲过："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工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老课新讲

艾教员多年讲课，许多课教得驾轻就熟了，但是，他决不因此墨守成规，随便应付。他每讲一课，总是认真准备，写出讲稿，时间来不及，也要写出提纲。他反对不经备课，信口开河。

一九六四年秋，我跟他一起到通县参加四清工作，为了准备一次出国讲学，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他思路清晰，出口成章，稍加修改，便成讲稿，但是，这篇稿子却改了又改，每讲一次，就改一遍。所以，他讲课虽是同一题目，也是老课新讲，不肯取巧省力。

艾教员讲课，善于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他非常注意联系当前实际，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因此，他讲课前注意搜集有关材料，调查听课对象。一九六三年去青岛给海军讲

课那一次，事先听取了海军情况的介绍，又专门召开了有各舰队司令和政委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了对讲课的要求和意见。舰队一位负责人说："艾思奇同志这种调查研究的学风，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 用志不分

记得艾教员讲过古代一个寓言：有个叫做秋的下棋名手，教了两个学生下棋，一个学生精力集中，一心一意地学；另一个呢，虽然也同样坐在那里听讲，眼睛也看着棋子，可是他心里老记挂着天空飞来了鸿雁，想拿了箭去射它们。结果一个学生很快学会了，另一个学生学了很久，还是没有学成。艾教员说，学习上专心致志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这个寓言给我很深的教育。其实艾教员是讲了他自己的学习经验。我早发现艾教员有用志不分的特点。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专心致志读书的习惯，不管人们喜笑打闹，一片嘈杂，他照样可以钻进书本。一九六四年在通县参加四清，有一次他正在看书，外面锣鼓喧天，人群喧哗，他竟没有听到。

我在他身边工作时，到他办公室去，常见他奋笔疾书，或是埋头看书。有好多回，见他停笔在手，聚神凝思，背靠转椅，两眼前视。我推门进去，他往往毫无觉察，在这种时候，我或者把文件放在他桌上，悄悄退去；或者立即退回，不去打断他的思路。

## 文思泉涌

跟艾教员在一起，闲暇中，我常向他请教一些关于如何写

好文章的事。

他常讲，我们搞理论工作的，脑子里要常装几个问题，不要使脑子闲着，有空就整整。看书、读报、阅文件、交谈、听广播、办事情，随时注意，一发现有关材料，就及时记下来。有时得到新的启示，脑子里会出现新的思想闪光，就要及时抓住，积累到一定程度，材料有了，构思成熟了，写起来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他多次讲到，要多练笔。肩膀挑担是压出来的，腿劲是走出来的，文章是练出来的。他说：写作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写作实践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的经验。别人叫你如何如何游泳，自己不跳到水里去，永远学不会。笔头同脑筋一样，越用越活。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动笔少了，骤然拿起笔来，就感到生疏、发僵。他说：要写作，就会逼着你学习，逼着你搜集材料，逼着你深入思考，只有不断地写，写多了，越写就会越顺畅，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得心应手、文思泉涌的境界。

关于写文章，他还说过许多，比如要注意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文章开头要引人入胜，要准确、鲜明、生动，要背一点经典作家的范文，要学习鲁迅的文风等，等。他针对哲学文章容易枯燥乏味，特别提倡文章要生动。他曾说，他打算用文学的笔法来写哲学文章，也劝同志们试试。

## 诲人不倦

艾教员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常和青年同志一起研讨治学之道。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讲读书、写文章、做学问的事，讲得亲切深刻，令人难忘。

我们学习中有了问题，就去向他请教，他即使工作很忙，也挤出时间，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写了文章，请他提意

见，他都及时地认真阅改。一九五五年哲学教研室资料室七八个青年人，配合宣传唯物主义，写了十几篇小文章，出了一本小册子，就是经过他认真修改的。

艾教员对年轻人的培养，不光是苦口婆心，言传身教，而是采取措施，见诸行动。

一九六四年中央组织部为培养接班人，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来请艾教员讲课。艾教员带了李振霞同志和我一起去，并让我们一起听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后的思想汇报，最后又让我们各作了一个辅导发言。我们怕这样的课讲不好，他说："这也是锻炼嘛！"逼着我们上讲台。

## 面向实际

艾教员对哲学理论，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更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他说过：哲学是高入九霄云端的东西，一定要脚踏实地。

从延安整风以后，他更加注意面向实际，争取参加各种实际的运动。一九五一年，他到安徽宿县参加土改；一九五八年，下放河南登封县锻炼；一九六四年冬和一九六五年春，参加北京通县和海淀区东北旺公社的四清。

两次四清，我都跟他去了，那是他逝世前一、二年，身体已经有病，血压很高，心脏不好。但一听说要组织工作队下去，便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坚持要求参加，他说："这是深入实际、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他穿着旧布军装，和其他工作队员一样打扮。他特别嘱咐我，要和农民实行三同。我们在通县城关公社住在一家贫农家里，在东北旺是住在一家下中农家里。下中农那家，卫生条件差，跳蚤太多，我先去住了一夜，折腾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

向他讲了这个情况，他说："不怕！可以用'六六六'杀一杀。""在延安时，许多人都有虱子，大家还开玩笑说：'没有虱子就不革命。'"

在农村，他还常争取参加一些劳动。我们说：你身体不太好，劳动就算了。他说："下来了，不参加劳动那怎么行呢？"在劳动时，他和农民亲切聊天，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许多农民知道他是一位领导干部，见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常打消顾虑，讲出心里话。他在农村的二房东，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哭得很伤心。

后来，他说："一个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土改、下放、四清，对我改造思想、了解实际，帮助很大。"

艾教员在讲课和谈话中，常以周总理的话当作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一辈子都在实践这句名言。

## "救命的书"

一九六三年一天，福建有位同志给艾教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三十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热情的青年，由于国家满目疮痍，民族处于危急，个人出路渺茫，精神上极端彷徨、苦闷、悲观，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大众哲学》，精神为之一振，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觉悟到国家民族、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奋起斗争。于是毅然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信的最后说，你这本救命的书——《大众哲学》，恳切希望能修改出版，这对广大青年仍是很有意义的。

我把这封信给艾教员看了，他只是淡淡的说："请你替回

封信，感谢他对《大众哲学》的过誉，其实，那本书写得不好，希望他多读点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这才是我们救国救命的书”。

一九六五年初，我和他同住在老乡家里，临睡前坐在土坑上闲聊。我说："这几年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希望艾教员重新出版《大众哲学》，读者要求很迫切，社会上很需要。”艾教员说："这本书是我青年时代的作品，写得并不好，还有一些错误的东西。现在，再版的禁令是取消了，但是我需要修改。如果给我一年时间，我想用文学的笔法，改得更好些。要抽出完整的时间可能很难，或者我说说意思，你来帮我的忙。”我说："这办法好是好，只是我的笔头还不行。”他说："有了空闲，我们可以试试看。”看来，艾教员是有这个打算，遗憾的是，没有能如愿。不久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大众哲学》，是被禁止出的一九五〇年的修改本。显然，在一九六五年，他自已也不满意了。但这却是他最后的修改本，也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

## 严于律己

艾教员对于别人的批评，只要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他总是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检查自己，只要是缺点错误，他就努力改正。

一九五二年，艾教员写过一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文章，当领导和同志们指出文章有片面性后，他就诚恳接受，不止一次作了十分坦率的自我批评。

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适时，在郭沫若同志主持中国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党内外一些同志对艾教员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有的很中肯，也有的是吹毛求疵。回校时，我和他坐

在一辆车上。我觉得有些意见提得不怎么样，为此抱不平。他却说："大家意见都很好，有了意见，我就可以修改了。"

但是，在学术观点上，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敢于坚持，而对于他认为是不对的，也勇于自我批评。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就是例子。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一九六六年他逝世，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一九五八年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但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他写了两篇文章，系统阐明自己的观点，这种勇于百家争鸣的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 谦逊谨慎

一九六一年间，原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曾收到一位曾在党校讲过学的苏联专家的来信，信中讲到，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在苏联翻译出版了，受到了苏联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认为是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有见解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信的最后说："我为艾思奇同志的成就高兴，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劳动没有白费。"这意思是说，艾教员的成就与他的劳动有关。教研室同志看了，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位苏联专家有点可笑！艾教员写这本书是这位专家的"劳动"、恩惠，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我把这件事对艾教员讲了，他笑了笑说："这本书写得并不好，我以后还要不断修改。现在受到苏联人民的好评，我很感谢，但与这位专家没有什么关系，是我们党培养教育的功劳。"

艾教员在延安时期，和毛主席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有许多交往。有一个时期，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论哲学。但他从来只字不提。他保留几封毛主席的亲笔信，还有毛主席对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的长篇摘录手稿。其中一封信上，对艾教

员评价较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校内外绝大多数同志都不知道艾教员有这样一份珍贵的手稿。我也是在一次整理他的文件和图书时，偶然看见的。我曾建议，为了妥善保存，再去复印一份，作为副本。他没有同意。后来去秣整时，却被阴谋家、野心家康生知道了，要拿去让理论骗子陈伯达和他本人题字写跋。艾教员坚决反对。这不仅是艾教员谦逊之意，而且是他谨慎的表现。

## 严格党性

艾教员特别喜欢马克思这句名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艾教员在青年时代舍弃学工，而走上哲学工作的道路，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早就意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强大武器。因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的全部心血，都贡献给了党的哲学理论战线。

我们好多同志都听他多次讲过：要学鲁迅，要听将令。作为共产党员，要听党中央的号令，要研究、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央新的指示下达了，他就力求通过文章、讲课来宣传。他非常注意阅读党的文件，每周机要科给的几十份文件，他都认真仔细读完。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他特别重视刘少奇同志关于我党工作中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客观分析。他要我抄录下来，并在讲课中作了引用。

艾教员非常遵守党的纪律。党委会开会的情况，党的机密，从来是守口如瓶。党内文件和会议内容都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从不让家属孩子知道。他素有严格的组织观念，经常参加

支部活动，实在不能参加，也事先请假。每月发薪，就想着先交党费，一交就是十元，远远超出应交数目。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把历年积蓄的钱，拿出一万余元交了党费，以支援党战胜困难。对个人利益，他从不斤斤计较，哲学教研室要买一辆公用自行车，没有钱，艾教员就慷慨捐赠。同志们实在有困难的，找到他头上，他总是解囊相助，而他个人和家庭生活却十分俭朴。

## 情趣高洁

韩愈有一句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惰。"艾教员多次对孩子和我讲过。他特别喜欢"劳谦"、"认真"这几个字。他写成条幅，张贴在墙上，以鞭策自己，勉励子女及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我体会，这其实是艾教员一生经验的总结，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也是他的学识、成就、进步源泉的揭示。

艾教员的生活是严肃的，又是兴趣广泛。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却酷爱音乐，一有空闲，就放唱机，听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和其他中外名曲。他还喜好体育，夏游泳，冬滑冰，每年坚持。游泳能游千把米，滑冰能滑许多花样。他也很喜欢爬山运动。一九五八年登上华山主峰；一九六四年我跟他登上过青岛崂山山巅。

艾教员每天生活比较有规则，一般情况下，早晨六点准时起床，先打二十分钟太极拳，再学半小时外语，听半小时广播新闻，早饭后即开始工作、学习，直至晚上十来点钟，中饭或晚饭后练半小时毛笔字。我在他身边工作这几年，从未间断。

他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常教育孩子要艰苦朴素，无论是对家乡亲友或家属孩子，也没有办过一

件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事。孩子上学很需要自行车，市场上供不应求，也不准我们向有关人员开口。云南有位熟识的老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几次来信，想请艾教员想办法，调动一下工作，艾教员坚持要通过组织，私人没有帮上忙。

## 敦厚诚实

在艾教员所喜欢的许多格言中，最喜爱的恐怕莫过于"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了。他常常大书特书，讲了又讲。在他看来，实事求是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马思主义世界观，是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特征的体现，也是他自己克一生践履笃行的生活准则。

同艾教员一起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对艾教员为人敦厚诚实，都有较深的印象，甚至有些反对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常常吃了亏，而无怨言。他对党忠实，对同志诚恳，胸怀坦荡，赤诚相见，肝胆照人。他厚道、善良、正直，不在背后议人长短，更不有意整人。一九五三年"三反"时被整而自杀的周文同志，艾教员在会上公开为之鸣不平。一九五八年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陈仲平同志被康生打成右派，他一直认为是冤案，一九六二年就积极奔走，为他平反，艾教员乐观地说："党是会实事求是的，老陈的问题一定会解决"。艾教员的敦厚诚实，获得了许多同志和朋友，使他和群众之间亲密无间。

但是，陈伯达、康生这伙坏蛋，却变着法儿排挤、打击他。陈伯达经常明里暗里说艾教员的坏话，诽谤他的《大众哲学》"没有一页没有错误"，"艾思奇是少年得志"，"艾思奇是唯心论者"，等等。康生胡说什么"艾思奇是'阎王殿'里

的人”，是“书痴”，是“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不高”，等等。陈伯达、康生曾长期窃取了主管党校工作的职位。一九五三年，在陈伯达操纵下，组织批判《大众哲学》，把这本历史上起过很好作用的畅销书，说得一无是处，并且下令禁止出版。一九五八年，在康生操纵下，由他的老婆坐镇，围攻艾教员，并发动贴他的大字报，企图把艾教员打成右派。后又强令艾教员带病下放河南，作为“惩罚”（艾教员却把下放看成是锻炼的好机会），使得艾教员生活道路坎坷。

在那运动频繁的日子里，在一些同志之间难免造成隔阂。艾教员对于无端的怨恨，乃至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话语，从不发火，不生气。有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同志竟然对他大发雷霆，拍案骂街，激起许多同志的不平，但他依然不动声色。

凡了解艾教员的人，都知道他性格上有一个特点：深沉、内向。他讲课时可以讲上一天两天，但平常言谈较少。坏人整他，同志之间有疙瘩，使得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心情不尽舒畅。这种境遇，对他的心脏病，是有害的一个因素。本来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至交的老同志也这样劝过他，让他向党中央、毛主席打个报告，但是，他凭着党性原则，敦厚诚实的品德，忍耐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了，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可是损坏了自己的身体，不然他可以为党工作得更长久一些。

## 优秀品格

“人要完人，金要足赤”，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艾教员也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由于忙于教学、研究，而对群众工作做得不够，更不善于做行政工作。在理论观点上，也有不正确

的东西。例如，在讲课中，有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情形，但是，这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全党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

艾教员的主流和本质是好的，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他为人诚挚、谦逊、敦厚、正直、勤奋、好学、谨慎、深思等等，这些都是他的优秀品格。我曾经反复想过，艾教员最值得学习的品格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学者和战士。

艾教员精通哲学，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学问，有独到的研究，是名符其实的学者。同时，他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革命，忠贞不渝；坚持原则，勇敢战斗；他为了党的理论事业，废寝忘食，呕心呖血。他是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战士。

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学者和战士”结合的优点更完美的了。学者，就是精通业务的专，也就是才；战士，就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自觉奋斗的红，也就是德。简言之，学者和战士，就是又专又红、才德兼备。这种优点，在今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是多么迫切需要啊！我想，怀念艾教员，就要学习他的这种崇高品格。

# 怀念艾教员

马清健

艾教员辞世整整十四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革命品质和道德风尚，在脑海里却越来越鲜明。十四年前，当噩耗传来恸哭失声的时候，我曾悲叹："艾教员离开我们太早了！"艾教员早已离去了，但对他的怀念却愈来愈深切！

第一次同艾教员见面，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那是一九五四年夏天，组织上刚分配我到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的时候。一天上午，一位满头浓密黑发紫檀色方正脸庞，双目炯炯有神、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的中年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身穿一条蓝布裤子，一件已洗得发白的淡灰短袖衬衣，手里拿着一叠稿子，以浓重的云南口音对一位女同志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帮忙核对一下引文，给抄一份？"那位女同志接受了任务之后，就给我们介绍："这是艾教员，我们教研室主任。这是……"

"好，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开始不熟，时间长了就好了。"艾教员说着，同我握了握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当时我一怔，呵，原来这就是哲学家艾思奇，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从前我读过他的文章和著作，也听过他的报告，但还不认得他。头一回接触，我怀着年轻人特有的崇敬心情和好奇心理，想了许多。一方面，有点激动，觉得他谦虚朴实，

对人和气，能在他指导下工作和学习，实在是幸运；同时，又有点纳闷，感到他过于严肃，不大热情，怪他不跟自己多聊上几句。更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称同志，不称官衔，只叫他艾教员，但新来乍到，又不好问。后来才知道，“教员”在马列学院是个尊称，并且逐渐习惯了这个称呼。在党校，跟他共过事的同志直至今天仍然亲切地叫他艾教员。经过在艾思奇同志领导下工作和学习，自己也渐渐深切地感到，他确实不愧为受人敬重的好教员，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表。

艾教员勤勤恳恳地从事理论教育工作，为培训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倾注了许多心血。他生前肩负着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主要重担。除了计划、指导和组织哲学教学以外，从高、中级干部轮训班、师训部、短训班、理论班、自然辩证法班到逻辑班，几乎每一期、每个班他都亲自讲过课。凡是教研室别的同志一时还不能讲的课，他都主动承担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形式逻辑以至中外哲学史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哲学领域的问题，他没有探讨过和讲授过。他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哲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其他机关、团体和学校来请讲课、做报告，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同志们看他工作负担太重，担心他的健康，常常叹息：“艾教员太好说话了！”他讲课次数很多，有时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或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每一次他都严肃对待，力求准确地讲解基本原理，宣传党的路线、政策，讲出新意，而不是应付差事，搞老一套，照本宣科。他讲课没有装腔作势的旁征博引，没有哗众取宠的秘闻笑料，只是老老实实把道理讲明白，讲透彻，往往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这正是一种老实的治学态度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曾号召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艾教员就是我国哲学界从事

哲学解放的开路先锋。从青年时代进入哲学战线那天起，他就在党的影响和教育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工作，为此毕生花费了巨大精力，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还有许多同志谈到，《大众哲学》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哲学解放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但不管征途上有多大的坎坷曲折，艾教员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就是在以“理论权威”自居的陈伯达、康生给《大众哲学》扣上“庸俗唯物论”等莫须有的罪名，禁止出版，嘲笑他“只会写纲要”，诬蔑他是“书痴”，面临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甘为那些显赫一时的“理论权威”们所不屑为，不论报纸、杂志、电台，还是出版社约写通俗读物，他都来者不拒。在他看来，把哲学交给人民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历史常常是捉弄人的。今天，那些“理论权威”们自命不凡的“大作”，不是成了反面教材就是早已被人们忘掉了，而他们所蔑视的《大众哲学》等等著作，却继续在人民群众中传诵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艾教员不但对哲学的普及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他认真钻研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系统的阐释和发挥。《辩证唯物主义纲要》，最初是他给党校哲学短训班讲课的提纲，似乎也属于普及一类的书。其实，这部著作凝结着他多年研究的心血，其中不少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至今仍然是有意义的。他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写了一系列有分析、有说服力、战斗性强的文章和著作。他还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留下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的斗争》等遗稿。

艾教员性格深沉，刚一接触，容易给人一种不大好接近的

感觉。但正如他自己说的："开始不熟，时间长了就好了。"在十多年相处中，我逐步了解，他虽然不是感情外露，象一团火一样的人，但对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蕴藏着一种持久的，不是倏忽即逝的热忱。一九五六年春，艾教员叫我给哲学短训班解答问题，我写了讲稿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耐心地指点：哪些问题应突出，哪些问题要从简，哪些问题该怎么讲，哪些问题应修改、补充等等，足足花了两、三个小时。真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我觉得占他的时间太多，有点内疚，暗想："如果艾教员自己解答问题，也许用不着花他那么多时间吧！"可这回我又想错了，他确实非常珍惜时间，极少跟人闲聊，但是，谁要向他请教理论问题，白天可以一谈就是半天，晚上可以一直谈到深夜。起初，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他从不过问同志们的生活状况，觉得他不大关心同志。后来才逐渐懂得，他的志趣专注于理论研究，他所关心的是同志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成长。

艾教员不但常常给同志们解答理论上的疑难，而且现身说法，传授自己研究和写作的经验，鼓励和指导同志们写作。他告诉我们："写文章不容易，可也不是那么难。脑子里要经常装着一两个题目，无论看书、备课或做别的什么事，同题目有关的就随手记下，材料积累多了，见解成熟了，写起来就不难。"一九六〇年他任党校副校长后，行政工作占去许多时间，他曾为此而苦恼，并用切身的体验劝我："文章是练出来的。过去精力集中，东西写得多，写起来容易。现在写得少了，拿起笔来就感到笔头硬，不那么容易了。你可记住，文章要多写才能顺畅。"一九六六年春，他身患重病，住进阜外医院，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仍然关怀同志们的成长，鼓励我们写东西。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永远的诀别，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艾教员的教诲了！

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政策，这是一个理论战士应尽的义务和党性的表现。艾教员提倡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学习鲁迅，要象鲁迅那样“听将令”，遵守党的纪律，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否则就会“失街亭”。每当中央有重大的决议，他都提出一些哲学问题，组织同志们进行学习和研究，贯彻到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去。这成了他领导下的哲学教研室的一个传统。他身体力行，通过讲课和写文章忠实地宣传党的路线、政策，但决不看风说话，推波助澜。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超出时代的局限。一九五八年，在一些问题上他头脑也难免过热，但就在当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夏天，下放河南回来，在教研室一次经验交流会上，他一方面歌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肯定总路线，同时又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这位理论战士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对于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艾教员勤奋学习、努力钻研、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是很感人的。解放前，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哲学，并且掌握了日、英、德三门外语。进城以后，在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情况下，他还坚持听广播讲座，自学掌握了俄语。借助于这几种外语工具，他能够准确深刻地领会和宣传马列原著的精神实质，而不致随波逐流，跟着某些不大准确的译文兜圈子。他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研究文史，注意自然科学上的新发展，也重视进行调查研究。向实际学习。下放河南登封县锻炼、“四清”曾多次到农村。就是在病危的时候，他还向组织上表示，要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学习。无论在理论问题或工作问题上，他都能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从不以权威自居，搞“一言堂”。在教学和研究中，他常常提出一些问题来同大家平等地商量和探

讨。他的见解，别人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他的文章往往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有时还请别的同志讨论、修改，自己择善而从，最后定稿，真正做到了古人所推崇的“不耻相师”。

同艾教员相处过的同志无不交口称誉他的朴实敦厚。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总是开诚布公，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改正，而不是轻描淡写，文过饰非。对于同志的缺点、错误，他能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有所改正就表示欢迎，而不是求全责备，揪住不放。实在称得上“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他遵守党的纪律，珍视党的团结，不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从未听他背后议论过别人的长短。人们常常把朴实敦厚当作懦弱无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不搞无原则纠纷，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却不怕流言诽谤，不屈从权势，敢于坚持真理，绝不看风转舵，拿原则作交易。

认识艾教员的许多同志都说：“艾教员是个老实人。”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时期，多么需要这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实人呵！

我们永远怀念您，艾教员！

一九八〇年

# 一位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联盟的哲学家

吴 义 生

艾思奇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为丰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从学习自然科学转而从事哲学工作，投身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行列，曾直接受到艾思奇同志的影响。后来我有机会进入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班学习，结业后，就留在他当年领导下的哲学教研室工作，受到他的许多教诲和帮助。他是我的老师，又是共同工作的同志，他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位哲学家，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他不仅深入研究了社会科学，而且广泛涉足自然科学，知识广博。在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开拓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领域中，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成绩是卓著的。

艾思奇同志早年曾在日本福冈工业学校学工，但时代的风云促使他放弃原来的志愿，毅然投身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潮流，然而，年轻的艾思奇同志并没有放弃自然科学，他遵循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研究与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很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哲学营养，坚持学习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艾思奇同志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读得很仔细，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严格的分析，既肯定科学内容，又指出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汤姆生编写的《科学大纲》，概述了当时的科研成果，不失为一部完备而通俗的著作，但又说它在选择内容上缺乏科学态度，书中包含着灵魂学一类荒诞无稽的东西，应当抛弃。当有人在《东方》杂志上大骂达尔文，攻击进化论时，他深入研究了生物学，确信进化论是科学真理，并写了《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用丰富的实验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推动了生物进化论的传播。艾思奇同志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他写的许多文章引起了当时理论界的重视。在这时，他还热心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书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科学小品也很有名。他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并以此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他写的那些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的科学小品，大都登在《太白》、《读书生活》等刊物上，直至到了延安，还可以见到他在报上发表类似的短文。一九三六年，艾思奇同志还和其他同志在上海发起和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

艾思奇同志到延安后，仍然重视自然科学，加强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积极参加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活动，与徐特立、于光远等同志坚持对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

科的理论研究。解放以后，科学技术急速发展，艾思奇同志深感科学的重要性，很注意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努力跟上科学前进的步伐。这个时期，他通过讲课、作报告、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强调科学的作用，启发人们积极学习和研究科学，动员干部重视科学。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必须抓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也要把握自然科学前进的脉搏，让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一九六一年，我毕业留党校工作，他同我谈过几次话，一再说，你们搞哲学，一定要注意自然科学，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关心新的科学理论和尖端技术，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他还引导我们注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科学的三大前沿，宇宙天体的起源和演化，微观粒子的结构，生命的起源等方面的新发现。记得在《红旗》杂志刊登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之前，他就很快把文章转送给我们看，要我们研究它的科学内容，结合唯物辩证法探讨微观粒子的可分性问题。一个哲学家，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这并不奇怪，但是能够随时把握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站在自然科学的前沿，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位科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初期，艾思奇同志应邀到清华大学讲课，当他讲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说明原子并不是物质结构的最小单位时，台下顿时哗然。有的同志说，艾思奇只懂哲学，并不懂自然科学，原子怎么还能分呢？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实验证明，原子不仅可分，“基本”粒子也并不基本。这说明，艾思奇同志对自然科学理论的理解是非常敏锐的，也说明自然科学家多么需要掌握唯物辩证法！

艾思奇同志信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向科学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致力于辩

证唯物主义的宣传，写了许多文章，通过分析国外科学家，如洛治、汤姆生、爱丁顿等人的研究道路和遭遇，指出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能把握所研究的问题的实质，因而没法解决科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那些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人必然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的说法，是十分片面的。况且，自发的唯物主义是经受不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的袭击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许多科学家在科学上卓有成就，最终却又走向唯心论，相信灵魂之说，把科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这种可悲的结局便是明证。

解放后的十多年中，艾思奇同志一如既往，继续结合时代的特点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情况，探讨自然科学中的理论问题，进一步阐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即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会推动科学的前进。因此，他再三向我们强调，搞哲学的同志，要重视和学习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则要学习哲学，这样才能共同进步。关于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问题，艾思奇同志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那种把哲学庸俗化、简单化，妄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只能给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立场、观点、方法，指引正确的方向，解决一些原则问题。自然科学中的具体问题，仍然要靠科学本身去解决。一九六一年，在他主编的哲学教科书中，特别强调了这个思想，指出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各门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离开各门具体科学去学习和研究哲学，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可能会得出有害的结果。“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散布了种种谬论，搞得混乱不堪，应当加以批判和澄清。在全面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向

科学进军的今天，回顾艾思奇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和理论活动，对于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有益处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巨大进步，自然辩证法已愈益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而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自然辩证法也已发展为独立性很强的研究部门，而艾思奇同志，则是我国最早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之一。他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并且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当时，他研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而且还向国内作了介绍。他在探索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后，写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等，这是国内较早的自然辩证法论文。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更热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提倡学习《自然辩证法》一书，把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看成是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央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他积极支持，并直接抓这个班的学习。他认真贯彻校领导的意图，亲自讲课、作报告，先后讲授了《自然辩证法》中的《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辩证法（札记）》和《反杜林论》中的有关篇章，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他对我们说，开办自然辩证法班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宣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人才，搞自然辩证法工作要掌握两方面的知识，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较好的哲学基础；再就是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熟悉其一方面的专业科学理论，包括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史的知识，熟练地运用这两方面的知识，去解决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实际问题。据此，校领导部门安排学员在学习期末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一书。在艾思奇同志的指导下，书很快编出来了。这本书，是国内写的第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它力

图总结自然科学的历史成果和最新成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阐述自然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这个尝试，对于我国后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艾思奇同志在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活动，对学员提高独立研究的能力，帮助是很大的。结业以后，大家奔赴全国各地，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每当我们参加各种专业会议，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那一段的学习和生活，怀念艾思奇同志。在结业时，他给我们留下的临别赠言“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至今还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在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方法上，艾思奇同志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学好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列的一些著作，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是为尔后的研究打下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必须跟上自然科学前进的步伐，补充以大量的新的自然科学材料、著作和新的哲学理论，不断丰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扩大研究范围。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包括技术）领域，既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艾思奇同志不仅对现代物理学中基本粒子无限可分性一类问题感兴趣，对机床中的辩证法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还认为，既要从认识自然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且要从社会的角度，从总体上考察自然科学。这就是说，仅仅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科学是不够的，还要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然科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解决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问题。这是因为，自然科学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离开社会、阶级、生产、哲学等方面去纯粹研究自然科学现象，就不能弄清科学的本质，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只要把科学放到社会总体中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它既是生产力量，又是一种

精神力量，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科学的发展既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又对社会起重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里表现是不同的，还需要联系具体的社会制度具体分析它的作用，研究其发展的规律性。这些见解是自然辩证法中自然科学观方面的重要内容，在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今天，重新领会艾思奇同志的这些研究成果，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正当艾思奇同志在哲学方面，其中包括对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研究不断获得成果时，不幸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研究因此中辍。他在一生中虽遭受过一些波折，但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兢兢业业，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他的遗产，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继承的。我以上的叙述，只是一鳞半爪，也许还有不确切的地方，作为一个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有责任把它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并用它来丰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多了，这段时期，现代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又有了巨大的进展，社会也发生了大的变革，但是自然宇宙的奥秘仍然有待智慧的人类去探索。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开始新的长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已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今天，我们纪念艾思奇同志，要学习他献身党、献身人民、献身党的理论事业的崇高品质，以他为榜样，热心科学，热心哲学，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一九八〇年

# 艾思奇同志和读者心连心

刘　伦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所在志愿军部队打了一次大的战役，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当时，我担任志愿军某部六支队三营文教主任，在战地上搞宣传鼓动工作，和指战员一起冲锋陷阵与守卫阵地。及至停战以后，部队的行踪比较稳定，除练兵之外，还开展文化学习，我又有时间看书了。趁着空隙，我从老教导员祁家声同志那里借来一本《大众哲学》。

这本书，老教导员多年带在身边。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部队行动不测，爬山涉水，练兵打仗，生活异常艰苦，往往要克服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因此，每个人都力求轻装，随身携带物品一减再减，而营教导员祁家声同志却把一本《大众哲学》从国内带到国外，作为宝贵的精神食粮，伴随自己出生入死。这是一本什么书呵，值得教导员如此珍惜！在借的时候，老教导员对我说，这是一本好书，里边有战火，也有真理，从它问世起，它就象火炬一样在革命青年中间传播着。

我怀着求知的欲望，越看越感到兴趣，竟从头到尾一连看了三遍。名不虚传，这本书果然是初学哲学的入门好书。同时，我又觉得，书虽然好，但许多例子看来已经过时，举的大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其中有些迫于当时的形势，意思若明若暗。我的这些想法，真想给作者说说，因而产生了给艾思奇同志写信的念头。我在信中说，这本书很适合广大工农兵的口

味，浅显易懂，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能读，读了脑子开窍，能长智慧。为了帮助读者学习哲学，我诚心地建议他结合当前实际，尽快修订重印《大众哲学》这本书。

出人意料的是，信发出不久，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我在朝鲜前线接到了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的亲笔回信。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刘伦同志：你的信收到了。你对于《大众哲学》的缺点，说得完全对，但对它的好处却估计过高了。这本书由于早已过时，三年前就停止出版，以后也不打算再版了。如果要出版，那只能是另外写一本完全新的。但这在短时期还难做到。

我没有其他重要著作，几年来写的文章，打算编一本集子，大约六七月后才有可能出版。我的文章，不值得你那样高的热情来读，我以为，你应该用最大的热情去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算是一个建议。

为祖国向你们致敬！

艾思奇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

一位负有盛名的理论家，工作任务那么繁忙，却抽出宝贵时间给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回信，我当时真做梦也没想到。艾思奇同志的亲笔回信，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非常感兴趣，争相传阅。大家由衷地感谢祖国亲人的热情问候，感谢哲学家艾思奇同志对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青年战士的关心和鼓舞。我们的教导员祁家声同志是《大众哲学》的老读者，读罢艾思奇同志关于这本书的回信，更是欣喜异常。令人痛切的是，他在一次完成紧急任务时，壮烈地牺牲在英雄的朝鲜土地上，他的遗

体就安葬在三八线北边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陵园里。那本与他形影不离的《大众哲学》，想必也已销铄在朝鲜战场烽烟之中。真理长在，烈士的英魂不朽。

艾思奇同志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和读者心连心的感人气息。他那么谦虚诚恳，平易朴实，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宽阔的胸怀和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可贵品德。他对领袖的热爱和对领袖著作的推崇，也极大地感染着我们。真是文如其人啊！在读《大众哲学》之前，我曾经读过艾思奇同志的另一本著作《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追想起来，这本书对于我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特殊重要意义。我是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自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九年，我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在学习社会发展史时，学校把这本书列为主要教材之一。这一阶段的学习，使我们初步明确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国家观点和阶级观点，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在我的人生观转变过程中，确有启迪作用。

正因为这个缘由，艾思奇同志的信使我倍感亲切，因此，我一直极为珍重地保存着它。这封信跟随着我，走过了千山万水，经过朝鲜北部的许多地方，回到祖国，第二次又入朝，多次行驶在鸭绿江大桥上，从硝烟迷漫的战争岁月，到参加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直至一九五五年，奉命调回祖国学习、工作，我一直把艾思奇同志的信保存着。

一九六二年秋天，艾思奇同志应天津哲学学会的邀请，到天津讲学。有一天，他在干部俱乐部礼堂，给市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干部讲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写过程和内容概要。我终于亲自看见敬慕已久的学者艾思奇同志，又聆听了他的报告，我的心情自然是非常激动的，再加上他那封鞭策着我探求真理的来信，我真想和他说几句心里话。

第二天，在河北大学会议室召开各校哲学教员座谈会，我也在场。艾思奇同志讲了哲学工作者的战斗重任，还讲到一个理论工作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和勤奋精神。他建议大家除刻苦阅读经典著作外，不妨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他赞誉这部著作文字精炼，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名篇。座谈会结束后，艾思奇同志在院子里稍事休息，我怀着点儿紧张的心情上前问好，把我在朝鲜前线曾接到他的信一事告诉他，并感谢他的指导。艾思奇同志略一思索，立即记起来了，我们紧紧地握手，他嘱咐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

艾思奇同志二十六年前给我的信，鼓舞着我去战斗和学习，十八年前的亲切握手和教诲，时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艾思奇同志是我们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尖兵。他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争取自由解放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风风雨雨数十年，虽几经坎坷，但始终磨灭不了我对艾思奇同志深深的怀念！

一九八〇年

# 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几件事

李振霞

艾思奇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十七年了。每当回忆起艾思奇同志，他那栩栩如生的形象，总是伴随着他的举止，一幕一幕地呈现在眼前。大海的怒涛，咆啸着拍打，冲击岸边的沙石。生活的激流，对于历史人物，也无情地冲洗着。回首眺望艾思奇同志走过的脚印，虽然他并不能超越所处的时代，也有走偏、走错的时候，但通观他的一生和我所能够直接接触到的五个春秋，艾思奇同志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个正直勤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理论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而且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尽管他在有些时候，对某些“左”的观点，也作过宣传，但是，他却坚持了不作“书斋哲学家”的道路。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不论是治学或对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这好象已经成了他特有的气质。在他逝世后，我发现贴在他的书柜上的墨写的手迹：“谨言之，慎行之”六个大字。这可能是他的座右铭吧！他沉默寡言，老老实实，总象是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思索当中。这也许是他所以能留给后人那么多宝贵精神遗产的一个缘由。一篇短文难写下一个人五个春秋的所见所闻，更何况还有他离开我们以后的十七年的对他著作的学习和联想呢？在这里，我只想写几件深深留在自己记忆中的事。

## 我开始认识艾思奇同志

我是一九六一年调来中央党校才认识艾思奇同志的。

过去，已久仰其名，从报刊、杂志和书籍上，作为一读者，我常常和这位作家见面。在我的想像中，由于把他的名字常常同“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仅他是《大众哲学》的作者还是大哲学家、大学者等等，所以，总以为他是有几分“圣气”，难以接触的大人物。来党校后，我第一次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他主持的哲学教研室的会议上。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干部服，样子是那样的普普通通，平易近人。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质朴谦和，既象一个深思熟虑的学者，又象我在解放初期所见到的经过战火磨炼的令人尊敬的许许多多的老干部中的一个。当副主任把我作为一个新来的同志介绍给大家时，他说：“好嘛！我们又增添了新生力量。”他话讲得是那样诚恳，令人深深感到一种对新来到同志诚挚的欢迎和热切的期望。从此，我就和这位尊敬的领导和老师在一个单位，度过了五年难忘的岁月。

## 和群众在一起

“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脱离群众，就没有生命了。”这是我亲耳聆听到的他的一句话。生活中，他严格地遵守着自己的这个信念，矢志不渝。

一九六四年，我们教研室的一部分同志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他的年龄和在校的繁重工作，本来可以不下去，但是，他根据组织的安排，还是欣然到农村去了。第一期社教运动，他被分到通县城关公社南关大队。他是带着准备出

国讲学的任务下去的。晚上他要准备讲稿，白天他还和一般队员一样，深入实际了解农民群众。第二期社教运动，他又随着我校的同志来到京郊的东北旺公社。鉴于他的心脏不大好，为了保证他的休息和饮食，开始在公社办公室里，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好的住房，在公社食堂就餐。可是，他一开始就提出要住到老乡家里，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在他的诚挚的要求和坚持下，没过几天，他就住进一个贫农老大爷家里。老人家只有一个儿子，大娘早已去世，艾思奇同志就同这位老大爷家住在一铺炕上，吃在一起。艾思奇同志逝世后，他的长子李昕东和一位生前友好，曾来看过这位老大爷，组织让我陪同。老人坐在小炕桌旁，指着炕上光光的席子哭着说："几个月来，我们就睡在这里。"他又用手指指小炕桌说："在这上面，我们一起吃饭。我吃啥，他吃啥。我生活紧，没有好的给他吃，我吃稀饭，他吃稀饭；我吃玉米饼子，他也吃玉米饼子。他说我困难，给我粮票、钱，我不要，他一定要给。他话不多，但也常和我唠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好心人啊！"他哭得说不下去了。老人的儿子也一起说着，啜泣着。随行的同志把群众对艾思奇同志的深情，收入镜头里。

当时，东北旺有一位盲人青年，由于自幼刻苦学习，能借助盲文阅读哲学书籍。艾思奇同志非常关心他的成长，李昕东和我们一起也去探望过这位青年。这位盲人青年哭得十分悲痛，他好象是一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流畅地表述了对艾思奇同志的思念。他谈得很多，事隔多年，已记得不完整了，只记得他说："惊闻艾思奇同志逝世，我几天吃不下，睡不好。""我真没想到，我这个农村的瞎孩子，能有这样一个大哲学家指导学习"，"他吃了晚饭后常来我家，谈这谈那，他对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有一副多好的心肠啊……"。

艾思奇同志这位"大哲学家"，对群众没有一点架子，走

到哪里，群众喜欢他；离开后，深深怀念他。在他逝世以后，我曾听他爱人说，艾思奇同志一生住的除了炕，就是木板床。党校的同志多次要把他的木床换上钢丝床，他不换，说："平时睡木床，到老百姓家时能睡着觉，我是要经常下去的。"

艾思奇同志在解放后来到了城市，但他并没有忘却生长、哺育过他的"大地"。紫禁城的秀丽风光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并没使他丢掉与广大劳动群众的鱼水之情。

## 对青年的关怀

我们第二期去东北旺公社的社教工作队，办了一个《队员园地》，不定期出刊。经常有些年轻队员写稿，谈他们和群众的接触、收获体会、感想等等。来的稿子不少，我们不想麻烦艾思奇同志，不要求他每篇都看，只是希望他帮忙看看有关谈到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之类的文章，可是，艾思奇同志却要求都给他看看。看后，在文章上，有时留下他的批语；有时留下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有时他还亲自动手改。当我们把他的意见传达给队员时，大家都感到很受鼓舞。有的同志说，校长能帮助我们改这种小文章，真没想到。同志们又都感到他要求很严格，从内容到文风以至用词，他都常常提出意见或进行修改。

艾思奇同志在学校，平时对教研室的年轻同志，要求也很严格，而且十分关怀。我自己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来党校时，是二十六岁。由于在沈阳的一个大学教过四年哲学原理、原著课，来中央党校后，希望能研究得专门一些，想搞搞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组和辩证唯物主义组，都需要人，我深怕愿望实现不了。一次，艾思奇同志作为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你来了，我们很欢迎，希望去哪一组？"当我说了自己的兴趣时，他说："好！这里面很需要人。女同志从事中国

哲学史研究的不多，你要搞，就下决心搞下去，搞出成绩来，但这要下苦功夫，没有苦功夫，办不到。"按着他的"下苦功夫"的严要求，我当时请文史教研室的李熙波同志每周辅导一次古文课，还有计划地读一些哲学史著作。一次，在我给学员辅导了关于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哲学思想后的几天，艾思奇同志在校园里遇到我，鼓励说："听说你辅导了龚自珍，苍天不负苦心人啊！"一九六三年初，我生病，他到家里来看我时，又谈到哲学史问题，他说："你搞的工作很有意思，也很有出息，选了路，要一直走下去。"后来，我的苦心随着十年动乱付诸东流了。今天，在我重新又来为研究生准备中国现代哲学史课时，真是百感交集。可以告慰艾思奇同志英灵的是，我又在这条路上迈步了。

## 忘我的工作精神

一九六五年以前，艾思奇同志曾带领我们几位同志，一起办过一段校刊，他任主编。校刊从内容上检查，不可能不留下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印痕。这艾思奇同志是有责任的，但也很难都由有他个人负责，这里不是谈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想谈谈艾思奇同志在编校刊时现表现出的、令人长久难以忘怀的忘我工作精神。

党校的校刊，几起几落，一九六三年又恢复。在一段时间里，校刊室没有桌子，编辑同志都围坐在一个乒乓球案边审稿。同志们原预定，将稿子选出后，送到艾思奇同志办公室或家里，请他审阅。艾思奇同志挚意不肯。每次审稿，他都和我们一起坐在乒乓球案边，一篇一篇地看原稿。有些稿子字迹潦草，篇幅很长，我们轮看后，已决定落选的，他也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星期日我们加班，艾思奇同志也一起加班。工作兢兢

业业，一丝不苟，这又是艾思奇同志身上的一个特点。

我最后见到艾思奇同志是在医院里。就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我们室的几位同志去看他。他请我们坐后，又把一个个苹果送到我们手里。他的举止和平时一样的安祥，步态稳重，但又不显得迟缓。他说自己的“病好多了。我想过几天就出院，还有很多事等着做呢！”他还说自己的病“本来不严重。照了心电图后，我就去开会，是一位老医生来，看到心电图后，一定要把我接来住院，”“唉！他们的工作认真负责，其实，我还可以不住院”，“前一段我还去温泉公社爬了山呢！”听他家里人说，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工作起来，总是忘掉自己，什么时候问他，他的自我感觉都是“良好”的。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毛病”，使他在凶恶的死神逼近时，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呢，在住院时继续看稿子、想问题、起草文件……等等。

艾思奇同志无私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作为一个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身上有许许多多特点，它激励人前进，令人回顾、怀念。当然，和历史没有直路一样，艾思奇同志的一生，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但无论如何，他的哲学家的头脑和有益的探索，所给予人的启迪鞭策，以及在人们心中所留下的印迹，是难以磨灭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中央党校

# 《艾思奇文集》序

周　扬

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先后认识了两位从遥远边疆来的云南青年，这两人后来都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在音乐和哲学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左翼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我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位是著名音乐家聂耳同志，一位就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我初次和聂耳见面的时候，田汉同志开顽笑式地给我介绍，这位的名字叫“四个耳朵”，我才知道是聂耳，因当时有人在旁，我只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没有深谈。后来，他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赢得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也更引起了我对他的敬慕。不幸，正当风华正茂之年，邻邦的无情海水吞没了他的生命。我认识艾思奇同志则是读了他的哲学著作，知道了他的进步活动之后。我专程到读书生活社去拜访了他，作了亲切的交谈。艾思奇同志一九三五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去延安，周立波同志和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他前往延安的同行者。我们在延安和北京，相处数十年，只是除工作上的联系外，私人来往很少。但他的为人敦厚，待人真挚，治学勤奋，文风明快，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确是我所深知和敬佩的。一九六六年初，我们同住阜外医院，他曾来探望我，他说我们不要被病魔所屈服，我们还可工作二十年，说时充满了革命的自信和乐观情绪。他走时，我久久地遥望着他的瘦弱的背影，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

的诀别。时光如流，现在艾思奇同志逝世已经十四年了，《艾思奇文集》即将重新编定出版，我现在写几句话来表示我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毋须介绍，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党的理论战线的光辉战士。他一生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方面，贡献很大。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生涯开始于三十年代初。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身。

在旧中国的哲学界，除了几个先后卖身投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为人所不齿的老唯心主义者以外，还有一些远离人民的哲学家，他们的倾向互有不同，后来的变化也很不一样，但在当时，他们由于完全脱离人民的斗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抹杀和反对的态度，实际上起了为反动派的统治粉饰升平的作用。艾思奇同志从来同这样的哲学家无缘。他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在上海所写的哲学文章就很少空论，这些文章或则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教育青年，或则向着种种错误的思潮开火。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的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到一九三五年结集出版成为《大众哲学》一书，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同志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艾思奇同志到延安以后，即在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他逐步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毛泽东同志对艾思奇同志所写的《哲学与生活》一文予以积极的评价，并在个别问题上提出了商讨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提倡哲学走出课堂，艾思奇同志就正是这样做

的一个先驱者。在著名的整风运动中，他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这一原则。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比以前的作品显然更加深刻了。全国解放以后，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继续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艾思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给中国的读书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艾思奇文集》收集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这些著作，包括一部分早期的著作，作为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入门读物，作为批判哲学唯心主义的战斗成果，至今仍然保有它们的生命力。我们希望，《艾思奇文集》的出版，将鼓励当代的青年哲学家们继承作者始终饱满的热忱，在新时期的思想战线上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作出勇猛坚实的努力。

一九八〇年四月

# 读《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胡　绳

艾思奇同志是在哲学和思想战线上勤劳工作了一生的学者和战士。想到他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他在三十年代写的《大众哲学》，这是曾经起过广泛影响的一本书。在《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这本书的全文。

《大众哲学》最初是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的。我当时是这个杂志的读者，也就成为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所启发和鼓舞的众多青年读者中的一个。

现在重看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个作品，不免感到它有不少不足之处。其实它的作者在成书以后不久自己已看到书中内容有些缺点。例如他曾指出（见《文集》第1卷第286页、290页、316页等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书中是说得不完全或不恰当的。据《文集》编者说，《大众哲学》在全国解放前印过三十二版，作了较大修改的是第四版和第十版。《文集》中刊用初版本，刊载了第四版和第十版的序文。我以为《文集》编者这样做是适当的。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找出这本书的缺点并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倒是看看为什么这本书当时能够赢得那样多的读者，在读者中起了那样深刻的影响。

《大众哲学》问世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书中却很少讲到当时的时事，作者承认这也是一个缺点。他是在爱国言

论受到禁锢的政治环境中写这本书的。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写的文章中仍只能委婉地说明这一点："环境的困难"使他"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这就是为什么在书中"不把例子举得更现实一点，却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的缘故。他冲破了法西斯言论统治的罗网，以当时一般青年能够接受的形式，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避开了现实的例子不举，但是使许多青年读者在思想上打开了新的天地，帮助他们初步地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启发他们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艾思奇的这一功绩是不能磨灭的。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中有不少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的一些托派分子和在艾思奇当时的有些文章中给以批判的叶青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自吹自擂，装腔作势，傲慢地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他写的其他文章则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娓娓而谈，不摆架子，不故弄玄虚。读者感到他们所遇到的是和他们在一起诚恳地追求真理的朋友。假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能使人受骗于一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忠诚地进行战斗的许多人抱着对《大众哲学》的良好忆念，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和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不少通俗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的书，对当时的青年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通俗化的工作虽然不是从艾思奇开始，但他的《大众哲学》确是出的较早、获得较大成功的一本书。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工作。现在做理论普及工作的人，回头来看看《大众哲学》，还是能得到一些教益的。

据我记忆，在《读书生活》杂志出版以前，《申报》上有

过一个答复读者提出的生活和学习问题的专栏。这个专栏的主要撰稿人艾思奇和柳湜就是不久后创刊的《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在这个杂志上每期也都刊有答复读者的信，很受读者欢迎。《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好多篇他在杂志上写的复读者信。我想，就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和读者亲切地交流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艾思奇的文章的风格和特点可能是和他曾用力地做这样的工作有关吧。

收入这一卷文集中的，还有作者在上海时期（一九三七年以前）和他从上海到延安以后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所写的许多篇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的论文。

这些论文中有的观点，现在看来是可以商酌的。例如他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几乎完全看成了同一的东西，其实，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对立的，而形式逻辑是人们说话和写文章都不能不遵守的规则。如果考虑到当时有许多人以形式逻辑的名义反对辩证法，作者在进行反驳时出现了这种偏颇是可以理解的。读前人的论著时，不必讳言其中的缺点，但也必须体察作者立言时的各方面的条件，这样就不会只看到缺点，反而看不到包含在这些论著中的基本上正确的、可贵的内容了。

艾思奇的许多论文批判了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与反动政治相联系着的各种反动思潮。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艾思奇的批判文章和其他文章一样，不是浮嚣的喊叫，而表现了着着实实的、认真严肃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战斗性的，但战斗性并不就是要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出现。条分缕析，从容不迫，以理服人，则是值得提倡的作风。

文如其人。读艾思奇的文章就想到他的为人。他是既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热情，又具有谦逊、朴实的学者态度的一个人。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因投稿《读书生活》而认识艾思奇的，这时也认识了在读书生活出版社从事写作工作的柳湜、廖庶

谦、曹伯韩、陈楚云等，还有这个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这些同志已经先后去世，他们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做了值得怀念的有益的工作。

《艾思奇文集》在作者去世十六年后出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在粗粗读过已经印出来的第一卷以后写下这点感想，既是为了向读者介绍这个文集，也是用以表达对已故的战友的追思。

（原载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

# 《论文化和艺术》前言①

丁　玲

艾思奇同志在我们见面以前，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并且看过他写的《大众哲学》。这是一本早期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读物，在青年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导青年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上海发表的一些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文章，用哲学观点阐明文艺问题，中肯而深刻，可以说也是不朽之作。后来在延安，又读过他发表的许多关于文化、艺术的论文和杂文。这些文章，大都紧密结合实际，文字通俗，观点明确，说理清楚，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是文化战线上的得力之作。现在时隔多年，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人们常说，文如其人，确实这样。我对艾思奇同志的为人，也有很深很好的印象。只要一谈到他，我总是不由地升起敬重和怀念的深情，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优秀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

一九三九年冬天，我正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中宣部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要调我去边区文协工作，同时兼筹办延安文化俱乐部。我到陕北已经三年了。三年间开始是做点文艺组织工作和编辑工作，接着是学

① 《论文化和艺术》，艾思奇著，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

习。这时，我很想专门从事写作。但在这里，好象还没有人不做工作而专事写作的。我那时很单纯、很幼稚，只以为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尽管我想写作，但对成立文化俱乐部究竟要做些什么，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去中组部转组织关系时，李富春同志也给了我鼓励。我带着简单的铺盖、换洗衣服、日用什物，由蓝家坪马列学院涉过延河到杨家岭后山沟的边区文协去报到了。那时边区文协的主任是艾思奇同志，柯仲平是副主任。住在这里的，大约有二十来个"文化人"。

李富春同志同我谈话中，有一句话曾使我很担心。他说："你在西北战地服务，做团结工作还是有经验的。边区文协有一些文化人，需要有一个人经常住在那做日常工作。"是的，艾思奇同志当时住在中宣部，也在中宣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柯仲平同志领导民众剧团常常下乡，也不在家。现在把我调去住机关，我将陷入一些无休止的人事问题中。这怎能创作呢？我听后，心里惴惴不安。可是，我到了文协，相处一阵之后，我感到大家相处得很好，很和谐，同志们彼此亲近，根本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人事纠纷。这里党员数目少一点。但是几个非党员都表示渴望早日解决他们的党籍问题（后来也都陆续解决了）。我细细观察，细细思索，我觉得机关里这样团结和睦的气氛，是同领导人艾思奇同志的工作作风和为人的品德很有关系。艾思奇同志是一个温和忠厚的人，遇事从不急躁，对同志诚恳和气，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他向我介绍文协每个同志的思想生活和来历，总是说他们的好话、长处。我知道的确有几个同志因为和原单位处得不大好才要求调来的。来文协之后，他们生活得很平静，都兢兢业业工作，埋头写作。另外一些同志，是从国统区到延安由中组部介绍来的。一位学哲学的同志在机关管总务，隔三天给大家发一次蜡烛。每当他在窗外叫唤："发蜡啦！"我心里就感到一阵歉意，急忙放下工作，跑

出窑洞领蜡。一位学历史的同志管理图书室，书籍不多，整理得很有条理。机关开始只有一个老炊事员，一个事务员，一个勤务员，其余事都由这些所谓文化人自己担当。艾思奇同志过几天或一个星期来一次，同大家开会谈心。他对我是完全放手的。我刚到文协，没有名义，大家把我当作副主任。一九四〇年，边区开过第一次文代会以后，由吴玉章同志担任主任，艾思奇和我担任副主任。这时因为他的工作多，文协的事，他管得少了，却仍很关心机关的生活，遇事找他，他都尽力帮助解决。我们相处一年多，我有缺点和弱点，从来也不用担心他会趁机整人。他从来也不会，也没有向上级领导谎报军情，背后说同志的坏话，或者用笑谈方式在领导同志面前讥讽同志，造成对一些文化人的坏印象。他是一个好党员好领导，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看，全文协的同志都有类似的看法。他和我，还有师田手同志、雷加同志、吴伯箫同志等一块工作，和衷共济，患难与共，环境再艰苦，条件再差，工作再紧张，大家心里始终是高兴的。我调到解放日报社，主编文艺栏，和艾思奇同志来往少了。一年以后，我调回文抗，参加领导文抗机关的整风学习，常去中宣部，又常碰着他，他还和先前一样，他不是一阵热、一阵冷的人，也不是一阵风、一阵雨、随风转舵的人。象他这样正直的人，即使在延安，也并不是普遍的。人的一生最难的就是在死后，在离世很久之后，当人们再想起他，谈论他的时候，却总也想不到，找不出他有什么不好和对不起人的地方。艾思奇同志在文协工作岗位上许多年，身居要职，并不煊赫一时，从不令人生畏，而只是令人怀念，深深怀念。我想，革命者还是应该取这种忠厚，而不会去羡慕那些权势和权术。

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重印前言"里，曾提到艾思奇同志。这部小说能够于一九四八年在大连出版，艾思奇同

志是尽了力量的。那时他受胡乔木同志的委托，审阅这本书的原稿。他读了之后，给过我很大鼓励，说这本书是最早地最好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建议有关方面早日出版。他不会说假话。他是用欣喜的神情同我谈这些话的。多少年的同志式的关心和感情，使我感激。我很愿意和这样的同志相处。可惜，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还是分开了。全国解放后，我们见面就更少了，虽然彼此仍然很关心。前年我从东北农村回来，找寻一些老熟人时，其中艾思奇同志已不在人世多年，再也无法见到他了。

我回来后，王丹一同志曾几次来看我，见面时，自然要谈起艾思奇同志，谈起他的书。我早就想写点回忆艾思奇同志的文字。现在趁他的这本集子出版的机会，我很愿意写几句话，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

# 《艾思奇文集》出版是哲学界的大事

## 哲学工作者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

李 培 南

《艾思奇文集》的出版是哲学界的大事。

第一、《文集》记载了艾思奇同志从事哲学活动的一生，他的一生，都是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战斗。

《大众哲学》是在三十年代写的，当时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特定环境下从事战斗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试想当时中国有几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呢？那时中央苏区党校里博古同志讲课时还在用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读这本书仍给人很多知识和很多启发，我们哲学工作者可以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吸收营养和知识。

第二、艾思奇同志的哲学著作说理清楚，通俗易懂，能发挥启迪教育的作用。他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在抗大任教，此后在哲学研究中有更多的成就。当时我也在抗大任教，他处事为人谦虚谨慎、忠厚诚实，他以实事求是的作风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是一致的。艾思奇同志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了一代青年，其中许多同志已成为党的领导干部，他对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很大

作用。

第三、学习艾思奇同志的精神，对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和大学的哲学教师来说，应该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关心和了解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社会各界的思想状况，使哲学的宣传教育更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艾思奇同志是在三十年代那种环境中进行战斗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更可以充分地把问题说清楚了，为什么不能更好地发挥哲学的战斗作用呢？

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努力写出有时代特点的、有针对性的、有战斗性的、思想理论水平更高的哲学著作。

## 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

冯 契

我做学生的时候就读了《大众哲学》，尽管年龄相仿，但艾思奇是我的老师，我到延安后也曾听了他的课。全国解放后我到北京讨论教材时，又同艾思奇同志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艾思奇同志为人诚恳，特别对青年关心和爱护。他对一些理论问题钻研得很深、很透彻。我受他的教育很大。

《大众哲学》的特点是联系实际，使哲学为群众服务，为青年所掌握。这本书非常注意用哲学解决现实问题。

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在当时抓住了这一点，所以才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搞哲学的人如果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懂得这一点，所谓联系实际就会浮在面上。把握时代脉搏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根本点，理论联系实际就要从这根本点上来考虑。

哲学要有体系，但体系是要发展变化的，哲学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哲学工作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来回答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

## 哲学要回答群众的问题

胡 曲 园

回想起在抗战前，我跟艾思奇同志一起在上海参加地下哲学小组的活动，小组每活动一次就要换个地点，以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当时我们的活动是冒风险的，但对学习哲学的兴味很浓。艾思奇同志写《大众哲学》，每写一篇基本上都在小组里讨论过。

艾思奇同志这本书，单单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出了三十二版，还有很多出版机构私下印行，这个数字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

在抗日战争以前，社会上思想问题很多，我参加哲学小组，思想上也得到教益，收获是很大的。那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不搞社会科学的人，也要争购《大众哲学》，这是因为《大众哲学》这本书，在关心国家存亡这个现实问题上，同广大人民群众起了“心连心”的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我认为就是要写反映时代需要的东西。《大众哲学》的历史意义就是它写了大家需要了解的东西。《大众哲学》主要是在认识上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当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大众指出了真理。

深入浅出的关键，就是要抓住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情合理地回答出来。这样的理论也就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就抓住了人的思想，就有战斗性。

哲学概括了科学的成果，所以哲学有着指导科学的作用，

但是具体学科中的具体问题仍然要由具体学科去解决，哲学是不能代庖的。至于哲学本身，作为最高的综合原理，总是要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对我们起着世界观的指导作用。

当前思想的复杂，不亚于三十年代，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发扬艾思奇同志当年撰写《大众哲学》的精神，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一九八二年

# 哲学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

## ——读《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梁 唐 谭恩晋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已经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是我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成果。

艾思奇同志是我们党的卓越的哲学家。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教学工作，写了许多著作，留下丰富的遗产。重读收录在这一卷里的这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著作，深深地为他那种致力于使哲学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所感动。

文集第一卷收进了艾思奇同志早期的代表作《大众哲学》。它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使哲学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最初尝试。这本著作，以通俗的形式，浅近的事例，生动的语言叙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运动中起了广泛的、积极的作用。许多当年亲身受到这本书启发的同志，今天谈起来，依然强烈地感到它的价值。当然，这是艾思奇同志的早期著作，免不了存在着缺点。但是，就其面向大众，力求使哲学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一基本方向来说，是我们今后仍然应当坚持和努力实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团结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哲学普及运动，需要更多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要求的《大众哲学》。

哲学面向人民同哲学面向实际是一致的。艾思奇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总是力求用哲学来说明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解答实际问题，帮助人们端正思想。形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上同群众同呼吸，这是艾思奇同志从事理论工作的贡献，也是他著作的优点。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艾思奇文集》第一卷收录了该书前半部分的文章），曾经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赞扬这是艾思奇同志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并作了详细摘录。

毛泽东同志对《哲学与生活》一书所作的摘录，涉及哲学上的许多问题，如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与综合，特殊与一般，差别与矛盾，外因与内因，本质与现象，运动与静止，等等，其中特别是绝对和相对、一般和特殊的问题，占有重要的篇幅。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纠正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错误，毛泽东同志早在《矛盾论》一书中，结合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地展开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的研究。

艾思奇同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深刻之处，在于从理

论上触及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给人们以重要的启发。他不但从方法论上区别了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问题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而且把哲学上的论证同中国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中就是联系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来谈方法论的。他说："譬如说，封建社会需要资本主义革命，这是一般的公式，你的研究答复说中国的经济是封建经济，于是你就说中国是要资本主义的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中国社会并不能完全服从你的公式的推演，中国虽然是封建社会，然而它的具体条件并不允许它依然走上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不容许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都不是形式逻辑的推演法可以看出的，而必得要辩证法来研究才行。"这一段批判公式主义的话，今天读起来，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论》等文中，还进一步论证了如何运用辩证法来认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当然，形式逻辑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公式主义。艾思奇同志在这里把它们误认为是一个东西，这是不准确的。他后来改正了这种认识。但是，当时一些反辩证法的人，确把形式逻辑歪曲为形而上学，并用这种形式逻辑的名义来攻击辩证法。因此，艾思奇同志对他们的批驳，还是有意义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就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般和特殊的统一，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路线的两个基本的理论。三中全会以来，人们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理论上来端正思想路线的。当前，在政治思想上存在的“左”或右的错误观点，工作上存在的一刀切或放任自流的错误做法，从认识根源上说，都是由于违背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法，搞了形而上学片面性。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习唯物辩证法。现在中央号召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我们认为在学习中参阅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是很有教益的。

艾思奇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教诲，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理论上更加成熟，更加自觉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如《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对于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根据自己的深刻体会作了解释和发挥。

他根据毛泽东思想，针对当时存在的主观主义，论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以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针对教条主义者把“黄金变成粪土”的错误，着重说明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性在于理论紧紧地依赖于实际。理论本身的成立，是紧紧依赖于实际的；离开了实际，理论仅只是在词句上而不是在实际上成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察今”是非常重要的。了解今天的情况，今天的特点，依今天的情况使理论具体化，这是进入成功之门的正道，否则就是走向失败的邪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每提出一个问题，必定要恰当地估计到事实条件，同时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理论与实际应当这样联系，否则还只在抽象原则上把握了理论，而没有对

理论获得最正确最完全的了解。就是专门研究理论的人，也只有结合实际才能对理论真懂、深知。应当以对历史和现状作有系统的研究为基础，来验证和理解理论，而不应满足于书本的背诵、词句的推敲，而将真正的生活内容，全然隔绝在它的外面，触不到理论的精神的深处。

艾思奇同志在论述理论结合实际的同时，又论述了对实际要采取正确的认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使认识停留在局部的、片面的经验上，犯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他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注意事实的各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必须明了某一现象在全体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离开全体来孤立看待；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或为假象所迷惑；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而不是表面形式的误解；还必须从对事实的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总之，实事求是，不是只简单指出事实，而必须进一步应用理性的头脑，对事实加以理解；不是为事实而找事实，而必须从事实中求出它的所“是”；不是单纯做调查工作，而必须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要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唯物论性质的，必须尊重经验，反对空谈，但又必须超出狭小范围的经验知识，扩大经验知识的范围，并把多方面的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以达到理论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中央领导同志曾指出，有一些人看问题看现象，理论上、实践上都缺乏根基。因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艾思奇同志这些文章，对于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中，还有许多文章是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哲学斗争相联系的。其中，有专题性的批判文章，如《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客观主义的真面

目》、《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也有总结性的批判文章，如《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有批判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还有揭露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艾思奇同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必要的斗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有的战斗风格。读一读这些文章，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哲学，正确地进行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也是有帮助的。

使哲学面向群众、面向实际，这是《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的一个主要特点，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我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原载《哲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 哲学家艾思奇的文化艺术活动

苏　英

艾思奇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献给党的理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光荣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艾思奇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哲学以外尤其热爱文学。艾思奇青年时代就在文艺这块园地中，进行过辛勤的耕耘。上中学时，曾为学艺部负责人，也是校刊《滇潮》的编辑之一。他的文章曾受到进步老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称赞，他还积极组织剧团，从选编剧本、任导演和演员，甚至服装道具，件件事都乐于去干。由于当地妇女还不敢登台，他曾自告奋勇男扮女装，饰演《少奶奶的扇子》等戏中女主角，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他总不遗余力。他也酷爱音乐，在学生时代与聂耳素有交往，常常邀请聂耳的小乐队为演出伴奏。一九二八年艾思奇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给聂耳带回了日本打渔的民歌和世界音乐家传记；翻译了伏尔加船夫曲，由聂耳在群众中教唱。他还以店小二、小幺、ＳＧ等笔名为《云南民众日报》撰稿，并翻译过英国青年诗人济慈的名著《夜莺歌》和日本国木田独步的小说《孤独者》。他利用这段时间广泛阅读了世界文学名著。在学习德文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海涅的诗歌。一九三一年到

上海便决心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又以李崇基的笔名（崇拜高尔基之意），发表文章，虽然有些文章还不成熟，但是为了宣传倡导进步文艺思想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艾思奇和文化艺术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报刊编辑、新闻出版等岗位，并且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工作。在上海，他先后编辑或主编过《读书问答》（一九三三）、《读书生活》（一九三四）、《读书半月刊》（一九三六）、《生活学校》（一九三七）、《认识月刊》和《新认识》、《文化战线》（一九三七）和《战线五日刊》，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以后担任边区文协主任，他曾是《文艺战线》编委（一九三九）、《中国文化》主编（一九四〇）。延安整风开始后，一直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历任副刊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他除担任抗大、马列学院等校的哲学课程，还担任过中央文委秘书长（一九三九），延安鲁迅研究会干事会委员和编委（一九四一）、延安青年剧院理事（一九四一）、延安诗会理事等诸多文化艺术界的职务与工作。

建国以后，艾思奇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全心全意研究哲学和从事党的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他虽无暇顾及文艺战线上的活动，但他仍然十分关心。他在给全国文联的几次讲演中，在许多地方都联系到文艺界的实际，阐述自己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他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从来不愿意做那种自以为是的空论家。当有人劝他出来继续写写文学论文时，他说自己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教学方面了，没有参加文学界的实践，要写还得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但看来时间又不允许。这种态度正是体现了艾思奇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

诚然，艾思奇对文化艺术产生兴趣并为之奋斗的原因，不单单是他的个人爱好，这里还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他曾这样说：“文学也和哲学一样，是一种观念形态，前进的文学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坚定更明确。”（《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298页）他写的大量的关于抗战文化的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字里行间喷发着作者忧国忧民、仇恨黑暗、追求光明的爱国主义激情。他写的许多文学论文是十分精辟的，对文学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翻译的海涅的诗歌是很出色的，对海涅及其政治诗的评介也很有见地。为了保存艾思奇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在他的遗著中，选编了《论文化和艺术》一书。这本书，对于了解艾思奇的思想，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史，无疑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入这本书的三十多篇文章，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新启蒙运动；文艺工作者要到现实斗争中去；文艺创作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关于海涅政治诗的评介等。下面，把艾思奇同志涉及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 积极参加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根据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和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提出“国防文学”的主张。这个口号适应了广大进步作家和群众的抗日要求和爱国热情，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它在客观上成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继后，又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这样就在文艺界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论争中，艾思奇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写了《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对两个口号的实质作了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对从敌人方面来的污蔑和

攻击，给予无情的驳斥。

艾思奇指出，文学必须紧跟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一个新的形势必然要在文学上提起新的任务”，“文学的生命就是现实主义”。因此，给文学规定任务和口号，不能限制在少数人的圈子里，应当把政治上的联合战线的特点反映出来，他解剖了自济南惨案以后，中国已经由半殖民地逐渐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完全的殖民地的形势，说“民族的危难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它逼着中国，或是抗战，或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全都被敌人吞下。”这就是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很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为形成抗敌联合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他批评了那种把抗战任务仅仅局限于一部分前进者的圈子里的“关门主义”，提倡更广大的国民、各党各派和前进者合作，以便结成抗敌的伟大力量。因此，“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适时的，是“文学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

本来，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文学界内部正常的事情，但反动派却利用这场争论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由于争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许多人不了解真相，难免产生误解。一九三六年六月，艾思奇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文学论争所得到的结果》，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两个口号的态度。他认为，有人把文学界两个口号的论争，生硬地分作两大派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现在前进的文学界，根本就没有分做两派。所谓分派，一定是由于利害不同，或理论基础不同，这次论争者的两方面，意见无论怎样不一致，立场却同样是前进文艺者的立场，说到利害，也同样是为着民族解放的利益，为着文艺界的联合而论争的。”虽然双方各提一个口号，然而并非要在口号之下各树一帜，都不过是试图给文艺界的联合探求一个适合的标帜罢了。况且，鲁迅先生的目的，也

只是希望“另给前进的文学者立一个特别的研究标帜”，和“国防文学”没有对立是很明显的。艾思奇通观两个口号论争的实效，说争论本身也许没有重大意义，重要的是从中引起许多问题的解决。比如，通过争论，使大家更明白爱国主义在被侵略国家的重要性，明确“国防文学”所要求的创作方法，不应当去勉强各派的作家一定要用什么形式来写国防文学，只要求作家把所写的东西和民族生存有机地联系起来。象茅盾先生在论争中提出的关于文艺创作的自由论，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就有着很可贵的贡献。茅盾先生所述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它仅仅限于两点：第一在创作形式上，各派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自由；第二要争取爱国的自由。显然，这种自由已有相当的限制，自由里面已有不自由的成分，即我们不容许文艺家去做汉奸，对于那些只知道写哥哥妹妹，写粉饰太平的骗人作品，就要受到严肃的批判。总而言之，对于这场论争，“应该好好地采取它的积极的精华，不要把糟粕的东西……看得太大”。可以看出，艾思奇的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毫不掺杂个人成见的严肃态度。

在此期间，他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谈到这个口号问题，并写了一些有关“国防”的论文，如《科学的国防运动员》（一九三六）、《赛金花的风波》（一九三七）等等，其中心思想都是强调爱国主义的。

## 新启蒙运动的热情发起者之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加快蚕食中国的步伐，激起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日运动的不断高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民族的意愿，反共反人民，变本加厉地对内推行高压政策，投降卖国活动有增无减。他们十分惧怕人民起来

抗战，便在那里拚命兜售愚民政策；他们的宣传部公开发表所谓“告国人书”，把风起云涌的爱国救亡运动诬蔑为“共产党的阴谋”，胡适、陶希圣之流大肆鼓吹“读书救国论”，一些帝国主义豢养的乏走狗，则从他们日本侵略者的主子那里贩来“王道乐土”等邪说，还有一些披着“左”的外衣伪装进步的民族败类，也在那里兴妖作怪。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用封建文化来麻醉毒害人民，妄图把爱国人民统统束缚在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牢笼里，让侵略者任意宰割。文化思想界的这一股反动逆流，极大地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对于挽救民族免于危亡是十分有害的。为了抗击这股逆流，给人民灌输革命道理，由共产党人带头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启蒙运动。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新启蒙运动。艾思奇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为什么叫“新”启蒙运动？艾思奇说：“过去以五四运动为高峰的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因此叫新启蒙运动。”他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九三六）里，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说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文化运动自有它们光辉的历史功绩，但两次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只好把自己战斗的血渍和旧文化的残余一同留传下来。目前，我们的民族正是这些血渍和残余的承受者，整个民族呈现出非常庞杂而不平衡的现象。因此，这一个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而这个“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新启蒙运动的主旨，就是要调动一切抗战因素，让它在抗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此相联系的，艾思奇还写了《论思想文化问题》（一九三七）等文章，系统论述中国当时思想文化运动的特殊性，驳斥几种攻击新启蒙运动的滥调，指出这个运动已经不是简单的反封建文

化运动，而是要把一切文化应用到有利于中华民族生存的方面，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完整的独立的新中华。

艾思奇深知开展这个运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预言“它的完成恐怕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但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运动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到一九三七年春夏间，不到一年便迎来了抗战的全面爆发。因此，集中的讨论已不可能进行。尽管如此，这次新启蒙运动的意义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对于廓清蒙昧和宣传抗日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久，艾思奇受党中央的调遣，到了延安。在从事哲学教学和文化界的行政职务的繁忙工作中，他继续发扬新启蒙运动的精神，写出了一批密切联系抗战实际的论文，如《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一九四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一九四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运动》（一九四〇）、《改变面目改变脑筋》（一九四四）等。

## 在关于“旧形式运用”的讨论中，主张文艺工作者到现实斗争中去

抗战初期，有人提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革命的文化界结合抗战的新形势新特点，曾就利用旧形式和文艺大众化问题展开过初步的讨论。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谈到继承历史遗产和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500页）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促进下，掀起了进一步讨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高潮。周扬、艾思奇、何其芳等同志都先后发表文章，他们分析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功绩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继承民族传统，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民族形式的途径。这次讨论的结果，使得文艺界对于作家深入现实斗争生活、认真向群众学习等问题，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一九三九年四月，艾思奇在《文艺战线》杂志发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一文。他把旧形式运用问题归结为对中国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问题。运用旧形式，其目的并非要停止于旧形式，而是要为了创造新的民族的文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他在文章中十分强调文艺工作者认识民众生活、向民众学习的重要性。只有民众的东西，才能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力量，这就是说，只有拿民众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精制，再还给民众。又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旧形式，或者说那些离民众较远而更“高雅”的东西，不应当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挖掘，把旧形式反映现实的优良手法从它的诸多限制里解放出来，把现实主义归还给我们的民族文艺传统。新形式和旧形式应当渗透，互相发展。

关于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艾思奇联系旧形式的运用写过许多文章。他在《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一九四三）中，满腔热情欢呼文艺界的成功，赞扬文艺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说文艺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战斗部门。面向群众的好传统得到发扬，乐于为群众写作蔚成风气。艾思奇特别赞扬文艺工作者在开掘文艺传统方面的成就，如秧歌剧，就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性。群众欢迎它，欢迎“这种融合音乐、诗歌、戏剧、跳舞和装饰美术于一炉，富有伸缩性且不受舞台限制的综合艺术。”“那种以为群众不能接

受艺术，或不能接受新的高级的艺术，以为群众的艺术必然要迁就落后等等偏见，都是没有真实根据的。”他说：“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环境中还大有发展的余地”。艾思奇心里经常装着广大农民群众，解放后，他曾四次下农村，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认为那种蔽于一隅，把自己禁闭在艺术之宫中，不肯为广大农民写作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诚然，时代在发展，文艺也在发展。正如艾思奇说的：“丰衣足食的条件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要求，他们有了较丰裕的物质食粮，现在就进一步要求丰裕的精神食粮。”因此，需要文艺工作者真正地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考察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有系统地编写他们所需要的作品和读物”（《群众需要精神食粮》，一九四四）。那种机械地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截然分开，只要“提高”不要“普及”的糊涂思想，是和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

一九四二年，边区文委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文化人的战时动员，号召大家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队伍里去。“文化入伍”，大大改变了文艺界的面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艾思奇撰文盛赞这个行动，是延安文艺界空前未有的壮举，文艺工作者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又说，目前典型的、纪念碑式的巨著显然太少了，他引用刘少奇同志的话，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的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同志也说过“抗日战争是最复杂、最多样、最丰富的。这样的现实，有权利要求我们创作百十部和它相适应的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艾思奇为我们伟大民族骄傲、自豪，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期望着“不久的将来，能有那种典型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拿到我们读者的面前”。

# 用哲学观点探讨文艺理论

艾思奇写过不少文艺论文，《论文化和艺术》收进其中的十几篇，或许可以体现作者早年的文艺思想和对创作的一些见解。这些文章，都是艾思奇当年参加现实斗争的产物。他再三声明，由于对文艺没有作过太深入的专门研究，因此不能算是系统的艺术理论。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艾思奇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战斗气息，时代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诬蔑无产阶级文学是“标语派”、“主义派”。一九三二年前后，又有“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出来标榜中立，胡说左联“只看目前需要”，是“煽动家”等等。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奋起批判，给了“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艾思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先后撰写了《文学的永久性和政治性》（一九三三）等论文，阐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决不是属于“自由人”的东西。文艺的政治性，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当作一种教化或宣传作用，即使是标榜艺术至上论者，他的作品也仍是一种告白，告白就是宣传。文艺的永久性，正是文艺的不可缺少的特征。哲学、宣传品等等，往往会因新时期的到来而显得逊色，唯独文艺的艺术价值不会因新的生力军之突起而被消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文艺不象哲学那样借助抽象的概念推理反映现实，而是以具体的形象来反映真实。“文艺将你带到有着极度的具体性的事例中，它不给你看见空洞的抽象，却让你身临其境，……不管你是同时代的人，或是千百年

后的人，一触到文艺，便走进了作者的环境里，随着他的生活而生活。……借着具体性而能引起读者之实感的能力，便是艺术的自身，便有永久性的存在。”宣传品的作用，只是列举种种的特殊事例以证实一般的原则，文艺却将特殊事例加以描绘组织，这里的特殊事例便成了具体事例，使一般原则生活在事例中。凡是文艺作品，它的内容都是活的，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触到鉴赏者的心灵，就都变成活的了。这就是文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原因。文艺的本质任务，是在一定的政治性之下，通过具体性以反映现实。而“永久性”不过是作为一种不可分的副产物或属性。“自由人”胡秋原极力夸大文艺的永久性，把属性当本质，就这是他的观念论的大错误。文艺的永久性，决不能排斥文艺的政治性，两者始终是统一的。

艾思奇在《论文学的鉴赏》（一九三四）里还说：“二千年前的哲学理论，在我们看来是幼稚而且错误，不是二千年前的人，决不会把它当作真理；但二千年前的艺术却直到现在仍一样地生动，一样地活跃。那艺术特有的感人的力量，决不会象哲学的真理一样，会被时间之流冲洗了去。”他说尽管艺术的标准会因鉴赏者的角度不同而产生差异，但那艺术的价值是客观的。此外，他还谈到文艺批评家的任务，不要混同于一般的鉴赏者。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当站在作者和鉴赏者的中间，为鉴赏者开辟正确的道路，站在作者地位之外去观察和分析作品，他的所得应当比作者了解得更多。如果批评家对一部作品不是比作者知道得更深刻，那才是奇怪的。

艾思奇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以为“要求作者把最前进的意识作为主题的基础”，就会成为“倾向文学”或“口号标语”式的文学的错误思想。其实，文学有“倾向”，不见得就足以损害文学的艺术性。一些作品充满生硬的标语口号，丧失文艺所特有的感人力量，那只能怪作者在写作技巧上不能很好地使

题材和主题统一起来，这并非主题的过失。至于那种以为“世界上有不少伟大的作品不见得都有前进的意识”的说法，也是片面的。一部伟大的反映现实的作品，在它的时代里，它的作者至少是不满于现状，而希望前进的，决没有羊一样的俗物能够给我们留下宝贵的遗产。诚然，过去伟大的作品，它的前进的主题，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它的前进的程度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但用作者自已时代的标准来说，却仍不失为一个前进者。“每一个时代的作者都必须站在他当时生活的前线，那么，今日的作者必须以今日的斗争中最前进的意识作为创作的主题，不是也应该的么？”(《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一九三五）。

胡秋原们曾根据马克思说过“诗人是另外一种人物，应该让他去走他自已的道路”，便断言马克思在文艺领域内也是一个“自由论者”，这是极其荒唐的。艾思奇撰文批驳了这个错误的观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文艺的论述里，始终要求的是“真实”。写实主义是不是“自由”？不是的。写实是一种方法，但决不是容许什么自由的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谓诗人的道路，并不是那么自由的，它必须“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在写作中始终贯彻唯物史观的真理。文艺不是政治宣传品，然而也决不是感情之恣意。两位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匠，竟会给“自由人”胡秋原钻了空子，那才是不可设想的。(《“诗人自已的道路”》，一九三三）。

此外，艾思奇还写过《文艺创作的三要素》（一九三八）、《谈谈现实主义》（一九三八）等活泼而又有分量的文章，发表过一些戏剧评论，如《惯匪周子山》（一九四四）、《〈日出〉在延安上演》（一九四〇）等等。

## 翻译海涅的诗

早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二十三岁的艾思奇就写了《海涅

的政治诗》，介绍德国海涅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极力推崇海涅的讽刺诗和政治诗，称赞他不仅是歌咏爱情的好手，也是社会斗争的一员将士，本质上还具有奔放的、锐利的、前进的思想和热情。

艾思奇青少年时代曾潜心研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中知道马克思寄寓巴黎时，和诗人海涅结下了非常深笃的友谊，并且在诗歌创作上给过海涅以深刻的影响。在海涅的诗作中，艾思奇最喜欢的是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他针对当时翻译界只有人翻译海涅的爱情诗，于是决心把“童话”介绍给中国读者。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一八四四年的作品，全诗二十七章五百多节。诗人根据一八四三年年底返回故乡汉堡途中的见闻和感受，运用民歌传说、离奇的比喻和个人奇特的幻想，对德国丑恶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艾思奇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翻译“童话”。他说：“译诗并非自己的专业，仅出于兴趣和爱好而在工作余暇零碎抽些时间作作。又因为诗中有许多典故及史实需要费一些力量去查考，所以拖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一九四四年夏才译完。”海涅原诗每章无标题，艾思奇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每章的中心，在翻译时，每章均冠以醒目的标题。在译诗中间，艾思奇辗转昆明、上海、延安，历时十多年，直到一九四四年冬，诗的译稿才由林默涵同志费尽周折从延安带到重庆交给黄洛峰同志。不久，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建国后，一九五一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一九五四年转由作家出版社再版。文学评论家吴伯箫同志说：“艾思奇同志除了从事哲学著述研究而外，对文学也是爱好的，并且有深湛的造诣。我很喜欢他从德文海涅原著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流利、押韵，保持了海涅诗歌的隽永幽默、情感炽热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翻译“童话”，艾思奇说他是出于“兴趣和爱好”，其实他是在借用海涅的“刀”和“剑”。海涅是一位对封建主义疾恶如仇的激进诗人，一位从不献媚于“至上”的女神、“宁可把纯洁的双手掘入污秽的现实中”的坚强战士。而当时的中国，反动派竭力推行蒙昧主义，封建的幽灵在游荡，严酷的斗争多么需要进步的人们从海涅的诗歌中吸取思想的营养。关于这一点，在《海涅的政治诗》一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也就是艾思奇所以致力于翻译海涅政治诗的主要动因。此外，艾思奇还翻译过一些短诗，刊登在当年上海的《中华月报》等杂志上。

## 科普作品和杂文独具特色

艾思奇作为一个哲学家，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论文化和艺术》是他的文化艺术理论的集中体现。同时，艾思奇还从事一些文学写作。除上面提到的翻译外，他创作过几十篇文学色彩很浓的科普作品。他的科学小品独具风格，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他没有从单纯的图解科学概念出发，就事论事，以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抒发对反动势力和黑暗的旧制度的不满。他以小品文的形式，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给读者以清新的启迪和教育。他的这些科学小品，大都登载在上海《太白》、《读书生活》杂志上，有的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艾思奇的杂文也写得很漂亮，特别是他主持《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以后，写得更勤。他的杂感，有许多都被收进解放后出版的《“有的放矢”及其他》一书中。他对鲁迅的思想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撰写了《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一九三七）、《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一九四一）。艾思奇的哲学论文也往往带有文学的色彩，他甚至多

次酝酿过用文学的笔调再写一本《大众哲学》。但是，无情的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九六六年春天，一位哲人带着许多为党为人民效力的良好愿望，溘然长逝了！他为世人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文化艺术方面的劳绩。

一位文学家说，艾思奇不是叱咤风云、光彩耀目的英雄，而是以毕生的心血默默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老实人。（《一个哲学家的道路》，第3页）在整理艾思奇同志的遗稿和翻阅他的生平资料中，我们常常为艾思奇同志的勤奋、执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感动，为他的待人诚恳、亲切善良的品格而产生敬佩。他一生都在研究、著述、教学这样平凡和艰辛的工作中度过。他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人物，至于阴谋、权术之类，更是与他无缘。艾思奇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是一位高尚的战士，而战士也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就说他的这本书，虽然记录了他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战绩，文辞中凝聚着民族的血和泪，但是，时代的局限，个人认识的限度，都难免地反映到他的言论中。只要我们用历史的观点来读这些文字，即使发现瑕疵或因岁月的推移而显得陈旧的地方，也不会觉得奇怪了。

# 艾思奇与报刊活动

闵大洪

艾思奇是个坚持不懈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家，但他的贡献不仅限于哲学理论方面，在三十年代（一九三二年至抗日战争初期），约有五年时间他奋战在上海，编过好几种进步刊物，写了不少科学小品，是个出色的报刊编辑，在艰苦的延安岁月，以迄新中国诞生前，他办过大众化的通俗刊物和大型的理论刊物，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领导工作，对于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艾思奇，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在昆明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时，就投入进步文艺活动，能写稿、演讲、编选剧本，主持学校的学艺部工作，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为避免当局唐继尧的迫害，他从昆明逃到南京，以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东渡日本求学。他在日本钻研哲学，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于一九二八年冬一度回国治病，即为《云南民众日报》副刊撰稿，发表译著，并用书评形式介绍鲁迅著作，这是他从事报刊活动的开端。

##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艰苦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离昆明来到上海，亲自参加由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工作，

他在《读书生活》上写的文章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特别是他撰写的《哲学讲话》连续刊载，从创刊号的《哲学并不神秘》到二卷十二期上的,《猫是为吃老鼠而生》,先后写了二十来篇，脍炙人口，整个哲学讲话，通过有关的事物分析，阐明了从世界观到认识论、方法论的哲理（即以后汇编成著名的《大众哲学》一书），对青年学习起了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在史量才主持的上海《申报》和柳湜、夏征农一道编《读书问答》专栏，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仅半年时间这个栏复信字数就达三十万字以上。他学习勤奋，学问渊博，还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和自己编的《读书生活》上先后发表了十二篇科学小品，当时他和高士其、贾祖璋等同志所写的富有社会感的科学小品，巧妙地创造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统一的良好文风范例。

一九三六年《读书生活》出至五卷二期时，遭国民党查封，不久他又亲自创办《认识月刊》综合性学术研究杂志。八·一三抗战开始，他在党的领导下，他又参加《文化战线》旬刊与《战线》三日刊编辑工作。他在《文化战线》上曾透彻分析形势，写了《论信任政府》等五篇文章，鞭策国民党政府。《战线》五日刊更富有鼓动性，它敬告“彷徨中的热血青年”奋起抗日；它质问当局“现在尚不发动民众，要等待何时？”；它所刊登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的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是何等鼓舞人心；它并刊登郭沫若写的《纪念九·一八》震撼人心的豪迈诗句，发表名记者羊枣用辛辣笔调写的评论性文章，揭露上海一些外报的伪善面孔。这两个刊物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发挥了推动抗战的轻骑兵作用，由于战局恶化，艾思奇听从党的召唤，离沪奔往延安。

艾思奇在上海五年时间，写作异常勤奋，发表文章之多，

涉及范围之广，产生影响之大是少有的，他冲破国民党对言论的严格限制，紧张地投入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驳斥胡适之流、叶青之流……用报刊武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段光辉的战绩，说明他不愧为一名反文化“围剿”的猛士。

## 延安时期从事报刊生涯

一九三八年初，他到延安不久，毛主席曾写信给他，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艾思奇在延安近十年的时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更加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斗争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他曾先后在抗大任主要教员，还执教于陕公、马列学院，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等多种职务。对于培养干部为边区的文化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艾思奇在延安的报刊活动，除了参与编辑当时重要的文艺刊物《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突击》以及为《解放》周刊、《新中华报》、《中国青年》、《群众》周刊等撰稿外，最主要的活动是主编《中国文化》和担负《解放日报》的领导工作。《中国文化》（月刊）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由艾思奇主编，创刊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出到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共出十四期，质量较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刊物是根据当时毛主席对大型学术理论刊物要求有“实事求是”科学态度作为办刊方针的。每期按商定的计划，由林默涵同志把稿件收集齐全，由他审定后，骑马送到延安几十里外的安塞印刷厂去付印。这个刊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允许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平

等充分的讨论，如刊物中关于"殷商社会性质"的争论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具体反映了学术上兼收并蓄、充分说理的活跃气氛，以便通过讨论提高认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殷代后期是氏族社会，而周则是奴隶社会；而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等人则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作者尹达则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争论渐趋一致的情况下，仍然全文刊登了尹达的《关于殷商史料问题》，让他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在该刊二卷一期上，刊登了茅盾的《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和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两篇文章，以改变在第一卷中研究性质多、论战性质少的不足。从这个创新的刊物中可以看到延安当年浓厚的学术空气。

艾思奇自己也在《中国文化》上撰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大纲》也在这个刊物一、二卷《哲学讲座》栏上加以转载。他还在《自由亡国论》等尖锐短论中，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并嘲讽为其辩解的反动辩护士。

一九四二年，为了加强报纸的领导力量，党中央把艾思奇同志调到《解放日报》任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投放在这张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艾思奇对于副刊的工作抓得很紧，他以认真而细致的作风影响其他同志，每天从审阅稿件、决定版面直到看清样为止都事事躬亲，对于不用的稿件要编辑写信提出意见退给作者，看退稿信有时他还要翻看一下来信，对退稿信作些修改，甚至重写才发。毛主席说："整顿文风要好好利用报纸。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把整风运动的报道放在优先地位，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起，专门设了整版

的《学习》副刊，作为讨论整风问题的学习园地，艾思奇先后在报上发表了《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观念的革新》、《怎样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从思想方法论上给广大干部以启发教育。艾思奇主持的副刊还配合大生产运动宣传、军事宣传、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宣传。他自己还为报纸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建立新的劳动观念》和《春节宣传文艺的新方向》等。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抛出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疯狂反共，狂热地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解放日报》在一百六十多天中就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坚决予以回击，这些批驳稿件多由艾思奇审阅，《解放日报》还发表他写的重要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深刻揭露蒋介石唯心论哲学的肮脏货色，把蒋介石的愚民哲学批得体无完肤。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艾思奇为纪念韬奋曾写了《中国大众的立场》和《血肉相联》两篇文章，勉励新闻工作者学习这个好新闻记者为人民大众鞠躬尽瘁的精神。

《解放日报》副刊在艾思奇的直接领导下，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报纸副刊与各版脱离的现象，具有鲜明的党性、战斗性、群众性，全党和群众所关心的问题，通过多种形式也同样在副刊上生动活泼地反映出来。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际，一批中外记者访问陕甘宁边区，他们通过实地考察，不少记者写了轰动一时的访问记，如美国记者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用整整一章介绍了《解放日报》，他写道：……《解放日报》比起重庆的十数种日报，无可比拟的要好而且确实。重庆的报纸沉闷的内容和无色彩的写作几乎是一致的。""《解放日报》副刊的内容，文化水准比较高，比较严肃而有目的，可是比起国民党的报纸，那就确实很大众化了。"赵超构在《延安一月》写道："解放日报第四版是综合性的副刊，拥有全边区作家的投稿人。艾思奇的地位，可以说是文艺政策的执行人。解

放日报的第四版，也就是延安作家们唯一可以发表文章的地方，是由他主编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编辑方针，也必然可以影响延安的文风。虽然延安人不见得肯承认我这样的观察，但事实上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平，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一九四五年艾思奇当选为七大代表，八月二十五日报社宣布艾思奇担任副总编辑，一九四六年春社长博古同志回延安遇难，五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余生光代理社长兼总编辑，艾思奇任副总编辑兼报纸编辑室主任，直到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匪帮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自动撤出延安，艾思奇也因《解放日报》停刊才离开报纸领导工作。《解放日报》在重要历史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的成长以至整个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无疑包含着艾思奇的一份心血。

纵观艾思奇的报刊活动，他作为一个活跃的撰稿人和数十种报刊发生过关系；他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人员，跟随时代的脚步，把握不同报刊的特点，成功地运用报刊武器，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 艾思奇的科学小品

龚　人

象人们一提到一位有名的作家，就会联想到他的代表作一样，当人们一提到艾思奇同志，立刻就会想到他的《大众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和著作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今天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科学小品的出色撰写者呢。这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在科学小品刚刚诞生之时——

一九三四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黑暗年代。在上海，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克服重重困难，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进行了坚韧的战斗。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组织里，象鲁迅所比喻的那样，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对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创刊。"太白"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启明星，即拂晓之前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刊物以"太白"为名，暗示要为驱除黑暗、迎接曙光而努力。在创刊号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小品"的名称，并设立了专栏，这是对当时林语堂等人所宣扬的买办资产阶级文化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林语堂于一九三二年创办了《论语》，一九三四年又创办了《人间世》等刊物，鼓

吹所谓“幽默小品”，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引导读者不问政治，逃避现实，甚至诋毁革命，诋毁左翼文化运动，他曾说：“小品文是不能写科学的，科学是不能用小品文来写的。”陈望道痛加驳斥道：“我们写几篇给他看看”。这样在创刊号上就刊登了顾均正、贾祖璋、克士(即周建人)、熏宇所写的四篇科学小品。

艾思奇同志当时是“社联”成员，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战斗，他的名字后来排进《太白》杂志的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之列。他在第三期上写了《神话化的科学》一文，说明中国的劳苦大众在长期的反动统治下，对自然科学了解太少，因而他认为“扳起面孔来谈自然科学，一定会使中国的大众退避三舍，中国大众的生活问题太紧迫，社会传统的障壁太厚，能看见自然的机会太少，要将自然的科学知识一五一十地灌输进去，就等于让摩登女郎走到最偏僻的乡下，一般人总是看不惯。”所以“大众需要科学知识，科学知识要求大众化。”（柳湜：“论科学小品”《太白》创刊号）同时，针对林语堂的“软性”小品，艾思奇辛辣地讽刺道：“我们不是雅人，没有‘灵性’，除了一点生硬的科学常识以外，不懂得其他的东西，所以也不会幽默，不敢摹仿林大师的‘文言之白’的那一手好白话文，只愿做一篇科学小品。”

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不但提出了创作科学小品的目的，而且提出了创作原则，努力加以实践，使这种新生的形式不断加以完善。柳湜在“论科学小品”一文中写道：“小品文如果与科学结婚，不仅小品文吸取了有生命的内容，同时科学也取得了艺术的表达手段，艺术的大众科学作品于是才能诞生，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所要求的。”艾思奇同志正是这样去做的，他在《太白》杂志上共发表了两篇科学小品，这就是“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第一卷第九期）和“由爬虫说到人类”（第

一卷第十期），而多数的作品则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

当时艾思奇、夏子美（即夏征农）、柳湜都在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并在《申报》的一个专栏——“读书问答栏”负责回答读者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每天一篇，三人轮流撰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能容忍《申报》当时抗日的进步倾向，于是派特务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从此进步言论受到箝制，“读书问答栏”也被取消。另一方面，追求光明的广大读者表现出如饥似渴的读书要求，迫切希望看到能指导他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刊物，这样由李公朴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编辑的《读书生活》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创刊，从《申报》的副刊上发展成独立的半月刊。

一九三五年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勇猛地战斗在社会科学和文化出版战线上。《读书生活》和其他进步刊物，犹如沙漠中的甘泉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这份刊物终于在“背景是左倾分子”“鼓吹全国武装抗日要求停止剿匪”等等“罪名”下，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五卷第三期被国民党查封，李公朴先生也遭到逮捕。

《读书生活》也设有科学小品专栏（开始称为科学讲话。此外还有文学讲话、哲学讲话等等栏目，从第一卷第七期起科学讲话改称科学小品），它紧随《太白》之后，并和《太白》一起利用这一形式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与反动派的邪气抗衡。高士其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其中二十多篇就是发表在《读书生活》上，尤其是第四卷的十二期上，每期一篇，全部为高士其同志的作品所垄断。在此期间，高士其与艾思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士其后来回忆：“当时和他多次见面，他都鼓励我创作科学小品，‘肚子痛的哲学’就是照他提出按辩证法原理写成的。”

艾思奇发表在《读书生活》上的科学小品有十篇，连同《太白》上的两篇，大约有二万六、七千字。《太白》上的两篇署名艾思奇，《读书生活》上的十篇署名李崇基或崇基。我们知道，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艾思奇是他写作的笔名，而李崇基的笔名则表达了他对大文豪高尔基的崇敬心情。

艾思奇的科学小品题材很广泛：谈死光（第一卷第一期）；毒瓦斯（第一卷第二期）；谈潜水艇（第一卷第三期）；火星中的生物（第一卷第五期）；火箭（第一卷第六期）；太阳黑点与人心（第一卷第七期）；牛角尖旅行记（第一卷第九期）；由蝗虫到鸡生蛋的问题（第一卷第十期）；中风症与黄河（第一卷第十二期）；斑马（第二卷第七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物理、化学到生物进化，他所选择的都是当时广大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艾思奇的科学小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始终是他创作以及在编辑《读书生活》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力求只要读过千字课（即认识一千个字）的人就能阅读。文章中常用形象的比喻，例如用鱼鳔来说明潜水艇沉浮的原理，把黄河比作一条血脉，把它的灾难看成是中风等，生动活泼，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印象。

艾思奇很重视科学小品的写作技巧，他曾在“为什么写作不能忽视技巧”一文中写道：“一定的内容，要有一定的章法结构，才能够表现得最适切，没有这样技巧上的斟酌，表现的力量也会大大减弱。”“各人自己都得要做一个新的写作技巧的探求者和发明者，决不能图享现成。”艾思奇在创作这十几篇科学小品时是颇费匠心的。在“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里借用一个民间传说，一步一步加以展开，不但解释了人的眼睛在看太阳时所发生的错觉，而且教给读者观察太阳的简单方法。“太阳黑点与人心”这篇则采用了“赵君”与“张君”的辩论

形式，使读者随着他们辩论的深入，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牛角尖旅行记”则通过游记的形式揭示出了物质分子、原子的结构。有的文章开头是以当时上映的电影、马戏团的演出引出本文，有的是用与读者聊天的方式开始。形式多样，引人入胜。

当时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斗争，因此，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直指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把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进步性的科学小品文。

艾思奇的创作态度是一丝不苟的，李公朴在为他的《知识的应用》这一小册子所作的序中指出：“作者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真正了解的东西。他的长处是知识广博，因此虽然是一个小册子，已经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科目；他很虚心地恐怕自己的经验不足，遇到问题涉及现实生活的地方还常常要和朋友详细讨论之后，才肯下笔，因此，这里面所给予的一切问题的解答都是很谨慎地写成的。”这是李公朴先生对艾思奇同志当年创作科学小品文的情景的生动描写。

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和科学小品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当时他尚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艾思奇同志早年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以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研究，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减。哲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家要学习自然科学发展史，密切注视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作为哲学家的艾思奇同志，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也是很坚实的。另一方面，在艾思奇同志的科学小品中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

艾思奇同志和高士其、周建人、茅以升、柳湜、顾均正、贾祖璋、刘薰宇等人一起，以为人民服务的热情，用严肃的科学态度，辛勤的创作劳动，为创立科学小品这一新的文章体裁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今天的时代和四十多年前已经根本不同了，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尽早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环顾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学科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应用到各个领域，因此科普创作的天地是广阔无际的，责任是重大的。让我们从老一辈的科普作品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创作出大量光彩夺目的科学小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自己的贡献。

# 革命何人计死生

郭 影 秋

泰山为重羽毛轻，　　革命何人计死生。
四海翻腾添一滴，　　后车簇拥过千重。
起居从未忘艰苦，　　呼吸犹存即斗争。
谁使斯人宏胆略，　　灵魂深处有真经。

一九六六年春，艾思奇同志不幸病逝。是时，我悲痛异常，写成七律一首。今年为思奇同志逝世十四周年，特发表，以志怀念。

# 为悼念艾思奇同志作

## 水调歌头

李 一 非

振起如椽笔
挥斥鬼神
数十年如一日
奋战未曾休
穷究马列宝库
服膺革命思想
真理尽探求
文章传“大众”
哲人其萎乎！

阐唯物
扬辩证
挞群丑
廓清茫茫霾雾
歧路见通衢
对友谦虚诚恳
对敌辞锋凌砺
笔下不情留
风义兼师友
楷范式吾侪

# 艾思奇年谱

**一九一〇年三月一日（生辰）**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诞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

**一九一二年（二岁）**

随母自腾冲迁居昆明。

**一九一四年（四岁）**

入幼稚园。

**一九一七年（七岁）**

入私塾。

**一九一九年（九岁）**

因祖父去世，跟父母回和顺乡半年多，年底回昆明读私塾。

**一九二一年（十一岁）**

入国民小学插班读四年级。

**一九二四年（十四岁）**

到父亲政治流亡所在地香港。进广州岭南大学香港分校（教会学校）读高小高年级。艾思奇父亲李曰垓系孙中山同盟

会会员。曾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兼秘书处长，后因反抗新军阀唐继尧被迫流亡香港。艾思奇自幼受其父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知识的熏陶。

**一九二五年（十五岁）**

在香港读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偕同弟妹返昆明。随后考入云南省立一中，插班读二年级。

**一九二六年（十六岁）**

在校受进步教员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和共产党员李国柱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曾与进步同学张克诚办工人夜校，为军火工厂与造币厂的工人子弟补习文化，时间约两年，校址设天君殿，后因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支援“三一八惨案”的游行等，险遭军阀逮捕。

**一九二七年（十七岁）**

年初，乔装取道越南逃到苏州，一九二七年初到南京找他大哥李生庄，李生庄在东南大学专修西洋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生会负责人。当时，正是北阀战争期间，军阀孙传芳打到江浙，到处抓人，李生庄闻讯未及通知弟弟逃往上海，艾思奇被捕。经宗伯李根源（曾任黎元洪政府内阁总理兼农商部长）交涉，保释出狱。不久，即赴日本东京求学。自一九二七年春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日本学日语。补习功课，并自修德文，参加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钻研了黑格尔的《逻辑学》等。后因国内发生济南惨案，中共东京支部发起留学生归国运动以示抗议，于是返回祖国。

## 一九二八年（十八岁）

春季在昆明，因在日本生活艰苦和用功过度得了胃病，在家中住的时间较长。这时唐继尧已垮台身死，龙云夺得政权。艾思奇的父亲出任“殖边督办”。大哥李生庄也回昆明在一所中学任教，并兼云南《民众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常为《民众日报》、《市政日报》副刊写稿。他从日本运回许多日、德、英等外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利用养病时间，抓紧研读，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

## 一九三〇年（二十岁）

病愈。再度赴日。在日本用半年时间备课，秋季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冶金专业。经过刻苦自学还掌握了日文和德文，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他利用一切课余时间继续钻研马列主义，终于使自己的世界观发生根本变化。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却很玄妙，都没有说清楚，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他还用这些认识否定他曾相信过的“工业救国”的主张，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

## 一九三一年（二十一岁）

在福冈学习一年半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和许多同学，激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于年底返回昆明。

## 一九三二年（二十二岁）

春季到了上海，当时已出任云南“殖边督办”的父亲仍希望儿子继续学工，以助他兴办实业。对此艾思奇无法接受，于是他决心脱离家庭走自己的路。

到上海后曾为日本研究所翻译文章，八月经留日同学介绍到上海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该校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师生与反动当局作斗争，艾思奇加入他们的行列，并积极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革命活动。此时，他开始以“李东明”、“思奇”为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并着手翻译苏联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一九三三年（二十三岁）

因学潮，泉漳中学被国民党查封，断了微薄的薪水来源。在极端困难中，艾思奇写成了第一篇较长的哲学论文——《抽象作用和辩证法》，发表在“社联”办的《正路》创刊号上。后经杜国庠介绍，加入“社联”，担任宣传部的工作。从此他以笔为武器，更加坚定地走上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求解放而奋斗的道路，同形形色色反动哲学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哲学斗争，剖析了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如他写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主要是批判当时流行的胡适实用主义和玄学派的形而上学。

当时中国反动哲学界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叛徒、托派分子叶青。艾思奇指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哲学是一种“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种唯心论”。对叶青鼓吹的“宗教——哲学——科学”的公式，艾思奇揭露其本质无非是企图以科学代替哲学，是十分荒谬的，当时叶青、严灵峰之流还从哲学上宣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的所谓“外烁论”。

艾思奇联系中国近代史的事实，深刻地论证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因规律性，指出叶青之流把一个国家的变化，说成为“全面由外力造成”，把民族解放的前途，说成要“受外力的左右”的这种荒谬论点不外是和敌人、汉奸的反共噌声相呼应。

在这场论战中，扩大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

**一九三四年（二十四岁）**

六月经“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挥部工作，该报辟有“读书问答”栏，为读者解答一些生活和读书中的疑难问题。仅仅一年时间，读书指导部发出有关学术内容的复信就有一千八百件，影响迅速扩大。

为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创办了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两年后，终于被反动当局查封。

艾思奇此时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他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哲学讲话”，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哲学讲话》原为他在“量才业余学校”① 的讲稿，他广泛征求了学员的意见，经整理后，第一篇的题目是“哲学并不神秘”，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二十四期，后结集成书。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五年还在陶行知办的山海工学团讲哲学课，听众多为工人和失业、失学青年。

---

①“量才业余学校”是为了纪念《申报》老板史量才办的，由于他的思想倾向进步，竟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该校学生多为失业青年、工人、学生等。

## 一九三五年（二十五岁）

《大众哲学》问世。此书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易名出版。问世五月，再版三次。它适应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启发引导人们探求真理，寻求改造旧中国与世界之路，以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前《大众哲学》印行了三十二版。

十月，艾思奇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时，他参加了全国救国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工作，积极从事以鲁迅为旗帜的文化运动。当时发表的文章有《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论思想文化问题》等。

## 一九三六年（二十六岁）

艾思奇发起组织了秘密的新哲学研究会，参加的有杜星垣、林默涵等，并主讲哲学史。

夏季，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二十多人。这个时期除撰写一些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还写了一些科学小品。这一阶段，出版了《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等。

当时读书生活出版社资金困难，他多方奔走邀约了进步人士郑易里为股东，又聘请了共产党员黄洛峰为经理，使出版社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

## 一九三七年（二十七岁）

出版了《哲学与生活》一书。五月创办了综合性学术杂志《认识月刊》，出了两期，于抗战开始后停刊。当时郭沫若、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组织上海编辑人协会，将一些进步刊物

合并，出了《文化战线》旬刊、《战线》五日刊、《抗敌周刊》等。艾思奇参加两个刊物的编辑工作。此时，并参加了上海著作人协会，与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郁达夫等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宣言》。

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犯上海。九月艾思奇与上海文化界十几位知名人士一同被调往延安。十月到达延安。

### 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

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与陕北公学任教，并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主任。

九月，在毛泽东同志倡议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九月三十日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公布了《新哲学会缘起》。

年底，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艾思奇调往该校任教，并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在这期间，除讲课外，他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并为《解放周刊》、《解放日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撰稿。

### 一九三九年（二十九岁）

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管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他除了参与边区文化活动的组织领导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着手翻译海涅的代表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此书于一九四五年方出版。

这一年，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参加的有艾思奇、何思敬、杨超、和培元等，每周集会一次。随后，中央各机关学习小组纷纷成立。中宣部的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艾思奇为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供大家研究讨论。为了

配合学习，他还编了《哲学选辑》一书，并与吴黎平同志合作，完成了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的任务。

**一九四〇年（三十岁）**

二月，延安出版了综合性学术刊物《中国文化》，艾思奇任主编。此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并积极倡导学术研究和讨论，鼓励学术争鸣，奇思艾自己也撰写了大量文章，自第四期起连载了他所写的“哲学讲座”。

是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艾思奇代表文协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

六月；延安新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艾思奇作了会务报告，毛泽东同志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

**一九四一年（三十一岁）**

五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随后又改为中央研究院，艾思奇任该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他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写成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文章叙述了辩证唯物论的发展情况，批判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以及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等等。

**一九四二年（三十二岁）**

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并亲自布置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主编，在他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及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任务，作整风运动中必读文件之一。

艾思奇在整风运动中严于律己，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有针对性地写了《“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深刻总结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五月间，他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年底，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的代表大会。

**一九四三年（三十三岁）**

年初，调《解放日报》社任副刊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艾思奇当即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对蒋介石反动的“力行哲学”进行了尖锐有力的分析批判，在《解放日报》发表。

**一九四四年（三十四岁）**

除编辑《解放日报》副刊之外，还写了不少文艺和哲学方面的文章（全国解放后选编成《有的放矢及其他》一书出版）。

**一九四五年（三十五岁）**

四月，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八月，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最后完成了海涅的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翻译工作，由林默涵带到大后方出版。

**一九四六年（三十六岁）**

五月，《大众书店》出版了他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年底担任总编辑。

**一九四七年（三十七岁）**

春季，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解放日报》于三月二

十日停刊，报社全体人员向晋察冀撤退。艾思奇于行军途中患副伤寒，不得不留在岢岚县伤兵医院治疗。五月病愈后即启程到晋察冀，在长途跋涉中，受中央委托与张冲夫妇商谈如何使东北的云南军队不要为国民党卖命。

到达晋察冀边区建屏县西柏坡，参加了中央工委召开的土地会议。

年底，受中宣部委托，去解决北方大学的一些问题，随薄一波同志到达晋冀鲁豫边区的长治，工作了一段时期，并拟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因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未成。不久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艾思奇随北方大学从山西长治到河北正定，在华北大学任四部（即研究部）副主任。

**一九四八年（三十八岁）**

十月，中央决定在河北建屏重新开办马克思、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社会发展史。

**一九四九年（三十九岁）**

春，北京解放，马列学院迁入北京。党为提高广大干部以及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应邀到许多单位作报告，还培训了一批教学骨干，编写了系统的讲稿，经修改，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艾思奇针对当时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写了《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这次学习，对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唯物史观、推动其思想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七月，北京召开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艾思奇当

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新哲学研究会常召开一些座谈会，北京哲学界的许多教授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任继愈等一道研究学术问题，艾思奇经常参加活动。

**一九五〇年（四十岁）**

艾思奇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教育部邀请艾思奇为高等学校教师作广播讲座，系统讲授政治理论课，并负责问题解答。

**一九五一年（四十一岁）**

三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在社会科学讲座节目中讲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

冬季，参加中央组织的土改工作团。十一月初到安徽宿县工作了四个月。

**一九五二年（四十二岁）**

春季回北京，又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在这期间，写了一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以后他对文中的一些片面性错误，多次作过严肃的自我批评。

**一九五三年（四十三岁）**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马列学院领导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上，艾思奇和杨献珍同志的意见有分歧，后来杨献珍同志写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送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向一些理论工作者征求对此文的意见，艾思奇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写了《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

当时双方的文章均未公开发表。

八月，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年底，马列学院成立教研室，艾思奇被任命为哲学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岁）**

开始在校内系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初步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作为教材，在马列学院内部印发。一九五七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易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纲要》。

**一九五五年（四十五岁）**

撰写了长篇论文《胡适适用主义批判》，揭露了实用主义的"科学"和"最新哲学"的假面具，剖析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实质。以后他又写了《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从其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三方面，深刻批判了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

五月，参加中苏友好代表团访苏。

秋，马列学院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艾思奇仍为党委常委、哲学教研室主任，并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一九五六年（四十六岁）**

被选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

又增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的另外十二封，共计二十封，并根据本人的译本给党校学员作了讲解。

冬季应邀赴波兰参加哲学学术讨论会。

**一九五七年（四十七岁）**

春季，参加了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就"研究中国

哲学史总的方向”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对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遗产“抽象继承”观点提出异议。

秋，因高血压心脏病去青岛疗养。

**一九五八年（四十八岁）**

上半年单位开展“反右派”运动，艾思奇返校参加运动，运动结束后下放河南。

去河南之前，曾到天津参观学习，应市委邀请给全市干部和工人作了几次哲学报告。

九月与党校十多位同志一同到河南，艾思奇蹲点地区为登封县，任开封地委副书记和登封县县委第二书记。

当时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后，艾思奇赞扬过群众的革命热情。随着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开始泛滥，他在下放期间看到不少问题，于是直接写信给省委负责同志，大意是：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一九五九年（四十九岁）**

一月，他发表了《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一文，一方面赞扬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章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月，当选为第二届人大代表。

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群众力量的发挥总有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有穷有尽方

面。”认为在一定具体工作中看不到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错误。

秋季，下放结束回京。

在总结下放工作时曾严肃地指出：“下面刮‘五风’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认真纠正，农民就要打扁担。”并且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准备出国讲学，写成了《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文章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写到一九四五年“七大”，尚有两题未写成，因故中断，也未出国。

年底，党中央任命艾思奇为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

## 一九六〇年（五十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艾思奇写了《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自延安时代起，艾思奇同志就比较切实地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解放后，他更加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曾多次讲课、撰写文章。一九五〇年发表了《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一九五一年发表了《〈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一九五二年发表了《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等等。

党校于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办自然辩证法班，艾思奇亲自布置教学，并经常讲课，先后辅导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的许多章节，并多次讲了《辩证逻辑》。在他的领导下，党校编写了我国第一批比较完

整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并培养了一批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骨干人材。研究自然辩证法是艾思奇一生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三十年代便致力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指出科学家如不能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就难免陷入形而上学。如在《进化论与真凭实据》一文中，即用丰富的实验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科学内容，有力驳斥了歪曲进化论的邪说。他还积极撰写科学小品，如《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热情从事科学普及事业，是我国最早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之一。他常对身边搞哲学工作的同志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好好学习自然科学，关心新的自然科学理论和前沿科学，把握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向，认真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

**一九六一年（五十一岁）**

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名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艾思奇任哲学专业组组长。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成为建国后第一本较为系统准确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

**一九六二年（五十二岁）**

五月，艾思奇继一九六〇年七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之后，在《哲学研究》上又发表了《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文。

**一九六三年（五十三岁）**

在校内担负大量教学工作，给五九班、六〇班哲学专业讲了七次"历史唯物主义引言"；给五九班党史专业作了《实践论》、《矛盾论》辅导报告；给六一班讲哲学基础课，并应西

北局邀请到西安作了哲学报告。

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离任，短期内暂由艾思奇主持工作。

夏季，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一文。

秋季，写了《画皮下的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实用主义》。

**一九六四年（五十四岁）**

他在高级党校担负了大量教学工作，各种班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各种哲学科目，他都讲授过。

这一年，还在中国科学院、中国文联、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作了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

夏季，在北京召开的亚非地区科学讨论会上，艾思奇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作了《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哲学思想》的报告。

**一九六五年（五十五岁）**

被选为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

五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评"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不容许矛盾调和说来偷换革命的辩证法》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的思想所提出的"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不需要用合二而一来代替和补充。

冬季，党校组织大批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艾思奇到通县南关镇和东北旺公社两次参加"四清"。在四清中，艾思奇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为准备出国讲学，写成了《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

年初和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和杭州两次找艾思奇谈话，讲了许多哲学问题。其中一次是谈关于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

六月一日，《红旗》刊登坂田昌一文章。艾思奇应邀参加《红旗》编辑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座谈会，并发了言，题为：《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后刊登在《红旗》一九六五年第九期上。他曾提出自然辩证法研究要面向整个自然科学领域，既要研究理论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要研究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十六岁）**

年初，自杭州返京，在校内传达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二月应邀参加《新建设》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顺路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发现心脏病已很严重，会后即令其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手准备为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国际共运史撰写前言。并打算用文学笔调再写一本通俗哲学，自信还能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准备退休后写长篇专著。不幸病情日重，于三月二十二日九时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王丹一　卢国英　叶佐英

一九八四年二月底王丹一修订

# 艾思奇著译总目①

## 著作部分

**抽象作用与辩证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正路》杂志创刊号。

**进化论与真凭实据**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正路》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上海《中华月报》第一卷第四期。

**直观主义与理知主义**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上海《中华月报》第一卷第七期。

**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

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读者书房一九三六年版《新哲学论集》。

**“诗人自己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同上。

**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

同上。

**理知与直观之矛盾**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中华月报》第一卷第十期。

**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

**论文学的鉴赏**

一九三四年，上海读者书房一九三六年版《新哲学论集》。

---

① 本索引只收艾思奇同志见诸公开出版物的文章、专著和译著，大体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海涅的政治诗

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七期。

月蚀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上海《新语林》第四期。

中庸观念的分析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上海《申报月刊》第三卷第十期。

神话化的自然科学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太白》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谈佛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新语林》第六期。

哲学并不神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创刊号。

谈死光

同上。

怎样养成判断力

同上。

形式和内容

同上。

对象·抽象·实践（名词编释108则）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十一期。

哲学也有不空洞的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谈毒瓦斯

同上。

读书和创造兴趣

同上。

两个科学问题

同上。

**哲学的真面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谈潜水艇**

同上。

**生死问题和返老还童术**

同上。

**两大类的世界观**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关于提倡写别字**

同上。

**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生产要素的问题**

同上。

**火星中的生物**

同上。

**孔子也莫明其妙的事**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太白》杂志第一卷第九期。

**客观的东西是什么？**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火箭**

同上。

**《人——机械》**

同上。

**由爬虫说到人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上海《太白》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上海《新中华》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不如意的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七期。

意志自由问题

同上。

教育救国及生活读书化

同上。

太阳黑点和人心

同上。

用照相作比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八期。

关于生产要素的问题

同上。

关于“扬弃”一词的疑问

同上。

卓别林和希特勒的分别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九期。

牛角尖旅行记

同上。

抬杠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十期。

由蝗虫说到鸡生蛋的问题

同上。

论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

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读者书房一九三六年版《新哲学论集》。

这次由胡桃说起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

“人类生活的努力”是什么

同上。

我们所能认识的真理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一卷第十二期。

客观主义的真面目

同上。

中风症与黄河

同上。

天晓得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怎样研究哲学

一九三五年五一十月，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一、五、六、十、十二期连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读书出版社以《如何研究哲学》书名出版。

不是变戏法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二期。

怎样能够把书本上的知识活用

同上。

追论雷峰塔的倒塌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三期。

生产力是什么

同上。

为什么写作不能忽视技巧

同上。

没有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各科问题八则

同上。

思想的秘密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受不住热也受不住寒

同上。

青年就是青年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怎样读自然科学

同上。

怎样读哲学

同上。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

同上。

两种态度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七期。

斑马

同上。

抽象名词和事实

同上。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七—八期连载。

七十二变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八期。

教育的反作用在哪里

同上。

物质享受与人类存在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侵略的内容和形式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九期。

通俗文的真义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规规矩矩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十期。

读经吗？读外国书吗？

同上。

在劫者难逃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

怎样使思想正确

同上。

观念论的要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上海《生活知识》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你连自己的一切都不了解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七期。

什么是机械论的唯物论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上海《生活知识》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几个哲学问题

同上。

谈谈新的唯物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上海《生活知识》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论黑格尔的哲学的颠倒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新中华》杂志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吃了亏的人的哲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经验还是实践

同上。

哲学问题四则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人生的三大真理

同上。

思想上的官样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上海《生活知识》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各式各样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

同上。

失业闹乱子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

全国学生都活跃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有冤无处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四期。

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

同上。

非常时的观念形态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五期。

生活难、汉奸、民族道德及其他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

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社出版。本书原在《读书生活》杂志分期连载。单行本出至第四版时，遭国民党反动派查禁，遂改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作者对本书曾作过几次大的修改。其中一九五〇年的修订稿因故长期未能出版，直到作者去世后的一九七八年才始得和读者见面。书前有李公朴先生的“序”和作者的三篇再版说明，书末附有《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

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七期。

**何必悲观**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怎样养成判断力**

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知识的应用》。

**数学公理的来源**

同上。

**〔知识的应用〕**

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写的十七篇答读者问的文章，分作五类问题。书前有李公朴先生的"序"。

**世道不同了——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五期。

**关于理论批判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三卷第十期。

**我们不是野兽**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六期。

**什么叫做进步**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七期。

**马达救国论的错误**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上海《通俗文化》第三卷第八期。

**阿比西尼亚失败的教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一期。

**再论阿比西尼亚的失败**

同上。

**救国决不是不要科学**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斯达汉诺夫为什么工作得很好**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十期。

---

① 〔 〕内的篇目是艾思奇同志的文章结集。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二期。

真理的问题

同上。

宪法和国民大会

同上，

〔新哲学论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读者书房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在此前后三年中写的重要论文十五篇，分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三个部分。书前有作者“自序”一篇。

谈翻译

一九三六年六月，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哲学研究大纲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三期。

诚恳的忠告

同上。

恋爱能阻止人们前进吗

同上。

认识论的问题

同上。

敌人自身的矛盾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十一期。

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四期。

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

同上。

文艺家成立之日的感想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光明》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侵略者的光荣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

文学争论中得到的结果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实践与理论》。

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上海《文学界》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抗战的前途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上海《通俗文化》第四卷第一期。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生活》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

职业界的救国自由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七期。

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

同上。

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现世界》杂志创刊号。

关于《哲学讲话》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八期。

《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

同上。

青年与战争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上海《现世界》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纪念“九·一八”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九期。

到学校去和到民间去

同上。

历史的内因论的具体问题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十期。

科学的国防动员

同上。

证明自己的统治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第四卷第十一期。

怎样做读书笔记

同上。

思想方法论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发行。本书被列为张仲实编的“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种，共六章，有作者“后记”。

从新哲学谈到爱国青年的自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世界》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胡适也挑拨离间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论民族的不自信

一九三六年'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除去着色眼镜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创刊号。

相对和绝对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二期。

旧戏不够反映生活

同上。

民族解放与哲学

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大众文化社出版。本书被列为杨东莼主编的“大众文化丛书”第一辑第二十四种。

文明又输入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上海《生活学校》杂志第一期。

赛金花的风波

同上。

哲学问题等六十五则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七月二十五日，上海《生活学校》第一—六期。

〔哲学与生活〕

一九三七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这段时间写的“读书问答”专辑。一九八〇年六月，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的节本。书前有毛泽东同志的《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和《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十九页的手稿。书后附录王子野同志的《学习毛主席认真读书、不耻下问的精神》和王丹一同志的《关于毛主席给艾思奇同志信的几点回忆》。

新启蒙运动座谈录

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读书》杂志创刊号。

老虎打架和人类打仗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生活学校》杂志第二期。

关于思想方法论的问答

同上。

从二加二等于四说起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上海《生活学校》第三期。

沉闷时局中应有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实践与理论》。

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

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版夏征农主编《鲁迅研究》。

河为什么向前流

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实践与理论》。

论思想文化问题

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认识月刊》杂志创刊号。

从哲学的用处说到爱国的自由

同上。

身边琐事与伟大远景

同上。

论批判

同上。

民族问题及其他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上海《生活学校》杂志第四期。

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国民周刊》杂志第八期。

辩证唯物论梗概

一九三七年，上海《中国农村》杂志第三卷第七期。

命运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上海《生活学校》杂志第五期。

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上海《文化食粮》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再论批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实践与理论》。

思想的自由与共同的路向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上海《中华言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不要放松思想的岗位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上海《文化战线》杂志第一期。

文化在抗战中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上海《抗战三日刊》第六期。

信任政府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上海《抗战三日刊》第七期。

对于撤退应有的认识

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实践与理论》。

民众组织的民主原则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海《文化战线》杂志第三期。

论爱国主义

一九三七年，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难民问题要加倍注意

同上。

怎样解决职业和事业的矛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海《自修大学》第一卷二辑第十二号。

〔论读书〕

一九三七年，学习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怎样读书才会有兴趣》等三篇文章。

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群众》杂志第三卷第八一九期。

文艺创作的三要素

一九三八年三月，武汉《战地》杂志创刊号。

谈谈边区文化

一九三八年四月，武汉《战地》杂志第二期。

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一九三八年四月，武汉《自由中国》杂志创刊号。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

一九三八年四月，延安《解放》杂志第三十三期。

克服自己的弱点

一九三八年《军政大学》第四期，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批评不是诡辩

一九三八年五月，武汉《自由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山西敌区工作团第一支队投敌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延安《解放》杂志第四十六期。

受敌我双方委任的两面游击队

同上。

共产主义者与道德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延安《解放》杂志第五十一期。

美国修改中立法问题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杂志第六十一六十一期。

抗战文艺的动向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延安《文艺战线》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哲学选辑

艾思奇编。一九三九年三月延安初版。本书是根据当时学习哲学的迫切需要着手编辑的，编选宗旨和目的均在“编前”的话中详细说明。全书分“绪论”和正文四章。书后附录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编者自拟的《哲学研究提纲》。这个提纲共分六节，每节末了都列有若干思考题和参考书目。

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延安《文艺战线》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使三万双睡眼睁开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延安《新中华报》。

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延安《新中华报》。

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科学历史观教程

一九三九年延安初版。当时，中宣部决定在党内外进行一次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艾思奇和吴黎平受组织的委托，共同编写了这本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较为通俗的教材。本书在延安用《唯物史观》书名出版，《科学历史观教程》是在国统区出版时用的书名。

读书问答

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海《读书月刊》杂志第一卷第五期。

〔实践与理论〕

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在上海和初到延安工作时期写的文章三十八篇，以及翻译的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其中“哲学讲话”十一篇，原拟写成“历史唯物主义通俗讲话”，但因形势变化而未能完成。

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理论和现实》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杂志第八十二期。

统一和斗争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杂志第八十七—八十八期。

反汪精卫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延安《中国青年》第二卷第一期。

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

同上。

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延安《解放》杂志第八十九期。

论中国的特殊性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

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日出》在延安上演

同上。

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哲学是什么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一卷第四—六期连载。本文是作者为延安新哲学会专门编写的哲学基本教材。

**什么是辩证法**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一—五期和第三卷第一期连载，是上文《哲学是什么》的继续。这部分“哲学讲座”连载到第四章《论对立统一（上）》即止。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文学上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十期。

**弄文艺的人要注意宪政运动**

一九四〇年，大众书店一九四六年版《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自由亡国论**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一致性**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延安《解放》杂志第一二四期。

**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

一九四一年，延安解放社出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延安《解放》杂志第一二六期。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杂志第一二七期。

**光明**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延安《中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六期。

**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三期。

**反对主观主义**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二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主观主义的来源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同上。

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同上。

不要误解实事求是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同上。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同上。

“有的放矢”及其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同上。

学习观念的革新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同上。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同上。

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上。

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同上。

共产党的本领在哪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同上。

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同上。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同上。

两个相反的传统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同上。

谈起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同上。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

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同上。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同上。

感想与回忆（二）

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

六·二三纪念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同上。

向“瓢虫”的子孙们警告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同上。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同上。

扒手的鬼计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同上。

《逼上梁山》

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同上。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同上。

人民的军队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四日，同上。

劳动就是整风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同上。

向日本弟兄们致敬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同上。

群众自己的秧歌队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同上。

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同上。

《惯匪周子山》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同上。

美术工作者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同上。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上。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同上。

“中国大众的立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同上。

降魔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上。

谈面子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同上。

不埋没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同上。

打击与回击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同上。

再谈面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同上。

柱子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上。

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上。

血肉相连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同上。

难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同上。

一往无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同上。

东方强盗就缚以后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同上。

反面文章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同上。

一个声援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同上。

从理论工作看博古同志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同上。

〔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

一九四六年五月，大众书店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在上海和延安工作时期写的四十篇文章，分四个部分，其中大多数论文，紧密联系当时抗日战争实际，阐发自己鲜明的思想立场和见解。

谁是杀人的凶手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

反对经验主义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学习与行动结合

一九四九年二月，天津知识书店《论主观主义》。

论精通业务

同上。

〔论主观主义〕

一九四九年天津知识书店出版。本书收入《主观主义的来源》等论文六篇。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从头学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学习》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学习》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学习》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

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关于几个哲学问题

一九五〇年一月，《新建设》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反驳唯心论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学习》杂志第一卷第六期。

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方法

一九五〇年五月，山东新华书店版《学习发展史参考资料》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同上。

学习的目的与基本方法

一九五〇年七月，《展望》丛刊第一辑。

〔从头学起〕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联书店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在此一时期所写的论文《反驳唯心论》等七篇。

前进一步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学习》杂志第三卷第一期。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

一九五〇年，本书是艾思奇同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稿。工

人出版社等曾以单行本多次出版，中间曾由作者进行大的修改，一九五五年由北京三联书店用本书名出版。

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学习》杂志第三卷第二期。

论思想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一月，《学习》杂志第三卷，第七期。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

〔“有的放矢”及其他〕

一九五一年三月，海燕书店出版。本书收入作者一九四一年原在延安写的哲学、文艺随感录共三十八篇。书前有“自序”。一九七九年，北京三联书店重印了该书的节本。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学习》杂志第四卷第四期。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一九五一年六月，《学习》杂志第四卷第五期。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新建设》杂志第四卷第六期。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四卷第十一期。

认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

一九五二年三月，《学习》杂志第五卷第三期。

关于《矛盾论》问题解答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学习》杂志第五卷 第六期。

关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上海《文汇报》。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一九五二年六月，《新建设》杂志第六期。

机关青年应当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

学习斯大林的学说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学习》杂志第三期。

怎样正确认识和争取我们的远大前途

一九五四年五月，《中国青年》杂志第九期。一九五五年三月，作者对本文加以改写扩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为书名出版单行本。

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学习》杂志第十期。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学习》杂志第一期。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该社把本书和《批判梁漱溟的哲思想》合并，以《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为题重印。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批判胡适实用主义》一文的修改说明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学习》杂志第三期。

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学习》杂志第四期。

在列宁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哲学研究》第四期。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七七年，该社把本书和《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合并重印发行。

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哲学研究》第一期。

唯物辩证法范畴简论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七年，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否定之否定简论

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光明日报》。

哲学讲座·引言（辩证唯物主义第一讲）

一九五七年二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

一九五七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在中央党校的讲课稿，并曾在中央党校内部印行。一九五九年，经修改补充，用《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的书名再版。一九七八年，人民出版社重印发行。五十年代，“提纲”一书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一九五七年，见山西《晋阳学刊》一九八三年第一—二期。

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哲学研究》第三期。

工人与哲学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三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版《破迷信，大家学哲学》。

哪里找根据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第四期。

改革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一九五八年八月，《哲学研究》第四期。

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争鸣》第十期。

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哲学研究》第七期。

破迷信立科学无往而不胜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州评论》第一期。

学习哲学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州评论》第二期。

认识客观规律　鼓足革命干劲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

一九五九年二月，《红旗》杂志第四期。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哲学问题

一九五九年七月，《史学月刊》第八期。

我们要歌颂风雷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新建设》杂志第十一期。

纪念斯大林诞生八十周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四月，《八一》杂志第七期。

学习列宁，保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一九六〇年四月，《哲学研究》杂志第四—五期。

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在党史学习中掌握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〇年，见中央铁道部党校《理论研究》一九八一年试刊号。

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九六一年三月，《哲学研究》第二期。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艾思奇主编，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供高等学校文科使用的教科书，一九六二年修订再版。一九七八年，人民出版社重印第三版。一九七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等单位翻印在军内发行。一九八〇年，法国一百周年出版社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附有简要介绍。

外行与内行

一九六二年二月，《新建设》杂志第二期。

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一九六二年九月，《哲学研究》第五期。

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月，《教学与研究》第五期。

曲折前进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一九六二年，见《昆明师院学报》一九八〇年十月第四期。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一九六三年二月，见江苏《群众》论丛一九七九年创刊号。

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

一九六五年八月，《红旗》杂志第九期。

## 人类认识的总规律

一九六五年，见中共中央党校《探讨》杂志一九八一年试刊二期。

## 〔艾思奇文集〕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编辑。一九八一年起由人民出版社分卷 出版。本文集侧重收入艾思奇同志各个时期撰写的部分 哲学著作，集中反映作者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成果。其他方面的著作则极少收录。

## 〔论文化和艺术〕

本书收入艾思奇同志文化艺术理论著作三十四篇， 丁玲同志作序，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

# 翻 译 部 分

## 新哲学大纲

苏联米丁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一九三六年六月， 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译第一部分， 郑易里译第二部分。全书译完后，由艾思奇统其成，并作译者“序”。

##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德）海涅著。这部长诗，艾思奇从一九三一年开 始陆续翻译，一九四五年夏译完，次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一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译者的修订稿出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由作家出版社印行第二版。书末有“译者后记”。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三八年， 艾思奇同志在延安曾节译过其中的九封信， 用《马恩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为题发表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六期上， 一九五一年出版单行本。 一九五六年，除原有九封信外，又新译了另外十二封，共二十一封，并以本书名出书。 艾思奇根据自己的译本，在中央高级党校作了该书的辅导报告。

**火星**

（俄）·A·蒲格达诺夫著。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在上海《通俗文化》杂志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连载。

**最近物理学展望及宇宙线问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国际每日文选》第七十六期。

**论现实**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上海《文学丛报》第一期。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 重版后记

本书在一九八一年春天初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近年来，又有不少同志撰写了回忆艾思奇同志的文章，其中，有的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有的没有公开发表。根据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意见，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重新编排，收入许多新作，并且把《艾思奇年谱》和《艾思奇著译总目》附于书后，供有兴趣了解和研究艾思奇同志的生平和思想的读者参考。我们谨对热情支持本书出版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和众多的作者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一九八四年